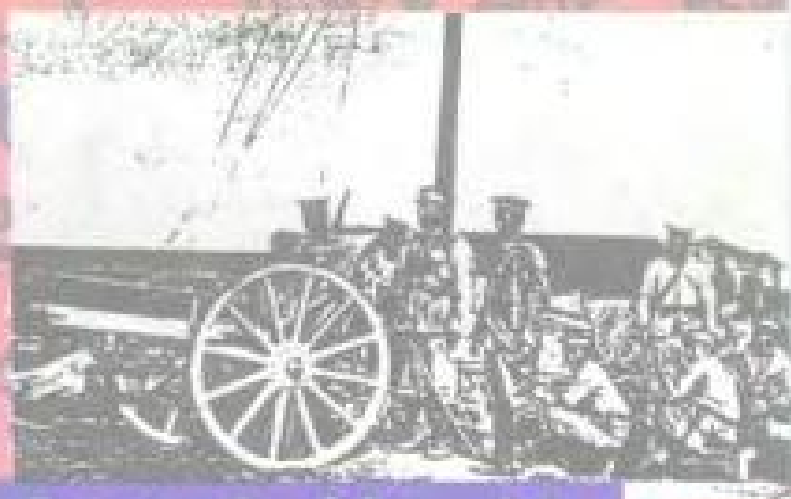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澳〕冯兆基(Edmund S.K.Fung)著

郭大风 译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军事近代化

与中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E295
2

DG94/30 89390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澳] 冯兆基(Edmund S.K.Fung)著

郭太凤 译

军事近代化 与中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唐克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澳] 冯兆基 著

郭太凤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68,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1634—4/K 395

定价 12.75 元

英文版序言

尽管这部著作不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但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辛亥革命时期河北省革命运动的博士后研究工期间，开始对晚清军队产生了兴趣。河北为这场革命中的新军作用提供了饶有趣味的研究素材。不过后来我觉得，为了更深刻更充分地理解最终导致清皇朝垮台的新军的作用，必须开阔视野，越出河北一省的界限和革命党人的活动看问题。从博士后论文中取出几篇文章发表后，我对1903年至1913年间的军事演化展开范围更加宽广的研究。

本著作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在格列菲斯大学完成的，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转借来的资料使我获益匪浅。我还花了些时间外出收集资料：1976年至1977年的夏季（南半球）在堪培拉，1977年7月在悉尼的米切尔图书馆，1977年至1978年的冬季（北半球）在伦敦公共档案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还有幸访问了台湾的国民党档案馆和东京的东洋文库。

本著作涉及的中文姓名和专用名词用中国的拼音系统处理。然而，为了方便起见，也有些例外。通商口岸和设有外国传教机构的城市遵循邮致惯例，使用韦氏拼音法，因而济南用 Tsinan，不用 Jinan；天津用 Tientsin，不用 Tianjin；广州为 Canton，而不是 Guangzhou；北京用 Peking 来代替 Beijing，台北用 Taipei（用于资料出处）来替代 Taibei，蒙古用 Mongolia 替代 Menggu，而西藏则用 Tibet 替代了 Xizang。英语写作中人所共知的著名人物的姓

2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名,也照习惯用法保持原样。而不按北京话书写。因此,孙逸仙用 Sun Yat-sen,不用 Sunyixian。

这部著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一些人的鼓励、指导和支持,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良师益友王光武教授理应名列首位。他在我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予鼓励。他读了本著作的最后一稿,并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我还得感谢 C·P·菲茨杰拉德荣誉教授,陈志让教授以及欧内斯特·P·杨教授。他们对博士论文的评论,使我开阔了对新军研究的思路,从而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在格列菲斯大学,我的两位杰出的同事 C·P·麦克拉斯教授和 D·H·麦克米伦博士阅读了本著作的手稿,提出修改意见,还在文字上作了些润色加工。至于这部著作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当然由我本人负责。

本著作第九章曾发表于《远东史学论丛》第19期(1979年3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同意将这篇文章收入本著书,我对此表示感谢。

书中的照片都取自德国出版的一部当代影集《中国的革命》,经格列菲斯大学图书馆许可后采用。

我还受惠于格列菲斯大学的资助。如果没有这项资助,我将无法去堪培拉、悉尼和伦敦从事访问研究。我应该感谢詹尼弗·帕克斯夫人和埃姆·佩莱康诺斯女士,她们为我的手稿打字,工作极其认真仔细。此外,我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全体人员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的编辑工作,并在其他方面给予指点帮助。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穗芳给我的精神支持。如若没有她的理解和鼓励,这部著作将无法完成。

冯兆基

1978年11月于布列斯班

中文版前言

郭太风教授1990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访问研究期间，建议将我的著作《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直译《中国革命的军事因素》）译成中文，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深感荣幸。这部著作在国际上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但我不清楚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注意到了这部著作。令我欣慰的是，中译本有幸问世，使中国读者得以顺利地阅读。

郭太风教授尽心竭力地翻译这部著作，我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郭太风教授本人就是有造诣的军事史学者。他的译文准确、忠于原著。他学风严谨，文笔老练，使译著通顺流畅。在翻译过程中，他还发现英文版一些排印错漏，同我磋商后，逐一纠正。如此翻译，确非易事。英文本中若干人名和地名无法确切地译成中文，这是郭太风教授碰到的一个难题，然而责任不在于他。我研究时引用了部分英国和美国的资料，其中有些专用名词没有标明中文。由于少数几个人名和地名鲜为人知，因而无法查实，只能采用音译。

沈渭滨教授撰文介绍，使中译本锦上添花。沈教授是杰出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里名扬海外。他对我的著作感兴趣，并不吝赐文，我谨表深切的谢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译著。从商业角度看，出版学术著作不能盈利，中国与其他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希望出版者最终会发觉，出版这部著作是值得的。

冯兆基

1991年7月于布列斯班

序 言

沈渭滨

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终于在我国出版了中文本，这是值得高兴的。

作者冯兆基博士，澳大利亚格列菲斯大学亚洲国际研究院院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这部著作，是他早年在澳洲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开始酝酿写作的，1980年由澳洲国立大学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英文本。欧、美、澳学者纷纷发表书评，认为此书在中国近代军事史和辛亥革命研究中，“填补了相当大的历史空白”；并把它和美国学者拉尔夫·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并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军事史的两大力作。

我读了此书的中文译稿后，觉得西方评论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出版于1955年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军事力量的权威性作品，那么冯兆基博士的这部著作，堪称80年代西方研究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的代表作。

二次大战前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在观察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大多以“冲击—反应”作为分析模式，力图证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但是，随着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的失败和不发达国家的迅速崛起，新一代的西方学者

2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经过痛苦而又冷静的反思之后，纷纷转向从这些国家内部去寻找自身成长起来的积极因素，分析框架为之一变。冯兆基博士的这部著作，恰是两种分析模式交替时期的研究成果。就其主要内容看，也是这种新趋向的一个重要收获。

他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军事改革和社会反响，第二部分论述军心动摇和兵变过程，第三部分则探讨辛亥革命及其后果。三个部分以次递进又互为依存，完整地构成了对清末新军的兴衰过程及其与辛亥革命、民初政局关系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的主要特色就在于作者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和叙议结合的方法，从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寻求中国军事改革的必然性；从传统的文化结构和知识阶层对军事改革的共识来解释新式陆军的发展；通过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工作的分类比较，士兵成份构成的分析，士兵传统性冤苦的描述，自然灾害对新军心态的影响，以及清皇朝财政困难、管理不善引起官兵的怨愤等，说明新军对朝廷离心倾向普遍增长；从军事角度论证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分析新军起义对立宪派及地方士绅背叛清皇朝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都督擅权和军阀割据论证维护“以文治武”传统的必要等。这些都是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中忽视或开掘不深的方面，显出了作者向中国社会深层求索中所达到的新水平。

作者视野开拓，论证缜密，在分析中时时闪出思辨的火花，发人深省。例如作者在第四章《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中，把中国近代尚武主义的兴起和军国民教育的鼓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和好战尚武的两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说明新式知识分子颂扬尚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军事统治或构筑军国主义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在促进国防近代化的同时，扭转民众鄙视军人的陈旧观念和和平主义的心理定势。作者指出，一支充满新生活力的军队，不仅是国防的工具，而且将成为新道德的象征，带动尚武

的民风。作者的这种见解，对辛亥革命准备阶段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弃文就武的活动，确实是一种独辟蹊径的解释。

作者分析新军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时，认为革命策反活动只是造成新军动摇的因素之一。军事近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政治性经历，有助于军人形成近代化世界观，使他们认识到清皇朝积弊已深，国家处在危亡生存的十字路口，这就促使新军滋长起近代的国家民族意识。清政府多方扶植这种意识，力图把它引向排外。“不过，民族主义是双刃利剑，当它被用来反击外来侵略时，也砍向了满清统治者。”把民族主义比喻为双刃利剑，来说明军心动摇对朝廷的潜在威胁，既生动，又令人生发出历史联想和感慨。

作者认为新军的反戈一击，不但摧毁了一个旧政权，而且冲垮了中国“以文制武”的传统统治模式。在民国初年政治不稳的年代里，军方不但倾心于获取权力，而且在政治角逐中比文官集团准备得更充分。作者指出：传统模式被摧毁，造成民初都督擅权乃至后来的军阀割据，民众遂失去政治方向和心里定势。这个观点不仅对人们思考辛亥以后军阀势力的形成有启迪意义，而且为理解当前某些不发达国家中军方势力的增长开创了一条新思路。

我不敢说包括上述见解在内的本书主要观点中国学者都会同意。但可以肯定，作者所取的分析框架和力图从社会结构、阶层集团、政治机制、思想文化，价值判断，乃至社会生活状况、自然灾害影响等方面解释历史，这种立体的研究方式，大多数中国学者是会感兴趣的。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布洛赫所说：历史学家要有提出新思路的创新精神，历史著作只有闪现出思辨和史识的光彩，才有久远的价值。

冯兆基博士不仅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也有不少著述。1985年在美国出版了他与David Pong教授合编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收入了十

4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多篇论述中国近代社会及政治变迁的新作。同年，又与格列菲斯大学 Coln mackerras 教授合著《从疑惧到友好交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演变(1966—1982)》，由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他致力于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已完成了题为《帝国的外交退却—不列颠的华南政策(1924—1931)》一书。由此可知他是一位勤奋著述的学者。

我与冯兆基博士素不相识，只是因为专业的需要，才多次希望郭太风能把这部著作译成中文，设法出版。太风本人对中国近代军事史作过长期的研究，他发表的有关八旗、绿营俸饷制度的论文和关于清皇朝解协饷的研究，至今仍为军事史学者所重视。由他承担翻译此书的任务，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中英文表达理解等方面应不成问题。他不辞辛劳，翻译经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项有益的工作，并得到了原著作者冯博士的赞赏，称其译文正确，忠于原著，文笔老练，通顺畅达。我作为他的老师，也深感欣慰。

冯兆基博士的这部成名作，经过13年之后才被介绍到中国来，实在是太晚了一点。但是，它能以中文版与中国同行见面，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相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中国历史上新一轮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双向流播热潮必将很快到来。地球变小，距离缩短，东西方学人都能潇洒走一回了。

1993年9月18日序于复旦大学文科楼

DG94/30

献给穗芳和育君

To Lucia and Eugene

目 录

英文版序言	
中文版前言	
序 言	沈渭滨
导 论	(1)
第一部分 陆军改革与社会反响	
第一章 新军的形成	(16)
第二章 管理机制改革与军事财政	(47)
第三章 军事教育与民族主义	(79)
第四章 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	(110)
第二部分 军心动摇与兵变	
第五章 湖北新军的革命运动	(144)
第六章 大江南北的其他军队	(182)
第七章 华南新军与北洋军	(212)
第三部分 革命及其后果	
第八章 1911—1912年的革命	(244)
第九章 1912—1913年的陆军状况	(282)

第十章 辛亥革命引起的思辨	(310)
附录一 1906 年清政府筹建 36 镇新军及 摊派给各省额数	(319)
附录二 辛亥革命爆发时新军分布状况	(320)
注释中的缩写	(322)
参考书目	(323)
译后记	(349)

表格目录

表一	一镇兵力·····	26
表二	1905年和1906年各省承担军饷情况·····	68
表三	1911年主要省区的军费预算·····	72
表四	1909年11月实施的文武官职对照表·····	111
表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部队·····	255
表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外的部队·····	257
表七	1911年10月至12月各省的革命·····	261
表八	中国民军编制一览表·····	287
	——军队各级单位新旧名称对照	
表九	中国民军编制一览表·····	288
	——各级军衔新旧名称对照	
表十	1913年划分军区计划·····	298
表十一	1915年划分军区计划·····	299

导 论

中国所有传统机制中，或许没有什么比军事组织更受西方鄙视的。“质量差到不足以挂齿”，那些对中国了解不深的外国人往往用这类话来论定中国陆军。19世纪，这个封建皇朝与外国进行一系列战争的结局，似乎证实了这一结论。难怪，1903年清政府宣布将按近代方式重建中国陆军时，外国观察家们自然十分怀疑中国人最终整治好军事机器的能力。

中国虽然有厌恶尚武主义的传统，但一直拥有组建一支优良军队的自然材料。一般说来，中国人是天生的宿命论者，顺从而很少有所需求。他们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显示出忍耐力和忠诚性，这是战斗人员最难能可贵的素质。中国士兵只依靠极少的给养就能维持生存，并进行长途征战，必要时即使被迫露宿也毫无怨愤。他们可以忍受有损于健康的环境，对一些曾摧毁许多西方军队的常见疾病似乎有免疫力。虽然他们比较适应于消极防御，不具备日本士兵勇狠敢斗的本性，但一旦有优秀的领导和称职的军官，他们会发动令人生畏的攻势。

新建陆军由遍布全国的许多镇(师)组成，被看作有别于各类地方部队的一支国家军队。最早编练成的北方六镇，通常称为北洋军，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大。在南方，陆军这个词似乎不很常用，那里新组建的镇常称为新军。为了避免概念混乱，本书无论在什么场合提到“新军”，都表示新式陆军的各支部队。

· 编练新军计划具有对外和对内双重目的，即抵御外来的侵略

和扩张,平息国内的革命挑战和集团内部的冲突,从而维护国家利益。这是清廷整体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强化清帝国地位,以对付外来侵略者和国内反叛者。与民政管理改革相仿,新军显示出它的功绩,也暴露出不足之处。尚武精神坚实地增长,军人地位得到稳步提高。军队士气随之高涨,因而更具有团结精神。另一方面,军官们还远远不能胜任工作,训练和武器装备缺乏统一性,军事运输和通讯设施不完备到可悲可叹的地步,腐败现象仍然猖狂蔓延。总面言之,尽管新军自从创建以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用西方或日本的标准来衡量,新军离近代化还有一大段差距。然而,新军正在朝近代化方向前进,因此,可以把它看成一支近代化过程中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军事历史上正在发生第一次令人瞩目的变化。

军事改革显然影响了中国人对军人的看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向来墨守成规,鄙视当兵打仗的人,而且他们在19世纪末是否不再抱有偏见,仍然是很成问题的。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对士兵的鄙视减少了些,许多有文化的人确实选择了军事职业。而且,新一代的中国学人士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中国需要一支强大的近代化军队,中国人需要改变对尚武价值的心理定势。作为建立强大而有尊严的中国的一条途径,振武主义事业得到知识分子和清政府的支持。

1911年,当清皇朝无法有效地驾驭新军并用它去抵御革命冲击时,就走向了灾难。就象清政府深切认识到的那样,新军是不满现状的。新军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与世隔绝或自我封闭的。与此相反,从军人的社会背景到激动人心的政治潮流,都成为外界影响渗透进新军内部。换种说法,军人对引发革命的各种力量没有抵御能力,国家的形势使知识界精英、乡村民众和城市贫民离心离德,也使军人心怀异志。确实,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前,军

队早已受到外来思想,国内势力、传统不满以及革命宣传的侵扰颠覆。革命刚刚爆发,南方省份的大批新军马上宣布支持共和事业。北洋军队虽然在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制,但也有所不满不忠,这就对清政府的毁灭起了作用。

本书集中探讨新军以及它对清皇朝最终垮台所起的作用。第一部分论述军事改革和社会反响,第二部分论述军心动摇和兵变的过程,第三部分则探讨辛亥革命及其后果。20世纪初新的军事改革运动当然可以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为了节省篇幅,1903年以前的军事沿革不作详尽论述。同样,对正在遣散过程中的各省旧式军队也不多展开。本书集中论述1903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的理由是,1903年12月练兵处设立后才开始创建新军,而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于1912年,但直到1913年才处在新总统牢固的控制下。然而,对所谓的“二次革命”着墨不多,仅限于刻划跟军队态度有关的内容。对民国初期整顿军备也不逐一展开,以免这本书变得冗长庞大。

要论述辛亥革命的军事因素,首先必须考察中国军队和军事机构所发生的整体性变革,无论改革成功与否都要论及。这在前3章完成。然后,我们将进而研究新军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社会各界在财政、道义和思想方面对新军的支持,动用新军来维护国内秩序和平息动乱,以及新军在增强或削弱不同团体的社会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本书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问题都阐述得淋漓尽致,只能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讨论。这种探讨以第四章为主,并散见于其他章节中。

本书第二和第三部分并不试图研究辛亥革命,有关这场革命运动的著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了。这两部分的重点放在迄今被忽略的领域,即新军不满现状以及它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对这场革命早期研究的倾向是,集中论述同盟会运动以及孙中山、黄兴和其他

4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革命党领袖人物的作用。^①近些年的学术成果,反映出对著名的改革精英^②、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员以及绅商等非革命党人的作用表现出很浓烈的兴趣。现在的研究兴趣,大多转向晚清行政管理改革和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学术界还相当重视研究义和团运动以后10年间社会发生的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新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提出了清政府不愿意也不能够接受的种种新要求。因此,改革导致革命的论题在近期一些著作中得到充分展开,一致论定清皇朝最终垮台是1910年至1911年改革精英们离心离德造成的,不是软弱面支离破碎的革命运动的功绩。如果清政府采纳改革精英们早开国会的建议,如果清政府愿意并且有能力更为迅速果断地走上宪政道路,那么它就可以在20世纪的政治剧变中存活下来。^③

学术界对改良主义者,特别是对立宪派的作用表现出新的兴趣,力图说明清皇朝的覆灭可归因于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并且纠正了过去一味推崇孙中山和同盟会主要人物的论调。然而,在强调改良主义者、立宪派人士和省谘议局议员作用时,近来的学术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了革命党人在行业团体和地方团体里的贡献。尽管这场革命运动存在派别活动,而且组织上也软弱松散,但它的重要性不以是否由同盟会领导为转移,而在于为推翻清皇朝打下了基础。

本书坚信,就论及的新军而言,河北的革命运动组织得相当好,它的特色显然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武昌的革命力量非同寻常,不宜将革命成功贬低为侥幸取胜。^④武昌起义尚欠成熟,但它不是继各地所有起义失败后的一个偶发事件,它不啻是指引其他各省纷起反叛的灯塔。

尽管已经有论著研究了河北的革命运动,但对那里颠覆性团体的组织演变,还留有深入探讨的余地。这样的深入探讨(参阅第

五章) 将证明河北团体的发展不仅有显而易见的连续性, 而且在组织和策略方面, 它们虽然同其他地区的革命团体有相似之处, 但与众不同的特色更值得注意。这还将证明武昌起义不是偶发的运动, 而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政变。毋庸讳言, 起义是经过一再拖延后, 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被迫发动的。从这个角度看, 起义爆发的本身是始料不及的。一项秘密计划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以后就酝酿了, 定于同年9月采取革命行动。虽然革命军人是志趣不尽相同的一个群体, 但他们为了试图发动一场起义, 都愿意求同存异, 至少暂时如此。承认这项秘密计划, 并不意味着分析密谋就足以解释革命, 这当然是解释不了的。人们必须考察引发革命的社会背景、政治势力和经济因素。然而, 完全忽略密谋的作用, 就象夸大其重要性一样, 是背离实情的。实际情况是, 革命往往在阴谋和秘密计划达到心理上最适应的瞬间爆发, 或在种种力量汇聚成最适于谋反的形势中发生。

考虑湖北革命运动时, 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 即中国许多地区的革命运动通常是零零星星而且效果很小的。地方革命团体极少采取联合行动, 这是同盟会运动疲软的部分原因。同盟会革命党人在许多省份进行活动, 但他们的活动大多限于个人努力, 无法凝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

为了把湖北新军与其他地区新军作对照比较, 我们将考察另外一些省份, 其中包括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云南、东三省以及北洋军驻守的京畿地区。再次出于行文简洁的需要, 这项考察将不包括其他许多省份。但是, 考察部分行省足以说明, 新军中已经或多或少存在着不满情绪, 而且除了京旗第一镇和禁卫军以外, 各支部队的忠诚性已经很令人怀疑了。尽管革命党人的影响仅仅是造成部队不满现状的众多因素之一, 但他们在大多数正规部队里展开了活动。

军事颠覆的进程确实存在。军事颠覆这个词用在这里具有特殊含义。它首先表示一种革命过程，革命党人和急进民族主义者在军事组织内外展开活动，从而策反军队。其次，军事颠覆表明军人出于种种因素而离心离德，这些因素使他们不时地公然反抗军事当局。不必把这类军人同任何革命党派联系起来。军事颠覆的第三层意思是指环境的力量侵消了部队的忠诚性，即社会政治大形势对所有人的影响，军人也不例外。军人尽管携带武器，身着军装，但在政治上与心怀不满的平民百姓无所区别，因此他们不是与世隔绝的。第一种情况是，革命党人通过对军队的渗透和深入细致的革命鼓动，有计划有组织地策反军队。为了便于讨论，不妨称之为革命颠覆。第二和第三种情况是军人的行为受到传统性怨愤、个人野心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导致革命的社会动乱所怀有的自发感情。所有这些因素经常程度不等地出现在同一时期，相互联系，影响着局势，最终破坏了满清当局长治久安所依赖的军队忠诚性。

有许多因素使军队受到颠覆。主要的因素概述如下（不以重要性为序）：

一、新军的社会成份。有文化新型军官阶层的出现，受过教育的青年投笔从戎，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应募入伍，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军队的成份，并使军队懂得国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政治形势。受过近代教育的军官越来越关心国家面临的问题。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和急进学生进入军队后，在普通士兵中扩大他们的影响。^⑤在社会面临危机，经济陷入困境之际，普通士兵的自身利益失去保证，他们变得不易驾驭了。而且，士兵大多出身于农民，一般都驻扎在本省，通过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与当地农民保持密切关系，并且同情他们。因此，士兵经常感受到家族纽带、乡土观念和个人思想情绪影响着他们自己的行为。^⑥这样的士兵不

可能被国家当作无限制的镇压工具来使用，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往往跟贫苦民众和乡亲故友毫无区别。

二、革命党人在活动。某些地方颠覆军队的活动是范围更宽广的推翻清政府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青年革命党人活跃于军内外，鼓吹颠覆性的思想观念，并组织各种文化社团，在合法的外衣下从事革命活动。

三、军队中的民族主义和排满倾向。近代民族主义在某些重要的新军部队里发展起来，对军队秩序显然起着颠覆破坏作用。当事实证明清皇朝既不能应付外来挑战，又无法处理好国内问题时，许多青年军官成为急进的民族主义者，并滋长了排满情绪。

四、士兵传统性的冤苦。贪污资金和侵吞士兵军饷的腐败风气仍在部分高级军官中盛行。军队生活并不意味着轻松自如，操场训练和课堂学习的难度都在增加，紧张的操练往往是危险而且过分艰苦的。部分地区伙食差，环境肮脏，生活条件之恶劣简直骇人听闻。军纪是严厉的，有些镇还在实施体罚。军官时常虐待士兵，在社会活动方面与士兵格格不入。何况，经修改的征兵制是强制实施的，许多青年似乎违心地应征入伍。

五、自然灾害。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水灾、饥荒、旱灾和瘟疫等灾害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食品短缺和粮价昂贵引起民众骚动，影响了地方驻军。

六、军事力量萎缩。全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 1910 年和 1911 年大幅度削减军费，在此之前军队曾一度扩充。新组建的镇寥寥无几，建制不全的镇兵员大大低于额定数。晋升前景渺茫使军官情绪低沉，粮饷供给时常没有着落使士兵变得焦躁不安。

七、普通士兵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使得部队更容易受革命宣传影响，被地方报刊的时事政治评论打动。阅读报纸的士兵人数空前，革命文学很容易被不满现状的军人接受。

本书第二部分论及各支部队时，将详尽阐述上述各种因素。就军队滋长不满情绪而言，这些因素并非一个不可缺少，也不是必须共同起作用的。但是，它们确实助长了军中的不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或部分因素起了作用，就足以毁坏业已形成的军事权威。

对那些不掌握军队的革命党人来说，新军是他们想获取武装力量的两大主要渠道之一。起初，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党人极其重视会党，会党给 1900—1908 年期间一系列流产起义提供了基本力量。借用 E·J·霍布斯鲍的话说，这些会党分子是“未开化的反叛者”，莱昂·夏曼则称他们为“业余士兵”。会党成员组成所谓“民军”的大部分，他们的作用是向地方权力挑战。^①即使他们已经表现出不可靠，而且军事能力也有限，孙中山还是不愿意考虑反省以往战略以及开始策反新军的建议，他坚信会党的战斗力虽然不及政府军队，却是敢于发起大胆行动的唯一武装力量。在他看来，每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毕竟还是“胜利之母”，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直到 1910 年，他仍然坚持这种态度，坚信军队最终会自然而然地响应他的事业。

其他革命党领导人较为现实，看出有必要发掘新军的潜力。焦点的转移导致新观点的产生，强调城市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910 年以前，暴动大多在农村、乡镇和省际交界地区发动，那里清皇朝的统治最为薄弱。革命党人必须对付旧式地方部队，小心翼翼地避免同新军交锋。新军训练有素，而且都驻扎在大城市里。乐观主义使孙逸仙相信，一旦攻取乡村城镇，各省行政管理中心会通过自发的反叛，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但是，暴动的失败仅仅证明，他们越是远离统治中心，对城市居民和官僚集团的影响就越小。如果孙中山及其同伴试图用共产党人的观点搞一场农民革命，城市居民的支持将是不明朗的。尽管同盟会选择农村发动起义，但

它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农民革命,而且显然未能去动员农民,组织农民。对政府部队进行革命渗透必将导致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这就进一步使乡村民众与革命主流相分离。正是现在这个时候,有必要占领大城市,从而控制国家机器、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还可以取得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这就是旨在“努力争取军队”的一场运动,由新一代年轻革命党人领导,他们曾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教育,有些则受过国内外双重教育。不能过分强调城市的重要性。有些人寄厚望于利用新军,对会党的期望并不高,他们的直接目标是驻防军、衙门和各类统治机制的象征。

有多种途径对新军进行渗透和策反,其中之一是利用留日军校生。他们按规定要回国服役,其中不少人是同盟会首批会员。湖南籍革命领导人黄兴同留日军校生保持良好关系。他挑选少数最可靠而且真正具有献身精神的军校生组织起军事团体铁血丈夫团。该团体开始时有28人,杰出人物有江西人李烈钧,山西人阎锡山、云南人罗佩金、湖北人孔庚以及浙江人黄郛。此后人员略有增加,但一直没有成为庞大的组织。团员大多有良好的社会经济背景,有些人富裕得足以可以买到官衔。他们在回国途中,公开宣称要在官僚集团内部推进革命事业。^③

没有参加铁血丈夫团的军事留学生也期望回国后扮演类似角色。许多人后来在军官和军事教习职位上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们没有追随同盟会制定的明确政策,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类政策。^④铁血丈夫团的成立是黄兴个人首创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同盟会计划的结果。后来,当孙中山和广东籍低级军官们致力于华南革命时,其他人去别的地区开展活动,相互之间极少配合。

革命党人争取军队支持的第二条途径是利用友情纽带,有些革命党人已经与个别军事指挥官建立起友情关系。这取决于个人关系,不涉及有组织的活动,因而成功的机会很少。被解除职务的

革命军官(通常是低级军官)也跟普通士兵保持秘密交往,而且关系密切。老关系被恢复并得到加强,以便在不满现状的部队与同盟会文职领导人之间建立起联系。广东革命党人用的就是这些策略(参阅第七章)。

还有另一种“努力争取军队”的模式。这跟“到普通士兵中去”差不多,其中包括已经做过的那样,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事大量艰苦工作。这项工作要求革命党人跟普通士兵们打成一片,从中获取支持。所谓打成一片,意味着急进分子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首先加入军队,无论是做军官还是当普通一兵,然后必须在合法的文化团体和学习小组外衣掩护下组织活动。革命党人秘密地接近那些同情革命的士兵,争取他们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项运动的特点是领导人和追随者都是军队成员,革命团体存在于地方驻军之中,并在军内开展活动。他们独树一帜,不受那些围绕同盟会的非军界组织的支配。他们知道部队的精神状态,了解军界的第一手情况,也懂得应该带领部队走哪一条路、走得多远。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湖北革命运动(参阅第五章)。

把重点放在新军,并不需要完全排斥会党。事实上,会党仍然起着辅助作用,在对军队进行渗透方面作出许多贡献。会党分子加入军队不是新鲜事。旧式军队一直拥有大量的会党分子。从另一个角度者,许多会党分子是退役军人。遣散旧式军队导致大批会党分子转入新军。有些会党分子加入新军是受优厚待遇吸引,另有一些会党分子按革命党人要求渗透到新军中去。革命党人利用了会党分子的反清传统,让他们在不问政治的普通士兵和急进的幕后活跃分子之间架桥搭线。

这些革命策略运用于不同环境,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成败大小,取决于革命党人的组织情况以及士兵中原有怨愤的强弱。

把新军放到重要位置并非暗示辛亥革命是由革命军人或密谋者造成的,尽管他们在秘密会议室或他们居住的兵营里反复商议,并谋取支持。^⑩本书要争辩的观点是,辛亥革命的开始阶段取决于不满现状的新军。1911年10月底之前,新军在6个省为革命指明了道路。正因为如此,心怀异志的立宪派人士和有些谘议局议员才意识到这时取胜的机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于是把筹码押到革命党人一边。新军军官欢迎省议员反戈一击,同他们携手合作。这一策略使满清政权很快就崩潰了。

这种合作创始于湖北军政府成立之际,不久便成为许多宣布独立省份的革命模式。新军军官代表了中国新精英的一部分。他们具备的优势是,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受过新式教育和专业训练,有爱国志向和近代化的观念,所有这些优势使他们跟旧式军官迥然不同。毋庸讳言,与知识分子精英相比,新军军官来自较低的社会层次,真正声望卓著而影响广远的军界人物仍然寥若晨星。然而,许多新军军官十分关心中国的未来政局,因此同非军界精英步调一致,忧患与共,加上追求个人利益(未必会损害国家利益)的共同愿望,有助于推进军内外精英的合作。像非军界精英那样,军队指挥官们在1911年相信,内战爆发后迅即恢复法治和秩序将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北洋军支持袁世凯,并不是要效忠于他个人,而是普遍觉得唯有袁世凯才能建立起新秩序,以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

1911年的各种事件不仅是一场军事运动,而且清帝逊位不是战场失败的结果。推翻清皇朝的最后一击由各式各样的参与者来完成,其中包括地方革命党人,军队同盟会领导人、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员,富商和实业家。强调新军的贡献并不是试图贬低或否认其他社会集团所起的作用。有许多其他因素促使清皇朝覆灭,对这些因素的研究不在本书范围之内。

注释：

- ① 对孙逸仙坚持保守策略的评论,参阅周锡瑞:《回顾1911年》,见《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第141—148页。
- ② 借用周锡瑞的观点。他把湖南及其他重要省城的急进士绅刻划为“城市改革精英”。这些新式精英竭力主张教育改革,收回各项权利。1909年成立的省谘议局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部分,但新精英们的主张在省谘议局里占据优势。参阅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43—44、66—69页。
- ③ 参阅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爱德华特·J·M·罗兹:《中国共和革命在广东(1895—1913)》;张朋园:《立宪派》,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03)》,第143—183页;傅因秋:《政治割据与民族革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03)》,第185—226页。
- ④ 革命运动早期研究的英文论著,参阅约瑟夫·法斯:《湖北省革命运动与辛亥武昌起义》,见《东方文库》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维杜阿·普拉卡什·达特:《革命的第一周——武昌起义》,见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383—416页。刘吉祥则指出,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十年甚至数十年以来,湖北特殊发展的必然结局……”参阅《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第105—115页。对湖北革命运动的近期评论,当然要提到周锡瑞的观点,他在《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五章中争辩道,湖北革命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革命活动没有“明显区别”。
- ⑤ 约瑟夫·法斯提出,“中小资产阶级人数在新军中”增长,是军中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法斯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下定义,仅用这种词汇表示湖北和其他地区新军中有文化的军人。参阅他撰写的《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第185—186页;《湖北省革命运动与辛亥武昌起义》,见《东方文库》第28期(1960年),第147页。
- ⑥ 田中义一曾断言,农民的怨愤情绪渗透到新军里,变成“有组织的革命的形式”。换言之,新军的革命运动表达了农民的不满。参阅田中义一:《新军》,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本著作将论证,新军背离清皇朝,并不仅仅因为军人出身于农民,而且要阐述官兵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他们都有离心倾向。
- ⑦ E·J·霍布斯鲍:《仿古的反叛——19、20世纪社会运动陈旧方式的研究》,第24—25页;莱昂·夏曼:《孙逸仙评传——他的一生及其意义》,第109页。
- ⑧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3卷,第401页。
- ⑨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第183—184页;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8页。
- ⑩ 在“革命预备阶段”,同盟会拟定了行动纲领,提出11项主要任务:吸收同志,募集资金,调查民众情况,开发可用潜力,观察革命形势变化,侦探清军动向,争取政府官员,离间统治集团,骚扰清廷,揭露行政腐败,视全局形势相机行动。参阅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卷,第101—102页。值得注意的是,策反军队不包括在内,侦探清军动向仅列为第六项任务。

-
- ⑩ 周锡瑞早就说过,尽管“看来有数以百计的湖北革命团体在活动,但它们都给人造成这种印象:革命密谋是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发生的。”参阅他撰写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58页。

第一部分

陆军改革与社会反响

第一章

新军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府虽然作了一些军事改革的尝试，但直到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惨败，未曾对彻底改革陆军作过认真的努力。甲午战争以前所谓的自强运动，出于对西方列强入侵的觉醒，体现了早期建立中国海防力量半心半意的努力。自强运动的依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二分法，以及获得新式武器便足以使中国御敌于海湾的设想。清政府十分重视制造轮船和生产近代军火，但没有创建一支新式国家陆军的计划，也没有对文武机制进行体制改革的计划。^①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湘、淮军都没有被视为反抗外来侵略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两支军队虽然使用了一些西式武器，但训练不足，而且大多是传统式的。一旦镇压了太平军，北京政府对权力日益增长的地方大员感到不安，遂下令遣散湘、淮军。

另一方面，清政府曾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多方筹措，去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满清统治者以往总是忽略海上防御。这种漠视海洋的态度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亚洲内陆边防区是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外国炮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使中国改变了轻海防重内陆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强大的海军是军事强国地位的首要标志，并于1882年组建起一支中国近代海军。^②此后陆军遭到忽略，这种状况持续到1894年北洋舰队屈辱地被日军歼灭于黄海。

一、1894年以后新的振军运动

1894年以后注重于组建陆军，表现出回到陆上防御为主的转变。海军对于它的倡导者和抱有期望的人来说，已经是令人沮丧的事物。此后许多年，以往发展海军的种种努力中断了，而陆军在中国军事发展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振军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政府表现得主动积极。先前的军事改革主要靠少数几个地方大员时续时断、各自为政的努力，这使北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有可能用海军与日本进行势均力敌的对抗。北京现在懂得需要实施一些中央集权的计划，控制武装力量。这项艰巨任务要求在其他事务上根本改变中央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北京还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等量齐观，体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接受近代训练的军队定武军，由官员胡燏棻在甲午战争期间组建于天津西南35公里处的驻防地小站。经由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专家冯·汉纳根建议，恭亲王和庆亲王为首的新建督办军务处创设了定武军。1895年11月胡燏棻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时，定武军共建成10个营，兵力5000人。此后，袁世凯奉命接任，负责这支军队的训练与指挥。定武军遂更名为新建陆军，人数增至7000人，由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及一些辅助部队组成。^③ 尽管袁世凯正在军中迅速建立他个人的威望，这支军队仍然受督办军务处控制。新建陆军的军费由户部支付这一事实^④，似乎使中央政府能够牢牢地控制这支军队。

与此同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在南京组建一支称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自强军以德国模式为楷模，设有马、步、炮3个基本兵种和1个工程营，各支部队的训练和操演全部由35名德国军

官负责。后来张之洞调回武昌，恢复湖广总督本职。他在那里又开始拟订训练近代军队的新计划，于1896年组建成1000人的护军营，由2个营和1队工程兵组成。护军营由省库提供资金，受湖广总督直接控制。^⑤一小批德国军官调到武昌，但只有3人奉命训练军队。后来，他们被免除军队教习的职务，仅仅被任用为武备学堂的顾问和教习。^⑥

1898年12月，武卫军组建于直隶，军机大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各军。武卫军下设前军、左军、右军、后军和中军5支部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袁世凯在1899年出任山东巡抚时，把武卫右军带到济南。义和团起义后，3支残存的武卫军被遣散，第四支部队武卫左军依然存在，但已衰弱不堪。1901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率领他的武卫右军进驻天津。^⑦

1900年初，当德国人乘义和团起义之机在山东获取更多权益时，袁世凯考虑到没有一支庞大的新式军队，难以守卫海岸线很长的山东省，觉得有必要扩充他的武卫右军。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只有7000人，而地方旧式军队陈腐衰朽，形同虚设。经北京允准，袁世凯把20营山东旧军改编成武卫右军先锋队，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新军第五镇。同年6月底，在八国联军跟中国交战之际，他又招募4营步兵，并将一些地方旧式军队改编为左路、右路及沿海防卫部队。^⑧

义和团灾变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军事机制的精心改革。慈禧太后现在转而倡导广泛深远的改革，推行大量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在19世纪90年代只是被徒劳地鼓吹一番而已。1901年8月29日的一道谕旨，废除了传统的武科考试，以便为近代军事教育清除障碍。9月1日的另一道上谕，晓谕各省尽早开设武备学堂，承认受过培训军官的价值。9月2日颁布的第三道谕旨，命令各路部队依次改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巡警军。^⑨

就清政府和热情的改革者所关心的目的而言，中国军队在1900年以后的改组可以从两个相互有关的方面分析。第一是国家安全。1900年联军侵掠北京是一系列政治事件的顶点，带来了民族耻辱感，使士大夫们坚信，中国如果不发展有活力的国防体系，迟早要被列强瓜分。整顿军备是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首要一步。^⑧

例如，袁世凯被看作是一名抵御列强的官员。当他的部队接受忠诚与正直的传统价值观念教育时，他告诫部下要“毋忘国耻”。他的《十大教条》之一是这样写的：

尔等职司捍御，见有寇仇无礼，肆志欺凌，侵占我土地，戕害我民生者，皆引为愧愤。况封豕长蛇，得步进步，一旦逼处，势且横行，辱及尔身，殃及尔家，种种蹂躏，不堪设想。宜时时切同仇之念，存雪耻之心……此志究不容稍懈。^⑨

“寇仇”和“封豕长蛇”指的是日本人。1882年至1894年袁世凯任中国驻朝鲜要员期间，与日本人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

与此相仿，张之洞对旧式军队的批评也十分激烈。旧军队虽然还可以用来应付地方叛乱，但抵御西方或日本的军队却毫不足恃。他在许多场合表示对外来威胁忧心忡忡，以证明他努力在湖北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必要的。^⑩

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如果不能马上消除这种威胁，至少也得控制住它。美国驻华陆军参赞早在1904年初就说过：

或许，为隐约出现于地平线上的日本军事力量幽灵所刺激，中国意识到，即使要获准在东三省重新行使真正的主权，必须使列强确信，它有能力在那里维持统治秩序，保证财产安全，并努力使它的军事机制井然有序。为此目的，建立起了一个以庆亲王邸下为首的机构，以制定整治军队的条

例。^⑩

迫在眉睫的日俄战争为军队扩张提供了另一个动力。这场将在东三省爆发的战争，无视中国的中立立场，威胁要将它卷入战争。1904年4、5月份，北京被迫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部分北洋军移师长城以外，袁世凯的常备军第一镇（师）开拔到山海关附近的永平府。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立即增设实力与编制相仿的两个镇。日俄战争为增拨国家军费的要求提供了适当的理由，清廷发出一道谕旨准予所请。这年晚些时候，又一个镇开始组建。袁世凯的打算是把他的常备军增加到4万人。^⑪

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无疑给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战争结果第一次清楚地证明了，东方人并不必然比西方人低劣，一支亚洲人的军队如果训练良好，组织得当，可以跟任何一支西方军队匹敌。要是中国采用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办法，就会跟日本一样，有可能抵挡住侵略军。《远东评论》的一名记者将这种心态概括为，“日本能做的事，中国也能做到，即使我们不是优秀种族，也未必会比日本人差。”^⑫

日本以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强国形象出现，增加了北京的不安全感，促进了尚未成熟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俄两国与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无视中国的中立和主权，在中国领土上选择战场，这一事实激发起广泛而强烈的愤恨。^⑬ 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日俄在远东的竞争。相反，它们的冲突有增无减，这使中国更加急于维护它在东三省和其他边远地区的主权。此后几年中国在边远省区建立起军事力量，便是这方面新的急进政策的明证。

除了东三省之外，新疆和蒙古也受到俄国人的威胁。据报道，1909年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驻扎在乌鲁木齐，人数多达4万，用新

式来福枪装备，由日本教习训练。这支武装力量的人数被大大夸张了。实际情况是伊犁将军奉命在他的管辖区内着手训练至少 1 个镇兵力的新式部队，因为那里俄国人的侵略很令人担忧。原先未列入新军计划的蒙古，正在组建另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同时还计划在蒙古和新疆安装无线电报，以便与甘肃建立通讯联系。1910 年春，一名勘测长城全长的外国旅游者注意到，广泛的尚武宣传遍及全国各地，几乎到处都有新军在训练，甚至极其偏僻的乡村也不例外，这看来“全是秘密组建一支庞大军队总计划的组成部分”^⑩。

维护中国主权的一项类似计划也在西藏推行。清政府重申行使主权，在 1906 年的《中英协定》中得到承认。1907 年中国人和俄国人商定，双方约束，不干涉西藏。1910 年北京开始实施一项广泛的改革计划，镇压了西藏东部的反叛，派遣讨伐远征军进抵拉萨，迫使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在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确保获取西藏人的支持与合作，这也是北京的意图。^⑪

中国的主权危若累卵的另一个地区是云南。法国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建造一条铁路，以河内沿红河而上，伸抵云南府的昆明。危言耸听的报告接踵而至，说法国人派出 2 万名安南人到云南从事帝国主义活动，使北京为之震惊。中国人觉得云南在 1909 年只有 1 个步协（旅）和 2 个炮营是不够的，应该立即扩充到 2 镇兵力。为了应付可能的意外事件，中央政府拨银 200 万两^⑫。英国驻昆明代总领事问地方当局，云南这么穷的省有必要设置 2 镇兵力吗？回答是，“为了保卫云南，抵御法国人的侵略”。四川组建成 3 个镇后，在必要时还可以增援云南。^⑬

1910 年，曾游历中国广大地区的一名英国记者埃德温·J·丁勒说，云南军队的发展有了极大的提高：

中国决心自己确保云南的命运。它正在努力做工作，以

便处在有能力保卫自己边疆的地位上。如果有必要，将作出强有力的努力。西方人并不了解这种努力有多么艰苦。^②

丁勒在1911年初再次报道：

它(中国)正在为取得某种地位作准备，即一旦发生突然事变，足以成功地保卫云南。如果你有兴趣，不妨随时走上通往省城的路，你将会看到鱼贯而行的马队，驮载着外国弹药和来福枪。我从长江最上游的港口重庆跋涉到云南府，其间相距约900英里，新式军事装备一直没有从我的眼帘中消失。军备的全部目的是拒法军于云南边陲之外。^③ (原报道加重点号)

仅仅几年以前，路过的旅游者无不嘲笑云南军队。但时隔三载，到1911年情况大不一样了，云南军队比中国大多数较富裕、人口较多省份的军队水平要高些。云南军队以四川军队为依托，这两支军队都是中国西部边远地区军事力量的代表，很令人注目。英国驻缅甸当局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这种发展。^④

中国蒙受的屈辱太多太长久了，它认识到不能再听任这种状况漫无制约地继续下去。中国正在觉醒，每当蒙受一次新的耻辱，它就重新为取得军事实力进行努力。确实如此，一名同时代的作者看到“傲慢的满族亲王……被接二连三的屈辱刺痛”，他把组建新军刻划成铸造“复仇的工具”^⑤。

新的振军运动也可视为对内部挑战的一种反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近代各种力量冲击和近代挑战的自然反应。反帝不是建立新军的唯一重要理由。诚如保罗·科恩精辟论证的那样，“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这个理念上的框架并非晚清史探讨中令人满意的模式。^⑥对晚清发展史的任何研究，还必须分析西方冲击下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及其反应。

塞缪尔·亨廷顿曾断言，20世纪的传统君主国家一般都已认识到必须为国内的因素进行改革或搞近代化。因为一个传统社会

的稳定所遭受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外国军队,不如说来自外国的思想观念和影响。他认为,19世纪的君主们搞改革和发展近代化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20世纪的君主们这样做是为了挫败革命。由于巩固权力是改革的先决条件,因此传统君主国家有必要创建一支效忠的、有理性的、受中央控制的高效能军队。^②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新的振军计划必然被理解为对国内形势的一种反应,国内革命的高涨与清皇朝的改革运动是息息相关的。新军计划有应付内部挑战和外来威胁两个同样重要的目的。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的部队的职能是“维护国家尊严,镇压民众暴乱”。对袁世凯来说,“国”意味着皇帝与中华民族。他反复强调“皇上宽厚仁慈,百姓感恩戴德”^③。与此相仿,张之洞也很懂得效忠,问心无愧地动用他的新军平息地方叛乱。所以,在军队本身变得离心离德之前,清皇朝自然觉得新军是政治统治的有用工具。

抵御外侮与应付内部挑战的双重目标并不相互排斥。到20世纪初,国家存亡与皇朝安危已经纠缠在一起,而且后者依赖于前者。汉人民族主义和排满情绪的增长,与其说由异族统治导致的,还不如说是清政府的软弱以及对列强不成功的外交造成的。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满清统治者在最后几年中渴望实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而且他们自己也正视国家和皇朝面临的问题。因为一旦国家崩溃,清皇朝将随之倒坍。反之,如果国家免遭外来威胁,清皇朝就会觉得它自己在对付内部问题上处于更强有力的位置。

作了上述分析后,论述1900年以后新军真正组建成军就更有意义了。得到北京老佛爷的恩准,军事改革进行得相当迅速。1902年,华北受过新式训练的部队约有5.02万人,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袁世凯的右军兵力达7850人,是最精锐的部队,由刘永庆、段

祺瑞和王士珍统领，其中约有5500名官兵驻守在北京城和颐和园。马玉昆统带的左军大部分和姜桂题率领的武毅军驻扎在离京城不到50公里的范围内。其他新式部队，包括这时已经移师保定的自强军和一些素质较差的部队分散驻扎在各地。显而易见，尽管垂而不死的八旗军还是存在，清皇朝和这个国家已经完全依赖汉人的军队苟延残喘了。^②

在此期间，湖北大约有9500名受过新式训练的军人，其中7060名官兵为武昌护军营提供了中坚力量。这支护军营下设2个步兵标(团)，骑兵、炮兵和工程兵各1营。^③武备学堂有100名学生，3名德国退役陆军军官和12名来自广州、天津的中国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教习。将弁学堂的100名学员选自各营有文化的低级军官，由1名日本中佐指导，3名上尉级军官、2名军士长和2名翻译协助他工作。^④将弁学堂的毕业生被派任未入流的低级官佐，在部队服役一段时期后，有指望升任正式军官。^⑤

长江流域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军事发展，但进程远远落后于直隶和湖北。^⑥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新式训练的部队以往只驻守在沿长江的一些军事要地里，而现在毕业于军事学堂的中国教习也训练内地城镇的驻军。虽然最优秀部队的实力只及中等水平，但最差劲的部队总体素质是有所提高的。^⑦

清政府对直隶和湖北军事改革的成效印象深刻，于1902年命令其他省份仿效它们的成功经验，重新组建各省控制下的军队。从河南、山东和山西选送军官到直隶受训，选自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南的军官则去湖北。训练完毕后，他们将回原省服役。^⑧

1903年，各省开始着手组建常备军。有些部队招募新兵而成军，另一些部队则大量改编现存的旧军队而成。各部队的规模和兵力取决于战略因素和财政资源，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训练和军事素质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1903年12月4日在

北京设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和袁世凯分任总理大臣和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第二年，练兵处制定出一整套方案以应付众多的问题，其中包括军队编制的表格、军官的职责、新兵的征募，医务和后勤供给、装备标准化、军阶及抚恤金等，并制定了建立军事教育体系的规划。^⑤

1905年秋北洋6镇成军是中国新建陆军起步的标志。^⑥此后，各省常备军改编成新军的镇或协。1906年4月清廷降旨，限令10年内组建36镇新军，分驻各省(见附录一)。第二年将各镇组建成军的期限提前到1912年，但由于财政困难，事实证明这项计划是行不通的。^⑦

辛亥革命前夕，全国一共只有14个镇(不包括禁卫军)组建完毕，各镇兵员与额定数有出入。此外，还必须计入兵员多少不等的18个混成协和2个协(见附录二)。实际战斗兵力大约达19万人。^⑧

从战略角度看，这些部队分成4个集团。京畿集团下设禁卫军，第一、二、三、四、五、六镇，以及太原和开封的混成协。第二集团驻屯于东三省，那里有第三、二十、二十三镇，以及盛京(现沈阳)和齐齐哈尔的混成协。沿长江及其周围地区是中部中国集团，设有第七、八、九镇，以及驻守武昌、苏州、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和杭州的7个混成协。这3个新军集团通过铁路与内陆水路交通相互联结起来。1910年，天津——浦口铁路曾把第五镇运送到京畿集团驻防区，清廷指望在1912年将这条线路修筑完善，使交通更为便捷。其余新军可称为另一个集团，即孤悬各地的镇和协，以保卫福州、成都、西藏、云南、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伊犁、广州、桂林、贵阳和热河等帝国其他地区。^⑨

二、一镇的编制

新军编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仿效日本军队的。1个镇下设2个步兵协,1个马队标,1个炮队标,1个工程营,1个辎重营以及1支军乐队。每个步兵协下设2标,每个标(步兵或炮兵)由3个营组成(骑兵标下设队),1镇兵力12512人,如表一所示。

表一 一镇兵力

单 位	军官	士兵	役夫	总数	炮
镇级机关	12	50	5	97	/
2个协级机关	16	36	4	56	/
6个标级机关	68	84	12	164	/
12个步营	384	6921	600	7908	/
3个马队营	78	813	198	1089	/
2个陆军炮营	60	882	194	1136	36
1个过山炮营	39	453	109	602	18
1个工程营	32	577	58	667	/
1个辎重营	36	573	143	752	/
1支军乐队	2	44	5	51	/
总 计	748	10436	1328	12512	54

资料来源:《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19卷,兵18,第9962—9964页;F0371/637,《1908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4页;F0371/886,《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7页;MP312/119,柏来乐中校1908年9月2日撰写的《中国一镇编制的札记》,亨利·伦纳德:《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78—87页,案卷号2106/2—5。

有时炮队标由2个过山炮营和1个陆军炮营组成,甚或由3个

过山炮营组成。中国人谈起一营兵力,通常只提供士兵人数,而不计及军官、木匠、鞋匠等。1个步兵营(504名士兵)下设4队(连)。1队下设3个排,每排42名士兵。一排分为3棚(班),每棚14人。棚设1名正目,1名副目,4名正兵,8名副兵。1支马队营下设4队,每队有56名骑兵。1马队下设2排,每排分为2棚(与步兵兵力相仿)。

1个炮兵营下设3队,每队有126名士兵,6门炮。如步兵那样,每队再细分为3个排,每排设3棚。1个混成协由步兵、骑兵、炮兵以及少量工程兵和辎重兵部队组成,据地方情形,规模自2000人至7000人不等。

战争时期,步兵可从续备军得到补充而成倍地增加(当然这是以随时能征调续备军为前提的),而骑兵和工程兵总是维持在战时编制水平。据美国情报资料,中国1个满员的镇有12768人,其中包括1支军医队,1个司号排和1个机枪排。一旦中国把陆军36个镇全部组建完毕,官兵的平时额定数将达到45万人,战时编制则高达1085976人。^④由于中国政府极少公布可靠数字,以上估算是很粗略的。而且必须指出,几乎每个镇或多或少都缺员。

三、军官与士兵

近代军队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官们的素质。军官素质低是中国陆军最大的弱点。非但缺乏尚武传统,仅仅就获取科学知识来说,也是跟中国人的习俗与情感格格不入的,而科学知识对掌握近代战略战术至关重要。社会对军人的轻蔑,使军内受过教育的人都感到沮丧。诚如芮玛丽曾经评论的那样,轻视军人的根源,在于缺少一个能产生有才华军官的社会阶层。^④旧式军官没有文化,不具备真正的军事科学知识。与普通士兵一样,他们也来自

社会下层。即使有文化有身份的人好象可以被授予军官职务，也几乎无例外地难当重任，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军事素养，这种素养是得不到社会赏识的。在从军的传统态度得到彻底改变之前，根本无法产生出精明强干的军人集团。

现在清政府认真作出努力，以吸引受过教育的人从事军事职业，尤其重视通过新的军事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军官的素质（参见第三章）。将来，所有的军官都要毕业于国内外军事院校。不过，在军校毕业生能确保充分供给以前，旧式军官不会被统统免职。那些已被证明特别能干、勤奋、武艺过硬而又愿意学习的旧军官，将继续留任，但他们也必须接受适当的教育。^④

与军官一样，普通士兵需要培育起适应近代军队的品格和精神。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消除积习久远的陈旧观念——军队只征募卑贱者、无赖、刑满罪犯、鸦片鬼以及除当兵之外无以谋生的各色人物。要作出努力，有效改变军人的社会成份，并且不怕艰难，革故鼎新，使从事军职为人心所向，为有志者所追求。新的征兵法^⑤中有年龄限制（20—25岁）和某些体格方面的要求，但在实行中，这两条规定似乎都有一定程度的变通性。征兵法强调的是应征者的社会出身与品格。应征者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在当地有家庭亲属关系。他们按要求报出祖宗三代和他们自己的居处，以证明自身身份。鸦片鬼、游手好闲之徒、兵游子、无信义者及有犯罪前科等各类人物一概不予考虑。乡村绅董、族邻和地方警官要提交可造就青年人的名单，不得漏报任何符合征兵条件的青年。

为了吸引有出息的年轻人，清政府打算给应征入伍的新兵若干特殊优惠。根据规定，新兵经过3个月的见习，将被豁免30亩土地的地赋银。无地赋银可免者，准予享受通常赏赐给有功名书生的免税权。而且，他们的家属得到相应的精心保护，以免受地方官员与土匪无赖的骚扰。军人的家眷一旦卷进诉讼案件，将由代理

人在公堂上为他们申辩。当军人服役期届退伍,或被开除军籍,所有这些特权不再生效。

清政府决意抬高军人的地位,使之几乎与有功名的书生士子的地位不相上下,而后者是士绅特权阶层的组成部分。这种转变是意味深长的,标志着对根深蒂固旧传统的背离。提高军人的地位似乎是袁世凯出的主意,因为他是练兵处的核心人物。不过,或许还应该计及张之洞的作用。他几年来训练新式军队采用了许多类似的方法。张之洞挑选新兵更倾向于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金者,他们无需一味依赖军内粮饷维持生计,服役期满后愿意退役。他们必须没有为非作歹记录和犯罪前科,而且要得到绅董、族邻及地方官员的切实保结、申送。年龄限于18至24岁,服役期为3年。军人服役期届便退伍,回到他们原先的注册地,转为续备兵。^④早在1902年,张之洞就奏请清政府给退役军人一些优惠待遇,以增强征募新兵的吸引力。根据他提出的计划,服役期满的士兵将得到3种不同等级的证书之一,列为头、二等者将被任用为不入流官佐或弁目教习,列入第三等者退为续备兵。凡领有凭照的军人一概免除杂项差徭;即使被指控犯法,若无实在案情确凿证据,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他们本人卷入诉讼案子后,可以为自己的案请抗辩而不受拷打。官府不预先革除他们顶戴,就不得动用刑讯。^⑤这项奏议虽然未被采纳,但还是有可能在练兵处的招募应征政策中体现出来的。

按新的饷章,俸饷是丰厚的。标统月给俸银500两,营管带月俸400两,排长月俸50两,正兵月饷4两5钱,副兵月饷4两2钱。^⑥* 饷银供士兵给养所需外,扣除一部分给士兵家属作养家活口之用,

* 八旗马甲月饷银3两,步甲月饷1两5钱,岁支米48斛至24斛不等。绿营马兵月饷2两,步兵月饷1两5钱,守兵月饷1两,皆月支米3斗。相比之下,新军士兵的月饷要高得多了。

依地方物价差异,这部分银钱通常在1两2钱至1两8钱之间。^④士兵领取冬夏两季军服,食宿条件也不差。

塑造军人新形象,使他们受人尊重,这一观念看来已被富有进取性的地方大员所接受。当然,尊重军人的观念被社会普遍接受还需要好些年。但至少有部分军人必须能读会写,这个标准是重要的。提升军职的要求是恰如其分的:组建新军营时,五分之一较优的新兵必须有文化,列为正兵。他们经过5个月的见习,通常可以升任副目,再接受3个月训练,升至正目。^⑤张之洞更是雄心勃勃,要求他的部队中至少有一半人能读会写。为此目的,他要求所有想入伍的人参加笔试,以国内事务和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作为考核的基本内容。^⑥结果,很大一部分湖北士兵是等第不同的书生士子(参见第五章)。

要知道中国陆军中有文化士兵的确切人数是不可能的,何况各省的情况肯定不一样。然而从总体看,中国知书达理的阶层似乎对重建陆军反应良好,他们中许多人出于种种原因投身军界(参见第四章)。这样论述,并不是要否认大量新兵仍然出身于农民阶级,少数则来自于商人;而是要表明,中国陆军的社会成份正在经历着某种重大的变化。

四、从本省征募新兵

军事改革家们感兴趣的另一问题是士兵的出身籍贯。按规定,每个镇应该在驻扎地招募本省人组建成军。当愿意应募入伍的本省人不够数时就产生麻烦了。不过问题可以通过征兵方式来解决。旧式军队采用募兵制,尽管战时通常实施征兵。清政府继续推行自愿应募入伍的政策,但改头换面的征兵方式实际上也在强制实施——地方当局奉命按额定数招募兵员,而当地人并不踊跃

应募,便转而实行强制性征兵。^⑤强征和招募本省人相结合的方法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旦资金有了着落,征募新兵并组建满员的镇就没有多少困难,而且可以及时取代所有外省老兵。由于新兵的出身可以核查,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兵是良家子弟。最后,当地招兵有利于促进军人之间的同乡友情和相互帮助,从而减少开小差现象。

地区性征募在各省推行,很少有例外。征集的兵员称之为征兵,大多是真正的当地人;招募的兵员称之为募兵,很多来自外省。实际上,中文“募兵”含有雇佣的意思(不要跟正兵和副兵混淆起来,正兵、副兵表示一等兵、二等兵以及士兵的军事技术水平)。新政策颁布以前已经有许多人应募入伍,把他们全部取代出来需要几年时间。兹举一例,1902年湖北军队中有许多外省人,但到了1905年,12317名士兵中有9915人是本省人,来自直隶、河南、山东、安徽和河南的士兵仅1916人,另有486名荆州驻防八旗军。^⑥

1906年下半年,京旗第一镇驻保定部队有90%是北京旗人,其余则来自散居在中国内地的旗人。驻扎在保定附近的第三镇,75%兵员是应征入伍的,大多征自直隶,来自湖南的为数不少,还有安徽人,山东籍士兵寥寥无几。第二镇的士兵都是直隶人。第四镇的第七步协和第四炮队标驻守在大运河近旁的马厂,约有90%的士兵是直隶人。驻山东第五镇的部队大多是征招成军的,90%的士兵从本省征得。第六镇的情况略有不同,75%的士兵应征入伍,但大多来自湖南,或临近河南的直隶边沿地区,还有一些山东人和安徽人。^⑦本省人取代外省士兵是大势所趋。到1908年,北洋军队中剩下的外省士兵已经很少了。^⑧

然而,某些省在征募当地合格新兵中遇到的困难比其他省要多。1906年广州驻军主要是安徽人和四川人,而没有广州人,因为署理总督岑春煊认为广州人性情太浮躁,而且不可信赖。广西新

军1800名士兵中,1500人来自湖南,还有些江西人和安徽人,本省人极为有限。驻扎在浙江杭州的一个步标,五分之三的士兵是本省人,当局渴望今后只征募本省人入伍。^⑤

保定征募新兵的过程说明了华北招兵的具体步骤。每个府都设招兵处,并在各地设置分支机构。招兵处和预备役兵站同处一地,两者都由预备役军官管理。要按计划组建一支部队时,总指挥官决定从哪个府吸收兵源,然后派遣一名军官到招兵处,那里的预备役军官会同地方行政官发出告示,宣布征募兵员额数。此后,地方行政官将人数分配到乡村,并支持乡绅、族邻按额征满兵员。如果一个府没有足够的兵源,新兵将从另外一个府补充。自愿报名者是受欢迎的。如果当地青年观望不前(情况往往如此),大多数新兵将被强征入伍。^⑥用什么方式强征不甚明了。

其他各省也设立了与此相仿的招兵处,只要当地条件许可,限于招收本省青年。唯有特殊省份例外,例如必须驻扎好几个镇的直隶。如果这些省能从临近地区或铁路运输便捷的地方招兵,就可以超越省界征募兵员。^⑦

湖北主要通过征兵招收士兵,规定每个府提供1标兵员,马队标从武昌府吸收新兵,炮队标兵源来自襄阳府,如此等等。这样做的理由是,某些地区向来负有盛名,专门提供马、步、炮三大兵种之一的最合适人才。到1907年,由于合格的新兵事实上来自不同地区,这套招兵方法失灵了,只能成为一纸空文。^⑧其他省份从来没有仿效过湖北这套模式,而是从可以征募到合格青年的地区吸收新兵,并不计较他们属于什么府。

尽管中国陆军具有保卫国家的雄心壮志,但本省征募兵员的结果,使它成为一支半地方性的武装力量。通过这种方式组建起来的部队偏重乡土感情和亲属关系,一旦地方上发生动乱,部队将更难控制。但相对兵源混杂的部队而言,本省人组成的部队在初

创阶段,无论征募、动员、训练或实施军纪所受的阻力较小。④

五、训练、武器装备、运输通讯和医务设施

新军的训练混和了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训练要素。北洋各镇在日常操练、使用武器和密集队型方面是很优秀的。1908年视察过北洋军队的美国驻华陆军参赞发觉,第三镇的行军给人印象尤其深刻,他们“精力充沛地执行命令,动作整齐精确,有久经锻炼而成的军人外观,举止英武而不失礼仪,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⑤英国驻华陆军参赞也觉得他们“极其敏捷,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训练,似乎都按统一的方式进行。”⑥长江流域的第八镇同样卓杰,训练中有强烈的德军色彩,尽管日本人正在逐渐施加巨大的影响。步兵显然十分出色,而骑兵与其他镇的情况一样,是最弱的兵种。⑦

武器装备型号杂乱。由沈阳兵工厂制造的1888式毛瑟枪被广泛使用,骑兵使用同样型号的卡宾枪。从1908年起步兵也使用日本制造的1903式6毫米口径来福枪,以及日本制造的其他装备,骑兵和炮兵则分别使用日本造的6毫米口径卡宾枪和75毫米口径阿雷斯卡野战炮。部队还使用德国武器,如75毫米口径的克虏卜山炮,维克斯—马克沁机枪和同样口径的斯开奈德—卡纳特机枪。⑧1910年清政府为了装备禁卫军,向克虏卜公司发出一份订货单,订购54门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⑨

中国人总是渴望自己制造枪炮弹药。新的军备计划规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分别建造一所配备新式机器的大型兵工厂,以期生产出规格划一的武器,用于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小型兵工厂分散在各省,但其中不少工厂已经废弃不用,或改为修配工场。由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缺乏经营技巧,资金匮乏和贪污腐败,直到

1908年下半年新建的兵工厂还是达不到高效率的水准。他们的产品不够新型,而且工艺质量相当低劣。更为糟糕的是,产品根本谈不上规格划一。^④到1910年底,有了些令人瞩目的提高。外国观察家们似乎一致认为,汉阳兵工厂是最有成效的,广州的兵工厂居其次,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名列第三。另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分别在开封和天津。军工产品中有大量的野战炮、山炮和弹药,以及连发来福枪,卡宾枪和机关枪。这些武器的样品陈列在1910年夏季的南京博览会上。1910年5月在成都开设的兵工厂,有一家制造德式马克沁水套机关枪的分厂。此外,有些工厂生产无烟火药。这好象表明中国“在自己制造军火方面,正变得越来越不依靠外国提供的钢铁。”^⑤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陆军使用的武器缺乏统一标准,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第一镇的情况可以作为产生混乱的一个例子。该镇配备3种不同类型的火炮——3个炮队各自拥有阿雷斯卡野战炮、戈鲁森野战炮和克虏卜山炮。来福枪的配备同样混乱,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均无例外。^⑥

辎重部队的编制往往因地制宜,配备船队、驮载队、运货车队或手推车。至于通讯,已普遍使用了信号旗和闪光信号灯,采用了摩尔斯电码系统。建制完善的工程营所在地区已经使用电报和电话机。1910年,一所无线电报局在上海开始工作。有些镇和协配备为数不多的自行车,但使用并不普遍。^⑦

由于受过新式训练的西医供不应求,医疗服务成为中国陆军最落后的部门,但是环境卫生得到普遍重视,医务所保持干净整洁。取得军人信任的中医很管用。医务部门的普通人员称为医兵,他们的工作相当于敷裹员和医院勤杂工。虽然兽医不足,马匹仍然得到仔细照料,保持良好状态。^⑧

六、预备役与战时动员

陆军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3类。常备军军人服役3年后,得到一份凭证,被遣送回他们的故乡,在那里转入为期3年的续备役军人,饷银减少,定期操练。他们平时从事他们通常做的工作,在战争时期则可能被征召为常备军。经过了3年续备役,他们便转为后备役军人,饷银减半,只是在第二年和第四年按规定操练。后备役期届,他们退役成为平民百姓。但那些才能杰出者经过考核,有可能充任正、副目,甚至被提升为军官,在不同地区指挥续备军和后备军。^③

从理论上讲,一些镇组建成军3年后,会产生大批续备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关预备役军人的规定,除了对驻扎在直隶、山东和江苏的第二、四、九各镇起作用外,对其他镇来说不啻形同虚设。由于北洋各镇和第八镇已成军3年以上,在1908年理应产生7万名续备军,但实际上续备军只有1.34万人左右。续备军在1909年增至1.82万人,1910年达到2万人。所有续备军只进行步兵操练。对建立续备役骑兵和炮兵,未作过任何尝试。^④直至1911年,后备军仍然不见踪影。

预备役军队雷声大、雨滴小,有几重因素。第一,起先指望常备役军人是真正的当地人,他们退役后组成地区性续备役部队,但事与愿违。到1910年,完全从本省招募新兵成军的只有少数几个镇。这就使续备役部队无法从外省人为主的那些镇得到补充。而外省人在常备军服役期届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与原来部队失去了联系。^⑤从保定移师东三省的第三镇便是一个例证。1904年该镇成立时,兵源主要来自山东、湖南、安徽和直隶南部。1907年,新军镇统制凤山将军上奏清廷,提出服役期满的军人在该镇继续当

兵或去别处重新入伍，或加入东三省的巡防营与巡警军。^②

第二，北京政府似乎并不反对退役军人重新入伍。到1907年底，第三镇有3000名士兵服役期届，其中1000人后来又加入第四镇，留给预备役的军人就只剩下2000人了。^③旗人组成的第一镇和禁卫军允许退役军人重新入伍。^④

第三，有些省份的退役军人被巡警军和旧式军队吸收。这种情况在湖北是千真万确的，那里第八镇的许多退役军人加入了铁道警卫部队和地方部队。这样做，固然有助于提高后者的素质，但违背了战时动员的宗旨。最后一点，不少新军士兵来自旧式军队，他们既然按旧的招兵规章入伍，如果他们不愿意转入预备役，就不能强迫他们。^⑤

新军平时编制没有军级组织，但是动员法规已为战时建立军作了规定。每个军由1个常备役镇加上5170人，再配给1个续备役镇（8营步协3720名军人）以及3营看管兵站仓库的军人（来自后备役的900人）。这就需要1.723万名预备役军人去扩充一个常备役镇，使它的兵力达到战时军的要求*。在1910年可得到的预备役军人总数只能补充一个军，所剩就不多了。^⑥

七、地方军队

组建新军的必然结果是，在一段时期内遣散八旗、绿营、勇营、练军和团练等旧式武装力量。1905年，清廷诏令整顿所有各式地方军队，挑拣其中优等官佐弁兵充实新军，次等官佐弁兵组建巡防

* 关于军的建制，论述有错漏。按规定，新军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视情形而定，或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1大军，或只派出1镇而不受军节制。因清末新军镇数不足额，平时不设军。北洋军队镇压武昌起义时，曾合数镇为军。

营,等而下之者裁汰遣散。^⑦ 巡防营武器装备不错,也接受新式训练,部分军官由原新军常备役军官和新式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但还是保留下大量未经过训练的旧军队,其中最差劲的是总督和巡抚的亲兵,他们的技艺只是舞戟弄枪。

巡防营组成一支警察武装力量,以协助追捕盗匪、镇压起义以及平息边疆地区骚乱。这些部队照理不应该调出供养他们的省份去应付事变,但实际上一旦发生地方叛乱,各省当局往往相互请求邻省拨兵支援。巡防营第二项职能是,在正规的预备役军队组建完毕之前,充当新军的后备兵力。换言之,他们被指定为战时的二线兵力,在各自驻守的省份内做好防务事宜,例如守土御敌,护卫交通线路,征集军需给养,看守兵站仓库,使常备军腾出兵力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部分巡防营,如以抗击法军而著名的广西巡防营,被誉为值得称道的“抵抗侵略军的游击队或骚扰部队。”^⑧

与集中在省城的新军不同,巡防营散驻于各省各地。1907年拟定巡防营章程,以期军制划一,但巡防营的编制并不统一。省巡防营一般划为若干路,通常称为中、左、右、前、后各路,每路由数量不等的步兵营和马队营组成,每营下设3至5哨,每哨设3至5队,最小的单位是组成队的棚。省最高将领提督统辖全省巡防营,得到省内不同地区的中将级军官镇台辅佐。^{⑨*}

巡防营设有步兵和骑兵,但没有炮兵。各省巡防营的素质相差悬殊。譬如,山东、安徽和东三省的巡防营几乎毫不顶用,而江西巡防营的素质却高于驻扎该省的常备役新军第七镇。^⑩ 一般说来,驻守在天津、南京、武昌等重要省城的巡防营训练有素,其中最优秀的部队实力相当可观。英国驻华陆军参赞柏来乐中校认为,如果编制和训练得到一视同仁的关注,巡防营将产生出优于新军

* 英文资料将巡防营的路等同于新军的镇或师一级的建制,因此用中将级军官表示各路指挥官。按清制,巡防营每路设一统领,节制所属各营。

士兵的军人。^⑤这种评论并不令人惊诧。从军事观点看，有些省巡防营的编练显示出了巨大的进步。1909年，一些受过良好军事教育的军官和未入流官佐调入巡防营，提高了巡防营的训练水平。^⑥

由于地方部队不受严格规章的约束，可能全部男子，或者说至少大部分男子，是当兵的料。从总体上看，巡防营弁兵出身较为低贱，待遇比新军差。他们的额定月饷是4两2钱银。象江西之类的省，每人给饷银3两。^⑦减扣的口粮银却跟常备军一样。他们的军服、装备、营房，尤其是地位，都比不上新军，而且没有辎重部队和医疗设施。

然而，极为有趣的是，他们忠于清政府。巡防营非但兵变少，而且时常被清政府用来无情地镇压叛乱和骚动，还用来平息新军中不可靠部队谋划的兵变。他们对蔑视巡防营的新军显露出溢于言表的憎恶。何况地区性征募兵员跟他们无关，因而他们缺乏乡土感情，在对待地方叛乱和骚动时特别有效。有鉴于此，清政府很愿意供养他们，有必要就一直供养下去，使巡防营与新军长期并存，目的在于一支军队反戈一击时，另一支军队会来扶持清皇朝。^⑧

至于巡防营全部兵力，据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参赞韦乐沛中校估计，1909年12月达24.673万人，不包括团练和其他未经训练的武装力量。^⑨1910年底，美国驻华陆军参赞考虑到文件上额定兵员与实际兵力之间通常存在着差异，认为巡防营实际兵力为15.7087万人。^⑩在此期间，裁汰遣散绿营军，挑选其中优秀军人转入较新式军队的综合性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1910年11月，浙江首先完成遣散绿营军的任务。^⑪

八、满人的军队

要全面研究清朝陆军,势必提及满人的军队。八旗军*被18世纪的长治久安、繁荣顺昌及享乐腐败侵蚀战斗力之前,他们是所向披靡的劲旅。他们组成世袭的特权阶级,享受皇朝赐予的土地、牲畜、粮食、布匹和若干津贴,在法律方面也受到优遇。^⑧由于他们在中国属于居统治地位的种族,满洲八旗军在中国各类军队中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同样这些因素也使他们体质大降,不再勇武,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降低。这样,就有必要对八旗军也进行整顿。

整顿改编八旗军从三方面着手。首先,组建一二个全部或主要有满人组成的近代化镇。其次,对那些能起部分巡防营作用的八旗军提供些新式训练。第三,遣散八旗驻防部队,强令他们从事农、工、商业。

新军的京旗第一镇到1906年已经组建得很不错了。该镇由凤山将军任统制,在他之下是两名汉族协统曹锟和何宗莲,分别统辖第一、第二协。正参谋官王定珍也是汉人,他曾留学日本。第一镇共有步兵12营,操演敏捷,训练有素,骑兵和炮兵各有3营兵力。^⑨据1908年会操的表现来评定,第一镇不如第二、四、五、六各镇,但优于第三镇。^⑩

另一个满人的镇禁卫军,是按照1908年12月3日的谕旨组建起来的。^⑪禁卫军被钦定为护卫宫廷的特殊武装力量,受摄政王和军

* 八旗制度原先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设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皇太极时,抚慰归降的蒙古人和汉人,增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清军入关后,八旗生产功能萎缩,成为军事主力。原著时常将八旗视同满人,不提及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

机处直接控制。士兵全部选自八旗中最优秀的军人，以体格健壮、技术娴熟为标准。其他人员从第一镇选补。军官是陆军贵胄学堂的毕业生，曾在别的镇服役6个月。到1909年，禁卫军仅仅建成1个步标和1个马队营。摄政王的意图是将禁卫军编练成中国军队的楷模。禁卫军士兵的武器装备是第一流的，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得到精心的照顾，每月领取饷银8两，比普通新军士兵的月饷高得多。一旦编练成3万人，这支新式部队将补充京师警力，那时驻京宪警将被取消。^②

1910年11月，负责训练禁卫军的高级官员提出一项新的招兵章程，据此将征募汉人入伍。^③这与其说是满清统治者相信汉族民众效忠异族皇朝，还不如说是笼络汉人感情的一种姿态。由于极大多数禁卫军官兵是满族旗人，这个新章程没有取得什么值得称道的结果。何况，如前文所述，八旗军人服役期满后通常获准重新入伍。

满人也在新军其他镇里服役，特别集中在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组建的新军部队里，在别处加入新军的满人人数极少。另有一些满人的部队属巡防营，其中最杰出的是驻守在湖北荆州的镇威新军。柏来乐中校于1907年5月访问过那里，发觉他们显得朝气蓬勃，年龄在18至26岁之间，训练与操演水平同新军几乎不相上下。就身体素质而言，他们是他在中国见到过的最敏捷的军人，有些官兵高达6英尺，健康状况比中国军队的平均素质好。在广州、南京、杭州和热河等满族人以往征服的地方，满人部队也在接受新式训练。^④

1907年9月27日下达的一道诏旨，命令遣散八旗驻防军，旗民与汉人一样自食其力。^⑤除了北京，在全国各地有人数众多的八旗驻防军。他们生活在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而不受汉人司法的管束，成为游离于平民百姓之上的特权阶级。由于旗民

过去不准务农经商,上述特权不能使旗民免于最终落到穷困境地。八旗的潦倒状况确实是中国统治种族衰微的典型写照。因此,清政府飭令地方当局会同八旗驻防将军,核查八旗户籍,分给旗民耕地,同时相应减少他们的津贴。适应农耕生活后,旗民在交纳地赋和诉讼纠纷方面将与平民百姓一视同仁。开始时,他们得到一些谋生资本,但以政府不再给予赏赐为代价。

然而,即使到了1909年底,全国各地旗民成为汉人那样的平民百姓者,为数仍然不多。12月26日的一道诏旨,重申了政府辅助所有旗民生活自立的政策,不过又补充道,并无立即取消旗民津贴的意图。^⑧这表明1907年9月的诏令未曾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而且必定有来自满人内部的抵制。

无论如何,考察一下中国新式陆军发展过程中,八旗参与到什么程度,是令人感兴趣的。据一份法文资料报道,截止1910年3月,满人和“入籍”旗民(如蒙古八旗)共500万人,其中约有22.7万人参加强制性的军事训练,33%的人完成了军训,38395人在新军中服役或从事与新军有关的工作,29292人在巡防营接受质量平平的训练或加入了巡防营。皇族宗室人员则在北京的陆军贵胄学堂接受军事教育。^⑨显而易见,走向近代化的晚清中国陆军中,旗人的部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竭力按近代方式重新编练陆军。新的振军运动不是局限于几个省或地区,而是全国规模的。这场军事改革,是由幕后策划19世纪维新运动的地方大员们发起的,并遵照清政府制定的方略和规章开展起来的,从而使国家和人民决心为加强国防体系和提高军人职业地位作出努力。组成一支近代化的专业陆军,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要推进军事改革运动,必须使地方当局、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合作有所保证。发展军事,阻难重重。这些障碍的性质,以及清政府寻求克服困难的方

法,将在以后几章论述。

注释:

- ① 19世纪后半叶军事改革的研究状况,参阅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汇览(1862—1874)》,第46—131页;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足点——同治中兴(1862—1874)》,第196—221页。对中体西用二分法的分析,参阅约瑟夫·R·利文森:《中国从孔子到近代的命运三部曲》第1卷,第59—78页。
- ② 参阅约翰·L·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奋斗(1839—1895)》。
- ③ 关于这支军队详情,参阅刘凤翰:《新建陆军》。
- ④ 刘凤翰:《新建陆军》,第93—95页。
- ⑤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60—62页(以下引同书时,指原英文版页码。其他外文资料页码皆按原著,与已出版的中译本无关。);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38—39页。
- ⑥ 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69—70页。
- ⑦ 胡璜玉:《开国战史》第1卷,第17—18页;参阅本章最后几节及本书表四。
- ⑧ 刘凤翰:《新建陆军》,第318—320、327—323页。
- ⑨ 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33—135页;商务印书馆编印:《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3—4页。
- ⑩ 出于不同原因,清政府中的守旧分子也赞成国防体系近代化,他们把国防近代化看作抵御其他方面西化的工具。参阅威廉·加斯考尼·塞西尔勋爵:《变革中的中国》,第14页;马利贝斯·E·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第96页。
- ⑪ 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92页。
- ⑫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40卷,第1—2页;第60卷,第3—4页。
- ⑬ 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13页,案卷号2106/2—5。
- ⑭ 伦敦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以下略作FO)17/1655,陆军中校杜卡特撰写的:《中国局势札记》,附在情报处1904年7月5日致外交部文件中。
- ⑮ 《中国陆军》,见《远东评论》1909年10月刊,第171页。
- ⑯ 威廉·加斯考尼·塞西尔勋爵:《变革中的中国》,第12、15页。
- ⑰ 同⑯,第150—182页。
- ⑱ 《中国的陆海军》,见《远东评论》1910年8月刊,第93页。
- ⑲ 同⑱,第179页。
- ⑳ FO228/1733,《关于云南陆军的报告》,附在代总领事韦礼敦1909年9月21日致约翰·朱尔典爵士第41号文件中。
- ㉑ 埃德温·J·丁勒:《步行穿越中国》,第215页。
- ㉒ 同上书,第427页。
- ㉓ FO 371/1063,《关于1910—1911年中缅边境开放时期的报告》,附在代领事罗斯1911年2月25日致格雷爵士第1号文件中。
- ㉔ 爱德华特·H·罗斯:《变革中的中国人》,第113—114页。
- ㉕ 保罗·H·科恩:《清国与西方的对抗(1850—1900)》,见詹姆斯·克劳莱编:《近代

- 东亚译丛》，第29—32页。
- ②6 塞缪尔·P·亨廷顿：《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秩序》，第155页。
- ②7 陈志让：《袁世凯》，第34页。
- ②8 FO 17/1522，英国陆军上校柏郎撰写的《中国军事实力札记》，附在萨道义爵士1902年4月24日致兰斯顿尼侯爵第111号文件中。
- ②9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57卷，第22—27页。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48页提出，张之洞的数字估计偏低。鲍威尔还引用法国军官卡杜非上尉的话，说明张之洞军队的中坚力量是受德国训练的。不过，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张之洞似乎早就不聘用外国军官来训练中国军队了。
- ③0 FO 17/1523，《柏郎上校的报告》，附在萨道义1902年6月2日致国务大臣第149号文件中；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公牍》第19卷，第21—22页。
- ③1 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51页，摘引卡杜非上尉的资料。
- ③2 同上书，第157—159页。
- ③3 FO 17/1523，《柏郎上校的报告》，附在萨道义致国务大臣第149号文件中。
- ③4 《大清光绪新法会》第1册，第8页。
- ③5 同上书，第14册，军事管理。美国驻华陆军参赞伦纳德将练兵处规章译成英文，作为他1903年撰写的《中国陆军》报告的附件。
- ③6 关于北洋六镇编练和发展的简略说明，参阅陈志让：《关于1911—1912年中国陆军的一个注释》，见《通报》第40期(1960)年，第426—433页。陈指出这些镇的名称有时容易搞乱，因为袁世凯和镇统制喜欢时常变换各镇番号。
- ③7 蒙塔古·H·J·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2年中国年鉴》，第244—246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53—57页。
- ③8 我对镇数的估计与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页)一致。但与他不同的是，我只发现18个混成协，而鲍威尔说已编练成20个混成协。我跟陈志让(《中国陆军》第436页)的看法也不一致，他断言共有16个镇，而我认为应估计低一些，因为第十七、二十一、二十五镇的编制不全，尽管这几个镇在1911年设置了镇级机关。参阅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5—56页；FO371/1347，张格尔撰写的《1911年中国陆军情况报告》，第2页。
- ③9 FO 405/223，《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0页。
- ④0 美国海军部海军情报处档案，编号A—4—a，登记注册号159，美国海军陆战队二级上尉伊斯门1910年1月25日撰写的《关于中国陆军的报告》。
- ④1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足点——同治中兴(1862—1874)》，第201页。
- ④2 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33—34页，案卷号2106/2—5。
- ④3 同上，第35—39页。
- ④4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57卷，第32页。
- ④5 同上，第34页。
- ④6 自高级军官至普通士兵的俸饷，参阅④3，第87—95页。但有例外，某些地区士兵的饷银通常低于额定数。在江西和贵州等贫穷省份，正兵月饷仅4两2钱银，副兵则3两9钱银。参阅FO371/214，柏来乐中校撰写的《关于九江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FO371/1035，柏来乐撰写的《关于贵州

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1月12日至格雷的第13号文件中。

- ④⑦ 同④，第93、170页。
- ④⑧ 同上，第39—40页。所有入伍新兵必须经过第一阶段服役，其中五分之一将列为副兵。在5个月训练结束时，他们可能被提升为正兵。
- ④⑨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57卷，第23页。一个革命士兵回忆他刚入伍时，写了一篇名为《启迪德性，改造国民》的文章。参阅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3页。
- ⑤⑩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8页。
- ⑤⑪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65卷，第10页。
- ⑤⑫ FO371/39，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六镇的报告》，附在康乃吉1906年8月6日致格雷的第332号文件中；FO371/41，柏来乐写的《关于第一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6年10月15日致格雷的第420号文件中；《关于第三镇的报告》，也附在第420号文件中；FO371/214，《关于第二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6年11月23日致格雷的第488号文件中；FO371/415，《关于第四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11月25日致格雷的第543号文件中。
- ⑤⑬ FO371/620，《1908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1页。
- ⑤⑭ FO371/33，柏来乐撰写的《广州驻军情况报告》，附在萨道义1906年2月24日致格雷的第32号文件中；FO371/34，柏来乐撰写的《广西省情况札记》，附在康乃吉1906年7月9日致格雷的第296号文件中；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杭州驻军情况报告》，附在康乃吉1907年7月5日致格雷的第319号文件中。
- ⑤⑮ FO371/241，柏来乐撰写的《保定驻军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10月29日致格雷的第504号文件中。并参阅美国首都华盛顿档案馆藏美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以下略作WDGS5521—1，《中国陆军在1910年的动态报告》第26页。
- ⑤⑯ 伦敦档案馆藏英国陆军部档案（以下略作WO）33/454，陆军部总参谋部1908年编的《中国兵力手册》，第8、63页。
- ⑤⑰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八、十一镇的报告》，附在1907年5月13日朱尔典致格雷的第221号文件中。
- ⑤⑱ 约翰·斯图尔特·汤姆森：《革命化的中国》，第32页。
- ⑤⑲ 同④，第182页。
- ⑤⑳ FO371/642，韦乐沛中校撰写的《驻东三省部队的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09年11月15日致格雷的第421号文件中。
- ⑤㉑ 同④，第209—211页。
- ⑤㉒ 同④，第171、174、180、187、190、195、208页。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5页。
- ⑤㉓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6页。
- ⑤㉔ 同④，第166—167页。
- ⑤㉕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2页。
- ⑤㉖ 伦敦《泰晤士报》，1911年10月21日，第6版。
- ⑤㉗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3页。
- ⑤㉘ 中国的马一般都较矮小，严重地影响了骑兵和炮兵的效率。
- ⑤㉙ 同④，第26—28页。

- ⑳ FO405/171,《1908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4页;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4页;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1页; FO228/1748,《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39页。
- ㉑ WDGS6562-1,《中国陆军在1910年的动态报告》,第13页。
- ㉒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20卷,兵19,第9670—9571页。
- ㉓ FO371/435,柏来乐撰写的《第二十二镇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1月2日致格雷的第505号文件中。
- ㉔ WDGS6552-1,《中国陆军在1910年的动态报告》,第14页。
- ㉕ FO405/171,《1908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4页。
- ㉖ 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2年中国年鉴》,第247页;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4页;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1页。
- ㉗ 参阅《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22卷,兵21,第9685、9587页。
- ㉘ WDGS 6562-1,《中国陆军在1910年的动态报告》,第59—60页;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6页。
- ㉙ 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第309—310页;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5页。
- ㉚ FO371/620,《1908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3页。法国驻华陆军参赞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少校认为,最优秀的巡防营是在直隶和东三省编练的。参阅他写的《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第412—433页,英译后载《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1—1195页,美国海军情报处翻录,编号A-4-a,注册号159。
- ㉛ FO371/415,《1907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5页。继柏来乐之后任驻华陆军参赞的韦乐沛中校,在1911年1月撰写一份报告,也认为巡防营士兵的平均素质不比新军差,而且前者的个人作战能力更强,尽管后者在编制、装备和近代训练方面占有优势。参见FO371/1085,《中国陆军情况札记》,附在朱尔典1911年1月12日致格雷的第18号文件中。
- ㉜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6页。
- ㉝ FO371/229,柏来乐1906年12月31日至1907年2月4日自南京到福州的旅行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4月15日致格雷的第181号文件中。
- ㉞ 珀西·H·肯特:《满清统治的消亡》,第127页。
- ㉟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57页。
- ㊱ WDGS 6562-1,《中国陆军在1910年的动态报告》,第59页。
- ㊲ WDGS6283-4,《1910年11月军事信息摘要》,第6页。
- ㊳ 关于旗人的特权,参阅谢宝潮:《中国的政府(1640—1911)》,第58—62页。
- ㊴ FO371/41,柏来乐撰写的《第一镇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06年10月15日致格雷的第420号文件中。
- ㊵ FO371/435,柏来乐撰写的《第二镇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1月2日致格雷的第505号文件中。
- ㊶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4卷,第3页。
- ㊷ 《中国陆军》,见《远东评论》(1909年10月),第178页。
- ㊸ 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2年中国年鉴》,第248页;

FO371/875, 麻木勒1910年11月11日致格雷的第488号文件。

- ⑭ FO 371/214, 柏来乐撰写的《湖北驻军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6月13日致格雷的第289号文件中。
- ⑮ 《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578卷,第7—8页。早在1907年8月,两江总督端方就上奏折,提议旗民应与汉人一视同仁,都受地方当局管辖。应该逐年遣散旗民,并赐予相当于10年津贴的年金,使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在京旗民应遣送到东三省,以利于开垦那里的荒地。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576卷,第15页。同时,民政部高级官员赵秉钧也在一份奏折中提出,遣散旗民有助于满汉平等。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57卷,第21页。
- ⑯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4卷,第7页。
- ⑰ 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英译后载《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1—1195页。本注见英译件1191页。

第二章

管理机制改革与军事财政

各国近代化陆军是内部富有凝聚力、组织机制高度完善的武装力量,并擅长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合理地使用武力。卢西恩·派伊认为,近代陆军“本质上是工业化式的实体”^①。跟民政机关一样,近代陆军也有专门的职能,要完成好任务离不开特殊的组织机制。义和团运动以后的10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建立西式陆军的途径,这意味着军事组织需要发生某种结构性的变化。军事管理必须专门化,前提是对旧机制进行革故鼎新。军官要到新式的军事院校去接受教育,以达到一定程度的专业水平。

“中央集权是军队熟悉的组织模式”^②。为了实施军事改革,北京政府推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政策。从军队职能方面看,这种政策可以说是正确的——正在组建的新军将成为国家军队。然而,中央集权政策遭到各省强烈抵制,因为它们控制了编练新军所需的财源。

资金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非但表明编练新军的花费是多么的浩繁,而且对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清帝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库存银与地方库藏的情况。本章试图阐明军事组织的管理机制改革,以及改革过程中受政治和财政问题牵制的情形。

一、设立练兵处

大清帝国的军事管理机构无法有效地统辖战场的陆军，长期以来相当于一般行政管理的一个部门，成为高级文官享受特权的地方，而实际指挥军队的大多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军官。

兵部基本上是一个文职机构。虽然兵部理应是管理大清帝国武装力量和制定军事政策的机关，但它的职能几乎全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只做些名不符实的事。兵部对八旗军和宫廷侍卫没有权威，也无法管辖驻省部队。编练新式军队客观上需要设置一个近代化机构，由进取性强的官员负责，他们应该懂得新式训练及近代战略学与后勤学的价值。1903年12月清政府设立练兵处，旨在使它成为一个制订特殊军事规划的临时性机构。练兵处的主要目标，就是使正在组建中的新军在编制、训练和武器装备方面有章可循，做到整齐划一。^③

练兵处分为3个司：军政司、军令司和军学司。军政司设有6个科，分管军制、考工、粮饷、医务、法律和器械。军令司下设4个科，分管运筹、测绘、向导和储材。军学司也设4个科，分管训练、教育、编译和水师。^④庆亲王和铁良分别担任练兵处总理大臣和帮办大臣，实际控制练兵处的是会办大臣袁世凯。刘永庆、段祺瑞和王士珍分别被任命为军政、军令和军学三司的正使。^⑤他们三人都紧紧追随袁世凯，出任正使靠的也是袁世凯的势力。但必须公正地指出，他们是杰出人才，最适合担任这些职务。

段祺瑞出身军人世家，他本人于1887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不久赴德攻读军事科学，并在克虜卜兵工厂接受炮兵工程学的实践训练。1895年*，他被任命为新建陆军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总办。

* 段祺瑞调往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总办等职，是在1896年，而不是1875年。

1901年,他成为袁世凯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并任省军事管理机关参谋长官。^⑥

王士珍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1896年他在袁世凯手下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新建陆军工程兵长官。1901年他被任命为第一步协协统,并在天津负责军事训练。^⑦

刘永庆没有受过军事院校正规教育。袁世凯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时,他在商务署任职。1895年刘永庆在天津负责军需给养和营务管理,1901年他在袁世凯的右军中任军械检验官和参谋官,一年后升任直隶军政司兵备处总办。^⑧

此外,还有徐世昌。他曾分管原新建陆军营务处,而且是袁世凯的结义兄弟,这时被任命为练兵处提调(相当于西方中将军官)。^⑨1904年初,袁世凯还从湖北和其他南方省份吸收60名左右年轻的留日军校毕业生,他们已经在地方部队服役过一段时期。^⑩显然,练兵处参谋班子的成员大多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而袁世凯本人文职和武职的履历也是引人注目的。

练兵处获准为整顿陆军和实施军事教育拟订规划和章程,拥有为北洋军队筹措资金、平衡开销的特殊职权,而且还经管武器弹药的制造、购买和分配。练兵处不是决策机构,但是它的奏议往往被皇帝采纳,经转批变成上谕。照理,练兵处应该与兵部合作,但实际上它很少跟后者磋商,即使提升、调进军官也自行其事。练兵处跟兵部分庭抗礼,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磨擦,这是因为各自的权力和管辖范围不分明,何况它们的职权确有重叠交叉之处。这就导致恶意猜忌,争夺实权与争相扩大影响。清政府意识到两者并存时间过长会招惹麻烦,似乎打算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取消练兵处,或者等到兵部改组时,最终将练兵处一并归入。^⑪

直隶总督和练兵处会办大臣的双重职位使袁世凯成为非常强有力的人物。天津向来是直隶总督督署所在地,这时又成为中国

极重要的军事训练中心，还有一个称为督练公所的地方性军事管理机构与督署同处一院。^②与练兵处相仿，督练公所也分为3个部门：兵备处、参谋处和教练处。兵备处考核章制，使部队服从各项命令，也分管功过赏罚与执行军法，以及筹集调拨粮饷、军械和医疗设施等。参谋处考查军需官编制，为军需部门的妥善管理作调度筹划，还收集和编纂中外军事信息与统计资料。教练处负责部队培训和军事学堂教学，拟定有关计划和规章，并为军校学生规定教科书。每处设1名总办，1名会办，3至4名提调及若干勤务、书记人员。^③实际上，天津的督练公所只是练兵处的附属办事机关，因为这两个机构都由袁世凯一手操纵。

二、省督练公所的职能

在各行省，只要编练成一协常备军，马上就设置省军事管理机构督练公所，下面通常设3个处，这跟天津的情况差不多。督办一般由总督或巡抚兼任，名义上是各该省部队的最高军事长官。^④有些省设立督练公所比其他省要迟缓些。例如，广西省督练公所是旧式军事机关营务处改建而成的，在1906年仅仅分设兵备、教练2个处。^⑤浙江省直到1907年还没有建制完善的督练公所。由于浙江新军兵力不足一镇，按规定3个处只能设1名总办，兵备处和参谋处各设1名会办协助这位总办工作，但教练处会办一职空缺。^⑥3个省组成的满洲里只在沈阳设置1个督练公所，吉林和齐齐哈尔另设分支机构。1907年设置东三省总督这一新职位以前，那里的督练公所督办一职由满洲驻防将军兼任。^⑦管辖地方部队的旧式营务处直到1909年才废除。^⑧

山东是没有设置督练公所的惟一省份，山东巡抚无权管辖驻扎在济南的第五镇。这是因为袁世凯掌管着第五镇，有关军务由

地方行政官员主持的旧式营务处代理。1906年11月袁世凯失去了对第五镇的统辖权之后，该镇就在新近设立的北京陆军部的直接控制下，由凤山将军管辖到1910年底。凤山将军主管的军事机关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⑭

文武官员共同经管省级军务，但职权有所区分。文官方面以总督或巡抚为首，提刑按察使司和布政使司辅佐，两使之下还有四五个挂武职统领头衔的道台级文官。武官方面省级军事长官是提督（又称提台），在他之下有若干名中将级军官镇台，每个镇台又管辖若干名统领，统领则指挥某一地区的部队。^⑮ 以前作为清皇朝军事统治正式代理人的八旗驻防将军，这时仅仅控制驻省八旗几支旧式部队。

要讲清文武系统各自拥有多少军权是困难的。跟以往一样，总督和巡抚作为行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握有一定的军权。另一方面，军官似乎享有地区性的军事指挥权。这表明大清帝国军事管理与军队指挥两权分离的局面依然如故。由于新式的军事管理需要新的管理技能，辅助文职大员的官佐们必须在新式军事学堂受过教育。但事实上官佐们处在从属地位。文职大员有权牵制军事当局，但他们对军事科学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有时相互间就产生猜忌和不信任。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文官把大量权力转让给他们的武职同僚，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使文武之间的矛盾得到某些缓和。兹举湖南为例，衡州行政官员曾控制了驻扎在该地区的13支部队，但后来他把军务管理权让给当地各指挥官，自己只保留控制军队调动的一项权力。^⑯ 不过传统习惯还是有影响的，文官在省督练公所占据大部分高级职位。出任总办的大多是道台级或更高级别的文官，辅助班子通常由许多年轻的低级军官组成，这些军官以留日

* “镇台”和“统领”按原著所注拼音译出。从上下文看，镇台当为新军镇统制（师长）的尊称，统领原系八旗官职，此处似指新军标统（团长）。

归国学生为主，实际上处理督练公所事务的就是他们。^②第九镇驻地南京(原名江宁)的情况似乎属于例外，1907年省督练公所3个处的总办全由协统级军官担任。他们都是浙江籍人，江宁陆师学堂*毕业后又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显然，他们对两江总督有很大的影响力。^③

由于总督或巡抚兼任省督练公所督办，并负责驻省部队的军费开销，因此从全局看，这个国家整顿陆军实际上反而拆散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军队的职能取决于督抚的行为和表现。练兵处未能十分成功地使部队的编制、训练和武器装备做到整齐划一。所以，新设立的陆军部在1906年以后力图更有效地控制各省。结果，1911年1月省督练公所相应进行整顿，这将放在以后论述。

三、创设陆军部

1905年秋，五大臣使团出洋考察宪政，访问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外国政治制度考察报告中，使团奏请中国仿效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这导致清廷在1906年9月1日颁发上谕，预备仿行宪政。虽然没有公布实行宪政的具体日期，但这个国家马上采取了措施，开始走向预备立宪。11月6日下达一道上谕，飭令中央管理部门进行广泛改革。据此，增设了邮传部，改组了原来的六部，尽管“部”的名称继续沿用。此时共有11个部，另4个部是外务部(1901年设立)、农工商部(1903年)、学部(1905年)和民政部(1905年)。除外务部和吏部外，各部引进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他未受宪政改革谕旨影响的中央机构是内阁、军机处和翰林院，这些部门强烈反对改革。^④

* 清代官方文件称南京为江宁。译文一般仍称之为南京，在专用名词中保留江宁原称。

兵部改为陆军部，并归并了练兵处和太卜寺。在军谘府设立以前，全部参谋事宜由隶属于陆军部的军谘处经办。还设置了处理水师事务的海军处，为以后成立独立的海军部预作准备。陆军部此时管辖大清帝国所有陆军、军事学堂、军械、军需贮藏和兵工厂等。陆军部分为承政厅和参议厅，并设有10个司。^⑤

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另两名满员寿勋和荫昌将军为侍郎。国内报界极其猛烈地抨击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称他为满清排汉政策的最大倡导者。^⑥到了1907年5月，庆亲王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陆军部部管大臣，地位比铁良高。由于清廷原先没有打算让庆亲王到陆军部任职，英国驻华陆军参赞柏来乐中校推测，庆亲王被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是为了制约铁良的权势，因为铁良在军务方面的权力正处在鼎盛阶段。^⑦然而，英国驻北京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却认为，把一位70岁高龄的虚弱老人安置到如此高级的职位上，目的在于“巩固满人对陆军的控制”，这项决定显然违背了11月6日改革上谕所持的原则。根据该原则，任命官员时不再有满汉之分；除外务部外，废除各部设2名尚书、4名侍郎的旧制。^⑧

此类任命暴露出铁良为首的满族守旧派与袁世凯为首的汉族改革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一度曾是袁世凯盟友的铁良，对袁世凯的权势以及掌握着北洋军队十分妒忌。1901年以来，袁世凯的权势急剧增长，把许多长期追随他的人安插到陆军重要职位上。他看来是最强有力的总督，控制着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而且，驻京外交使团对他有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中国最有进取心的一名官员，是新式陆军真正的灵魂。或许，没有一个满人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权力日益增长而无动于衷。何况，铁良本人又极具雄心，他倡导中央集权政策，以便削弱地方督抚，尤其是袁世凯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人们相信，铁良在这方面是得到慈禧太后支持的。^⑨

1906年9月30日，围绕管理方面的若干改革问题，铁良眼袁

世凯发生了冲突。^⑧ 11月6日的改革上谕发布后，袁世凯随之被削夺了对北洋军队4个镇的管辖权，只剩下第二、四镇仍由他统辖督练。第二镇前身是北洋常备军的左军，第四镇原来是袁世凯的右军。第一、三、五、六等4镇这时处在陆军部的控制下。统领驻京八旗军的凤山将军奉命接管这4个镇。凤山是平庸之辈，曾在京师巡捕营担任过几年级别不高的军官，他此时被提升显然是因为得到清廷偏爱的缘故。袁世凯眼看他的部队交给如此无能的继承者掌管，当然感到十分恼火，他曾奏请将部队交由陆军部直接管辖。^⑨

英国驻华外交官们不无忧虑地关注着这种事态。柏来乐认为中国的陆军改革应该有袁世凯这样的强人为之效力，先在一省进行小规模试点，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练兵处在以袁世凯为主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退出陆军部将损害中国陆军的利益。^⑩ 约翰·朱尔典爵士同意柏来乐的观点，他注意到在袁世凯的指导下，军备整顿曾使“中国获得了外国观察家的赞赏，因为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⑪ 英国外交部获悉凤山身居要职，评论道，这是“中国政府极愚蠢的决策。”^⑫

铁良排斥汉员的政策使汉人日益感到不安。中文《宇宙报》在1907年1月31日刊登一篇重要文章，评论铁良态度的危险性，指出铁良对管辖军务的汉族高级官员总是看不顺眼，因此迫使袁世凯自己奏请解除对4个镇的统兵权，以及其他各项军事职务。这家报纸还说，铁良是一个野心家，渴望取得已故世的荣禄那样高的地位。但是，荣禄排外甚于排汉，铁良却决意用他刚刚获取的军权和财权压制汉人。^⑬

铁良飞黄腾达的原因，必须从官僚统治集团中满员迅速占取优势的来龙去脉中寻找。11月6日上谕规定，各部设尚书1名，侍郎2名，满汉不分。清政府似乎朝平等对待汉人的方向靠拢。但时隔不久，满员就很快提升到高级职位上，汉员则充任大量次要的职

务。增强京城满员权力的同时，地方上的革命活动却在加剧。安徽巡抚恩铭是满族官员，他在1907年7月6日被地方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刺杀，使北京感到震惊。接着，绍兴女教员秋瑾又策划7月13日暴动。全国各地满族官员都为清皇朝与他们自己的安危担忧。他们住进戒备森严的官邸公署。北京已经公开承认存在着革命运动。^⑤清廷处在此时此境，企图恢复汉族官员的信心和效忠意识，遂于8月10日发布一道谕旨，允诺在任命政府各级官员时不歧视汉员，在法律面前汉人享有平等待遇。^⑥

尽管有这项承诺，满人继续增强他们对政府的控制。他们在1908年明目张胆地垄断了国家大部分高级职位。北京52个高级职位中(包括5个内阁大学士，5个军机大臣，以及内阁会议政务处总办等)，满员27人，占51.92%。在军机处和内阁，满汉比例大致相当。同年年底醇亲王成为摄政王，情况又有变化，军机大臣、会办大臣和各部尚书15个高级职位中，满员9人占据10个职位，比例高达66.7%。22名侍郎中，满员占了一半。尽管清政府先前曾宣称身兼数职是不妥当的，年迈体弱的庆亲王还是占了几个职位。结果，汉族官员只能满足于担任较低级别的职务。

显然，满清政府没有能力扩大政治参与权。尽管行政管理已经发生了变革，它还是无法把更多锐意进取的汉族改革家吸收进统治体系。不能使自己恰如其分地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不能按既定的政策吸收汉员，这就必定给改革中的政权带来严重问题。^⑦

四、摄政王主持下的改革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相继去世，清廷突然面临皇位继承的危机。已故皇帝的弟弟醇亲王出任摄政王，才使危机迅即解决。年轻的摄政王才26岁，但对某些西方国家的情况相当

了解，看来他比大多数满族亲王要进步得多。1901年他作为头等专使大臣率团赴柏林，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变乱中被杀一事谢罪。表示歉意后，他受到德国皇室十分隆重的欢迎，并进行参观访问，对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与商业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返回中国后，在政治上很活跃，意识到自己将担负起重大的使命，因此去陆军贵胄学堂修完了一项军事训练课程，从而使他自己比同一阶层的任何满洲贵族更有资格投身于积极的政治生涯。他取得摄政的权力后，北京舆论普遍赞同他担当重任，据说所有亲王及各部尚书也都答应竭尽全力支持他。在华的外国人对她先前的欧洲之行以及他通常不主张激烈排外颇为赞赏，欢迎他获取权力。中国外务部满怀希望，认为由他摄政，许多悬而未决的外交问题可望通过友好方式解决。中国报刊也看到新的统治机制透出了另一个改革时代的曙光。^③

由于袁世凯曾在百日维新中出卖现已故世的光绪皇帝，这位摄政王对他怀有宿怨。袁世凯早在1907年9月就“升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但到1910年1月2日，他被迫以“足疾”为借口，辞去各项官职，回到河南故居去“养病”了。^④

摄政王决意在北京及邻近地区维护满蒙旗人的统治优势。1909年7月，蒙古旗人锡良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端方取代杨士骧任直隶总督。长期以来，直隶总督一职由最杰出的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担任。这一职位转入满人手中，进一步削弱了汉族官员在政府中的势力。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去世后，大学士兼学部尚书一职任其空缺。戴鸿慈辞去法部尚书，成为军机大臣。葛宝华接替溥良出任礼部尚书，但廷杰出任法部尚书又抵消了葛宝华任新职的影响。^⑤

或许因为摄政王有过在德国的一段经历，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振奋国家的尚武精神。1909年7月15日颁发的一道上谕，宣称皇

帝是大清帝国陆海军的最高统帅,宣布设立一个特别谘询委员会,以筹划陆海军整编事宜,并提呈有关建议。清政府的目标是:激励部队以军职为荣,并缔造一支强大的军队。^④从统辖帝国军队角度看,此时宣统皇帝名义上恢复了先帝太祖和太宗的那种地位。但清廷颁发这道上谕的目的是“让民众知道改善中国防务力量这一问题,培养他们重视国防效能的观念。”^⑤在宣统未达到法定登基年龄之前,摄政王实际上剥夺了这位3岁儿皇帝的职权,从而稳固地独揽大权。

所谓特别谘询委员会,就是这道上谕里提到的军谘处。此时军谘处已经不再附属于陆军部。由于分别任命贝勒载涛和毓朗为军谘处正、副大臣,军谘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另一名亲王载洵和一名汉族海军将军萨镇冰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25岁的载涛和26岁的载洵都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而且都在陆军贵胄学堂学习过两年。他们年轻而又缺乏经验,他们身居高位引起普遍不满,并遭到北京中文报纸的猛烈抨击。^⑥

军谘处作为一个参谋和执行机构开展工作,清廷打算不久以后将它扩展为军谘府。军谘处仿效日本的参谋本部,它的职能是,对关系到国家防务、总体军备、军事指挥、作战计划以及陆海军将领和参谋长官的任命等所有问题提出建议。军谘处大臣跟日本参谋本部长官一样,直接对皇帝负责,或者说直接向摄政王载沣负责,并能直接与他接触。如果军谘处大臣的奏议可以推行,经皇帝批准后,即转发陆军部或筹办海军处。1910年,军谘处完全控制了各测绘学堂以及正在筹建中的陆军大学堂,并有权给各镇、军事情报处、翻译处和驻外武官任命或委派参谋军官。由军谘处控制的监察长一职,在监督管理军事教育方面取代了陆军部的职权。^⑦

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表示改革朝结构性变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似乎是军事管理脱离一般管理的一种渐变,有助于

促进中华帝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军事职业化。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官员们缺乏经验，军谘处从一开始就激发不起人们多少信心。把年龄很轻而且没有经验的人安置到负责岗位是不很明智的，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有时还引发军谘处内部官员之间的倾轧。^④

1910年3月，贝勒载涛率领军事使团赴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考察各国的军制和兵工厂。这次出访使载涛得益匪浅，他刚返回中国，就提倡进一步加强中央的军事管理，改进（实即扩充权力）军谘处。他在各种场合与总督、巡抚及各镇镇统制商谈，以期制定出更细密的规章，在中央集权的框架内治理好新军。他的副手贝勒毓朗在10月份调往军机处后，载涛全面控制了军谘处，并全力以赴履行他的新职责。^⑤

贝勒载涛由若干名能干的军谘使协助，居首位的军谘使是统制级军官冯国璋。他曾任练兵处军学司正使，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还有两名协统级的军谘使，他们是满员良弼和曾经跟随载涛出访的哈汉章，他俩都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军谘处属下的6个部门，全部由留日归国的军官负责。^⑥

五、荫昌为首的陆军部

陆军部此时失去了对军谘处的控制权，对省参谋处和筹建中的陆军大学堂也无权督察。原来隶属于陆军部的海军处也在筹办海军事务处的新名义下获得自主权，而且还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独立的海军部。但是，陆军部迟迟不愿将权力移交给军谘处，顽固地抓住原来的职权不放。权力转移缓慢或许跟军谘处办事效率不高也有关系。于是造成这样的局面，涉及军务的一切重要文件由这两个部门共同奏报。^⑦ 1910年3月，铁良失去皇上的恩宠，荫昌被任命为陆军部新的尚书。^⑧

荫昌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来改称北京大学),此后留学奥地利和德国,做过几年北洋武备学堂总办。1901至1905年他曾任出使德国大臣,有幸获得能干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好感,在军事方面也受到指点。荫昌回国后担任过第七镇统制,陆军部侍郎,1909年再次出使德国。他娶了德国妻子,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对德国陆军和德国皇室佩服得五体投地,被公认为亲德派人物。他经历丰富,才华卓杰,而且精力充沛。外国军事专家把他看作陆军部尚书的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时,正在德国任职,直到1910年9月才正式出任新职。同年12月,尚书、侍郎的称谓改为大臣、副大臣,于是他就成为陆军部第一任大臣。^⑤

荫昌追求3个目标:提高陆军部办事效率并厉行节约,提高各兵种的专业技能,集中军权。为达到第一个目标,他整顿陆军部,将2厅10司减缩到8个司与处,裁撤那些在陆军部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机构。例如,把旧式驿道和驿站的管辖权移交给邮传部,因为这种驿道已不再需要新军护卫。一项裁汰冗员的计划付诸实施,对大量官员和办事员进行考核,结果发现其中约有200人不称职,予以除名,并宣布凡未曾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今后一概不准担任军职。荫昌还坚持陆军部官员不准在别处兼职。这项规定激起一些高级官员深深的敌意,他们凭借保护人的庇护挂了多种官衔。^⑥

鉴于他自己的军事经历,荫昌自然为出任陆军部尚书一职感到十分自豪,并希望所有的部属理解他的感情。甚至在接受这项任命之前,他就宣称他将穿军服办公。^⑦他刚走马上任,就规定官员办公时一律互相行军礼,不准再用传统的文官行礼仪式,即拱起双手上下摆动几下。官员们无论穿便服还是着军装,都要遵守行军礼的规定。^⑧他在1910年12月又规定,从春节起,陆军部官员以及陆军部附属机构的官员办公时一律穿军服。^⑨

1910年11月,一部新的军事法典规定了一套军事法庭审判制

度,将用来审判犯法军人。^⑤这就意味着民政管理机构将被迫放弃按传统对军人行使的司法权,也表明民政当局与军事当局朝司法权相互分离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其结果将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

集中中央军权,使荫昌与总督、巡抚以及各镇统制的关系显得紧张而突出。前文已提到过,铁良曾从袁世凯手里夺得北洋军4个镇的管辖权。荫昌在集权方面则走得更远。1910年9月26日的一道上谕,收回了直隶总督控制的北洋军第二、四镇,把这两个镇转为京畿地区部队,由陆军部直接管辖,并将天津督练公所缩减到仅存兵备处一个办事机构。凤山将军被免去北洋军的指挥职务,调任湖北荆州八旗驻防将军。这意味着荫昌此时控制了北洋军和禁卫军,对这两支军队行使着最高统辖权。而且,给荫昌高官显位的摄政王载沣似乎很信任他,这就增强了他对付政敌的力量。^⑥

同时,荫昌还要削减督抚手中的兵权。这些地方大员们历来享有某些地方自治权,在他们管辖的省份内几乎完全控制了民事和军政的司法权。中央有效地约束地方势力,是发展一支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武装力量的前提,这就要求总督和巡抚向北京交出他们握有的大量权力。此前,贝勒载涛主持下的军諮处独断专行,把各镇统制和各省参谋处官员的任命权划归自己。荫昌在这方面再次表现得有过之无不及。他剥夺了地方大员们在省际调动军官的权力,自己掌摄向行省调派军官的权力。任何军官从某一镇辞职后,便不准再向其他镇申请职务。驻省陆军此时置于中央严密监督之下。长期以来,地方当局有权招兵,以补充部队缺额。荫昌却要求部队马上补齐所有缺额,否则有关军官要承担责任。陆军部还派出官员去调查地方驻军的编制情况。如果他们谎报军情,将受军法惩处。^⑦督抚们一直挂考督练公所督办与会办的头衔,到1910年12月这种头衔被取消了。^⑧

为了控制各省军官,需要陆军部与军諮处通力合作。荫昌同贝

勒载涛相处和睦,使这两个机构的相互关系得到改善,并为军諮府的成立清除了障碍。军諮府由陆军部和军諮处的主要负责官员以及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组成。军諮府在军官问题上的政策是,将军、统制等一二品武官应处于军諮府绝对控制下,其他级别的指挥官和统兵官则对陆军部负责。^⑩ 这项决策使地方大员们只剩下对低级军官的任命、提升及撤职之权。而且,这点权力也被荫昌的指示所削弱。按照荫昌的指示,队官的任命、提升及撤职,高级统兵官按常规向督抚提出建议,但必须每季度向荫昌禀报有关事宜。这项指令还规定,“此外,陆军部将时常派出官员巡视察访,以确保统兵武官及时据实禀报”^⑪。显而易见,荫昌想方设法把他的实际权力扩大到原来属于地方当局管辖的事务中去。

荫昌还坚持由北京掌握各省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一职的任命权,这项任命权过去一直是地方当局的特权。新军的训练和给养仍然由各省实际负责,但新军各支部队最终驻扎在何地则由军諮府决定。对此,地方当局可以提建议,但军諮府不必勉强接受。^⑫

与此相适应,省督练公所也作了整顿改组。1911年4月24日陆军部的一份奏议被转批为新的法规。据此,各省督练公所督办一职不限于督抚,将军和都统也可以兼任。每个督练公所设一名军事参议官督察所属各部门,并监督新旧各种部队的训练、招募兵员和遣散军队,总体军备状况、粮饷供给及军火储备等。原先每个督练公所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此时改为筹备、粮饷两科及军械局、测地分局。每个科或局设若干名副官、书记官和司书生*,在军事参议官主持下工作。各科、局职责分明。各督练公所官员人数取决于各该省新军部队的数量。若某省新军不足一镇,该省督练

* 据《清史稿》志九十四职官六,第3475页所记,督练公所测地分局未曾配齐官员,其他科、局都按额配备若干名副官、书记官及司书生。

公所的规模由陆军部决定。根据这些新规定,总督、巡抚名义上仍是所辖省份的军事首脑,但他们的军权显然被削夺了。由陆军部任命的军事参议官则实权在握,他们直接对北京负责,并受北京的绝对控制。^②

人们或许会产生疑问:荫昌的政策是否成功地达到了既定目标?从积极方面看,通过裁减冗员,他为陆军部节省了行政管理开支,加强了对地方军官的控制,比他的前任更了解各省情况。当陆军部收到的地方情况报告不令人满意时,他急于亲自去视察有关部队,搞清事态真相。他喜欢把地方高级军官召集到北京,同他们研讨部队状况和一些战略问题。^③他成功地削夺了某些督抚的军权。^④

但是,荫昌的成就是极其有限的。^⑤他精简了陆军部,却招致那些给亲信觅取闲职虚衔的高级官员的强烈怨恨。陆军部虽然进行了整顿改组,但很难令人相信部里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改进。陆军部所属8个司、处在职权方面的冲突如此之多,以至相互无视对方的职责范围^⑥。而且,在驻蒙、藏部队的管辖权问题上,荫昌跟理藩部相持不下。^⑦

另一个使荫昌成就受到限制的因素是,他的副手、陆军部副大臣寿勋对他怀有敌意。寿勋实际上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军事训练,曾做过两三年吉林驻防将军。1910年10月寿勋视察第一镇一事就证明他缺乏近代军事知识。那次视察后,他提议给229名文武官员特别嘉奖,尽管该镇情况比两年前还差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后,他在宫廷上下的影响力很大,颇能左右陆军部,并且在许多事情上瞒着荫昌独断专行。^⑧

还有一点也必须着重指出:集中军权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这遭到各省的抵制,而编练新军所需的资金是靠地方上提供的(参见下一节)。瞿人统治的最后三年是中央权力最衰弱的时期。摄政王缺乏坚强的性格和开阔的眼界,年轻面无经验的满洲

贵族谋权谋私，新的皇太后隆裕和其他宫廷命妇都忙于勾心斗角，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权威。摄政王逐渐允许政府的改革脱离他的控制。^⑩北京没有目光远大、性格坚强的领袖人物去鼓起众人的信心。事实上，没有哪个高级官员敢于发扬首创精神并承担起重任。中国外务部对此直言不讳。1908年8月，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对一名英国商务经理说：只要能推脱责任，他和别的高级官员都不愿为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⑪

中央权威削弱的同时，地方独立倾向在增长。虽然北京在许多方面可以约束督抚，而且有权调动或撤销他们的职务，但督抚们仍然擅自处事，一意孤行。如果北京的政策不符合督抚的利益，他们并不公然抗命，而是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建议，为不遵旨办事推卸责任。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愿意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撇开北京，自行其事。处在中央财政勒索与政治控制下，他们对北京的疑虑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若干地方大员在1911年1月联名奏议，反映出他们保持地方权力的决心已经发展到了何种地步。这份奏折陈述了三项原则，请求北京按这些原则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一，按宪法大纲组织新内阁时应与各省督抚商议。二，督抚有管束所属官僚的全权，务使他们尽责可靠。三，新式巡警组建完备之前，不应遣散旧式地方部队。^⑫如果北京全盘接受这些建议，即将成立的新内阁就没有多少管束行省的权力。

旧式地方部队问题很能说明地方大员们享有的权力。新成立的资政院要求立即或尽快遣散旧军队，提议根据财政预算，从1911年1月起大幅度削减旧军队费用（减少五分之二）。摄政王和陆军部看来都赞成这项提议，但各省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争辩道一旦裁撤旧军队，地方的安宁与秩序便无从维持，因为新军尚未作好接替旧军队职责的准备。由于旧式军队分成许多小部队散驻各地，军人服役期限不受严格限制，因此可以比新军更有效地维持地方治安。还

有一个问题是“欺诈”。北京不可能真正查清旧式军队花费了多少资金,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的又有多少。最后的问题是,上一年新军某些镇纪律涣散,发生兵变,这支新式军队可靠性已经值得怀疑^⑧。

在与中央关系问题上,行省的地位因中国的军事地形而得到加强。一位作者曾指出,中国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总是共同起着作用,导致“地方军事割据”的局面^⑨。中国多山的地形有利于地方割据,南北交通运输系统的落后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就难以维持南北之间的凝聚力,往往造成政治上的支离破碎。

鉴于这些问题,要消除集中军权的障碍,就需要有一个远比荫昌能干,足智多谋而且影响力大的人物。与此同时,财政困难使局势变得更复杂了。我们即将论述的就是财政问题。

六、军事财政

实施编练新军的计划,财政方面各种重要问题起着关键作用。各省编练新军的额定镇数,是根据当地财政资源及政治和战略等因素决定的。直隶拥有的新军镇数多于其他省份,因为它是大清帝国权力的中心地区。四川的战略位置重要,计划设置3镇新军。江西和河南各编练1镇,是因为考虑到这两个省的财源有限。由于资金短缺,几乎各镇兵力都不足额定数。北京一直向各省施加压力,要它们把各镇兵员补充足额。

除了新疆、广西、甘肃和东三省,其他省份按规定要向北洋军及更贫困地区的新军解拨款项。解协资金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称为解饷,每年按期解送北京供中央政府开销。第二种称协饷,是解饷之外的协拨,形式上经中央同意拨给贫穷省份,帮助它们搞军事改革。^{*}

* 八旗定鼎中原后,清朝就实行解协饷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各省解送银粮到京,称为解饷或京饷。省际拨款,称为协饷,有平时与战时之分。解协饷用于维持京师文武及各地八旗、绿营开销。清末,部分解协饷供编练新军需用。

大多数省份非但必须供养本省新军和旧式军队，而且还得向北洋军队和贫困地区提供军费支助。这些省份竭尽全力完成全部或部分解饷额数，但对协饷都拖延时日或确实没有能力拨款，因为它们为供养本省军队已经承受了沉重的财政压力。^⑥

北洋军队的维持很大程度上靠户部*拨给经费。斯蒂芬·麦金诺曾指出，尽管袁世凯给予特别关注，并且施加个人影响力，北洋军跟地区性的私人武装还是大不相同的，从一开始它就在财政和管理上受北京的控制。^⑦北洋军的年度经费通常提前一年交朝廷审批，因此户部可以为这笔经费作必要的筹划，使资金全部或部分落实。练兵处有权为政府税收开拓一切可能的财源。袁世凯建议对国产的酒、烟草、鸦片、茶叶和盐征收印花税及附加税，并增收新的地产登记税、关税和铸币税。户部就此给各省发文，以期在1904年从14个省增收81万两银的附加税。如果不能如数完成增税额，将强令有关地区的行政官员和其他省份的督抚从地赋收入中拨出部分款项，直到凑齐额数为止。同时，要求这些省份节约开支，竭尽全力交足额数。对试图阻挠增税事务的士绅和不诚实的官员，则以严厉惩处相威吓。^⑧

单靠新税收不足以应付高昂的军费支出，政府各部门的开销也需要减缩。工部奉命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工程，皇室成员也被告知要减少支出。政府鼓励富商和地主募捐资金，作为报答，他们可以获取官衔和其他酬赏。^⑨

1904年4月，户部尚书王文韶提呈奏折，建议除已增收的烟酒税外，应彻底修改全国地赋额数，提高盐税，增加四川的鸦片税，所有可耕种的公地全部出售给汉族农民。减轻南方各省的税务，不必再每年给北京解送贡米。暂时停建所有公共工程。身居肥缺的

* 1906年11月6日，清廷宣布正式厘订中央新官制，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

文官应将部分额外所得交充军费。据估计，这些措施将使岁入增加1255.5万两银子。他的奏议获得皇帝的批准。^⑳

中国政府唯恐军队受制于列强，而不寻求外债。清廷驳回了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关于举借100万两银外债以平衡广西军费开支的奏议，但批准了他要求在广东卖官鬻爵的条陈。为此目的设立了临时性官署，待收集满100万银后，这类机构就马上撤销了。^㉑

北京力图牢牢控制住各省财政。陕西巡抚早在1904年就表示，由于1900至1901年的饥荒，他应付地方问题已经困难重重，因而无法交足税款。陕西省向来贫困，民众的生活状况“极其悲惨可怜”，只能从旧式军队中吸收兵员组建新军。^㉒该巡抚在同年晚些时候再次上奏，认为即使裁减本省官员，紧缩省署开支，要按额定数交税仍然存在很大困难。^㉓山东巡抚周馥也抱怨资金匮乏。他每年至少要花20万两银来维持4营新军的粮饷和军械费用。^㉔他请求免除山东解送京粮，允许卖官鬻爵（跟广东一样）。^㉕

甚至连富庶的省份也有难处。江苏每年增派税收100万两银。两江总督魏光燾抱怨道，为了维持在南京训练的新建常备军，江苏省早已穷于应付。增收100万两银将使当地民众更加贫困，或许会迫使他们加入秘密会党，参与叛乱活动。^㉖

或许由于袁世凯特别卖力，直隶是极少数几个按时交纳税款的省份之一。另一个按期交税的省是湖北，但情况不尽相同。1904年5月，湖北递解给北京10万两银作为年税额的一部分，但地方政府已经向汉口钱庄举借了一笔款子。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极窘迫的情况下，设法于年底凑足其余税款。^㉗

第二镇和第三镇在1904年8月组建成军时，俸饷、津贴、购买武器弹药及各项杂费支出总计约423万两银。1905年这两个镇的预算为360万两银，比上一年略微减少，因为初创阶段的费用不必再计入。这两个镇由户部拨款，第一镇经费则由直隶支付。到那时为

止,北京从各省增收到税款292万两银,不足以充抵第二、三镇的开销。^②

地方对增税反应消极。为此,1904年8月铁良巡视中部和南方各省。他这次南下,表面上装作视察火药厂、机器制造局等各类兵工厂,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负有更重要的使命,通过调查这些省份的财政状况,搜刮更多资金用于军事。地方报刊把这次巡视与已故的刚毅的使命相提并论。刚毅曾于1898年借口视察长江防务,却从省库搜刮到了资金。^③据英国驻沪代总领事说,铁良彻底检查了江南制造局和设在龙华的火药厂,然后成功地从地方行政官那里筹集到80万两银。^④

如此搜刮资金触犯了地方行政管理的禁区,搞得省里怨愤丛生,以至清廷不得不在11月降旨,责令铁良把职权限制在跟巡视兵工厂有关的事情上。他可以在他巡视的那些省里考察军事操演,但必须自我约束,不去调查地方财务。显然,地方政府决心抵制北京干涉地方财政事务的企图,北京也从铁良南巡考察过程中看出隐舍的矛盾,觉得有必要安抚行省。

1905年北洋军各镇平均耗费150万两银。第一镇经费由直隶提供,第二、三、六镇开销由户部拨给,第四镇所需主要由山东供给,还有一部分取之于湖北,第五镇则由山东和户部共同维持。^⑤表二列出17个省为北洋军队和贫困地区部队承担军费的额定数。江苏、湖北、浙江3省在1905年提供了超出定额的资金,显然是因为这3个省的财力较充裕,被迫超额交税,结果它们在1906年的交税额数又有所增加。直隶、湖南、甘肃3省1905年完成交税额数,其余各省都没完成定额。这些省份1906年的税额大多保持不变。清廷考虑到云南和贵州经济贫困,允许这两个省的交税额数大幅度降低。

户部从各省和其他税源收取税款,然后把其中很大一部分交

给练兵处。练兵处军政司官员把银钱分发给北洋各镇。资金从北京转到天津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考察出户部、兵部和练兵处的合作

表二 1905年和1906年各省承担军情情况*

(单位:两)

省 别	1905年额定数	1905年实交数	1906年额定数
江 苏	850000	1610000	1610000
湖 北	500000	1030000	1030000
浙 江	500000	914400	914000
直 隶	1100000	按额交付	1100000
湖 南	400000	按额交付	400000
甘 肃	100000	按额交付	100000
四 川	800000	解交部分	800000
广 东	850000	150000	850000
河 南	400000	200000	400000
山 东	550000	192000	550000
山 西	500000	100600	500000
安 徽	350000	100000	350000
陕 西	300000	150000	300000
福 建	400000	20000	400000
云 南	200000	120000	120000
贵 州	60000	10000	10000
奉 天	未定	—	未定
吉 林	免交	—	免交
广 西	免交	—	免交
黑龙江	免交	—	免交
新 疆	免交	—	免交

资料来源:《东方杂志》第2卷第10号(1905年11月),财政,第240—243页。

* 表中所列各省摊派的军情,主要属于新军。八旗、练勇等旧式军队仍由地方等传统税项维持。

是否有效。袁世凯控制练兵处时，他的同僚和心腹正在兵部和户部担任高级职位，这一阶段合作效果是良好的。^④

如果户部尚书由军机大臣兼任，他就有权迫使各省交税。1902至1904年之间鹿传霖任户部尚书，他是军机大臣。1904年，另一名军机大臣荣庆成为户部尚书。1905年8月铁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同时兼兵部侍郎。这些极有影响力的官员身处高级职位，他们愿意并且能够获取千百万两银款来维持北洋军队。

1906年11月户部改为度支部，负责维持第一、三、六镇全部军费，以及第五镇一半军费和第四镇一小部分军费。直隶支付第二镇全部费用及第四镇大部分费用。这一年户部为北洋军筹集到500万两银，其中约有半数税款来自铸币税和其他税项，另一半征自地方特别税，摊派给各省的份额多寡不一。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 部分资金取自华北国有铁路利税及盐、酒等税，其他来自各省税收。军费常常供不应求，有时甚至拖欠官兵大量俸饷。^⑤

1906年，声望不足的满员溥廷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载泽在第二年接替了他。他俩都不是军机大臣，所以度支部似乎失出了向地方强征税款的权威。但各省实际上还是被迫交税。清廷还要求地方上为1906年设立的陆军部特别军费储备金提供资金，贫困省份暂免或永久免交。各省故位重演，年复一年地拖欠，有部分拖欠的，也有根本不交的。到1909年6月，这项储备金总数约500万两银。

18个省加上东三省的新军，1906年度总费用估计达6000万两银，其中不包括禁卫军的经费。新军已组建成10个镇、21个混成协。以一镇平时开销150万两银计算，新军各支部队粮饷总支出3000余万两银。这意味着另一半银两用于陆军部的管理经费，以

* 袁世凯在1906年秋被迫交出北洋军4个镇的统辖权。文中“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指的是第二、四镇。

及购置武器弹药、建造营房和其他军事设施、维持军事学堂和兵工厂、经办省督练公所等项开销上。^⑤谁也搞不清北京每年能征收到多少军费，因为它对各省的财政控制鞭长莫及，收效甚微。因此，中国财政制度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北京必须更有效地控制国家税收。在此之前，陆军不可能取得巨大发展。

直到1910年下半年才有一项军费预算。1911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作为成立立宪政府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于1910年11月递呈资政院，成为中国第一份国家财政预算。新军费用的初步预算为58760235两银，经过资政院大力砍削，只剩下28692680两银。其他军费预算也遭到大劈大砍，有些项目遭到资政院否决。国家财政预算被削减的部分中有半数以上属军费预算，被砍去的军费预算占原军费预算的三分之一强。资政院的宗旨是暂不扩充军队，主张提高现存部队的训练水平，改善其装备，并做到军需品自给自足。^⑥

这份财政预算第一次把中国的军费开支公布于众。陆军部曾以1910年军费支出为依据，并计入下一年度扩充军备所需经费，提出过一项军费预算。据中国方面资料，陆军部开列的军费预算总数高达109534895两银，计划用于新旧各式陆军、军事学堂、兵工厂、交通运输、军事要塞、马政及军事管理机构等开销，但不包括海军费用。仅仅新军一项就需银54361901两，占军费总预算49.62%。遣散绿营和部分巡防营将节省1300余万两银，其中一半用于被遣散军人的年金与其他补贴，另一半用于新军。因此，根据陆军部初步预算，新军经费实际上还将增加，占陆军军费总预算的50%以上。^⑦

表三表明各主要省区应该承担的新军军费预算，其中不包括计划组建或正在组建新军的边远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出，四川承担的预算数额最高，其次为奉天（1镇新军正在那里组建）、广东（该

省1个混成协将扩充为1个镇)、湖北、安徽、甘肃、云南、河南、湖南及浙江。直隶不必承担很大份额，因为北洋军已经编练得很不错了。各省总预算中，平均40--50%的经费用于新军。

陆军部总预算占全国财政总开支的35%，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36%。度支部将陆军部预算压缩到91358035两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0%。^⑧美国驻华陆军参赞认为，度支部的全国年度支出预算为338652295两银，其中126843333两用于陆军部，不包括海军的开支。资政院把陆军部预算削减到77915890两银，把全国总支出压缩到260745003两银，从而使陆军部预算占总预算的29.88%。^⑨

从新军预算所示的情况看，陆军部的预算似乎更切合实际，即军费支出应该占国民总收入的36%。跟欧洲列强及日本的军费开支相比，这种比例并不过分。但对中国说来，新军给农业经济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还得支撑其他各项必要的改革。1911年许多省份的军费开销实际上占省财政支出一半以上（参见后面几章）。各省被迫缴纳的税款花在供养军队上，而没用于本省事务，它们自然感到怨愤。

不过，这样的财政制度使地方当局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驻省部队，对军队的控制权还延伸到靠地方资金维持的兵工厂。北京政府虽然先后设置了练兵处和陆军部，但还是无法成功地把国家武装力量放到中央统一管理的体系中。每个省城都设有若干军械库或弹药库，存放着随时可取用的剩余武器。这些库存的武器弹药也由督抚直接管理。^⑩

本章小结。中央和各省的军事管理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新的陆军部、军需处及各省督练公所都建立起来了。已故世的慈禧太后为改革所作的努力，由摄政王与陆军部继续下去，他们特

表三 1911年主要省区的军费预算

(单位:两)

省区	财政总收入	财政总支出	新军支出	百分比	收支平衡情况
奉天	16183311	15521927	5294054	34	有余
吉林	8488606	9342715	1638677	17	不足
黑龙江	5400169	5513421	1423421	25	不足
直隶	25355170	21978882	3554287	16	有余
江苏	9834751	19430471	3388895	32	不足
江北	1507014	1565794	3041604	200	不足
安徽	5195863	6735864	4704776	70	不足
山西	8230884	9359828	2338638	25	不足
山东	9761848	9755823	2329217	24	有余
河南	9930096	9840305	4141604	43	有余
陕西	5035455	6207290	1801048	29	不足
甘肃	3805956	4317879	4295884	99.4	不足
新疆	3567885	3173772	1485262	41	有余
福建	5417396	6563775	1957967	30	不足
浙江	11830488	13380352	3508260	26	不足
江西	7073278	8478381	3127475	37	不足
湖北	13534251	14510681	5064904	31	不足
湖南	7661553	94887.3	3733739	40	不足
四川	22686637	26413232	10306036	40	不足
广东	23201957	23262273	5618158	27	有余
广西	4476302	5782331	3083513	53	不足
云南	5536793	7469703	4208659	56	不足
贵州	1842821	2749574	1248338	45	不足

资料来源:沈莹:《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见《社会科学》第2辑第2期(1937年1月),第400—401页。

别致力于统一全国各地的陆军,并力图从军事上、财政上控制各省。

北京统治集团的政治倾轧,满人渴望增强他们在政府中的权势,1909年以后中央统治地位的削弱,掌管军务的满族显贵的平庸无能,新军军费征集方式的杂乱无章,各省政权、财权的渐趋独立,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北京发展军事的努力。除北洋各镇之外,所谓国家武装力量或许有名无实,只能说是一纸空文。南方各镇尽管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但是这些新军是由各省编练,供养和管辖的,因此并不能真正做到军令划一。北京颁布的政策和规章,地方当局如感到不便,就阳奉阴违,渗进私货。总之,尽管编练新军是中央发起的,但新军仍然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

注释:

- ① 卢西恩·W·派伊:《政治近代化进程中的陆军》,载约翰·J·约翰逊编:《军方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76页。
- ② 小克劳德·E·韦尔奇编:《政治近代化——政治变革比较读物》,第358页。
- ③ 《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55卷,第10页。
- ④ 《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年),军事,第1—2页;第4号(1904年),军事,第197—200页。
- ⑤ 《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年),杂俎,第5页。
- ⑥ 包德华编:《民国人名辞典》第3卷,第330—331页。
- ⑦ 同⑥,第393—394页。
- ⑧ 《清史列传》第3册,第17页。
- ⑨ 沈祖亮、吴同生:《容庵弟子记》第3卷,第15页;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67页。
- ⑩ FO17/1655,《1904年3月1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4月15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
- ⑪ 《东方杂志》第1卷第7号(1904年),时评,第42页。
- ⑫ FO371/31,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新军的报告》,附在萨道义1906年1月27日致兰斯顿侯爵的第28号文件中。
- ⑬ 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第303—304页。拉尔夫·L·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03页中指出,天津督练公所“很大程度上是1902年设立的练兵处的化身”,负责训练当地的军队。
- ⑭ 竹坞:《我国之陆军》,载《国风报》第1卷第21期(1910年),第65—66页;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第202页;WO33/454,《中国武装力量手册》,第35页。

- ⑮ FO 371/229, 柏来乐撰写的《广州至南昌旅行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7年4月15日致格雷的第181号文件中。
- ⑯ FO371/214,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杭州驻军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5日致格雷的第319号文件中; 《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1905), 军事, 第379—381页。
- ⑰ FO371/435,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东三省驻军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21日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⑱ FO371/542,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东三省驻军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9年11月16日致格雷的第8号文件中。
- ⑲ FO371/642,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驻山东第五镇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6年10月16日致格雷的第420号文件中; FO371/434,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五镇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12日致格雷的第407号文件中。
- ⑳ 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 第337—339页; FO371/34, 柏来乐撰写的《湖南札记》, 附在康乃吉1906年7月9日致格雷的第296号文件中。
- ㉑ FO371/34, 柏来乐撰写的《湖南札记》, 附在康乃吉1905年7月9日致格雷的第296号文件中。
- ㉒ FO371/214,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驻苏州新军的报告》, 附在1907年7月5日朱尔典致格雷的第319号文件中; FO371/229, 柏来乐撰写的《广州至南昌旅行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7年4月15日致格雷的第181号文件中。
- ㉓ FO371/214,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驻南京第九镇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㉔ 马利贝斯·E·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 第105—107页。
- ㉕ 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 第139—145页。
- ㉖ FO405/171, 《1906年中国年度报告》, 第14页。
- ㉗ FO371/214, 柏来乐撰写的《江苏省督练公所组织状况》, 附在朱尔典1907年8月20日致格雷的第395号文件中。
- ㉘ FO371/226, 1907年5月5日朱尔典致格雷的第71号电文。
- ㉙ 马利贝斯·E·卡梅伦在《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第92页写道,“这可能出于慈禧太后对戊戌政变时期同谋者袁世凯的害怕和不信任, 并对他增长的权力感到震惊……人们在议论, 袁世凯正在使用他所掌握的权力……加强自己, 为慈禧去世后的局面预作准备, 因为那时光绪或许会恢复皇帝的实权, 将有机会惩处那些使他失去权力的人, 以报长久蓄积的怨恨。”
- ㉚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卷, 第1260页。铁良与袁世凯争论的问题不甚明了。郭廷以注意到铁良反对京畿地区行政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而这些改革很可能是袁世凯提出的。马利贝斯·E·卡梅伦在《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第92页提出, 他俩之间的不和从第二次军事大会操以后开始, 也就是说, 在1906年下半年举行的一系列军事会议上意见相左。斯蒂芬·R·麦金诺则认为矛盾起因是满人强化中央集权, 控制汉族官员, 以及铁良提议取消各省督抚。参阅斯蒂芬·R·麦金诺:《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权力结构及源起》, 第151页。
- ㉛ FO371/225, 朱尔典1907年2月21日致格雷的第99号文件。第三、第五镇统制段祺瑞和张怀芝因失宠而先后辞职, 没有效力于凤山。参阅FO371/434, 柏来乐撰写的《关

- 于第五筑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12日致格雷的第407号文件中；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18页。
- ② FO371/217，柏来尔撰写的《新设陆军部备忘录》，附在朱尔典1906年11月20日致格雷的第504号文件中；并参阅FO405/171，《1906年中国年度报告》，第14页。
- ③ FO371/226，朱尔典1907年2月21日致格雷的第99号文件。
- ④ 同③，备忘录评论。
- ⑤ FO228/1664，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1907年2月23日致朱尔典的第14号文件。
- ⑥ FO405/171，《1907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6页。
- ⑦ 《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576卷，第1页。FO371/220，《清帝谕旨》，附在朱尔典1907年8月21日致格雷的第405号文件中。
- ⑧ 这是作者根据《东方杂志》第5卷第7—12号（1908年）第1、7、13、19、31页各表得出的结论。
- ⑨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2页。
- ⑩ 《北华捷报》，1909年1月9日，第79页；陈志让：《袁世凯》，第75页。
- ⑪ 《东方杂志》，第5卷第10号（1908年），各表，第19页。
- ⑫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14卷，第20—21页。
- ⑬ FO371/633，朱尔典1909年7月20日致格雷的第259号文件。
- ⑭ 《泰晤士报》，1909年10月11日，第4版；《东方杂志》第6卷第9号（1908年），各表，第43页。
- ⑮ 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英译件见《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第1182页；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第61—64页；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6页。
- ⑯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8页。
- ⑰ WDGS6283—1，《1910年8月军事事件概况》，第1—2页；6283—3，《1910年10月军事事件概况》，第1页。
- ⑱ 军谘处所属部门管理情况为：1. 冯国璋和哈汉章负责参谋事务；2. 陆忠远（音）分管军官调动；3. 冯冠广（音）分管军事情报；4. 钱志才（音）分管演习与通讯；5. 张统领分管测绘；6. 蔡统领分管翻译。参阅WDGS6283—4，《1910年11月军事情报述要》，第3页。冯国璋虽然未曾留学日本，但他在日本有过若干经历。第一次是在1895年，他出任中国驻日使馆的陆军参赞，结识了一些日本军官。1905年秋他再次东渡，观看日本陆军军事演习。参阅包德华编：《民国人名辞典》第1卷，第25页。
- ⑲ 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5页。
- ⑳ 《北华捷报》，1909年2月25日，第433页，清帝谕旨。据悉，由于铁良与贝勒载涛之间的磨擦，清廷有时对不满意陆军部处理的事务。参阅《京报》有关内容，见FO371/870，附在麻木勒1910年4月25日致格雷的第123号文件中。铁良辞职还另有原因。其中之一是，摄政王拒不承认铁良为陆军部利益而举借的一笔80万两银款项。另有证据证实铁良的失势。建立禁卫军，设置海军处，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这些措施都使铁良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在消减。其他论者认为，铁良跟他的老搭档袁世凯貌合神离，而权势的天平倾向于袁，使铁良受冷遇被迫辞职。参阅《中国的陆海军》，见《远东评论》，1910年8月刊，第90—91页。总之，铁良从未成功地控制住北洋军队或削夺袁世凯的权势。1907年以来，长期追随袁的那些人实际上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如我们所知，冯国璋在军谘处取得了高级职位，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第三

镇和两个混成协将派往东三省。按计划,这两个混成协将从袁世凯的第二、四镇及凤山的第五、六镇中抽调部队组成。袁的支持者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以副护军第二镇的王英楷临时出任陆军部侍郎,成为凤山的第一助手。王心幹被任命为江苏境内的江北提督,并统辖第七镇。何况,并非所有的满族显贵都反对袁。例如,庆亲王就是袁的朋友和保护人。参阅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31—252页;斯蒂芬·R·麦金诺:《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权力结构及源起》,第152—153页。至于庆亲王与袁的关系以及他们联合反对政敌,参阅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15—116页。

- ①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72—273页;WDGS 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6—7页;J·G·里德:《清帝逊位与列国(1908—1912)》,第150页;《中国的陆海军》,载《远东评论》,1910年8月刊,第91页。
- ② WDGS6283—3,《1910年10月军事事件概况》,第2—3页;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7—8页;6562—4,《整顿陆军部》,第1—18页。陆军部经调整后,设承政、军制、军衡、军需、军医、军法、军牧7个司及军学处,共8个部门。
- ③ WDGS6283—1,《1910年8月军事事件概况》,第3页。
- ④ WDGS6283—3,《1910年10月军事事件概况》,第2页。
- ⑤ WDGS6283—5,《1910年12月军事事件概况》,第4页。
- ⑥ 同④,第3页;WDGS6283—4,《1910年11月军事事件概况》,第5页。据报告,新的军事法典正在顺利执行。参阅6283—5,《1910年12月军事事件概况》,第5—6页。
- ⑦ WDGS6283—2,《1910年9月军事事件概况》,第1—2页;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7、9页。
- ⑧ WDGS6283—2,《1910年9月军事事件概况》,第2—3页。
- ⑨ 同⑧,第14页。
- ⑩ WDGS6283—4,《1910年11月军事事件概况》,第1页。
- ⑪ WDGS6283—6,《1911年1月军事事件概况》,第1—2页。
- ⑫ 同⑩,第4、7页。
- ⑬ WDGS6562—5,《省督练公所》,第1—3页;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2年中国年鉴》,第247—249页。
- ⑭ 1911年2月,第十、五、六各镇指挥官在北京进行这种方式的会商。参阅WDGS 6283—7,《1911年2月军事事件概况》,第2—3页。
- ⑮ 有例可证。1910年9月,两江总督解除驻南京第九镇部分军官的职务。镇统制徐绍桢表示反对,认为此类事情只能由他本人单独处置。两江总督向陆军部告发徐绍桢,但陆军部支持徐绍桢。于是,两江总督上奏清廷,然而这份奏折被转到陆军部。该总督再次被告知,军务只能由军事当局处理,陆军部绝对信任徐绍桢。参阅FO 228/1762,《1910年第三季度情报》,附在领事葛福1910年9月30日专件中。
- ⑯ 在接受陆军部尚书一职之前,荫昌十分明白这一新职务是很难应付的。《华北日报》的柏林记者问他,在返回中国的前夕,是否为即将抵达祖国感到高兴?荫昌答道:“不,我并不为即将回国感到高兴,我宁愿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我想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进步到足以使一个人能在短时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地步。我既不把这项任命看作值得羡慕的,也不认为这项任命能使我取得任何令人瞩目的成就。”参阅《中国的陆海军》,见《远东评论》,1910年8月刊,第91页。

- ① WDG56283—8,《1911年3月1日至4月20日军事事件概要》,第4页。
- ② 同①,第3页。
- ③ 同①;WDG56283—3,《1910年2月军事事件概要》,第3页。
- ④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2页。
- ⑤ FO371/641,李德立撰写的《关于中国政治和商务情况的备忘录》,附在上海卡内门公司1909年8月31日致格雷的文件中。
- ⑥ 同⑤,第14页。
- ⑦ 同⑤,第6—7页;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78页。
- ⑧ 约翰·吉廷斯:《中国陆军》,见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187页。
- ⑨ 沈宝:《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载《社会科学》第2辑第2期(1937年1月),第392—393页。
- ⑩ 斯蒂芬·R·麦金诺:《北洋军、袁世凯及近代中国军阀主义起源》,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3年5月第3期),第405—422页。
- ⑪ FO17/1654,《1904年2月2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3月28日致副外交大臣文件中。
- ⑫ 悉尼市新南威尔士图书馆、米切尔图书馆藏《莫里循(1852—1932)文集》(以下略作MP)陆军部分;《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524卷,第10—11页。
- ⑬ FO17/1655,《1904年4月26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6月7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
- ⑭ FO17/1657,《1904年8月16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9月25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广东和广西的财政状况,参阅《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年),财政,第260—263页。
- ⑮ FO17/1655,《1904年2月16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4月14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
- ⑯ 《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年),财政,第257—260页。
- ⑰ 《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1904年),军事,第218—221页。
- ⑱ 同⑰,第253—254页。
- ⑲ FO17/1655,《1904年3月1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4月15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
- ⑳ FO17/1655,《1904年5月10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6月21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同⑱,第271—275页。
- ㉑ FO17/1657,《1904年8月30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10月14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
- ㉒ 《东方杂志》第1卷第8号(1904年),社说,第181—185页;第9号(1904年),社说,第210—212页;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87—188页。
- ㉓ FO17/1639,萨道义1904年12月7日致兰斯洛侯爵的第431号文件。
- ㉔ 《东方杂志》,第2卷第7号(1905年),财政,第125—127页;陈志让:《袁世凯》,第62—63页。
- ㉕ FO371/217,柏来乐撰写的《新建陆军部备忘录》,附在1906年11月29日朱尔典致格雷的第304号文件中;斯蒂芬·R·麦金诺:《北洋军、袁世凯及近代中国军阀主义

起源》，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3年5月第3期），第407页。

- ⑫ 1906年至1907年的冬季谣传纷起。据报道，袁世凯定期给部队发放俸饷的制度将在铁良管辖陆军时遭到破坏。参阅《泰晤士报》，1907年2月7日，第7版；2月9日，第7版；马利贝斯·E·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第93页；《北华捷报》，1907年1月4日，第30页。
- ⑬ FO317/852，韦乐沛撰写的《关于军费预算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9年12月18日致格雷的第470号文件中。
- ⑭ WDG5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37页。
- ⑮ 沈鉴：《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见《社会科学》第2辑第2期，第396—397页。该文使用了中国陆军部和度支部的资料。
- ⑯ 同⑮，第398—403页。
- ⑰ WDG56551—1，《1911年中国的财政预算》，第7、10页。
- ⑱ WDG5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0、24页。陆军部曾下令，任何地区要从兵工厂取得补给，须请示陆军部。如获允准，在发放武器之前，要把申请书转给地方当局。但看来这项命令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参阅 WDG56283—7，《1911年2月军事事件概况》，第8页。

第三章

军事教育与民族主义

中国军事力量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军官不称职。三年可以造就一名士兵，但一名能干的军官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和学习才能成材。直到 1910 年前后，军官素质低劣仍然严重影响着中国陆军的质量。不合格的军官可分为 4 种类型。来自八旗、绿营和其他旧式军队的军官，以及年老体弱和愚昧无知者属第一种类型。第二种是通过权贵者的裙带关系转入陆军的前水师军官。第三种原来是文官，他们获取军职靠的是管理能力，而不是军事知识。最后一种是短期留洋的青年学生，他们在海外只学习过几个月，其中有些人没有接触过军事课程。^①

在清皇朝最后几年中，出现了新兴的青年军官集团，人数虽然不多，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层次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大多 20 多岁，家庭背景相当不错，理所当然地受过很好的中国式教育。近代教育又使他们视野开阔，渴望在事业上成功，而且民族意识不断增长。

近代教育也助长了新兴军官集团中某些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反映出他们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而且受到北京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这类中国人渴望国家取得军事自主权。他们需要学习外来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但在雇用外国教习和技术人员的军事学堂和兵工厂里，他们巧妙地限制了外国人的监护。在建设

一支独立的国家武装力量的有利气氛中，凡是中国军官能顶下来的地方，就不用外国专家。

一、兴办近代军事学堂

1905年以前，行省设有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在校务管理、课程设置、学员人数、入学条件和培养标准上因地制宜，各不相同。培训时间短，内容不充分是无例外的通病，培养出来的军官不是第一流的，而且缺乏创新精神，不能适应军事技术近代化的变革。

1904年9月练兵处奏议，参照日本模式，设立不同等级的军事学堂和参谋学堂，实施7至10年一贯制教学。据此，计划在各省和八旗驻防要津建立陆军小学堂，全国兴办4所陆军中学堂，在北京则筹设1所陆军兵官学堂和1所陆军大学堂。练兵处还奏请设立1所速成师范学堂，为1908年计划开设的陆军中学堂培养师资。^③

这份奏议获得皇帝批准，从1905年起实施。陆军小学堂的设立和办理细则业已制定。^④练兵处希望各地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总共招收2000名学生，3年后入学人数将达6000名。据估计，90%的学生将成功地完成3年学业，进陆军中学堂再学习2年。学完中小学5年课程后，毕业生将以陆军入伍生的名义到部队充当正兵或正、副目，为期4个月。此后，他们将进入陆军兵官学堂学习1年半，然后返回原省部队做见习官或练习官弁，为期6个月。见习结束，他们须接受考核，考试优秀者被任命为队官。服役2年后，表现杰出者将被选送去陆军大学堂进修2年，以取得担任较高级军官或参谋官的资格。从陆军小学堂到陆军大学堂，其间大约要化10年时间。

按计划，各陆军小学堂应该在1905年或此后不久尽快设立。直

隶、江苏、湖北、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甘肃省省城都是总督所在地，每所陆军小学堂将招收 300 名学制 3 年的学生。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浙江、广西、贵州、湖南、山西和新疆等设巡抚的省，每所陆军小学堂应该招收 210 名学生，如果这些省愿意的话，也可以招收 300 人。荆州、福州和察哈尔等八旗驻防要地可以分别建立 1 所陆军小学堂。奉天、吉林、黑龙江的陆军小学堂数目未定。生源主要来自省办的高等小学堂，另有一部分从 1905 年以前设置的武备学堂中挑选。申请入学者要经过考试。考收条件如下：申请者年龄在 15 岁以上，18 岁以下；从原武备学堂内挑选者，年龄放宽到 20 岁。品格驯谨，诚实而无犯罪前科。出身良家子弟，真正有志于军事学习，并无不良嗜好。曾受过教育，初通文墨，能作浅近论说。还有关于身高、体重、视力、胸围等体格方面的要求。出身地址不是重要条件。诚如田中义一评论的那样，陆军小学堂从高等小学堂吸收生源这一事实说明，“新式军官的出身至少是地主、富农和富商，因为只有这类家庭才能花钱让他们的子弟读完高等小学堂”^④。这将使军官集团的阶级成份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使国内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迄今尚被人轻视的职业。

陆军小学堂开设的课程包括德育、语文、外语（日、英、俄、德、法中选一门）、历史（中国史和外国史）、地理（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数学（算术、几何、代数及三角）、自然常识（物理、植物学、动物学、卫生学和地质学）、测绘。此外，还有军事伦理、军事常识和体育课等。学生免交学费，还能领取数量不多的生活津贴，以及全部口粮、被褥、校服、教科书及文具。每周上 6 天课，每天 5 堂课，每堂课 1 小时，但实习课和体育课要长些。自然常识、德育、历史、地理、测绘及军事学每周各 2 堂课，数学和体育每周各 4 堂课，语文和外语每周各 5 堂课。^⑤

教学重点显然放在培训智能与体质。例如，数学和外语很受重视，军事教学只处在初级水平上，课时并不比历史和地理多。这表明当局认识到要提高军事教学水平，必须首先把基础教学搞扎实。

北京培养高水平军官集团的方针得到各省普遍支持。譬如，张之洞多年来努力招收举人、贡生、生员等有功名的士子书生，以及候选官员、官绅家庭子弟和各种各样知书达理的人。他规定，进入武备学堂者要通过笔试。即使难以按额定数招收120名符合标准的学员，他还是坚持挑选最优秀的人材填补缺额。1901年将弁学堂开办时，张之洞从文化水平高和热心军事的人中间考选学员。^⑥

到1907年，除新疆、黑龙江和若干八旗驻防地以外，其余各省都建起了陆军小学堂，其中直隶开设2所，1所在北京，另1所在姚村。^⑦大多数陆军小学堂从原先的武备学堂转变而成，并遵照北京制订的规章办学。看来，全国各地的陆军小学堂在训练和教学方面的标准大致划一，但外语教学的情形不尽相同。如东三省设俄语和日语，云南和广西把法语放在第一位，山东则重视德语。^⑧

由于各地情况有异，财政困难程度不同，部分军事学堂有自己的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北一所可容纳3000名学员的军事学堂。这所学堂在1906年初开办，每年招收1000名学员，以适应军官需求量大的形势。张之洞为了使入学人数翻倍，打算把学生分成两批，轮流来校，一天在学堂，一天去兵营。这样不但能增加学员人数，而且能加强学员同现役军官之间的美好交往。如果学员全部顺利完成学业，5至6年内将培养出6000名毕业生。这些学员都是武昌及其周围地区部队的军人，经过考试入学的。这样做，违背了北京的规章制度。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张之洞后来发觉良家子弟大多不能忍受艰苦的军旅生活。第二，当地高等小学里的学生还

没有修完课程。与此同时，张之洞在课程设置上增强了军事内容。第一年课程不变，但第二、第三年就增加了军事课。如开设了筑垒设防、地形测量、军队编制、军械设计制造、战略战术、骑兵与炮兵实习以及医务技术等课程。基础课与军事课之间的比例为，第一年三比一，第二年二比一，第三年一比二。此外，这所军事学堂附设制图班、军事管理班、医务班和水师班各一个，每班有60名学员。^⑨

湖北这所与众不同的陆军小学堂的另一个特点是学员年龄不受严格限制，入学条件的重点放在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上。结果，虽然一些成年学员年近三十，但他们有文化、身体好。^⑩他们因此有机会接受原来没有资格接受的近代教育。张之洞的创新，反映出各省情况不同，需求各异。与他自己先前坚持从当地有功名学人和上层分子中考选学员的准则相反，张之洞为地方环境所迫，转而从普通士兵中挑选学员。但这并没有降低军事学堂办学标准，因为他的部队里许多军人是有文化的，可以造就成优秀军官。

1908年直隶开设第三所陆军小学堂，校址在保定。设在北京的陆军学堂由陆军部直接管辖，办学条件最好，这所学堂有404名学员，其中满人约300名。由于办学经费昂贵，学员必须付学费，满族学员每月3两银，汉族学员每月4两银，官家子弟减半。学堂教授法语、德语和日语，但不设英语。毕业后，他们无例外地分配到北洋陆军中去服役。直隶另两所军事学堂设在保定和姚村，学员人数大约是北京军事学堂的一半。来自官员和商人家庭的学员几乎都成不了材。^⑪

跟北京制定的规章不尽相符，许多军事学堂由于经费不足，学员领不到生活津贴，但有不错的住宿条件，以及口粮、衣被、教科书和文具等供给品。入学者要经过考核这条规定，除一些八旗驻防地之外，其他各地似乎都照办了。有些省份的地方官员严格审核申请者的资格，然后选送合格学员。^⑫

每个省都有自己的陆军小学堂以适应本地区的需要。有些陆军小学堂跟最早编练成的10镇新军有关系,但不是镇属军事学堂。从直隶、武昌、南京、天津、福州和东三省军事学堂毕业的学员,根据需要,分配到各镇新军中去。^③

陆军中学堂看来办得更出色,原来计划只开办4所,分别设在保定、武昌、南京和西安。保定陆军中学堂从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东三省以及察哈尔招生;武昌陆军中学堂为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和八旗驻防地荆州的需要而设;南京陆军中学堂面向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若干八旗驻防地;西安陆军中学堂则为陕西、甘肃、四川和新疆开设。^④后来,保定陆军中学堂的办学计划取消了,以便集中力量办好北京的军事学堂。^⑤1905年秋,两广总督奏请在广州开办第五所陆军中学堂。到1909年10月建成了3所陆军中学堂,分别设在北京、武昌和南京。1910年秋,西安陆军中学堂也兴建成功,而第五所陆军中学堂仍在筹划中。^⑥陆军中学堂开设的课程是陆军小学堂课程的拓宽和加深。

陆军中学堂寥若晨星,反映出清廷的意向是要造就一支精干而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集团。4所陆军中学堂不可能吸收陆军小学堂的全部毕业生,只有那些能力强并经过2年以上军旅生活实践的高材生才能进入陆军中学堂。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陆军中学堂都设在直隶、湖北、江苏、陕西等战略位置举足轻重的省份(第五所陆军中学堂将设在广东省)。然而也有难以理解之处,四川按计划要编练3镇新军,却没有自己的陆军中学堂。

在筹办陆军中学堂期间,另外采取应急措施培训军官。清廷计划在京畿地区开设一所陆军建成学堂。学员总数为800人,将从各省原有的武备学堂中挑选。在校学习2年后,以学习官身份下部队实习半年,然后被任命为营官。^⑦陆军速成学堂最终设在保定,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但不包括新疆、西藏。学制分为两种。普

通学制2年半,学员1140人。特别学制1年半,入学人数较少。普通学制的第一年是一般教学,其余时间教授军事科学。特别学制全部课程都与军事科学有关。大多数学员学步兵课程,另一些学炮兵或骑兵课程,其余则学工程、辎重等。虽然为部分学员分别开设了日语、英语、法语及德语课,但由于学制短,外语教学是不够重视的。完成学业后,毕业生以练习军官身份去部队实习3个月。到1908年,这个国家在其他地区开设了另5所性质相似的军事学堂,但到1911年都停办了。^⑧

培训军官的另一个应急措施是在陆军中设立标讲堂。北洋六镇各标率先办标讲堂,教程1年。培训结束后,优秀学员被选送到镇属军校随营学堂继续深造2年,然后分配作军官。1909年3所陆军中学堂建成后,这类军队所属的军事学堂大多取消了。

陆军中学堂开设迟缓有多重因素,最主要是缺少合格的教习。中国教习的质量实在大成问题,他们“学识不足”,只能给学生“肤浅的教育”。^⑨虽然雇用了一些外国教习,但中国要培养出自己的教习还是绝对有必要的。为此目的,1908年春在保定开办了陆军速成师范学堂,学制2年(如有必要,18个月就结业),特地从陆军小学堂毕业生中挑选了140名学员。这些学员在陆军速成师范学堂只学习他们以后要讲授的课程,如数学、测绘、物理、历史和地理等。^⑩保定陆军速成师范学堂到1910年就停办了,可能是由于它已失去存在的价值。^⑪

1916年创办陆军大学堂之前,天津、沈阳、武昌、南京及其他省城开设了临时性的军官培训学堂讲武堂,其中1906年5月在天津附近韩家墅开设的讲武堂办得最出色。韩家墅讲武堂分成培训正式军官与未入流官佐两个部分。培训未入流官佐的部分按营的方式组建,540名学员来自北洋六镇,每镇派送精兵90名。学员只接受步兵兵种的培训。完成1年学业后,他们被任命为正、副目,排长

或队军需官。为保证入学者质量,备选人员必须勤勉耐劳、身体健康,富有进取性,而且至少已经在部队服役半年。150余名军官学员接受较高层次的培训。他们都来自北洋六镇,由陆军部选派,接受6个月的培训。每镇要派出标统级官员1名,营管带级官员2名,其他学员的级别自营管带至主任军需官不等。办学目的是更新军官的军事知识并确保统一执行军令。^②

湖北有自己的军官培训学堂,称为将校讲习所,培训各标任官佐职务3年以上的队官级军官。这些军官分批进将校讲习所进修6个月,然后回部队任职1年,再重复这个过程,直至全部教程结束。约有800名军官在1907年参加过此项进修,其中50人接受参谋职务的培训。南京也有类似的讲武堂,培训各标军官,但教程要短得多,通常半年为一教程,有时根据需要3个月为一教程。^③

此外,在保定还开办了一所军官学堂,设置两套不同教程。第一套教程面向步兵营和骑兵营管带,时间为1年半。第二套教程为队官设置,需3年时间完成。所有军官学员来自北洋各镇及第八、九两镇。保定军官学堂办学方式与韩家墅讲武堂相似,不过教程要长些,并且是为那些已完成陆军速成学堂课程的较高级别军官提供进一步培训。1910年保定军官学堂有120名学员,计划在第二年扩大规模,迁到北京去办。^④

1911年夏,北京陆军兵官学堂仍在筹划之中。除了已论及的各类军事学堂外,还有大沽的宪兵学堂(后迁至北京),20余所专科类的军事学堂。后者分别设置工程、电报、军事测绘、军械、兽医、医务及后勤等专业。^⑤美国陆军总参谋部斯威夫特少校认为,1910年中国军事学堂在校学员约7000人(不包括军事专科类学员),按计划到1912年学员人数将翻倍。^⑥美国驻华陆军参赞认为在校军事学员人数是7600人,其中5500人分属于24所陆军小学堂。^⑦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称,武昌起义爆发时

各类军事学堂共有 70 所。而《1912年中国年鉴》则列出 27 所陆军小学堂(鲍威尔估计 25 所)、15 所测绘学堂、4 所陆军中学堂,以及陆军军官学堂与陆军贵胄学堂。^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陆军贵胄学堂,1906 年成立于北京。贵胄学堂的学员年龄在 18—25 岁之间,来自皇室成员,以及总督、巡抚,各部尚书和侍郎,八旗驻防将军等文武大员的子弟与亲属。学员的父辈中最有名的是庆亲王、铁良和闽浙总督松寿。醇亲王,贝勒载涛和贝勒载洵经常去贵胄学堂旁听。学员学习 3 年一般课程,接着去部队见习 2 个月,然后回到学堂再学 1 年半军事科学,再下部队几个月,最后出任队、排级军官。^③

贵胄学堂第一任总办是副都统冯国璋*,他担任过保定讲武堂总办。1908 年,贵胄学堂有 120 名学员,其中 70 人来自皇亲国戚,23 人是满族官员子弟,27 人是汉族官员子弟。据说,满族学员在学习上比汉族学员更聪明机灵。除了英、德、日等外语,他们还学习欧洲史、中国史、地理、战术学、外国军事制度和军事操练。贵胄学堂不聘用外国教习,学员行为普遍良好。慈禧太后极力主张亲王和文武大员送他们子弟上贵胄学堂。所以,任何一名学员被开除,非但犯规学员本人遭到麻烦,他的父母也会受牵连。著名的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 1908 年访问过这所学堂,发觉整个教学体系很差^④。至于后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进教学质量,就不清楚了。

二、军事留学生

中国人非但在国内培养军校生,而且还派送学员去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军事院校留学。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们大多留

* 原文称冯国璋为中将。当时冯国璋任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译文据实情处理。

学日本。日本地理位置接近中国大陆，日语比西方语言容易学，日本的生活费用低于西方国家，日本的社会制度在许多方面跟中国大同小异。^④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正在成为中国仿效的楷模，尤其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少数几个省份已开始主动选派少量年轻人留学海外，影响较大的是湖北、湖南和四川。1900年，有40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攻读军事学科。1901年9月，中国政府大力主张其他各省也向海外派送军事留学生。袁世凯特别起劲，1902年初就从武卫右军和北洋武备学堂挑选出55名学员，派赴日本学习军事课程。^⑤1903年，有185名中国学生在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其中自费生44人，其他学生由湖北、福建、四川、湖南、浙江、云南及直隶等地方政府出资派送。留日军事生中有24人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⑥1904年，在日本军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增加到200余人。^⑦

日本陆军省为了帮助中国学生，作出了特殊努力，如建造新校舍，特地增派教习和管理人员等。由于赴日学生人数每年起伏不定，在他们的食宿和管理方面就产生了困难。因此，日本陆军省不止一次向中国驻日使馆提议制定一项规章，使中国学生赴日有章可循。中国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就此向北京奏议，确定每年赴日学生名额，并主张督抚与各省将军从官员和士绅的子弟中选派留日人员。清廷将这份奏折转交给练兵处处理，练兵处遂拟就《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1904年5月经清廷批准颁发。^⑧

这份章程有若干方面值得提及。每年选派军事留学生的名额定为100人，到第四年年底再另定额数。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等重要省份及北京每年各选派6名留学生，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和云南等中等重要省份每年各选派4

* “日本战胜俄国”，指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

人,山西、陕西、甘肃、广西和贵州等兵力较单薄的省份每年各选派3人,13个八旗驻防地各选派1人。留学生从地方武备学堂学生中挑选,未设武备学堂的行省则从各该省文武世家子弟内选派。所有中选学生必须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健康的身躯,聪明勤奋,学习目的明确,并无不良嗜好。他们应该有扎实的中国文化根基,具备军事科学的基础知识,年龄在18岁以上,20岁以下。凡未曾设立武备学堂的地区,选派的学生应该精通中国古典文化和历史。他们都是官费生,费用由北京和各省共同承担。今后,禁止自费赴日学习军事。凡正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自费生,将由驻东京中国出使日本大臣考察,意在将其中合格者转为官费生。学生完成学业后,以见习士官资格在日本陆军部队进行短期训练。此后,他们中有些人将进入日本参谋学校或其他院校进行专业方面深造,其余毕业生则返回中国。所有回国军事留学生将被考虑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未经参谋学校或任何其他专门院校深造的回国留学生,其中佼佼者通常被任命为营管带,第二等留学生被任命为队官,第三等留学生充任排长。日本参谋学校和专门院校的毕业生将得到更高级的任命,具体安排视他们的资格和经历而定,另一些则担任军事学堂教习。

安排军事留学生的政策中,讲究门第的特点仍然十分引人注目,北京坚持优先选用出身于权贵人家的留学生。北京的信条是坚定不移的:只有让这个国家里门第高贵的最优秀知识分子和男子汉担任军职,军官集团才能得到自我完善,并且保持忠诚可靠。

派赴日本的军事留学生大多来自直隶、湖北、湖南、浙江和江苏,这表明省里选派留学生实际上并不严格遵照章程规定的名额。这5个省能超额选派留学生,是因为这些省的财政资源较充裕,总督的态度较为积极。除袁世凯和张之洞以外,两江总督端方(1906—1909年在任)也是一位具有急进倾向的人物,同样热衷于

选派学生出洋留学。^③

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需要作出了反应，特地为中国留学生另行开设一所军事学校，称为振武学校。这所学校和成城学校都是士官预科学校，只有经过驻东京中国出使日本大臣签发证明的学生才能进入这两所学校。据日本军事当局规定，预科学校的毕业生要以普通士兵或见习士官的身份下部队服役6个月至1年，然后进入声名卓著的士官学校学习1年至1年半。正式毕业之前，再下联队见习3—6个月。最后，士官学校毕业生被授予军职。在日中国军事留学生按同样的规定完成学业。^④

1904年起，在日本的中国军事留学生每年约增加100人。据中国方面资料，1907年在日本军事留学生总数已达520余人。^⑤中方资料与日本驻华陆军参赞助理提供的数字相吻合。根据他的报告，77名中国学生在士官学校，223人在日本陆军部队中见习（一年前他们在预科学校），224人在预科学校。^⑥1910年初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少校提出，1904年有5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军事（不足的人数可以解释为前一年的毕业生已返回中国）。^⑦斯威夫特少校估计的人数为700名（可能包括了学习军械制造、观摩日军演习、进修军队管理与高级参谋课程的人员），但每年将减少50人。^⑧截至1911年，中国陆军里约有800名军官是日本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或曾在这类学校中学习过的，其中630人在士官学校受过培训。^⑨

赴欧美的军事留学生相对要少得多了。德国和英国分别以陆、海军强大而声名远扬，受到人们极大的敬重。湖北在1903年选派8名学生去美国学习海军，另外8名学生赴德国学习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等学科。^⑩早在1904年，那时任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从武昌几所军事学堂里又选出10名优生送赴德国，另30名优生派往比利时，学习铁道、矿业、其他工业及农业。^⑪亲奥地利的

两江总督周馥打算在 1905 年派送 10 名学生去该国。他还极力主张向英国和德国增派留学生,去学习武器制造、军需品生产、矿业和其他军事工业。^⑤

管理赴欧美军事留学生的暂行规章与赴日留学规定大同小异。但是,没有每年选派人数的定额,确定留学人员之前不必征求练兵处同意。学生年龄在 15 岁以上,24 岁以下。与通常要求的那样,学生必须出身于清白体面的家庭,本人具有相当水平的中国古典文化和历史知识,至少学习 3 年与留学国家有关的外语。^⑥

陆军部在 1908 年规定,尚未完成学业的归国留学生,不予安排工作,而且他们必须偿还留学期间政府提供的所有费用。^⑦由于归国留学生人数稳定增长,陆军部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所有归国军事留学生必须先在北京参加考试,然后才能接受军职^⑧。这样的考试似乎不利于欧美留学生,因为中国陆军新的军事术语是从日本人那里借鉴来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日本军事术语主要译自西方军事用语。受西式教育的军官只要化点功夫学会中文译名,就能避免军事术语使用方面的任何麻烦。^⑨

三、对军事教育体系和军官素质的评价

临近 1910 年时,新的军事教育体系在逐步提高军官素质方面取得了成功。先前颇多微辞的外国军事专家正在改变看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1908 年英国的《中国年度报告》尽管承认中国军事教育有所进步,但还是把中国军官刻画为“仍然非常落后,比不上其他国家”。虽然中外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正在取代旧式军官,但仍然有大量年纪过大、没有文化的军官。由于训练时间太短,即使曾留学海外的人看来还是没有受到坚实的军事教育。镇统制之类高级指挥官职位通常由年老而没受过教育的军官占据。从日

本学成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被任命为协统或参谋，他们感到无从发挥才干。英国的《中国年度报告》过去认为，“中国军官真正担当重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至少10年，或许10年以上”^⑤。

美国一份关于1908年中国军队的情况报告也批评道，对军官的培训“不充分，而且杂乱无序”，这是因为中国人以为花几个月或1年时间就可以掌握好军事科学。许多军校学员知识不足而且没有实践经验，却被授予军官职衔。不少标统以及某些协统、镇统制级高级军官是20余岁的年轻人，但队官往往是老年人。^⑥

接着几年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英国外交官在1909年报告中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正取得“稳步前进”，有些省份增设了新式军校。在组建新军镇和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军校毕业生担任了各级军官。^⑦1910年初，法国驻华陆军参赞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少校对中国军事教育计划印象很深，认为这项计划正在“被卓有成效地、彻底地执行”^⑧。同年年底，美国驻华陆军参赞里维斯上尉对军事教育的看法是，“比任何军事部门更有成效”，新式教育造就的毕业生组成“比原有军官更优秀的军官集团”。^⑨

另一方面，军事教育系统中的不足之处仍然显而易见。其中之一是没有低层次的军校，无法提供适合于下级军官的实用性教程。无论周而复始的专题讲座还是按章逐节的系列性讲课，不分高级军官还是低级官佐，都学习理应为培训镇级指挥官而开设的课程。^⑩另一个缺憾是缺少合格的中国教习。那些经过地方培训和陆军速成师范学堂学习的教习本身素质并不高。如果每年招收一些外国军事院校毕业生，这个问题原来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至少可以部分解决。但直至1910年底，军队对他们的需求量十分大，以至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事教育。起初几年，外国教习，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的教习，被聘任到军事学堂监督管理的职位上。但中国人后来自以为学会了如何经办军事学堂，不愿聘用更多的外国教

习。^⑤第三个问题是,许多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刚跨出校门就充任军官。^⑥这可能是因为军队在头几年里极其需要军官,后来力图起用受过较好训练的军官取代他们,但不很成功。

到1911年,新的教育制度已经实施了6年,陆军中学堂第一批毕业生开始体现出军事教育的成效。考虑到他们缺乏经验,他们的能力及不上英、法、美等国的军官就毫不足奇了。然而,新的教育制度确实表明已经向军事职业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且,不管它有什么缺点,毕竟给部队的自我完善提供了机会。1906年底到1907年初访问过北洋各镇的麦金尼对每个士兵都上军事课印象特别深。他查看了未入流官佐的练习本,感到“惊诧不已”,并发表以下看法:几何图形和防御设施的熟练描绘,地形测绘示意图,以及高难度数学作业,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袁世凯的军人在智力和体力的训练上正受到充分重视。^⑦

其他许多镇的情况与袁世凯军队的真实情形差不多。上军事课往往成为“军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4小时操练后,士兵按要
求每天去军事学堂学习2小时西方文化知识。^⑧士兵经过考核选拔,分批轮流上军事学堂。上级鼓励有文化的普通士兵自己组织学兵营,学习优秀的士兵有机会被迅速提升为正、副目或排长。^⑨

不论北京如何强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已成事实,因此军事学堂毕业生往往在本省服役,总督或巡抚有权授予他们官职。这就增强了军队地方化的基础,促使官兵越来越关注地方事务。^⑩另一方面,经地方当局和陆军部要求或命令,军官可以在省际调动。而且,由于南方有些军事学堂质量低劣,北方军官时常在南方部队里被授予高级职位。广西等省编练新军起步较晚,军官主要从外省输入。

留洋归国军官的身价要高得多了。他们中有少数人迅速升任镇统制或协统一级指挥官,其余的担任参谋官或军事学堂的总办

和监督。他们往往也回到原省服役,或者被调派到其他省份。

从军事专业观点看,到1911年已经涌现出一个新的军官阶层。他们年轻、受过新式军事院校训练,许多人来自社会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本人曾是有功名的书生。他们是改革年代的产物,是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日本近代科技知识的结晶。他们组成了新的军界精英。套用社会出身的说法,可以把他们刻划成下层士绅阶级的延伸和发展(士绅阶级将在第四章讨论)。②他们不同于明治维新以后崛起的日本陆军军官,不是一个独立的精英群体。他们凭借教育程度和社会背景的优势超越了旧式军官,获取高位要职。换句话说,他们与文官精英没有显著的区别。确实,文武精英有共同的社会关系,有面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政治经历,而且都为复兴中华操心,都相信新知识的价值。

与文官精英一样,新的军官集团内部也有派别门户之见。至少存在3个派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组成所谓士官系,以区别于北洋各军事学堂培养出来的北洋系军官。第三类军官较庞杂,他们是华中和华南各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必须应付士官系和北洋系军官的挑战。这3个派系各抢地势、勾心斗角。

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还必须艰难地与人数正在减少的旧式军官共事,何况有些旧式军官仍然身居高位。剔除这些尸位素餐的军官曾经招致某些部队强烈的对抗情绪,荫昌本人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只有当全部旧式军官被取代、新式军官磨练得更有经验之后,中国军官集团才能成为卓绝能干的群体。

四、新军中的民族主义

迄今为止,某些政治学家一直认为,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些变革以某种形式向官兵提

供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教育，尽管他们没有受过明确而正式的政治训练。新式军人越来越懂得发展新的技术领域与新的技术体系是近代国家的基础，从而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比较衰弱，也理解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性质，并知道他们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③

中国新式军事教育制度的内容对改革军人的思想观念确实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为了保卫祖国，军人此时在接受近代的（即外国的）技术训练，更加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阅读外国地理和历史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张主义，以及它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国的侵略。他们了解那些制造新式武器的国家的情况，并在那里学会了工艺技术。他们模仿列强军队进行操练，而正是这些强国从中国夺得势力范围和各种特权。所有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使部分中国军队渗透了爱国主义意识。

出国培训使大批军事留学生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在外部世界面临新的价值体系。在国外呆上1年或几个月便足以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与强国之间可悲的差距。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受急进思想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或其他支持国内斗争的革命团体。这些军事留学人员回国时多半怀有改革与革命的热情，愿意为建立强大昌盛、独立自主的中国而奋斗。

有充分证据表明民族主义意识正在中国军队里滋长。尚武精神正在成为全民族崇高的美德，这本身就是明证。美国记者埃德温·J·丁勒1909年去云南旅行，对此感受特别深切。他所遇到的军官中有许多人曾留洋学过军事，或从北京调来，他们不留发辫，外表看来久经磨练，而且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许多地方的庙宇寺院改建为兵营，另一些地方则已建造起巨大的兵工厂和新式营房，从早到晚各地都在进行军事训练。^④广州一所教会学堂的副校长也发现军队里的尚武精神与日俱增，军人开始有了爱国主义情操，并

为自身地位的重要性感到自豪。^⑤

为从事军队工作而自尊自傲的感情迅速增长，证明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军队里得到了大力培植。中国官兵都坚决拒收为奖励他们克尽职守而给的任何赏金，没有哪一个外国人不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特殊方式的骄傲令人敬佩不已，因为军人的俸饷不多，而且众所周知，接受赠品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不少人为了谋生或寻求好职业而从军，但也有许多人出于爱国目的才选择军事职业的。^⑥军事学堂为“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和军人荣誉感”倾注了不少力量。^⑦第八镇的部队在行军途中唱爱国歌曲是出了名的。^⑧1911年5月，镇统制张彪在一本小册子上题写“国耻”两字，分发给军人，以激发官兵爱国精神和战斗热情。这本小册子论述的问题有：义和团变乱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中国遭受的灾难，中国战败后被强索赔款和土地，列强占据通商口岸，洋人横蛮地对待中国，军人对国家和民众的巨大价值，军人应该在哪儿方面为国家作出牺牲。^⑨荫昌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也有名气，他命令各镇统制要更多地重视部队的“士气教育”，目的在于促进军人“爱国主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并懂得国家的意义与职能等军人过去不很明白的观念。^⑩

正是这种新兴的民族主义导致一些军官卷入了保路运动。1910年，几个省强烈反对北京通过举借外债实现铁路干线国有化的企图，希望用地方筹集的资金获取铁路营造权。引起最大麻烦的铁路段是汉口—四川干线(参阅第八章)。在留日归国学生领导下，湖北人民举行群众集会，推派代表赴京请愿。地方士绅和新军官兵也参加了这些集会。一名武昌军官愤怒地当众砍断自己的手指，以这种行为向中国民众呼吁，不能向西方人借款。^⑪在一次集会上，一名士兵咬破手指，给铁路公司写了一封血书，要求他们集资赎回路权。^⑫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则在另一次大会上被

一致推举为湖北军民赴京请愿代表。^⑭据外国情报资料,湖北新军参与鼓动宣传是经过他们长官同意的。^⑮

剪割发辫运动是汉人民族主义的又一种表达方式。一个近代军人身穿卡其布军衣军裤,头戴军便帽,脚登外国靴子,头发却编结成一根辫子。如此不伦不类的形象,实在使人感到难堪透了。在训练和体操时,这条有碍观瞻的累赘物实在太刺目了。这场割辫运动起先集中在军事学堂。1907年,杭州许多军校生和教习割去了发辫,但当地驻军的官兵还没有断然割辫。在安徽,少数几个军人割弃了发辫,其他军人将发辫盘在帽子里,听任其他部位的头发生长,因此当他们戴上军帽时,看起来好像辫子已被割掉了。广州的陆军小学堂中有25%的学生割去了辫子。^⑯未曾听说过军校生和士兵因割弃辫子而受到严惩的事例,这表明军事当局同情割辫运动。^⑰

北京的态度是模棱两可,息事宁人。清政府虽然从未正式同意割辫,但也不采取任何措施惩处擅自割辫的人。贝勒载涛访欧之后,完全赞成军人不再留辫子。1910年9月,陆军部、筹办海军处和外务部被告知,如果他们属下的官员要割辫子,不必劝阻。但这条规定不适用于中央其他机构。结果,陆军部官员与许多高级军官剪去了辫子,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军校生马上仿效。有的外国人估计,到1911年底所有军人都将剪去辫子。^⑱

在中国人看来,割去辫子的真正意义远远比这种行为本身来得重要。军事改革使男人的辫子成为丑陋的尾巴,军校生和军官作出割辫子的榜样,起因于怕羞去丑与民族主义双重意识。割辫的胜利又激励他们更广泛地参与日益深化的社会改革运动。男人的辫子不仅是一个发型问题,它对满清统治阶级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

然而,有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中国军官自负、傲慢和过分自信,

他们对此表示关切。海外军事留学生回国后往往怀有极高的期望和改革热情,但是他们涉世不深,没有经验,在外国人眼里,他们自视甚高,“头脑发热”。有些外国专家断言,这一代新式军官过分骄傲,而且很敏感,太急于表现自己,不愿适当地学习外国人,以致拒绝外来援助和指导。“乳臭未干的婴儿突然变成了协统”,一名英国军事专家不无挖苦地评论道。^⑭

新军军官华而不实的作风使其他人也认为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是傲慢无礼的。在中国服役的美国海军少校穆劳克发表评论,对新军军官待人接物的态度表示不满。

在某些方面看来,陆军不再是受人轻视的职业。但是,日本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职业性骄傲”的合理性,而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人却滋长起了“狂妄自负”,还自以为这就是军人“职业性骄傲”……新军对待外国人有失礼之处,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⑮

德国驻成都领事韦斯也指责中国军官“态度粗暴”。这里再次摘引海军少校穆劳克的报告来说明:

韦斯在去年(1909年)有理由两次埋怨中国军官。一次,他的助手赫尔·费斯切尔在成都市区骑马,遇上一长列军用骡子。他想越过马路,就从骡子队列中间的一个空隙里穿过去。他的马缰绳被一名士兵勒住,马被牵到路边,他被迫等到这队骡子全部走完才穿过马路。另一次遭遇是,韦斯在一个街角碰上了一小队骑兵。为了安全,他下轿步行。一位军官赶上韦斯的同事,用鞭子抽打他们,而无视他们身穿领事馆的制服。^⑯

外国人普遍感受到中国军官的自负,但穆劳克和韦斯所指责的“态度粗暴”是可以质疑的。那位德国助理官员首先做出不妥当的举动,因为他理应给军用骡子让路。对一个要作出公正判断的

人来说，第二个事件显得证据不足。英国驻华陆军参赞韦乐沛中校就怀疑这则故事的可靠性。这则故事描述的情况不符合韦乐沛本人的观察，也与他前任的感受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军官对待外国人通常都是友好的。^④

埃德温·J·丁勒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1909年6月他在云南时，观看了正在进行日常操练的中国部队，将自己的遭遇写入日记：

我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观赏眼前景象时，一名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军官极不礼貌地命令我离开。他一看到我，就放开沙哑的嗓门大声吼叫，“走开，走开！”（意即滚开，通常在赶狗时才说这种话）。同时，他向空中挥舞军刀，好像在说，“再上前一步，我就砍下你的脑袋。”当然是别无选择，我只能“走开”，但用维护一个英国旅行者应有尊严的方式“走开”。

由于中国加快军备和重新整顿陆军，造成这样一种有利环境，即要求军官具备爱国主义感情，并产生出与外国人平等相处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是溢于言表的。当那位中国军官命令一个体面的外国人离开操场时，他体验到了这辈子最为骄傲的时刻。或许还应该补充道，那位军官不会再去回顾他自己觉得“矮小”或完全自惭形秽的时候。^⑤

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作出概括未免轻率。当我们说民族主义正在新军中滋长时，必须强调只有部分人接受了这样的灌输。他们是年轻、自傲、敏感并受过近代教育的军官，以及怀着爱国动机从军的士兵——他们正在懂得爱国主义和振兴武备的价值，这两者对复兴中华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侧面是，不少部队军官仍然不称职，体质单薄，沉湎于吸食鸦片，士兵则目不识丁，愚昧无知。丁勒和其他外国人描述的尚武精神存在于某些部队，但另一些部队缺乏尚武精神。毋庸置疑，爱国主义被激发起来的程度，在各支

部队之间是大不相同的。

五、中国人对外国军事监护的态度

中国陆军中的民族主义还表现在清政府对外国人指导和培训军队的态度方面。中国人摆出毅然决然的姿态，一旦他们自己的军校毕业生够用了，便要做到军事上自立自治。这意味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尽可能使用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让他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与同治朝(1862—1874年)的军事改革领袖不同^⑧，义和团运动后的10年里，军事改革家们并不聘用外国人来编练中国军队，也不授予他们军衔军职。在19世纪，华尔、戈登、德克碑、勒伯勒东、哇乐德克、卜罗德等被授予中国军衔，但这种现象此时不再重现。现在，中国人雇用外国人是私人性质的，这些外国人跟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没有正式联系，并且全部限于充任军事学堂、枪炮厂、火药厂和军械库的教习或做督察性工作。他们的合同期1—3年不等。他们一概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中国内部的行政和军事事务。

外国军事教习中日本人最多，德国人居其次。聘用日本教习花钱较少，日本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术语已被中国采用。在社交方面，日本教习比欧洲教习更容易与中国军官平易相处。何况，许多中国军官曾留学日本，对日本多少有些感情。

1903年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是仿效日本陆军方式训练新军，制造日本式的武器装备，这就需要聘用较多的日本军事专家。1904年，两江总督魏光燾准备在合约期满后，解雇在江宁(南京)武备学堂任职的德国教习，将来全部聘用日本人。^⑨他的计划后来得到部分贯彻。1907年，这所军事学堂还剩下2名德国炮兵教习，他们是

布拉斯马和勃赖霍夫。相比之下，日本教习要多得多，有坂田中尉、网野中尉和5名未入流官佐。兽医学堂也聘用日本人主管工作，还有2名日本教习指导中国人制造枪炮。^⑧

1906年广东新军中的日本教习有4名军官、1名军士长和6名军士。此外，1名日本上尉和3、4名官佐在黄埔的一所军事学堂里工作。这些日本人对驻扎在造币厂附近几标新军有某种督察权，但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教习，标里的军官全部由中国人担任。^⑨

日本人的影响在长江中游地区也占优势。生田少佐在长沙一所军事学堂里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些日本教习在湖南省其他城市里担任较次要的职务。^⑩汉阳兵工厂的发展得到日本人不少指导。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在1906年7月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发现有15个日本人受雇用，其中2人是日本陆军军官，其余是技术人员，他们接替了先前被聘用的德国人。^⑪

约翰·朱尔典爵士简明地概括了1908年的有关情况：

新军里的一切都仿效中国人并不喜欢的日本人。外国教习在新军的标或营里没有职权，只限于在军事学堂任职。现在，大约有70名日本军官和未入流的官佐受聘用。据我所知，只有5名德国人受聘，都在沿长江驻扎的第八、九镇所属军事学堂任职。此外，2名德国人在军事要塞和兵工厂事务方面是参与机要的顾问。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德国商行是向中国出售大炮、步枪和兵工厂机器设备的最大贸易伙伴。^⑫

尽管外国军官不参与中国陆军的培训，但他们有时应邀协助搞军事演习。中国陆军在1905年举行首次大会操，并很想给应邀前来观看的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次会操只有北洋军队参加，于10月份在直隶河间举行。10名日本“翻译”为这次会操的预演出过力，他们拟订了演习计划和演习顺序，尤其是承担了所有的参谋

工作,这些都是在避人耳目的情况下进行的。^④第二年再次举行军事会操,北洋军队和包括张彪统辖的第八镇在内的南方几个镇都参加了演习。中国人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日本顾问来拟订计划和指挥演习部队的调遣。日本人既充任演习军官也担当演习裁判官。这些日本军官中较著名的有,袁世凯的重要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大佐,他在北洋军队任职,此时担任首席演习裁判;还有保定一所军事学堂的重要军事顾问寺西大佐,韩家墅军事学堂的首要人物嘉悦少佐。南方新军方面有张彪将军的首席参谋井形大佐,以及据说曾指导南方军队骑兵的小岛少佐,南方军队的炮兵指挥官似乎也是日本军官。这两次军事演习的组织和实际进行过程中,日本教习无论在演习部队还是参谋部门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确实已算不上什么秘密了。^⑤这表明,中国的战斗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还没有发展成为高效率的军官集团。

由于资金紧缺,1907年没有举行大规模会操,部分镇举行了地区性军事演习。中国人在1908年再次准备举行军事大会操,地点选在安徽西南、临近湖北边界的太湖地区*。这次会操,南北新军中似乎都没有外国教习,或许中国人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有能力自己指挥演习,或许他们感到无论如何总得自己试一下。荫昌和两江总督端方是清政府特派大员。冯国璋将军任参谋长,哈汉章任副参谋长,他俩担任军事演习的指挥人员。演习裁判人员庞杂,但似乎无所事事。或许由于他们完全排除外来指导,这次演习不很成功。^⑥

1908年的军事大会操不聘用日本顾问,反映出中国方面摆脱外国军事专家控制的强烈愿望。无论这样做是对是错,中国人现在感到在建造自己的兵工厂和训练自己的军官方面已经获取足够

* 太湖在安徽之东,此处疑为鄱阳湖地区。

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情况确实如此。中国政府对外国军事援助和军事指导等问题是敏感的，总是迅即驳回那些主张突出日本势力的奏议。它的政策是先利用日本人，然后请他们走开，就象日本人自己过去对待欧洲教习那样。日本人渴望尽可能广泛地扩展影响，据说还对北京施加了外交压力。无论如何，中国没有理由让自己处在日本势力独家控制之下。它对日本军队没有特殊的好感。相反，它倾向于把日本看作潜在的敌人，而且还意识到西方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国陆军受日本人的支配。^④

取代外国专家的政策实行得温和适度，通常允许合同维持到期满。一旦合约期届，有些外国雇员马上就离去，这往往出于个人原因，或工作条件不令人满意，以及中国官员的“不合作态度”。另一些人工作认真勤勉，就续订一个或几个合同期，继续呆下去。在工作中因无视中方意见、自行其事而被解雇者，属个别的罕见事例。^⑤

中国力图摆脱外国监护的意向已明显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即使荫昌倾其全部亲德感情，也无法扭转整个趋势。据报道，荫昌在1910年9月离开柏林返回中国之前，曾与德国政府商定派遣一支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指导中国陆军。荫昌的奏议未被清廷批准，德国军事顾问团也一直没有派出。显然，荫昌没有多大力量阻遏流行于中国的排外情绪。那一年，华北各军事学堂几乎全由中国教习任教，即使教授外语也不例外。长江流域各省，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在武昌、南昌和南京。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受聘讲解地形测绘，一些德国陆军军官则教授军事科学。^⑥

与此同时，新式军事学堂毕业生的出路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中国陆军提供的正式军官职位容纳不下这么多军校毕业生，这种状况隐伏着威胁清政府的严重危机。去除外国教习有助于减缓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雇用外国人总得花较多的钱，容易引起中国军官

的妒忌。使用急于获取军职的中国军事学堂毕业生的另一个充分理由是财政困难。最后一点，北京担心使用外国人可能会导致泄密。^④

然而，中国政府没有盲目顽固地实行排外政策，因为它认识到还是有必要在某些重要领域里聘用外国专家。1911年7月聘用3名德国军官到北京陆军兵官学堂担任教务人员，便是有力的证据，这所高级的军事学堂预计在几个月内开学。受聘者是刚离任的前德国驻华公使馆警卫队长冯·丁克曼步兵少校，一所中国军事学堂前任教习勃赖霍夫炮兵上尉，以及另一名德国选派的轻工兵上尉。他们3人的合约期都是2年。他们将不直接给军校生讲课，只是对中国教习的教育质量负责，起顾问和督教的作用。北京政府原来打算陆军兵官学堂和其他军事学堂一样，只使用中国教习，但后来认识到对这所培养最高级军事人材的学堂来说，中国教习的知识和经验都不足以担当起重任。^⑤

据《泰晤士报》报道，辛亥革命前夕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只剩下7人，1人在广州，1人在武昌，5人在保定。其中2人在1911年底之前返回日本。此外，还有3—4名德国教习，但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军事学堂和陆军的教育培训工作几乎全由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国毕业生包了下来。^⑥

综上所述，清皇朝垮台以前，新的军事教育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并正在做出成绩。各省办的军事学堂很受民众欢迎，入学竞争颇为激烈。到1911年，军校提供了充足的毕业生，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颇有军人气质，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⑦。由于缺乏经验以及训练不足，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实际能力无疑还远远及不上欧美国家的军校毕业生。但是，他们在中国代表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并迅速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他们的总人数不算很多。

民族主义在某些新军部队中抬头是值得注意的，这是对外国侵略威胁的一种反应，也是近代军事训练产生的结果。尽管没有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或中国工农红军那样灌输政治思想的教育计划，清政府还是扶持民族主义成长的。那些批评青年军官盛气凌人或清政府去除外国教习政策的在华外国人，忽略了中国人要振兴武备的迫切感。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一支中国人自己控制的陆军，以及素质良好的军官，使军队自治自立并强大到足以保卫国家主权，那么它就无法指望真正的独立。

注释

- ① 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160—161页，案卷号2106/2—5。
- ② 《东方杂志》第1卷第12号(1904年)，教育，第275—279页。
- ③ 《东方杂志》第2卷第4号(1905年)，教育，第60页；第2卷第6号(1905年)，教育，第109—116页。
- ④ 田中义一：《新军》，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373页。
- ⑤ 《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1905年)，教育，第122—126页；同①，第255—256页。
- ⑥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公牍》第15卷，第27—23页；第17卷，第23—24页；第19卷，第21—22页。
- ⑦ 关于这些学堂的名称和分布，参阅《东方杂志》第4卷第9号(1907年)，教育，第204—207页。
- ⑧ FO 228/1748，《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1页。
- ⑨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70卷，第2页；同①，第267页。
- ⑩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110—111页。
- ⑪ FO 371/435，帕来乐撰写的《关于中国军事学堂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1月8日致格雷的第506号文件中。
- ⑫ 同①，第269页。
- ⑬ FO 371/435，帕来乐撰写的《关于驻东三省中国军队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21日致格雷的第424号文件中。
- ⑭ 《东方杂志》第1卷第12号(1904年)，教育，第276—277页。
- ⑮ 同⑭。
- ⑯ 《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1905年)，教育，第332—333页；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6页；WDG 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6—17页。
- ⑰ 同⑭，第277页。

- ⑮ 同⑪；H·S·布鲁尼特和V·V·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第315页；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英译件见《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4页；WDGS 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7页。
- ⑯ FO405/171，《1903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5页。
- ⑰ 同⑪；并参阅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驻保定新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10月27日致格雷的第504号文件中。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在《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一文中认为，1909年初那里只有120名学生，参阅《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4页。
- ⑱ 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7页。
- ⑳ 同⑪，第261—262页。按规定，讲武堂由各省督抚或驻防将军督理。讲武堂内部设有两种班级，军官按不同级别分批轮流受训。
- ㉑ 同⑪；同⑪，第261—262页。
- ㉒ 同⑫；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2年中国年鉴》，第247页；FO371/1092，韦乐沛撰写的《北京陆军兵官学堂雇用德国军事教习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7月20日致格雷的第294号文件中；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7页。
- ㉓ 同⑬，第13、20—21页。
- ㉔ 埃比·斯威夫特少校：《中国陆军的发展与目前兵力》，见乔治·H·B·布拉克斯利编：《中国与远东》，第182页。
- ㉕ 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6页。美国驻华陆军参赞纠正了法国陆军参赞的说法（参阅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的文章，见《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4页），认为有29所陆军小学堂。
- ㉖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99页；《1912年中国年鉴》，第247页。
- ㉗ 《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1905年），教育，第321—322页；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贵胄学堂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8月20日致格雷的第395号文件中。
- ㉘ 同⑪；WO33/454，《中国军事力量手册》，第90页。由于贵胄学堂教育质量低劣，北京政府急于派送一些优秀学生留学美国、德国和日本。参阅《东方杂志》第5卷第1号（1908年），教育，第12—13页。
- ㉙ 罗杰·F·哈可特：《旅日中国学生（1900—1910）》，见《中国论丛》，第3期（1949年5月），第139页。
- ㉚ 龔立鹤：《清末留学教育》，第39—40页；永井道雄、原芳男、田中宏合著：《亚洲留学生和日本》，第77页。
- ㉛ 房兆楹在《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目录初辑》第1—45页，提供了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名单。
- ㉜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8册，《列强侵略》第1部分，第284页。
- ㉝ 同⑭，第267—271、284—285页。
- ㉞ 方东瀛：《留日士官系与民初政坛》，见《艺文志》第54期（1959年），第15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2—23页。

- ⑳ 方东瀛:《留日士官系与民初政坛》,见《艺文志》第54期(1959年),第14页。
- ㉑ 石锦:《中国现代化运动与清末留日学生》,第164页。
- ㉒ FO371/415,《1907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附件4。
- ㉓ 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英译件见《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5页。
- ㉔ 同㉓。
- ㉕ WDGS6790-42,《1911—1912年中国革命札记》,第9页;北京支那研究会编:《最近支那官绅录》第2卷,第392—395页;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总统——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与专制统治》,第60页。
- ㉖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37卷,第29页;雷立鹤:《清末留学教育》,第401页。
- ㉗ FO17/1654,《1904年2月2日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3月28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FO17/1655,《1904年2月16日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1904年4月7日上述文件中。
- ㉘ 《东方杂志》第2卷第9号(1905年),教育,第209—210、223页。
- ㉙ 《东方杂志》第3卷第2号(1906年),教育,第296—298页。
- ㉚ 《东方杂志》第5卷第6号(1908年),教育,第106—107页。
- ㉛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第7页。荫昌出任陆军大臣之前的两年中,陆军处于松散状态,因此他急于提高部队素质。1910年10月对100名归国军事留学生进行5天考查,其中大多是日本军校的毕业生,考查委员会由贝勒载涛、段祺瑞将军和荫昌本人组成。同时,军事当局准备下个月对第八镇全体军官举行一次类似的考查。参阅WDGS6283-2,《1910年9月军事事件概况》,第2—3页;6283-3,《1910年10月军事事件概况》,第4—5页。
- ㉜ WDGS6283-2,《1910年9月军事事件概况》,第5页;6283-3,《1910年10月军事事件概况》,第5页。纽约西点军校的中国毕业生起初拒绝接受这样的考查,后来听从美国驻华陆军参赞的劝告,接受了考查。
- ㉝ FO405/171,《1908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5页。
- ㉞ 同㉝,第152—163页。
- ㉟ FO405/195,《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6页。
- ㊱ 同㉞,第1184页。
- ㊲ WDGS62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6页。
- ㊳ 同㊲。
- ㊴ WDGS6790-42,《1911—1912年中国革命札记》,第9页。在北京的一名英国外交官也写道:“军事教育在继续发展。但缺乏合格的教员,而且他们普遍希望摆脱外国人的监护,因此影响了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参阅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2页。
- ㊵ 《1912年中国年鉴》,第247页;同㉝,第263页。
- ㊶ F·A·麦金尼:《揭去面纱的东方》,第222页。
- ㊷ 同㊶。
- ㊸ 例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76、204页及以下各页。学兵营实际上是按北京命令设立的,成为普通士兵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 ㊹ 田中义一曾争辩道,这些部队“欣然响应革命宣传,对开明的文人学士、富裕商人和

新进知识分子中正在发展的爱国主义表示同情。”参阅他写的‘新军’，见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382页。

- ⑫ 欧内斯特·P·扬把这些新军官比作“士绅阶级的附庸”，参阅他写的《袁世凯总统——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与专制统治》，第2页。我用不同的措辞表述新军，以避免流露出贬低新军的倾向。
- ⑬ 例如，参阅卢西恩·W·派伊：《政治近代化进程中的陆军》，见约翰·J·约翰逊编：《军方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第77—79、82—83页；莫里斯·佳维茨：《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军事因素》，第80—81页。
- ⑭ 埃德温·J·丁勒：《步行穿越中国》，第417页。
- ⑮ 亨利·B·格雷比尔：《中国的教育改革》，第63—64页，见西鲁斯·皮克：《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民族主义》第68页引文。
- ⑯ FO371/863，韦乐沛撰写的《关于中国陆军军纪涣散的备忘录》，附在麻木勒1910年4月30日致格雷的第134号文件中。
- ⑰ 同⑮。
- ⑱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八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5月13日致格雷的第221号文件中；同⑮，第211页。
- ⑲ FO223/1082，中文报纸摘要，附在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1911年5月31日致朱尔典的第53号文件中。
- ⑳ WDCS6283—3，《1910年10月军事事件概况》，第5页。
- ㉑ FO471/863，李德立撰写的《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备忘录》，附在上海卜内门公司1910年3月2日致外交部文件中；总领事法磊斯致麻木勒第38号文件，附在麻木勒1910年6月17日致格雷的第200号文件中。
- ㉒ 《民立报》(上海)，1911年3月31日，第4版。
- ㉓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80—81页。由于黎元洪是第21混成协协统，后来被认为不宜充当请愿代表。
- ㉔ FO371/864，法磊斯致麻木勒第38号文件，附在麻木勒1910年6月17日致格雷的第200号文件中。
- ㉕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杭州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5日致格雷的第319号文件中；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安庆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同⑮，第277页。
- ㉖ 实际上，有些高级军官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鼓励除去辫子。例如，黎元洪非但宽恕剪辫行为，而且还为某些士兵断然剪去辫子感到高兴。他至少曾在一个场合对士兵说过，他支持他们的行动，如果政府有关政策不那么含糊不清，他原本会做第一个剪辫人的。参阅《民立报》，1911年1月3日，第2版。
- ㉗ WDC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1页。
- ㉘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九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㉙ FO371/875，韦乐沛致麻木勒的文件，附在麻木勒1910年11月23日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㉚ 同⑳。
- ㉛ 同⑳。
- ㉜ 同㉛，第213—214页。

- ② 同治皇帝统治时期,外国军官在中国陆军里的作用,参阅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足点——同治中兴(1862—1874)》,第214—217页。
- ③ FO17/1655,《1904年5月10日以前的情报日记》,附在作战局长1904年6月21日致副外交大臣的文件中。
- ④ 同③。
- ⑤ FO228/1624,《关于广州驻军的报告》,附在柏来乐1906年2月7日致萨道义的文件中;FO 228/1653,《关于广州驻军的报告》,附在布罗特伍德1907年1月25日致朱尔典的文件中。
- ⑥ FO371/34,柏来乐撰写的几则湖南情况札记,附在康乃吉1906年7月9日致格雷的第296号文件中。
- ⑦ FO371/39,《A·G·少校访问汉阳兵工厂回忆录》,附在康乃吉1906年8月4日致格雷的第326号文件中。
- ⑧ FO405/171,《1908年中国年度报告》,第35页。
- ⑨ FO371/26,柏来乐撰写的《中国军事演习报告》,附在萨道义1905年11月27日致兰斯顿侯爵的第408号文件中;MP 312/119,陆军类。
- ⑩ FO371/41,W·H·H·沃尔特斯准将致陆军大臣文件,附在朱尔典1906年11月8日致格雷的第462号文件中。
- ⑪ 观察过1908年军事演习的3名英国军官对此评价极低:“如以往那样,军事演习还是老套头……因而指挥官的首创精神无从发挥,正面的直接进攻受到牵制,他们未能抓住时机作侧翼运动,即使他们有能力做到时也坐失良机。发动进攻时几乎不动脑筋,部队往往轻率地冲过空旷的谷地,不作任何掩护,也不为夺取目标挖战壕。每天,部队推进到近距离进行交战。没有演习裁判,因此部队旁若无人地越过战线……对侦察敌情和先头部队的作用不当一回事,只是装模作样应付一下。几乎从不搜索战场。有利的作战地形往往被忽略,并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参阅FO371/629,《军事演习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2月10日致格雷的文件中。
- ⑫ 同⑩,第229页;同①,第160页。
- ⑬ FO371/875,韦乐沛致麻木勒文件,附在麻木勒1910年11月23日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⑭ FO371/871,韦乐沛撰写的备忘录,附在麻木勒1910年8月25日致格雷的第290号文件中。
- ⑮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17页;WDGS6283—4,《1910年11月军事事件概况》,第3页。
- ⑯ 英国外交部作了下述评论:“或许,中国人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德国。首先一点理由是,德国军事教学法的卓越是得到公认的。其次,北京现任陆军大臣是前任出使德国大臣。同样自然的是,日本不愿眼看日本教习被德国人取代。”FO371/1092,韦乐沛撰写的《关于北京兵官学堂雇用德国军事教习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7月20日致格雷的第294号文件中。
- ⑰ 《泰晤士报》,1911年10月21日,第5版。
- ⑱ 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2页。

第四章

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

据前几章论述，军事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助于社会对军人和军事职业形成新的态度。每个信息灵通的在华外国人都证实军队的地位正在显著地提高。1908年柏来乐中校谈到第三镇时说：“军人待遇不错，定期领取俸饷。毫无疑问，这里的陆军与别处的军队一样，正变得更加受人欢迎。^①”新军不再是懒汉寄生之地。健康、年轻而且喜欢自己工作的优秀军人阶层正在形成。“官兵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黎富思上尉断言，“会使军队变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从而吸引良家子弟投身军界”。^②老是批评断军举止行为的海军少校穆劳克也不得不承认，“新军不再是受人蔑视的职业……培植尚武精神已经取得巨大成功。而且这支武装力量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国民熟悉了军事知识，这已经得到充分的好评”。^③

1910年初，《泰晤士报》记者乔治·E·莫里循发自北京的报道称：

在近代中国可以觉察到的最大变化，或许是以往受轻视的军事职业现在得到了尊敬……对富有进取心的人来说，武职官衔的吸引力有取代文职官衔之势。士兵现在为他们的军服感到自豪，把来福枪擦得干干净净，他们机敏而又尊重他人——当然，我们总是把他们和我们在几年前了解的军人进行

比较的。军人现在要求得到跟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待遇。军官乘火车坐头等铺位，士兵不再愿意象牲口般地挤在无盖的货车里，他们现在要求舒舒服服地坐进客车车厢。这是令人注目的变化。^④

莫里循的报道不免言过其实。他在另一场合的议论或许是故意夸大其辞，“文官与武官的相对官秩已经颠倒过来，现在武官的地位已经优于文官”。^⑤ 他的评论不无道理，1909年11月采用的文武官员职秩对照表，无疑证实了武官的相对级别出奇的高（参见表四），从中可以看出提高武职地位的结果。这至少正式终止了九品官秩中重文轻武的传统，而把武官放到享有同等特权的地位。

表四 1909年11月实施的文武官职对照表

武 职	文 职
大将军(陆军元帅)	军机大臣
正都统(上将)	总督兼右都御史衔
副都统(中将)	总督或巡抚兼兵部侍郎衔
协都统(准将)	巡抚或省承宣布政使司
正参领(上校)	省提刑按察使司
副参领(中校)	省都转监运使司
协参领(少校)	巡道
正军校(上尉)	知县
副军校(中尉)	县丞
协军校(少尉)	主簿
正目(军事长)	典史
副目(军士)	巡检

资料来源：《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22卷，第20—24页；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英译件见《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3页；FO371/845，索尔典 1909年12月13日致格雷的第463号文件；布鲁尼特和哈格尔：《中国当代政治机制》，第290—292页。

1911年4月3日的上谕，是对那些仍然怀疑清廷军事改革决心的中国官员的一种提醒：

朕维建国保邦，莫先兵力，安危定乱，实在人心……太祖之初，众无一旅，龙兴辽海，建都沈阳。我太宗嗣统，寅绍丕基，威加海内。仰维圣神谟烈，靡不躬擐甲冑，跋履山川，用集景命于我。世祖遂成帝业。逮我圣祖，冲年继绪……声灵震叠，万国咸钦。是则先圣临戎，上下一体之明效也。嗣是以来，列圣代作……尚武之风，于今为烈，乾嘉而后，内患叠兴……抑亦我军人之祖若父，同心翼戴，乃克定三百年之盛轨……深恐上负我列圣艰难缔造之勤，下负我军人祖若父尽瘁驰驱之烈。我军人……无不深明大义，何待谆谆。惟朕不敢自耽暇逸以负列圣，以负我军人祖若父效命之诚。固知我军人亦不忍自负其祖若父，以负我列圣安危与共之隐。自应交相策励，巩固皇图，异时军国治安，宪章明备，君臣上下同履太平，斯则我列圣灵爽式凭，亦我军人祖若父默启后人之意也。⑥

民众对清政府振兴武备政策的反响如何呢？受过新式教育的学人士子对尚武主义有什么想法？士绅阶级对新军反应良好吗？市民又抱什么态度呢？社会不同阶层对军事改革给予什么方式的支持？他们从各项军事改革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本章试图解答这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以便阐明新军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并由此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理解各项军事改革的深层社会意义。

一、近代中国人对尚武主义的看法

中国传统社会鄙视军人有两个根源：中华帝国文明中的和平主义态度以及兵源来自无地劳动者和其他无业游民。他们一贫如洗，目不识丁，以至不被任何层面的社会层次接纳。本节对探讨第

一个根源特别感兴趣。军事统治和依仗武力开拓疆域并不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和平主义效果。儒家学说强调的正义、仁慈、社会和睦、道德修养及中庸之道，无不使民众厌恶战争。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和谈与妥协得到解决，战争只作为最后手段。一旦发生战争，诱降媾和比彻底摧毁敌人更可取。不纵兵劫掠被占城市的将军受到尊敬，进行屠城血洗的将军为人所不齿。战争的终极目的是迫使敌人服从皇权。一旦皇权得到承认，被某种“有条件投降”彻底打败的敌人便获准撤退。中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是不使用“全面战争”，而只进行“有限战争”。⑦

然而，和平主义理论决不意味着晚清军事地位的上升是与儒家学说和传统制度格格不入的。皇帝有时热衷于颂扬武功，奖励征战，这类证据是很充分的。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中，当帝国大片土地被军事首领武装割据时，有过不少政治分裂时期。开国皇帝也时常凭藉武力镇服来加强其政权的权威。唐太宗的武功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前文提及的谕旨可知，清初几代皇帝也是遍过驰骋疆场建立起“业绩”的。中国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无例外地详细描述了战争、战役及军事谋略。

中国有些成语强调武功与文治同样重要。“文武全才”，指的是文武素质结合方能造就完整意义上的才能。“文经武纬”，意思是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具备文武两方面的才干。第三个成语“文治武功”，也把统治才能与军事业绩相提并论。另一些成语则渲染军事威望。如“将士万骑”，描绘一个将军率领1万名骑兵。“大将声威”，指一个大将具有令人震惊的名声。一个家族内武功代代相传，用“将门有将”来刻划*。

* 从严格意义上讲，“将士万骑”、“大将声威”等不是“成语”。而且，作者对“文经武纬”等解释不尽正确。译文尊重原著，不一一纠正。

中国文学作品并不缺乏鼓动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描写战士为国家作出牺牲或刻划家乡亲人的苦难。下面是一首译自《诗经》的诗*。

登上青山岗，
远远把爹望。
好像听见爹嘱咐：
“孩子啊，
早晚不停你真忙！
可要小心保安康，
回来吧，不要滞留在他方！”

登上秃山顶，
遥望我母亲。
好像听见娘叮咛：
“孩子啊，
早晚不睡真苦辛！
身体千万要当心，
回来吧，不要忘记你娘亲！”

登上高山岗，
遥望我兄长。

* 这篇《诗经》译文，参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的《诗经译注》第189—190页。原文即《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好像听见我哥讲：
“兄弟啊，
早晚服役神太伤！
当心身体保安康，
回来吧，不要尸骨埋他乡！”^⑧

另一首古诗描写中国古代魏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场战斗。*

众人意志成一心，
慷慨捐躯无怯情。
盖地铺天敌军来，
尘沙飞扬山动摇。
江水流红浮尸漂，
魏国城墙血淋淋。
誓不降敌为奴隶，
宁死疆场变鬼雄。
临阵逃跑臭万年，
笑迎阎王美名留。^⑨

在著名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对军事形势和英雄人物的刻划，必须提到的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论著《孙子兵法》。

中国传统含有和平主义与好战尚武两重因素，尽管前者时常占优势。18—19世纪时，中国的和平主义显然处在支配地位，并产生极其不利的影晌。但这种状况并非无法改变的。20世纪初，新式学人士子竭力鼓吹迅速发展中国军事力量，他们倾向于，或许故意地无视中国历史文化中尚武的一面。不唯如此，他们还强

* 这首古诗出处不详，据英文意译。

调,甚至夸大中国历史文化中和平主义的特征,企图说明崇文抑武是如何阻碍中国成为强国的。他们觉得,非但有必要促进国防体系近代化,而且有必要扭转中国民众的心理定势,使他们崇尚武力。

在编练新军蔚然成风之前,新式学人士子就已经竭力敦促中国政府建设自己的国防力量,号召中国民众为此作出贡献。他们的有关论著是严肃认真的,反映出他们关注军队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下面提到的观点主要是1903—1905年期间留日学生的议论,其中有些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军队。梁启超虽然不属于青年学生,但他也论述中国的军事,所以他的有关议论也一并提及。

看来,这些学人士子大多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影响,而社会达尔文学说流行日本是加藤弘之努力的结果。加藤曾将一些重要的达尔文主义著作译成日文,并加进他自己的解释。他十分重视“生存斗争”和“物竞天择”的原则,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些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强权概念被大大强调了,并运用到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世界里,取代了天赋人权的教条。评价日本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时,加藤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中发现,日本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是理所当然的。^⑩这种推理对中国的学人士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觉得不妨借用同一原理来论证,缔造一个崇尚武力的新中国是合理的。他们还用这个原理来解释,在外国帝国主义猛烈侵袭下中国面临的面境,企图从中国内在的弱点寻求答案,表现出了独特的反省态度。^⑪

中国人传统上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很缺乏对军人作用的社会理解。这些学人士子普遍认为,只有充分承认并正确评价军人的作用,中国军队才能得到真正的改进。后来成为驻东三省第二混成协协统的湖北籍军事留学生蓝天蔚在《军解》一文中给军人下了定义:军人是世界上最具有正义感最文明的人,同时又是最野蛮最

不文明的人。军人无情地打击敌人，夺取别国领土，企图统治以至奴役其他民族，因此他们是最野蛮最不文明的人。他们属于依仗暴力来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非正义世界。但是，他们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促进国家繁荣昌盛，他们又是最富有正义感最文明的人。^⑧

蓝天蔚从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观看世界。他认为，军事力量是“围护国家之城墙，民族骄傲之姿态，养育文明之母亲”，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文明程度同它的军事威力成正比。欧洲列强取得高于中国的文明程度，正是因为它们军事实力使它们能够向海外扩张，传教布道，操纵国际外交，以至建立殖民帝国。

合理解释野蛮和文明，就能用新的观点评析军人的作用与行为。由于和平主义不再符合中国的利益，影响中国人军事行动的传统道德观已经废弃过时。新军人应该有文明的头脑，野兽般的躯体，残酷无情地打击外来敌人，对待本国同胞则举止文明、行为正派。

人们一致认为，军队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对外，而不是对内。供养军队不仅仅为了应付来自国内的挑战，以维护某一个政权；更重要的是抵御外来侵略，以保卫国家和人民。一位浙江籍学生评论道，旧式军队不是私人武装，就是统治阶级的军队，它们起警察武装力量的作用。中国所需要的是一支国家军队，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的职责。这支军队跟警察性质的武装力量截然不同。军人要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并为此作出牺牲。他们将是富有战斗精神和进取性的，把国家作为效忠的唯一目标，他们个人的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⑨

军队承担起国防的职责，而国家利益又在发展，这很可能使中国卷入战争。但是，战争并不可怕。相反，战争应该被看成兴建国家的一种手段。蓝天蔚就是这样认为的：

好战之国，其国必食战福；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喜杀人者，人崇拜其国；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军国民者，制造一种喜战好杀之性质之国民，以安宁范围其国家者也。贱武右文之国，其国永不得受威，令国家行保护国民之权利。^⑭

蓝天蔚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中国民众有必要作好军事和心理方面的准备。他用俾斯麦式思想方法争辩道：

天下可恃，惟铁与血。凡国家所有之特权，皆军事补助支配而行之。^⑮

蓝天蔚不是歌颂战争的唯一人物，另一位隐姓埋名的学者视战争为普遍真理，“世上有战争，而后有幸福”。他引证加藤弘之的话写道，“战争者，文明之先驱也……夫文明之物，一任人人求之，然不得不偿其价值。价值谓何？战争是已。”^⑯付出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没有战争，世界文明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蓝天蔚认为，军事与国家的关系具有两重性。首先，两者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这在国民性和尚武精神形成过程中得到证实。它产生出种族主义观念和英雄偶像。德国人和日本人是爱国的，因为他们为各自的种族感到骄傲。中国人则相反，不相信种族主义，听任他们自己遭受外来种族的统治与屠杀，甚至还自相残杀。美国人歌颂乔治·华盛顿，俄国人崇拜彼得大帝，但中国人同他们不一样，没有自己的英雄偶像。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为保卫中华民族而英勇战斗的杰出人物。蓝天蔚竭力主张，赋予某些杰出人物以民族英雄的荣誉，为中国军人树立起榜样。^⑰

其次，军人与国家的关系是由军人的“地位”决定的，这意味着军人应该有权利参与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活动。这不仅促使他们接近民众，而且能使他们在各项活动中促进国家利益。蓝天蔚相信，美国实行了普遍征兵制，学校开设军训课。德国则全民皆兵。

大至全国范围，德国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校，而社会成了宏大的军事教育组织。蓝天蔚认为，这种“地位决定之关系”有助于国家的扩张和帝国的建立，由此增强了国家的威望，使人民感到更加自傲。

蓝天蔚指出，国家、军队和人民是相互依存的。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其武装力量，以及人民承担起组织武装力量的义务。因此，国家扩展其势力的愿望，不能过分指望政府，而应该多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他们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军事强国。国家进入战争状态，要进行全民战争动员，而正是人民提供了人力、资金和构成军事实力的一切要素。人民受国家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存在靠组成武装力量的人民。为皇朝而战的军队私有观念，在近代世界已经不合时宜了。^⑧

蓝天蔚强调战争不可避免和军事扩张的必要性，反映出他为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外来侵略的挑战感到焦虑，努力寻求对策，并渴望仿效帝国主义国家，从而使中国与列强平等相处。最好的防御战略是随时准备发动进攻。中国要充分武装起来，为战争做好准备。只有到了那时候，才能遏止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军人的作用才能得到真正好评。

另一些学人士子把中国军事积弱归因于和平主义传统。梁启超悲叹道，日本诗人歌颂战争的欢乐，而中国诗人倾诉战争的苦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不崇尚武德的懦夫。^⑨湖南籍军事留学生蔡锷持同一论调，他认为中国的战争文学刻划军人的遭遇和战争的悲痛，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赞颂战争和军旅生活的愉悦。蔡锷还批评传统教育体制缺乏民族主义的内容。旧式书生缺乏青春活力。即使正值青春年华，他们看上去还是像80岁老翁那样“骨瘦如柴，心如死灰”。中国没有激励主观能动性和积极进取性的宗教。儒家学说原先是进步的哲理，鼓励人们积极行动、努力进取、忍耐尽责和奋发向上。但蔡锷断然宣称，真正的儒家学说早已被歪曲成保

守的正统说教。^②

梁启超和蔡锷都为中国人忽视身体素质训练而感到痛惜。中国虽然有4亿人口,但健康强壮的人却很少。文人学士看不起五大三粗的体魄。鸦片鬼和残疾病弱者为数众多。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体能正常,但他们中也很少有人像外国武士那样强健有力。^③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亟待提高。中国要存在下去,单靠训练军队、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用近代军事科学知识教育军队还是不够的。众所周知,每个军事强国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在日本是大和魂,在德国是“铁和血”,在美国是门罗主义*,俄国则有泛斯拉夫主义,中国却一无所有。中国历代皇朝兴衰,通常是一个统治集团与另一个统治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中国人不能自诩具有革命精神,也无法夸耀在抵抗外来侵略中团结一致。相反,近千年来,汉人屈从于外族统治的时间达一半以上。^④ **

中国需要大力振兴武备的国民精神,这就是近代中国学者所称的“尚武主义”。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给尚武主义下的定义是:“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持以成立,而文明赖以维持者也。”他引证俾斯麦的话说,国家的生存不依赖国际法律,靠的是铁和血。一个民族倘若缺乏尚武的国民与铁血精神,便无以自立。古代尚武国的典范是古希腊城邦斯巴达。近代尚武国的典型是俾斯麦铁血政策下的德意志,德国上升为军事强国只花了短短几十年时间。日本依靠武士道成为又一个军事强国。要在中国促进武力崇拜,中国人必须增强他们的毅力和胆识,并提高身体素质。唯其

*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实质是要确保美国在美洲的独家利益,史称门罗主义。

** 元、清两代总共300余年。因此,“近千年来,汉人屈从于外族统治的时间达一半以上”的估计是不确的。而况,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的关系,跟近代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具有本质区别。作者对此未细加考辨。

如此,中国人才能克服他们的怯懦。梁启超批评道,尽管19世纪中叶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在进行军事体制的改革,但偏重于形式上的改革而忽略尚武精神的培植。^⑳

另一位学者认为,“尚武”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物质方面的,表现为军事技术的改进。第二是精神方面的,由大胆无畏、敢冒风险、独立自主、镇静沉着以及坚韧不拔等素质组成,这些素质在军人身处逆境时最能体现出来。两者都很重要,而且互为补充。尚武精神的培植,可以通过提高军人地位、灌输军国民教育、扶持中国式武士道精神等方式来实现。中国人民将由此体会到对祖国的责任感,把效力于国家看作他们的“天职”。这种精神一旦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部分,便会形成保家卫国的重要力量。^㉑

全民军事教育是面向全体民众的,目的在于训练新式的尚武国民,即军国民。爱国主义、独立自主、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尚武美德同样适用于黎民百姓,应该由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进行教育。浙江籍军事留学生蒋方震提出,普通学校的课程要包括体操、军训和军事常识的学习。他把学校看作军队的缩影,把国家当做军队的扩大。所有学校应该与军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学校应当按不同的教学阶段,从现役军官或力能胜任的退役军官中吸收部分教员。退过这种方式,使学校成为训练平民的场所,使学生作好为国家服役的准备。蒋方震极力主张军国民教育必须从家庭开始,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要跟学校配合。在学校和家庭之外,军国民教育将在一个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得到继续贯彻。同梁启超一样,蒋方震也对斯巴达式社会感兴趣,指望行政、立法、司法等政府各部门都用尚武精神进行改组,那时将产生出新一代的国民。^㉒

缔造新军人是军事教育的终极目标。与梁启超提倡“新民”相仿,一位军事留学生强烈主张造就“真军人”,他们应该具备爱国性、奉献精神以及西方军人的所有优秀品质。要实施普遍义务兵

役制,使每一个国民感到为国家分担责任是光荣的。真军人造就成功后,中国军队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活力。^②

一支充满新生活力的军队不仅仅是国防工具,而且将作为道德的象征和民气的支撑物,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中国已衰落到老朽腐败、民心涣散,以致必须用军队来振奋民气,使国民相信他们有能力拯救自己和祖国。情况确实如此,许多学人士子希望军队成为国民仿效的楷模,即通过军队勤奋工作,显示他们的人生目标与公益精神,从而作出表率来纯化社会。一位学者指出,中国人早就丧失了关心社会公德的道义性。他强调说,“军队者,国民道德之源泉而公共心之组织体也”。^③军队产生了组织体的概念,成为介于国民与社会之间的连结物。但一旦军队这个组织体倒坍,国民与社会也将随之瓦解。

显然,有些新式学人士子渴望把军队当作新工具,用以加强国家实体的观念,增强民族团结的社会心理素质,并强化公众意识。这意味着要把军队当作改造社会的工具。他们最终希望在中国发展军国主义。然而,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军国主义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看看西方学术界对军国主义下的定义。

劳伦斯·I·雷德威认为:

军国主义是崇尚战争、使国家和社会首先服从武装力量的一种学说或体制。军国主义鼓吹一种职能——使用暴力;一种组织机制——军事体制。它具有政策方向和权力关系的两重含义……一个十足军事化的社会还赋予战士特权地位。当军国主义达到鼎盛时,武装力量随心所欲地决定基本制度的性质、政权的形式、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调拨多少国家资源供军队开销。^④

斯坦尼斯莱夫·安德雷斯克认为,军国主义是好战性(“随时准备诉诸武力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军事化(“军方对社会生活的

全面控制，以及全社会服从军队的需要”）、军事统治（“武官的权势盖过文官的现象”）和军事宣传（“普及尚武观念的思想体系”）的混合物。在四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地方（如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我们就看到了军国主义的“典型例证”。^②

安德雷斯克给军国主义下的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的尚武主义。中国学人士子赞赏尚武好战，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列强。他们渴求的军事化，是用尚武精神组建新式军队，组织近代社会，这跟安德雷斯克的观念不同。他们鼓吹尚武，具有相当多的平民化含义，并不希望建立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他们既没有实施军事统治的愿望，也不希望军事组织压倒文职统治机制。他们所要求的是文武结合的政策，军方在国防教育和纯化社会道德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从而赢得社会尊重。实现军事化，但不必实行军事统治。中国的尚武主义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军国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

中国人还津津乐道于全民武装，这个概念跟古希腊城邦结下不解之缘。斯巴达的力量和稳定建筑在平民勇士们的基础上，因此中国的学人士子常常提到斯巴达。^③斯巴达人的行为准则，以每一项行动对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来衡量。它的全部教育体系都是实施正规训练，以此维护强有力的领导地位。斯巴达人的孩子从7岁开始到18岁一直在少年团队里学习文化，接受军训。18岁的小伙子再做2年“军校生”，接着是10年正规军旅生涯，此后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中国的学人士子相信，他们能够从这些古希腊人那里学到有用的东西。普鲁士人已经这样做了，接着日本人也仿效了。这样，德国和日本就为中国军事发展提供了模式。

这些学人士子鼓吹的尚武主义模式在中国是一种新事物。这不同于黛安娜·拉里笔下的“开国皇帝的中央集权军国主义”，或“民国初期那样的地方武装割据”。^④这是一种积极的全民尚武主义，压倒一切的愿望是通过全体国民重新确立尚武观，改变心理定

势,并建立近代化国防体系,来强化国家机制。搞军事化就是搞近代化。它会造成一场运动,改变中国人和平主义传统的观念形态,以至他们一旦面对真正的或潜在的敌人,将变得更好战更有进攻性。^②

二、倡导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是晚清尚武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要求实施军国民教育的呼声引起统治集团的反响。事实上,把编练新军的计划与新式普通学堂的教学体系结合起来,正是北京的政策。1903年清政府规定普通学堂的学生要穿制服,包括教会学堂在内的所有学堂都要开设军训课。清政府还规定,较高等的学堂应讲授军事组织、战争史和军事艺术,大学政治学系要增设外国军事和海军科学等课程。^③1903—1906年出版的普通学堂教材,强调爱国主义和尚武好战的积极意义,中国战败受辱与领土丧失、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等国耻,以及种族冲突和国家奋斗的重要性。《新国民读本》中有一课写道,“军人乃强国之根本”,并告诉学生弓箭已被淘汰,有用的是枪炮。有的课文则论及国家地理、城市防务、拳乱灾难,以及反对外国在中国筑路开矿的民族主义行动。^④

1906年一通上谕所说的教育目的是:谆谆教导学生效忠皇上,尊崇孔子,促进公益精神,尚武精神及务实精神。^⑤培养尚武精神显然出于爱国主义目的,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新兴的军国民教育。

普通学校笼罩着浓烈的军事气氛。1911年在广州一所学校担任代理校长的亨利·B·格雷比尔描写道: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他们身穿制服,佩剑扛枪,手拿军用横笛,肩背军鼓,在街道上行进。甚至小学也有军事训练和体操。体育突然变得十分流行。去年(1910年),广州某地把运动会、操练和竞赛放在一起举行……经常

能听到齐声合唱的爱国歌曲。^⑤*

广州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是这样唱的：

黄龙飞舞，中华旗帜多鲜艳；
 万剑闪光，刺杀该死的禽兽。
 新战歌伴随我们部队向前进；
 看，他们的军队在战云中颤抖！
 侵略者给神州大地留下硝烟和悲哀，
 今天，我们高唱战歌迎击敌人。
 将士天天流血，慷慨捐躯；
 因为不能抛弃往昔热爱的自由。
 右肩扛枪，腰佩利剑；
 我们离别忠诚的民众，奉命开赴远方。
 父母妻儿送行祝愿，
 笑语激励跃马上前的战士。^⑥**

荫昌出任陆军部大臣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全国各地推行全民军事教育。1911年3月，荫昌奏请在所有中等学堂实施初级军事教育，清帝准奏，于是制定出有关计划，开办更多陆军小学堂，并在普通学堂讲授军事科学。京师大学堂总办奉命增设军事课。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批准了学部、军谘府和陆军部的联名会奏。这份奏议支持东三省总督锡良关于在该地区中等学堂里开设军事教育、战术学、体操和步枪射击训练课程的建议。锡良强调指出，这项建议的目的是促进尚武精神。^⑦

这就明确了普通学堂应开设更多的军事课程。1911年4月28日，中华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海举行成立大会，代表来自12个省。大会作出5项决议，其中之一是请求学部制定军国民教育方案。同

* 原文Cheefoo指何地无法考实，这里译为“广州某地”。

** 这首歌词据英文意译。

时,各省将研究这项决议的可行性,以及贯彻下去的方法。而后,7月15日至8月11日又在北京举行全国教育会议,各地代表138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之一是,敦请学部向资政院提交军国民教育议案。^⑧与此同时,各省提学使司联名起草一份奏折,内容包括以下几点:首先,请求颁发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的原则。其次,应强调在高等小学及高小以上各类学堂实施军事训练。其三,高等小学及高小以上各类学堂要开展步枪实弹射击训练,进行军事常识教学。其四,这些改革新措施适用于所有注册登记过的私立学堂。最后,体操应列为各类学堂的主课。^⑨

不很明白,清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份联名奏折的。但估计正式反应还是不错的。无论情况究竟如何,反正在军国民教育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清皇朝已被推翻了。但是,尚武主义的潮流业已形成,并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不幸的是,原先那种积极的、全民振兴武备的设想,在以后几十年里很快演化为地方割据的军阀主义。

三、士绅商贾与新军的关系

要研究士绅对新军的态度,有必要探讨一下20世纪初士绅阶层的变化。士绅历来是社会精英,官僚集团从中吸收行政官员。据张仲礼的说法,士绅由各类拥有功名的士子组成,上层士绅是进士、举人和贡生,下层士绅则是生员和捐买功名头衔的人。拥有高等功名的士子被任命为京官或地方官员。下层士绅没有官职,生活在家乡村社里,利用他们功名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优势,操纵地方事务。^⑩由于生员不享有举人和进士的权势和地位,何炳棣据此提出,生员不应列为士绅阶层。^⑪孔斐力根据权力与威望的不同范围,把中国的精英区划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为“国

家精英”，他们具有“超越本地区的权势，关系网达到国家政治生活的顶峰”。第二层次由“省级精英”组成，他们“与最高层次精英有密切联系，但权益和势力的范围要窄小些”。第三层次是“地方精英”，他们“缺乏前两个层次的社会威望和强有力的关系网，但还可以在乡村社会和市镇上行使相当大的权力”。拥有低级功名的人属于第三层次。^③

旧式士绅凭藉他们的功名地位，享有广泛的特权，并依法享受某些豁免权。另一方面，他们为官员分担些地方行政管理责任，在官员督察下发挥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搞慈善救济活动，印发书籍，维持学堂寺庙，主持祭孔仪式，仲裁纠纷以及组织劳役等。他们还时常组织民团等地方武装，协助官府收税。他们在平民百姓和官府之间充当中间人和调解人，协助地方官员推行政府政策，一面维护法律和秩序，同时又反对腐败官吏的胡作非为，以保护地方利益。乡绅首领有时煽起骚动，反抗企图侵犯士绅权益的少数官员。^④但是，作为国家扶持起来的特权阶层，士绅向来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当局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愿望总是保持一致的。

士绅参与地方事务是经由官府邀请，而不是通过正式制度或他们所在地方村社的固有政治机制来实现的。^⑤关键在于，积极卷入的行为并不具备政治上的主动权与正式的政治权力。士绅没有结成政治组织，也没有发挥过地方政治集团的作用。他们的活动为习俗所允许，并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中央权力是以分散管理为基础的。士绅成员既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是任何地方代表机构的成员，地方代表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并不存在。正是由于缺乏正式的政治权力，他们无法发起政治行动，不论这种政治行动是否违背政府的利益。他们在地方村社里行使权力，但他们没有参与制定地方政策的法定权利，即使地方法规直接影响到他们或他们所在地区的利益，也不许他们参与地方政策的制定。士

绅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向来建筑在合作与互不侵犯的基础上。任何一方企图侵犯另一方的权益，都会打乱中国乡村事务的秩序，因为那里每个人的作用与地位都是固定不变的。

士绅抵制任何危及他们特权地位的社会变革，由此看来，旧式士绅是一个保守的阶层。士绅阶层也是稳定社会的一股势力，他颂扬儒家学说和封建帝制，以消除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而18—19世纪欧洲精英们却希望有激进的变革。士绅阶层的保守主义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如果没有某些新生力量起作用，是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西方列强和日本在19世纪带来了近代事物，引发了此类新生力量。外来冲击使中国产生出一连串新问题，与皇朝衰落阶段特有的内部挑战混合在一起。中国对外来挑战作出反应，要求重新评价它的传统价值。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运动是中国与近代事物冲突的第一阶段，为改变士绅的传统作用打下了基础。

早在19世纪末以前很久，士绅活动重心已经逐渐由乡村转向集镇和大城市。^④这还算不上新的转化过程：士绅总是被城市吸引，因为赋予他们议事特权的官员们在城市里生活、办理公务。^⑤所谓新，指的是开辟通商口岸以及对外贸易发展后，大城市越来越趋向商业化、都市化。都市新生活对拥有资本的士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投资于工商业。因此，不少士绅家庭移居到城市，那里的近代实业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他们把土地留给代理人看管，代理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向农民收租税。

商会、农会、校董会和各式各样的半官方机构纷纷成立，旨在促进工商实业。因此1900年以后，士绅移居城市和城市的都市化都在加速进行。可想而知，士绅控制着这些组织，尤其是商会。例如，广州商会“显然由富裕绅商所创”，他们“全都跟士大夫官僚阶层亲密无间”。^⑥

另一个破坏传统体系基础的因素是民主政治机制的发展，为士绅用较正式的政治方式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提供了新的机会。1905年成立的上海租界华商公议会*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它是商人和达官贵人各类组织机构的联合体。华商公议会的头面人物大多出身士绅，他们很了解外国人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而且精通商务。所有成员似乎都有官衔，但多半靠捐买所得。^④新移入的士绅与市中心商贾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不清。新兴资产阶级的确是士绅与商贾的混合物，尽管士绅和商贾作为不同的阶层各自仍然“保留着特殊的自我意识”，就象广州的情况那样。^⑤由于社会地位不断变动，而且扮演的角色相互交叉，开始普遍使用“绅商”这一词汇。^⑥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显然推进了这个演变过程。它变更了士绅地位与权力的主要来源，毁坏了中国传统社会最稳固的凝聚力之一。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取消了研究经典著作的许多奖励，使儒家学说受到沉重打击，由此改变了价值观的根本体系。士绅阶层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阿瑟·罗森鲍根据士绅阶层不同的社会政治态度，把早在1905年以前就分化的士绅阶层划分为保守派、温和派和急进派。1905年以后士绅的分化更加剧烈了。以湖南的情况为例，急进派由宪政改革者组成，他们想支配该省正在筹建中的民主机构。保守派感兴趣的是维持现状，他们反对清政府实施的行政管理与宪政方商的改革。温和派支持部分改革，但不为新设的机构效力，也不参加立宪运动。^⑦遁世隐居者或许可列为第四类士绅。他们不能接受新事物，因此不再在省里或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怀旧抱恨之余，埋头于传统学术，聊以消磨余生。^⑧

* 上海租界华商会议会于1905年12月开始筹备，1905年2月8日正式成立。

关心当时国家重大问题的是士绅急进派，他们与没有传统功名但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界新精英共享美好前景。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后，急进士绅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以往获得的权势。虽然他们可以投身工商等新兴实业，但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扩大政治参与权，在处理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拥有更积极的发言权。他们渴望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和省谘议局，在其中形成并扩展他们的政治权力。1909年这些机构刚建立起来，士绅就时来运转了。张朋园研究了5省选举结果的有关资料，证明士绅出身的省谘议局议员比例相当高，其中50.5%的议员具有进士、举人和贡生等功名头衔，还有39.5%的议员是生员。^②与此同时，另一些生员参加了地区性竞举，许多人在县以下的市、镇和乡村自治机构中成功地占据了重要位置。^③这样，急进士绅非但重新获得了地位和权势，而且他们在构筑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加强了自身的地位和权势。

但是必须指出，大多数低级士绅没有在地方自治机构或省谘议局里获取任何职位，只得寻求新的进取途径。有些人迅即看清现实形势，准备顺应潮流，转而从事实业或投身其他行业。另一些人进入成立不久的新式学堂。不过，上新式学堂的开销比上旧学堂要高得多，许多家庭没有能力让他们的子弟读到毕业。结果，大量青年被吸引到有新的成功机会的军队里去。例如，武昌北面的黄陂府在1905年秋招募96名新兵，其中12人是廪生，24人是生员。^④

没能在新式学堂、军官集团和军事学堂里取得一席之地的低级士绅是社会兵源的后备力量。他们一旦应募入伍，很可能被迅速提拔为正、副目或排长。据一位老兵回忆，湖北新军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四十一各标中至少有40名生员及4名资格相仿者。^⑤直到1910年，低级士绅从军人数一直在增长，而且其他有文化的人投笔从戎也并不罕见。^⑥

随着低级士绅突然涌入军界，有两类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弃文从武。第一类书生曾受过传统教育，在旧科举制度下他们或许能取得功名，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因而不属于士绅阶层。他们为参加科举考试作了多年准备，现在突然发觉自己被舍弃不顾，陷入困境之中。由于那时重视西学，大批富家子弟东渡日本留学，少数人赴西方国家留学，有些人进入国内新式学堂。另一些人则没有钱出洋留学或在国内深造，便倾向于从军或投考军事学堂。

省城是新学和军事培训的中心。许多有出息的青年来自穷乡僻壤，希望在省城里找到读书学习的机会，但他们刚进城就发现入学考试并不是定期举行的，何况他们即使通过入学考试，在真正录取之前还得等待好长时间。那些找不到工作而且没有足够银钱渡过这段日子的书生，往往改变初旨，倾向于从事军事职业。另一些人则对教书有兴趣，但中等学堂长达6年的学制使他们在取得教师资格之前就丧失了信心。^⑤相比之下，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只要花上几年时间便能成为不入流官佐，而且以后还有晋升的可能性。

对军事职业怀有强烈兴趣的第二类非士绅书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富有爱国心，把军事训练看作是振兴中华的前提。日俄战争的结束和科举制度的废止几乎同时发生，此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学业，投身军队。有些人从事教育和新闻等事业遭到挫折后转向军界。

对能够找到更称心如意的文职工作的人来说，并不优先考虑选择军事职业，但在那些找不到更好工作的人看来，军事生涯提供了很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机会。所谓很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是指，具有勃勃雄心、高度理想和满足自信感的一种职业抉择。其中有些人相信军队为国家近代化提供了契机，并使国家得以摆脱外国的控制。对于他们，军事职业既表现为长远而现实的前景，也包含着近期的职业利益。^⑥

从一名守旧官员视察军队后递呈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从军书生的思想观念对军队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这位官员把安徽、江苏和广东等地 1910 年新军纪律涣散归因于“虚弱”而“傲慢”的书生大量进入军队。他把这些人比作集市上不服管教的地痞流氓。^①然而，书生从军确实改变了军人的阶级成份，由此影响了士绅对新式军人和军事职业的态度。一支近代化陆军不仅仅是一支国防力量，而且是国家地位的一种象征，所有中国进步人士都渴望中国强盛。或许，除了保守分子和遁世隐居者之外，士绅阶层是支持学人书生选择军事职业的。失去他们的支持，几乎就不可能开办军事学堂、建造营房、兵工厂及军械库等。

从士绅对 1910 年 2 月 10 日广州新军起义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支持学人从军的。^② 公众舆论十分同情卷入起义的军人。地方士绅给政府施加了不少压力，要求从宽处理反叛军人和逃兵。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一、这次兵变起因于细琐的小事。如果军官酌情妥善处理，事态不至于发展到公开反叛。二、卷入兵变的军人都是良家子弟，他们第一次卷入兵变，而且出于爱国动机。三、他们从不骚扰当地民众，实际上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当局最终屈服于公众压力。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次事变的意义。由于广州新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军人素质日益提高，尤其是大量有文化青年加入军队，因此民众把他们看作值得尊重的一个社会层次。

绅商和商会赞同清政府倡导的振兴武备事业。除了捐款资助，他们对参与尚武运动也感兴趣，尽管步子迈得不很大。例如，一些上海富商在 1907 年组织起商团，1910 年底发展到 350 人，1911 年初达 650 人，还打算不久以后扩充到 1000 人。商团成员来自各社会团体和会馆公所中有身份的人。在地方商会资助下，杭州、苏州和福州建立了类似的商团。军事训练通常仿效日本军队的方式，夹杂着德军训练的色彩。负责军训的教官是毕业于日本军事预备

学堂或正式军事院校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商团声称，一旦清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将随时准备效力。他们认为，在军事方面为国家出力是中国人应尽的义务。^⑤

但是，士绅和绅商对重振军备的支持是有限的。我们已经论述过，编练新军是省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开销最大的项目。商人、地方士绅和省谘议局对军费大量支出及其他改革所需费用表示极为关切。资政院建议大幅度削减荫昌提出的军费预算，这场争论清楚地反映出最高层士绅领袖的思想观点。他们认识到增加军费会进一步加重税收，由此引发穷苦民众公开反抗，因为连年的自然灾害已经使穷苦民众一贫如洗。

傅因秋认为，抗议北京增加军费的活动在1911年发展到了新阶段。学生抓住军事改革中的问题开展宣传鼓动，于是中央政府禁止未经许可的集会，并检查学生的书信。同年5—6月间，北京召开省议员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改革问题。有些代表提出恢复并强化19世纪的团练，但这项议案显然不切实际，而且不符合国家需要，因此被否决了。最后，会议通过一项新议案，地方应建立后备役（实际上由成年男子的多数组成）制度，以削减现役新军的开销，并减少国民早已不堪承受的财政负担。而且，他们还相信后备役制度能够推行，人员来自有户籍并从事正常职业的人，他们服后备役期满后可以去原来的工作。^⑥

总之，士绅理解中央政府发展武装力量以应付外来挑战的立场，并且支持北京提高军人地位的政策。但是，财政问题极其严重，以致地方和全国的士绅领袖担心激发更多的民众抗税骚动，因此被迫抑制军事力量的增长。

四、民众的态度

尽管清政府想方设法招募有文化的人入伍，但大部分新军士兵仍然来自破产农民、失败的生意人、手工业者和城市无业人员。^⑥这些农民大多是从农村到城市来寻找较好生计的。几乎每年都发生的自然灾害助长了这种迁移，促使农民加入吃住有保障的军队。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入军队，因为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能过上象样日子的地方实在太少了。读书识字人口的比例在中国是如此之低，即使大量有文化的人投笔从戎，军队里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空额，只能由来自社会其他层次的文盲填补。从普通士兵的状况看，新军实际上还是一支农民军。尽管如此，他们的形象总比旧式军队的士兵要好些，后者原先大多是罪犯、游民、鸦片鬼和社会渣滓。

提高军人地位虽然有助于改变黎民百姓对新军的态度，但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也影响着军民关系，一是部队的纪律和行为，二是军费增加使赋税加重。

这方面的早期研究已经注意到，新军第一流部队纪律严明，行为良好，跟旧式军队士兵的表现形成强烈对照。^⑦有充分论据可以证实这种观点。袁世凯负责管轄新建陆军时，他的“军事教条”之一是“卫良民”，即保护安份守己的老百姓。他强调指出，军人的一切都取自于民，军人的职责是保护民众，而不是去骚扰他们。每个军人都有家庭，军人家属是民众的一部分。如果他的家庭受到其他军人的欺凌，他将会有什么感受？军人骚扰民众，就会使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兄弟也遭到骚扰。袁世凯规定，军人不准滥用暴力，与平民争执不下时，应该把纠纷交民政法官裁决。^⑧

友善待民的规定在许多部队得到贯彻，看来至少部分军队照

此办理了。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地方民众对1905年第一次军事大会操的反应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由于卖给演习部队水果和其他物品，地方民众实际上有利可图。在那里的一名英国军官不胜惊诧地评论道：

几年前，如果一支3万人的中国军队走到这个帝国的任何地方，他们不是忍饥挨冻就是靠抢劫为生。人们纷纷离乡逃难，甚至妇女们会投井自杀。

……新军部队循规蹈矩不啻是一场社会革命，民众开始友好地对待军队，蔑视军人的现象即使没有完全消除，至少已经减少了。⑧

1907年在北京西南约75公里处举行地方性军事会操，当地民众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对演习部队流露出十分友好的情感。据一位目击者说，村民看来十分友善，他们送来军马饲料，部队过秤后确实付了钱。军人从村民家的井里打水，每口井都贴上字条或竖起木牌，标明使用单位。⑨

1908年，军事大会操即将在太湖地区举行时，军中发布命令，要求部队行为端正，军人一概不准去村镇闲逛。当演习部队临近时，地方民众惊恐万状，妇女大多怕遭到强奸，逃进山里。但民众很快就平静下来，因为部队纪律严明，买东西都给钱，损坏老百姓财产一律赔偿。当地一位法国神父有点不满，抱怨道若干军人强行拿取东西而不付钱。但3名英国军官认为，从总体上看，部队的行为是“极好的”。⑩

直到1910年，新军的军纪大致介于中等与良好之间。出于种

种原因,1910年以后军纪开始败坏,这将在另几章加以考察。有些部队发生兵变,而且跟巡防营时常发生磨擦。尽管如此,军民关系“大体上还是不错的”。^④

当然,要是以为新军得到民众无保留的信任,那就估计错了。一般说来,老百姓跟军人打交道时仍然保持警惕。但是,只要军人表现良好,民众就乐于对他们表示友善与敬意。当地方当局解释军事会操的性质和目的,并要求老百姓对部队的良好行为放心时,他们至少愿意听取劝告。^⑤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部队都能用行动证明军纪良好。例如,1907年人们对第七镇有所不满,其中一例是有人发现几个军人“压榨可怜的居民”,而那年当地正在闹饥荒。^⑥驻云南乡村地区的一支新军部队在1909年表现出“欺侮无辜乡民的倾向,把他们从路上推开,尽管在城里没有看到这类情况”。^⑦1910年,长江流域驻防部队的一些放荡军官几次在妓院里惹事生非。有些官兵则赌博上瘾,并卷入若干盗窃案子。还有些官兵被发觉用种种方式骚扰民众。^⑧在这个国家其他地区一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这些事件看来为数极少,但军事当局对此并不宽容。

1910年和1911年的军民关系是紧张的。军队常常奉命平息骚动和暴乱,这些动乱是赋税过分沉重及米价上涨引起的。军队和乡民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发生在山东省莱阳府。新上任的地方官决定征收前任官员已经同意取消的赋税,导致乡民在1910年6月13日爆发动乱。这次骚动的领头人是地方组织的一名首领,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招集起几百个愤怒的农民,接着与政府军队发生冲突,造成乡民死亡二三十人,受伤多人。过了些时日,一支应急的新式部队从登州开来。7月15日动乱再次爆发,双方重新开战。据报道,五六百名暴动者遭杀害,其他人四处逃散。政府军队追捕逃亡者,沿途烧毁了一些房屋。面对强烈的抨击,这位地方官宣称

部队受到暴动者凶猛的攻击,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还说,死于冲突者大约只有 100 人。然而,他的表白与当地新闻报道大相径庭,后者对部队的“罪行”表示愤慨。山东省以外的中文报纸也声称支持莱阳乡民,谴责这支部队的所作所为。^⑤

还有其他例子说明某些新军部队奉命协助地方当局镇压城乡贫苦民众的骚动,这激起了民众的普遍忿恨。新军原先被看成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民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支武装力量。但这支军队没有同外来入侵者打过仗,反而成为高压政治的工具。新军没能阻遏得寸进尺的外国势力。它的职能究竟是什么?是保护民众呢,还是杀害老百姓?^⑥

最为糟糕的是,为了支付军事改革的巨额开销,人民被迫交纳额外赋税,而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利益。赋税年年增加,全然无视乡村民众与城市贫民的穷苦境况。老百姓看到一支教育良好又受过新式训练的军队终于诞生,或许会感到欣慰,但他们对这支军队的高额军费和由此增加的赋税无疑是心怀怨愤的。

1909至1911年,众多的抗税骚动遍及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攻击对象是设在市中心的新式学堂,乡村民众没有从这些学堂得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好处。其余的攻击目标包括新组建的巡警和新军。例如1910年长沙发生了米骚动,暴乱者提出关闭新式学堂、遣散巡警和新军等项要求。^⑦同年,直隶易州地区也发生暴乱,结果地方自治机构和一所中学被烧毁了。暴动者提出八点要求,其中两点为永远关闭所有新式学堂及遣散巡警。^⑧暴动者虽然没有提到新军,但新军实际上是造成赋税沉重的主要原因,使不少地区的民众反对军事改革。

当从军不再受歧视,军人不再在等级社会里被列为最低层次时,晚清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受过新式教育的

学人士子拥护编练新军,他们把尚武主义看成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促进国家整体观念以及公共意识的最好工具。他们大声疾呼,非但要对军人进行新式训练,而且还要实施军国民教育,以造就尚武的新式国民。与此相仿,教育家为了使民众适应更加广泛深远的改革而提倡军国民教育。这些学人士子和教育家来自士绅阶层,士绅也支持中国走向尚武好战。对大量低级士绅来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军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新工具,有利于重新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势。另一些士绅则认为,尚武主义是训练国民的基础,而国民是中国复兴的根本。商人,尤其是具有爱国观念的商人,也赞成编练新军的计划,他们估计中国终究会走向强盛,指望从中获得好处。

直到1909年或1910年,黎民百姓对新式军队的态度一直在改善,因为新军的纪律和行为看来比旧式军队要好得多了。遗憾的是,在清皇朝最后二三年里,新军比以往更频繁地被用来平息暴乱和骚动,这显然激发起民众对新军和清皇朝的仇恨。由于士气低落、怨愤众生(参阅本书第二部分),军人本身不再像几年前那样风纪严明,行为良好。花了那么多功夫小心翼翼地改善的军人形象,再次黯然失色。

最后,军事财政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对新军的态度。普通民众、青年学生、商人和士绅领袖都觉得军事改革的费用太高了。日益增加的赋税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以致许多地方爆发了抗税骚动,中央政府增收赋税的权力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注释:

- ① FO371/435,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东三省中国驻军的报告》,附在1908年9月21日朱尔典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② 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5—26页。
- ③ FO371/875, 韦乐沛致麻木勒,内附海军少校穆劳克撰写的《关于成都兵工厂的报

告》，附在麻木勒1910年11月23日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④ 《泰晤士报》，1910年3月8日，第5版。
- ⑤ 引自F·A·麦金尼：《四亿中国人的觉醒——莫里循访问记》，见《伦敦杂志》第23卷第150期（1911年2月），第702—703页。
- ⑥ 这份谕旨的英译件参阅WDGS6562—3，《关于军事改革的谕旨（1911年4月10日）》，作者引用英译件时作了些文字修改。中文原件见《大清历朝实录·宣统》第50卷，第6—9页。
- ⑦ 爱德华·L·德莱尔：《军事的延续性——人民解放军和中华帝国》，见威廉·W·惠特逊编：《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第18页。
- ⑧ 引自约翰·斯图尔特·汤姆森：《革命化的中国》，第323—324页。
- ⑨ 同⑧，第324页。
- ⑩ 黄宗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人的自由主义》，第56—51页。
- ⑪ 陈志让争辩道，1895年至1919年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理论和历史影响方面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并趋于理性化。他还说：“这使中国人从本国弱点中去反省中国遭受的灾难，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向外部世界看，也没有能力反对帝国主义。”参阅他写的《袁世凯》，第201—203页。
- ⑫ 蓝天蔚：《军解》，见《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2月），第57—61页。
- ⑬ 飞生（笔名）：《真军人》，见《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第55页。
- ⑭ 蓝天蔚：《军事与国家之关系》，见《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5月），第49—50页。
- ⑮ 同⑭，第51页。
- ⑯ 安诺：《军人之教育》，见《游学译篇》第7期（1903年8月7日），军事类，第38页。
- ⑰ 同⑭，第51—52页。
- ⑱ 蓝天蔚：《军国民思想普及论》，见《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第41—42页。
- ⑲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第3卷，论尚武，第10—11页。
- ⑳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见《新民丛报》第1期（1902年2月），第79—87页。
- ㉑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见《新民丛报》第2期（1902年3月），第65—68页；同⑲，第13页；张颢：《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1890—1907）》，第278页。
- ㉒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见《新民丛报》第2期（1902年3月），第48—51页。
- ㉓ 同⑲，第4—6页；张颢：《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1890—1907）》，第277—278页。
- ㉔ 《东方杂志》第2卷第5号（1905年），社说，第98—99页。
- ㉕ 蒋百里（方震）：《军国民之教育》，见《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第42—48页。另一批学生表达了类似观点，参阅民友社编：《武备教育》，载《游学译篇》第1期（1902年11月），军事类，第1—7页；第2期（1902年12月），军事类，第13—16页；第4期（1903年2月），军事类，第17—20页。
- ㉖ 蒋百里（方震）：《军国民之教育》，见《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第37—38页；飞生（笔名）：《真军人》，见《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第65—68页。
- ㉗ 飞生：《真军人》，见《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第70—72页。这里每个学生的作品几乎都会含有类似的思想。
- ㉘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0卷，第300—301页。
- ㉙ 斯坦尼斯莱夫·安德雷斯克：《军事组织与社会》，第184—186页。
- ㉚ 例见安诺：《历史上有名之尚武国》，见《国民报汇编》（1904年），第196—198页。

- 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名为《中国之武士道》的论著,主旨具有说教性质:尽管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体质弱、爱和平的民族,但他们原先并不缺乏尚武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尚武精神,是可以被重新激发起来的。参阅张颢:《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1890—1907)》,第278页。
- ③① 黛安娜·拉里:《地方势力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主系集团》,第11页。
- ③② 指出以下情况是耐人寻味的:1934年2月蒋介石在中国发动新生活运动时,要求国民做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生活军事化的含义是什么呢?蒋回答道:“这并非说我们都要加入部队,开赴战场。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该强调组织、团结、秩序、热情,日常生活中行为严肃,永远弃绝无组织、无方向、无纪律、无目的、放任自流、得过且过、骄傲自满及懒散迟钝等各种坏习惯。”参阅李敦仁编:《通往共产主义之路——1912年以来的中国》,第130—131页。
- ③③ 曾绍三:《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第76页;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156页。
- ③④ 西鲁斯·皮克:《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民族主义》,第180—181、190—191页。《新国民读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
- ③⑤ 引自曾绍三:《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第40—41页。
- ③⑥ 引自西鲁斯·皮克:《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民族主义》,第69页。
- ③⑦ 同③⑥。
- ③⑧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1)》,第142、201页;FO371/1090,韦乐沛撰写的《关于东三省平民学堂军训和实弹射击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4月19日致格雷的第161号文件中。
- ③⑨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1年)》,第408、455页。
- ④① 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第103页。
- ④② 张仲礼:《中国绅士——他们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 ④③ 参阅何炳棣:《中华帝国胜利的阶梯》,第34—35、37—38、40页。
- ④④ 孔斐力:《叛乱与镇压——晚清帝国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96—1864)》,第3—4页。
- ④⑤ 肖公权:《19世纪清廷对农业中国的控制》,第447—452、472、478—481页。
- ④⑥ 伊谢力克:《勉为其难的革命党人——四川与清政权的崩溃(1898—1911)》,未刊博士论文,第170—171页。
- ④⑦ 戴维·D·巴克:《民国时期山东精英的成功与失败》,见《近代中国》,第1卷第4期(1975年10月),第427—428页。
- ④⑧ 同④⑦,第51—52页。
- ④⑨ 爱德华特·J·M·罗兹:《广州的商会(1895—1911)》,见伊懋可和威廉·斯金纳合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08页。
- ④⑩ 伊懋可:《上海华界的绅士民主政治(1905—1914)》,见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43—44页。
- ④⑪ 同④⑩,第101页。
- ④⑫ 有些士绅成为商贾,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人张謇,他宁愿从商,不要做官。参阅慕尔·C·朱:《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张謇(1853—1926)》。
- ④⑬ 参阅阿瑟·L·罗森鲍:《绅权与1910年长沙米骚动》,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4期

- (1975年5月第3期),第589—690页。
- ⑤ 我形成这个观点时,受伊谢力克的启发,参阅他写的《勉为其难的革命党人——四川与清政权的崩溃(1898—1911)》,未刊博士论文,第300页。
- ⑥ 张朋园:《立宪派》,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149—150页。
- ⑦ 市古忠逸:《一个前提——绅士的作用》,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301—302页。
- ⑧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68页。
- ⑨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卷,第158—159页。
- ⑩ 我研究了革命老战士们各种传记性回忆录,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参阅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等书籍中的各类有关文章。
- ⑪ 同⑩,第3卷,第142—143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272—273页;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48页。
- ⑫ 我的观点受莫里斯·佳维茨的启发,参阅他写的《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军事因素》,第58—61页。
- ⑬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21卷,兵20,第96、79页。
- ⑭ 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论述,参阅田中义一:《新军》,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375—378页;爱德华特·J·M·罗兹:《中国共和革命在广东(1908—1912)》,第180—197页。
- ⑮ 《泰晤士报》,1911年6月3日,第5版。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建立起商团,其目的部分出于爱国,部分出于保护商人团体利益,使它们在动乱与革命时期免受骚扰。参阅白吉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见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245—246页。
- ⑯ 傅因秋:《尚武精英、民众抗税和中国的民族革命》,见《远东史学论丛》第19期(1979年3月),第224—230页。并参阅“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1)》,第246、265、260页。
- ⑰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3页。拉尔夫·L·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11页也提到,尽管部分军人来自中下层学人士子,但士兵的主体是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构成的。
- ⑱ 例见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情况》,第6—7页。
- ⑲ 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92页。其他“教条”则禁止军人夜间上街游荡淫掠,不许践踏稻田等。有一首军歌劝导士兵效忠,帮助老百姓并严以律己。总之,在军队起重要作用的社会里,军人应该成为受尊敬的人。参阅《新建陆军》,第142—144、194页。
- ⑳ FO371/26,使馆警卫队长H·鲍尔上校撰写的《中国部队军事演习报告》,附在萨道义1905年11月27日致兰斯顿侯爵的第408号文件中。
- ㉑ FO 371/415,柏来乐撰写的《军事演习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11月25日致格雷的第548号文件中。
- ㉒ FO371/629,柏来乐和另两名英国军官撰写的《中国部队军事演习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2月10日致格雷的文件中。
- ㉓ FO 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30页。并参阅FO371/1089,

《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3页。

- ② 《民立报》，1910年12月5日，第4版。
- ③ FO371/214，柏宗乐撰写的《关于第七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④ FO228/1733，《关于驻云南新军的报告》，附在代总领事韦礼敦1909年9月21日致朱尔典的第41号文件中。
- ⑤ 例见《民立报》，1910年12月8日，第4版；12月12日，第4版。
- ⑥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469—471页；《东方杂志》第7卷第7号（1910年），记载，第92—93页。
- ⑦ 《民立报》，1911年3月29日。欣内斯特·P·扬注意到“辛亥革命前，新军的武力实际上只用于镇压城乡贫民的骚动”。参阅他写的《袁世凯总统——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与专制统治》，第4页。
- ⑧ 中国史学会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509页；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33页。
- ⑨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528—529页。

第二部分

军心动摇与兵变

第五章

湖北新军的革命运动

由于毅然揭开辛亥革命序幕的是新军，考察新军失去忠诚并最终对清皇朝反戈一击的过程是饶有趣味的。革命不是由军人倡导的，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却成为清帝逊位的关键因素。直到1911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新军深受革命和革命以外因素的影响，而北方新军所受的影响则要小得多。辛亥革命爆发时，建立民国的观念在南方相当强烈，已深入人心，北方至少在几个月内一直倾向于君主立宪制，然而，北洋军队也有不满现状之处，并不十分支持清政府。不久，北洋军队联合南方军队，敦促清帝逊位。

本书这一部分的重点，就是研究不同省份的军队分别受到哪些影响。要考察的第一个省份是湖北，那里令人瞩目的革命运动具有典型性与特殊性。湖北的革命是典型的，因为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一样，革命团体时而形成，时而改组，革命领导人物来去匆匆，变动频繁。^① 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1903—1906)是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的一部分。急进的学生领导了这一阶段的革命运动，他们组织研究会和各种社会团体，从事反清活动。湖北革命运动的特殊性，表现在它从一开始目标就对准“为争取军队而斗争”，这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采用的策略。在革命运动早期，一批加入新军的学生在军界和学界之间起了“纽带”作用。到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1907—1911)，新式军人用行动充分证明

他们自己是革命的主角。的确，湖北革命运动的显著特点是革命领导人、军人，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革命组织浑然结为一体。由此看来，湖北的革命运动独树一帜，因为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新式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长期、孜孜不倦而又成效显著的革命影响。

本章集中论述湖北革命团体的组织演化，还将考察那些引起新军普遍不满而且助长革命势力发展的因素。

一、1904—1911年的湖北新军

湖北是最早编练新式陆军的省份之一。练兵处起先提出在湖北编练三镇新军，后来改为编练两镇，结果，只有张彪将军统辖的第八镇完全编练成军，原定为第十一镇的部队从未达到额定兵员，于是改成由黎元洪协统指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②张之洞对军事改革怀着浓厚的兴趣，其中也含有决心跟政治对手袁世凯一比高低的因素。如果不受财政困难的牵制，在清皇朝垮台以前湖北将编练成两个兵员足额的镇。据清朝官修史书记载，1910年第八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802人，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③另有1营八旗驻防部队，兵力不及当地新军十分之一。^④

湖北新军是全国最庞大的军队之一，正规部队几乎全都驻扎在武汉地区。湖北新军在南方各镇中实力最强，这是人所共知的。1905年，时任练兵处帮办大臣的铁良巡视长江流域后说，湖北新军是“沿长江驻防各军中最优秀的军队”。他发现湖北军官“或曾游学海外，或毕业于军事学堂，许多士兵也受过教育”^⑤。关于军事教育，他奏报道，1903年创世的一所中等学堂教授专门技术和一般知识，课程设有军事科学、外国语、历史、地形学、数学、物理、博物学和绘图，一半教习曾在日本完成学业，讲课质量不错。为培训正式

军官开设的学堂里，学员学习的普通课程包括心理学、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和绘图；特殊课程则有战略学、军事管理、军械装备、筑垒设防、骑术训练、心理学和医学卫生等。此外，还重视炮兵和步兵的野外训练以及军事体操。虽然还大有改善的余地，但这些军事学堂“生机勃勃，管理良好”，并且“极重视职责的培训”，不失为“军事人才的培训所”。^⑥

柏来乐中校在1907年4月视察过湖北新军，总体印象不错。他发现山西籍将军张彪是“中国最开明的将领之一”。张彪的参谋人员都曾留学日本，看来属于有进取性的少壮派军人。标里的军官也是年轻人，他们在日本或国内军事学堂受过教育。第八镇有2个陆军炮营，1个过山炮营。第二十一混成协有1个过山炮营。陆军炮营用的马产自日本，看来都很壮实。步兵的营房是柏来乐迄今为止在中国所见的最好兵营。中国军人自称，每个湖北新军士兵都能读会写。有3所军事学堂在进行正常教学，它们是培训军官的讲武堂（第三章已提及），将发展为陆军中学堂的武普通中学堂，以及初等军事专科学堂。^⑦

美国海军陆战队伦纳德上尉进行了类似的考察，他发现士兵的外观“棒极了”，他们都很年轻，年龄在20至25岁之间。军官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看来“比通常所见的军官更端庄自重，而且很少言行失措”。在上述3所军事学堂之外，他还发现1所有560名学生的工程兵学堂。^⑧在1905年、1906年和1908年的军事大会操中，湖北新军表现极好，被认为是南方各镇中最优秀的部队。

1909年2月，另一名英国陆军军官访问第八镇后报告道，总体看来，士兵具有军人气质，“纪律不错”，与表现得“极其懒散”的南京新军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八镇士兵装备精良，列队行军和训练都“十分出色”。在野外训练中，这个镇看来已经朝提高实力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不必匆忙推断这些部队在实战中会有上佳表

现。^⑨

设在汉阳的一所兵工厂供给湖北新军武器。汉阳兵工厂自1895年创办以来,已拥有6座分厂,分别制造毛瑟米福枪、火炮、军用器材、子弹、无烟火药和速发炮弹。^⑩1906年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梅杰访问过汉阳兵工厂,他评论道,规模不大的制枪厂出产米福枪和装5发子弹弹夹的毛瑟1888式卡宾枪。这些枪枝看来“制作得很完美”。制炮厂只制造一种型号的火炮,即带炮架的57毫米口径速射山炮。制炮厂里有若干不同型号的克虏卜炮和一种型号的霍特金斯速射炮。中国人以这些炮为模特,制造他们自己的山炮。在小型弹药厂里,梅杰简直着迷了,“黄铜皮、镍和铅在顷刻之间转化成子弹,令人惊愕不已。”从德国进口的机器新型精密,每月能生产100万发子弹。^⑪1908年继张之洞之后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1908—1909年在任)奏道,汉阳兵工厂规模之大、产品之多,远非其他诸省兵工厂所能企及。^⑫1910年,汉阳兵工厂的生产效率在全中国居首位。^⑬

湖北新军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士兵的文化水平高。约瑟夫·埃斯里克认为,这是因为“该省的普通教育体系发展不完备,许多受过部分教育和有革命倾向的青年,没有机会进一步深造。”湖北有1200所小学,这“说明每2.4万人就有将近1所小学,2名教员”^⑭。如此解释是切实而令人信服的。无论从人数还是质量上看,湖北的初等教育比其他许多省相对要好些。例如,湖南在1909年只有542所小学,^⑮而人口比湖北的一半还多些,因而湖南籍士兵的文化水平总体上就不及他们的湖北籍同行。

湖北军人文化水平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张之洞不懈的努力,他招收受过教育的青年入伍,以此改善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1907年他调去北京任职时,湖北新军大致已编练成军(只是没有能力把第二十一混成协扩充为镇的编制),此后在扩建新军方面没有实质

性进展。^⑩张之洞的招兵政策由高级军官继续推行下去。黎元洪本人是军校毕业生，他也倾向于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当兵。^⑪张彪的态度可能不很明朗，他常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刻划成愚昧无知而又腐败堕落的人物，^⑫尽管对他了解深刻的外国军事专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的参谋班子都是受过教育的军官，他似乎为他们感到骄傲。^⑬各种各样的舆论指责他在1911年迂腐无能，^⑭这就使许多中国作者低估了他在军事事务方面的才干，并忽略了他对有文化军人的喜爱。

陈夔龙任总督时间不长，也十分关注新军。他在1908年曾试图开设一所新的陆军小学堂。这可以使人们想起，一年前在武昌开设的初等军事专科学堂并不符合北京制定的规章，陈夔龙奏请设立的学堂合符北京的规章，原来可望与那所军事专科学堂同时并存。^⑮但经费无着落，这所军事学堂没办成。否则，将会有更多受过军事教育的青年投身新军。

值得一提的还有，相当数量的湖北军官是中国自己的军事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张彪和黎元洪虽然到日本访问过几次，但都不曾留学海外。从1911年情况看，湖北新军高级指挥官中很少有人在国外受过教育。^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湖北的各类学堂每年培养出大量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张之洞到晚年态度有所改变，极其严厉地批评归国留学生的表现。1907年9月，他上奏清廷，陈述己见：

回国以后，其中学问切实又不染荒谬恶习者不能得其半。即其可用者，久在外洋，眼高气盛，所望甚奢，非优异之官，丰厚之薪，不乐为用，断不能尽受中国镇、协各统铃束。且朝南慕北，去就任意。加以此项学生有学问无阅历，任以实事，果能人人皆克收效与否，尚未可知。^⑰

查阅一下1905年军官名册就知道，其中海外学成归来的不足

25%，其余都是国内培训的。^④张之洞过去一直支持派送军事留学生。那么，湖北籍的归国留学生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他们大多去别处就业任职了。如果北京需要他们，他们只得赴京任职，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1904年，只有一半湖北籍归国留学生在本省工作，他们都是可以调动的对象。别的留学生则离职去其他地方寻找更有吸引力的工作。^⑤

武昌培训出来的军官在湖北新军中占很大比例，这说明湖北新军中不存在当地军官跟北洋军校毕业生和留日军校生激烈竞争的问题。武汉军官中的不满情绪似乎比其他新军军官少，因为南方其他新军部队的军官大多由外省军事学堂毕业生或在海外受训回国的军校生担任。这就很能说明这样的事实，湖北军官的利益寄托在现实政治秩序的稳定上，他们对颠覆活动一般都缺乏热情。

二、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1903—1906)

1900年夏义和团灾乱发生以后，湖南学人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起义。这次起义的动机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似乎有“勤皇”的效忠意图，另一方面又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愿望。^⑥许多湖北和湖南籍的归国留学生参加了起义。武昌当局行动迅疾，逮捕了唐才常和支持叛乱的一些会党首领。不少卷入其中或受到牵连的学生流亡日本。

1901至1903年，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活动达到高潮，他们成立学生团体，出版许多评论中国问题的学生刊物。^⑦由各省学生团体主办的刊物对教育、政治、经济和军事表现出广泛的兴趣。其中之一是《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绝不是激进的革命读物，但某些有特色的文章以及对时政的评论是能起政治煽动作用的。张之洞在湖北查禁《湖北学生界》，召回刊物的编辑，这些措施正合编

辑之意,反而使这份刊物出了名。^②据说,许多武昌学生偷偷阅读《湖北学生界》,还发誓,“欲奋起为天完徐帝、大汉陈皇,而为汉族争自由,复国权矣。”^③

1903年初,俄国军队拒绝撤出他们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侵占的东三省南部,除非清政府答应他们在那里享有特权。沙俄的要求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成立了以蓝天蔚为首的拒俄义勇队。130余名学生主动采取实际行动;另有50名学生表示愿在东京总部从事拒俄活动,12名女学生报名做护理工作。他们发电报给直隶总督袁世凯,敦促他立即行动起来,抵抗俄国侵略军,并表示要推派若干名代表向袁世凯面陈一切。^④消息传到湖北后,武昌的学生反应强烈。他们要求张之洞致电北京,敦促清政府抵抗俄国军队。他们还建议,一旦爆发对俄战争,应该寻求英国和日本的支持。当局不理睬他们的呼吁,于是数百名学生举行集会,谴责沙俄军队的侵略罪行。他们还严厉抨击北京实行妥协政策,面对外来侵略表现得怯弱无能。^⑤

这年年底,激进的留学生从日本回国,进一步激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们中的为首人物是吴禄贞和《湖北学生界》的几个编辑。吴禄贞是湖北籍军事留学生,日本士官学校最早的中国毕业生之一,担任过好几个高级职位。尽管官运亨通,他看来仍然有激进倾向。吴禄贞的情况的确令人感兴趣。他出身于士绅家庭,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秀才,祖父曾做过地方官。17岁那年,他进入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他作为政府首批官费生之一被派送到日本留学。他在1900年参与唐才常起义,此后又东渡日本,并热衷于中国留学生的学生运动。张之洞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不希望他再回到湖北。因此,吴禄贞再次返回武昌时,被关押了3天。后来,张之洞召见了,对他的才华和雄辩印象深刻。结果,吴禄贞同时被授予好几个重要职位:武昌护军营教习,武昌武普通学堂首席

教习,省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兵备处提调。②

显而易见,张之洞意在“收买”,以防此类人物的激进倾向危及清政府统治。吴禄贞似乎对迅速提升感到满意,对这位总督产生很高的敬意,甚至怀有感恩戴德之情。尽管如此,他仍然是学生运动的参与者。直到1903年底或1904年初他出任北京的一个高级职务,他考虑到事业上的前程,革命热情似乎有所减弱。他赞同革命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确实给人留下了深深的疑问。③

或许张之洞不把奉命回国的《湖北学生界》编辑看成严重威胁,他们大多没有受到“收买”。不仅如此,他们还处在监督之下,这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到处去寻找职业或从事革命活动。有几个人去上海开设昌明公司,还在武昌设立分公司,声称办公司的目的是给打算出洋的学生提供咨询,出售或分发政治小册子,并作为信息中心提供国内外新闻。但该公司在正常活动的外衣掩盖下,发动了一场宣传战,资金来自该公司出版发行的4册演讲稿,这些小册子是由归国留学生编写的。小册子向世人展示了武汉的爱国运动和反对高压统治的斗争,有时还举办些演讲,以增强宣传效果。④

那时还设立了若干秘密聚会点,作为激进学生开会集议的地方,其中包括吴禄贞的家和《湖北学生界》原编辑李廉方的家。吴禄贞的家是一般聚会场所,李廉方的家则作为讨论政治的秘密会所。还有一个以阅览室名义作掩护、称为“武库”的秘密聚会点,那里每月举行秘密讨论会。⑤ 这些秘密集会形式简单,存在时间不长,而且作用也不很大,只是表明当地在酝酿革命。到1903年,中国不少大城市里发展着此类秘密集会。吴禄贞调京任职后,武汉的政治讨论会就停止活动了。

1904年5月,一群受过国内教育的青年在武昌集会,制定革命的策略,作出了几项决议。第一,考虑到会党在以往起义中表现得

不可靠、难以驾驭而且麻烦丛生,不再把他们当作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第二,要对正在武昌编练的新式陆军进行渗透。第三,策反军队活动的重点放在普通士兵,而不是放在军官集团,因为军官的既得利益与维持政治现状是一致的。最后,在作好充分准备和革命时机成熟之前,需要保持极大的克制和耐心。^④

这些决定具有深远意义。强调策反军队,反映出革命学生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很快就抓住了武装力量的关键问题。由于早期起义,尤其是唐才常起义的失败,他们不再对会党寄以厚望是正确的。正规部队的武器精良,军事技术熟练,使未经训练而装备落后的会党分子实际上不可能抵挡他们。会党只能秘密地购买和收集武器,财力也有限,何况要聚集起流品复杂的小股会党队伍一起行动,更是困难重重。

张难先和胡瑛出于革命目的,投身武昌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张难先是湖北籍人,做过学馆教师。胡瑛是浙江籍人,在湖南长大,他的父亲曾任湖南某市市政官。16岁那年,胡瑛到长沙,在黄兴开办的一所学堂读书。在黄兴的影响下,他参加了革命活动,因此遭到省政府通缉。他逃到武昌,结识了吴禄贞和张难先。^⑤

1904年6月,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负责宣传,时功璧分管财务,宋教仁担任文书,康建唐分管总务,朱子龙做联络员。吕大森和曹亚伯的家庭背景良好,他俩既通旧学,又懂新学。宋教仁是生员。朱子龙的父亲是廪生,他本人自学成才。^⑥时功璧和康建唐的传记材料极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俩都不是军人,也不曾当过兵。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动力,跟家庭出身或阶级背景关系不大,而是他们对满清政府的不满和对中国未来的关切。

科学补习所的一般成员主要是当地普通学堂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科学补习所成立时有48名成员,^⑦其中约有40人来自武昌的

普通学堂，他们都十分积极地与军校学员和军人建立起联系。^④科学补习所没有完全抛弃会党，因为不少会党分子已经是军人。另一些会党分子被要求打入新军，而且他们已经和科学补习所达成协议，他们“会成为活动分子，为恢复中华，相机发动起义”。^⑤

尽管组织松散，但科学补习所以探讨学术为掩护，在湖北开创了建立革命组织之先河。科学补习所没有会章，也没有会员资格的规定，然而它发起了由学生领导的，工作重点集中于军人和学生的地方革命运动。科学补习所的成立还标志着新战略的开始，它改变了以前依靠会党打击军队来搞革命的策略。

湖北与湖南的革命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科学补习所有不少湖南籍成员，他们又是黄兴1903年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成员。湖南人宋教仁和湖北人曹亚伯频繁往返于长沙和武昌，并同黄兴保持密切联系。^⑥

果然，科学补习所卷入了长沙一场未成功的起义，导致10月28日武昌巡警搜查会所，领导人被迫逃亡。结果，科学补习所解散，革命运动沉寂了几个月。^⑦武昌政府迅即采取措施，把激进学生遣送出国，让他们去欧洲和日本留学，^⑧并为当地学生和军人谱写尊孔尚儒的歌曲，希望由此增强他们的效忠意识。^⑨

虽然遭到这次挫折，颠覆军队的活动毕竟已揭开了序幕。武昌的一位道台认为，常备军的士兵受革命思想影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重要性，觉得一旦发生紧急事变，军官将无法控制局面，因而不必格外尊重军官。这位道台刚调到天津，就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说：

他过去居住的一幢房子近旁，一些军人去操场时常要路过。一名军官对士兵的不良行为发了几句合情合理的牢骚。此后，当士兵经过这幢住宅时，他听到他们说：“哼，这些家伙就是在这幢房子里说我们坏话的。我们造反后，首先要把这

幢房子攻下来。”他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说明，“造反”已经是这些部队熟知的概念，所以士兵们无所顾忌地谈论“造反”。^④

由此看来，随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外。1905年，革命运动又复活了。领导人是当地学人刘静庵。他的姓名在同盟会会员名册中是刘贞一。^⑤刘静庵虽然没有取得旧式功名，却酷爱中国经典著作。他年轻时皈依基督教，成年后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并对满清皇朝失去了信心。他在1901年投身军界，化名刘大雄，1904年提升为新军管带黎元洪营中的秘书*。他曾参加1904年5月的会议，并且是科学补习所成员。长沙起义后，他遭到黎元洪怀疑，被逐出军营。于是他到武昌的美国圣公会教堂去避难。这所教堂由美国牧师胡兰亭主持，他早些时候曾给过曹亚伯庇护权。刘静庵不久便知道，可利用外国教会来掩护革命活动。他成功地说服了胡兰亭牧师，把圣公会图书馆当作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⑥

这个取名为日知会的图书馆原来是阅报室。在长沙、汉口和九江的圣公会阅报室也取名日知会。武昌的日知会在刘静庵担任司理之前并没有新的特色。为了掩饰图书馆用于革命活动的真相，刘静庵不改动日知会这一名称，并且保留了图书馆的原貌。^⑦

1906年1月底或2月初，这所图书馆转变成一个革命中心。在日知会秘密成立会上，刘静庵作了发言，主题围绕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满清政府，并号召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他强调指出，军人和学生在革命运动中团结起来是十分重要的。^⑧

这个新的团体分为2个部：干事部约有20人，刘静庵任总干事，下设总务、管理、秘书、联络4个部门。还有1个评议部，但有关资料缺乏。日知会经费自给。吴禄贞为这个革命团体的成立捐出1个月的俸薪，其他成员得1—5元不等。没有交费或未曾签名加入该

* 刘静庵于1903年投身军界，次年任营中秘书。

会的同情者,也被视如同志。^⑤

日知会成员比科学补习所成员要多得多。有一份会员录列出118人的姓名,其中18人是前科学补习所成员。^⑥另一份材料认为有200余名会员,大多是士兵,其余的是学生、教员和记者。宗教界人士只有4名,由此可见,宗教信徒对革命运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有6名下级军官获准入会,或许因为他们热情洋溢,不便将其拒之门外。^⑦

在圣公会的保护伞下,日知会力图影响所有来图书馆读书看报的人。武昌的一所教会办的文华学堂每逢周末举行中国时事演讲会。^⑧宣传战不局限于武汉地区。在武昌东面175公里左右的黄冈府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发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以及国内鼓动家们写的其他作品。^⑨这类宣传品的主题都围绕着反帝排满,很少涉及到共和政体、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等学说。排外仇外和种族优越感等传统情绪有时会在宣传口号里体现出来,而且还富有感召力。据说,许多士兵把宣传品珍藏在床底下。他们服役期满回到家乡后,把宣传品改编为简单的歌曲,在乡村中传播。^⑩

以学堂、研究会和阅览室为掩护,武汉外围地区出现了一批秘密团体。学生出身的军人熊十力组织起著名的黄冈军学界讲习所,领导人员是武昌普通学堂和军事学堂的毕业生,也有些是普通士兵。军队中的同志结成10人一组的宣传队。军学界讲习所刚成立时是小型地方团体,很快就发展为富有影响力的革命中心,吸引了周围地区不少民众。1906年5月,地方当局发觉熊十力在煽动革命,迫使他逃亡。军学界讲习所失去首领,停止活动。^⑪

孙逸仙在1906年夏告诉日知会,一名法国高级军官向他透露可靠消息,法国政府同情中国的革命事业,在天津的7名法国官员已作好准备,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搞革命。孙逸仙请其中一名法

国军官奥兹尔上尉研究长江地区的形势。奥兹尔刚抵达武昌，就受到热情款待。在一次包括当地驻军官兵在内的数百名革命同情者举行的集会上，他发表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演说，并将法国旧政权的覆灭与中国需要革命进行比较。听众中，有经过化装的张彪将军、一名警官和一名中国海关的英国雇员。奥兹尔的演讲引起湖广总督的注意，法国驻京公使馆收到了抗议书，但法国公使答复道，对法国人支持中国革命党人情况一无所闻。^⑤奥兹尔的演说激起听众热烈反响，使清政府对教会图书馆的实质发生了怀疑。

日知会的领导人认识到策反军队需要有耐心，要做艰苦的工作，因而不急于发动起义。就像后来被捕的殷子衡在被审问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一直在酝酿革命，但没有采取暴力行动。^⑥如果不是由于1906年11月在湖南与江西边界爆发萍浏醴起义，日知会原来是可以免遭清政府迫害的。长江水灾引起普遍骚动之后，会党在农民和矿工的支持下发动了萍浏醴起义。^⑦尽管同盟会事先不知道要发动起义，还是决定利用这次起义造成的局势，派遣胡瑛、朱子龙和梁钟汉3名会员去湖北。他们刚抵达武昌，就催促日知会明确表态，打算采取何种行动。但在日知会作出决定之前，一个名叫郭尧阶的人向巡警告发道，日知会是披着伪装的革命团体，刘静庵跟参与萍浏醴起义而受警方通缉的会党首领刘家运是同党。巡警立即采取行动，逮捕了刘静庵、胡瑛、朱子龙、张难先、梁钟汉以及另外4名革命党人。^⑧于是，胡兰亭牧师离开武汉去日本，不久，他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帮助下，想方设法解救他们。这些被捕者幸免于死，被判处长短不等的监禁。张难先在狱中表现温和，于1907年获释，后来在武昌从事教育工作。刘静庵受到严刑拷打，在武昌起义爆发前3个月死于狱中。^⑨

长江流域革命团体的活动使张之洞大为震惊。最令他担忧的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学生运动与秘密团体已经结合起来，许

多秘密团体的成员又散布在军队中。1906年12月15日,一份地方报纸《南方报》刊登了张之洞关于对付叛乱团体的指令,详细列举了他们的实力、活动方式和组织情况。这位总督特别担忧军火私运到长江地区,命令湖北、湖南所有海关和关卡,一旦发觉货物有可疑情形,必须检查,以防不测,并责令全体文武官员采取严密防范措施,以对付秘密团体。^⑧

官员们决心放手大干,无情地粉碎革命运动。数以百计的人受到迫害,不少人惨遭杀害。日知会被解散,许多会员逃离湖北。加入过日知会的若干名军官胆战心惊,龟缩蛰伏,不敢有所行动。地方革命运动跌入最低谷。

湖北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就此告终。革命运动在1906年遭到挫败前,革命同情者的人数显著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普通士兵和会党成员。曹亚伯声称,记录在册的军内有关人员多达1万人^⑨,这种说法不免言过其实。另一位作者则认为约2000名军人倾向于日知会,^⑩看来是合乎情理的估计,因为根据这种说法,只有十分之一的湖北新军官兵跟日知会有关系。尽管大多数军人表现得冷漠或缺乏同情,考虑到这是湖北首次以此类方式对军队进行策反,所取得的成绩仍是令人注目的。

学生出身的军内革命党人的弱点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补习所昙花一现,带有尝试性质,只是一个不成熟的谋反组织。相比之下,日知会水平有所提高,但组织仍然松散。这两个革命团体存在的时间太短,没有机会自我完善。从一开始起,革命颠覆的全部目标就集中在驻武昌的军队。日知会同分散在各处的独立小团体建立起了关系,但组织方面不分等级层次。日知会没有具体规章,凡同情革命事业者都可以入会。由此可见,日知会缺乏政治甄别的制度,无法对申请入会者进行筛选。会费未作明确规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捐款。没有一套驾驭军内各种革命小团体的指挥机构。

更有甚者,宣传攻势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也反映出革命党人不成熟,缺乏经验,以致轻率地将造反意图暴露给地方当局。他们举办演讲会和集会,还放映幻灯片,一定程度上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他们聚会时漫不经心地拍照,而不考虑后果。后来,官方的奸细也有机会混入听众。当局一旦产生怀疑,抓住一两个人,便能得到全部照片,从而掌握最致命的证据,用以对付一切有关人员。⑥

三、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1907—1911)

由于粮食短缺和汉人反对满清皇朝的情绪滋长,长江流域各省在1907年极其动荡。⑦武昌的许多汉族军官同情革命运动,这是革命信徒们很少被地方当局发现并受到惩处的部分原因。⑧1907年确实堪称暴动年,共发生了十余起暴动。其中5起发生在广东,2起在广西,安徽和浙江各有1起,四川爆发了一些零星的骚动。这年5月份以后,每个月都发生暴动。各地起事者每次都想把暴动发展为全国革命的信号。但是,由于相互缺乏配合,领导水平低下,组织工作糟糕,加上军队没有给予充分支持,所有地区性暴动都成为孤立的事件。⑨

1907年的暴动反映出革命者高估了革命力量和民众支持的程度。反对清皇朝的运动正在高涨,但此起彼伏,而且组织松散。在这类暴动获得同盟者或政府军充分的军事支持之前,在新兴的精英集团和热情的改革家们毅然决然地跟政府当局分道扬镳之前,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1907年武汉没有发生暴动。在当局严密防范下,武汉革命党人被迫收敛,言行极为谨慎。部分革命党人退避到湖北中部的乡村小镇安陆,把那里的一个慈善机构当作联络中心。他们时常碰头,并为那些在狱中受审的同志照顾家属。⑩囚禁在汉阳的革命

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军。由于获得了监狱长官的同情，他们能够与外界的同志保持联系。胡瑛常应外界请求，就民众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另一位坐牢的革命家李亚东用笔名撰稿，定期投寄给汉口的一份中文小报。这份小报是由一位革命同情者出版发行的。^①

1907年9月5日，张之洞被任命为军机大臣。5天后，度支部尚书李岷琛任署理湖广总督。9月11日，张之洞起程赴京。直到1908年5月5日陈夔龙才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一职。^②在这段空隙里，官方似乎放松了防范，给革命活动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可乘之隙。

1908年春，湖北日知会成员任重远从四川返回，他受另一位革命党人李长龄的推荐，加入了驻武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三营。任重远和李长龄对同盟会在边远省区发动起义的战略都持有异议，认为只有在中国中部地区发动革命才能置清皇朝于死地。于是，他们在7月26日采取行动，召集起400名士兵开会，讨论组织新的革命团体湖北军队同盟会。围绕着是否应该用军队同盟会这一名称，产生了分歧意见。部分人认为，如此称呼，这个革命团体就会被看作纯军人组织，使军外人士望而却步，不敢参加。另一些人争辩道，既然大多数同志是当兵的，组织一个军人团体显然是众望所归。这场争论在会上没有取得结果。^③但这个新团体最终还是使用军队同盟会这一名称，从而表明军内同志确实在其中占取绝对优势。

不幸的是，湖北军队同盟会在年底之前便瓦解了。部分原因是任重远被调往四川，部分原因是当局发现了一些革命活动，加强了防范措施。那份与李亚东有联系的中文报被勒令停办，兵营内的革命活动受到监视。军队同盟会存在5个月便夭折了，没有干出值得称道的业绩。

但是，军队同盟会的成立具有两点意义。第一，它反映了许多

同志想建立纯军人团体的愿望。尽管军人同盟会仍然有非军人会员，但军人占支配地位已是势所必然。这就使军队同盟会跟以前的团体相比，具有显著的特色，开创了军队领导革命运动的风气。第二，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军队同盟会是湖北复兴排满运动唯一的知名团体，而且使地方革命团体的发展得以延续下去。

1908年底熊成基在安徽新军中发动一场流产的兵变（参阅第六章），使湖北革命党人深切地认识到革命颠覆活动是艰苦的任务，必须做好组织工作，而不能单凭热情就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客观形势要求他们多做团体内部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今后组织工作的方向问题，即从哪里吸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有些人提出应该对军人和普通学生兼收并容，以建立范围更广泛的团体。其理由是，单纯依靠军人会大大限制革命工作的范围。但大多数人赞同建立由普通士兵控制并占支配地位的纯军人团体。对同盟会领导地位的批评重新展开。批评的依据是同盟会的总部不设在中国，同盟会领导的起义一味依赖海外华侨和国内会党捉摸不定的支持，同盟会不是组织严密的团体，而且没有一支新式武装力量支撑自己。与此同时，出于跟以往同样的理由，军内革命党人对军官仍然心怀戒备。针对普通学生应当作为颠覆运动一部分的说法，军人运动创导者们回答道，湖南籍学生在武昌的学堂里比比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复杂的”（因此被说成不可靠）。革命军人领导人还认为普通学生不可能保守秘密，早期团体的失败，就是因为军人与学生不恰当地混杂在一起。所以，要使组织严密，秘密不外泄，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在士兵中间展开活动。^⑩

阐述了上述原则后，单纯军人革命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1908年12月13日军队同盟会进行改组，并取了新的名称群治学社。虽然名称不含军事色彩，但群治学社实际上是第一个普通士兵的革命团体，也是当地第一个有会章和会员资格规定的革命团体。

群治学社设社长 1 人,文书 2 人,财务和总务各 1 人,以及若干名评议员,一概通过选举产生。除 1 元入会费外,每个成员每月交纳军饷的十分之一给群治学社。为了加速发展队伍,每个成员每月必须介绍 2 人入社。成员资格的规定比以往要严格。想申请入社的人,必须经由 3 名老成员介绍,并接受政治审查。另一条规定为:“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⑥。武汉的革命团体自 1904 年以来就遵循这条规则,但经过群治学社努力,才成为正式规定。

没有标准尺度或统一方式来鉴别新兵的政治态度。申请入社者必须按照要求写一篇短文,有助于革命党人初步判断哪些人的革命倾向较明显。但这类短文毕竟不是可靠的保证,于是采用换帖拜把、义结金兰的方式。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相互敬重的人通过交换帖子,了解对方详细的个人情况,以便成为好朋友或结拜为兄弟。革命党人通过跟同情革命的士兵交换帖子,先含而不露地暗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革命党人收到的帖子反应良好,接着就增加接触,革命思想随着每次交往表达得越来越明晰。最后,革命党人把他们感兴趣的士兵介绍进群治学社。^⑦整个过程都在秘密中进行。以往革命党人使用的公开演讲、放电影和幻灯片以及发表煽动性讲话等方式,被认为不合时宜,代之以对军人做个别工作,逐个发展入社。为吸引支持者而用的革命语言并无新意,总是不厌其烦地指责清皇朝腐败无能、压迫人民,以及对外国人奴颜卑膝,因此必须推翻它。介绍一个新同志入社时,两三名老同志找他面谈,如果准许入会,便要求他在纸上写下誓言。新成员得到警告,如果他对群治学社的活动不严守秘密,将受到严厉惩处。然后,在新成员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张誓言被烧掉。^⑧

不久,群治学社在第四十一、四十二、三十二标里扩展了势力。激进士兵杨玉鹏升任第一营左队司生官后,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观

察政府动向,为群治学社在第四十一标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后来,营官潘康时发现了杨王鹏的秘密身份,向他表明自己支持群治学社的革命事业,以及正式加入这个团体的强烈愿望。要拒绝潘康时的好意是很困难的,但接纳他又违背不吸收正式军官为社员的规定。最后,还是破例将他吸收进社。更为重要的是,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潘康时是诚心诚意而且满怀热情的。他出身于黄陂一个贫农家庭,受过一位亲戚2年私人教育。1906年,他通过了军官资格考试,被任命为队官,2年后升任营官。显而易见,他的处境不同于个人前程黯淡的士兵。他声称选择军职是出于“拯救国家”的愿望,他的表白赢得了高度信任。此后不久,他用行动说明自己确实是第四十一标中富有奉献精神的革命党人。^⑧

那时,群治学社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第四十一标士兵李六如负责。李六如精明强干、劲头十足,短短几个月内就在第八、三十二标中吸收了大量新成员。革命影响在初等军事学堂里也得到广泛传播。^⑨

除了散发反帝排满的宣传品,群治学社还办起了一份中文报,取名为《商务报》。这份报纸原来由一位姓罗的先生主办。后来转卖给湖北学人詹大悲。詹大悲聘请何海鸣为编辑。湖北人詹大悲原来是黄州府中学的优秀生,因与学校监督发生争执,被驱逐出校。沮丧之余,他来到武昌,成为报人。^⑩何海鸣是第四十一标未人流退役官佐,过去常给各种地方报纸撰写文章。^⑪后来,他俩通过湖南籍同盟会会员蒋翊武和刘复基而结为挚友。蒋翊武长得像一个头脑简单的乡下农民,起初在澧县一所高等小学堂读书,后来进入彭德的一所师范学堂。他曾经协助过宋教仁,也搞过会党工作。他一度想留学日本,但在上海生了一场病,于是改变念头,进入当地一所新式学堂,后来为上海的一家中文报工作。这家报社卷入反清宣传,被两江总督端方查封,他返回湖南。1909年秋,他为

了加入湖北新军来到武昌。^⑤刘复基也毕业于高等小学堂,曾协助黄兴和宋教仁做过些工作。在编辑《商务报》以前,他曾东渡日本,还与蒋翊武共事过。^⑥

1909年秋,蒋翊武和刘复基在报道湖北南部的一场水灾时,打听到关于群治学社的情况。他俩遇到一位革命士兵,表达了想加入新军的愿望。于是,那位革命士兵向他俩讲叙了群治学社的全部情况。尔后,蒋翊武加入了第四十一标第三营。詹大悲和刘复基则去面晤李六如。那时《商务报》经费严重短缺,因此詹大悲和刘复基建议群治学社接办这份报纸。李六如想把《商务报》改成宣传革命的喉舌,同意他俩的建议。此后,这份报纸经常评论时事政治,严厉抨击政府的政策。它还在群治学社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联系,尽管未能促成群治学社向军外开放。

1910年初,由铁路国有问题引发的杨度事件,导致《商务报》被迫关闭。湖南省咨议局提出派遣请愿代表团赴京,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代表团抵达汉口时,支持举借铁路外债的杨度^⑦企图阻止它的进一步活动。《商务报》接连几天刊登痛斥杨度的文章。一些革命士兵邀请杨度参加宴会,希望他当众向代表团表示敬意。杨度拒绝出席宴会,结果在英租界的住宅中被人硬拉出来。英租界巡捕出面干涉,把“惹是生非者”关押了8小时。此后,印刷商为了避免麻烦,都不愿承印《商务报》。^⑧

1910年5月长沙发生了米骚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派人去湖南和四川做工作,并把军货私运给一些新军部队。后来政府控制住了长沙的局势,这项起义计划未付诸实施。但是当局早已获悉线索,立即对第三十二标进行突然搜捕,因为革命党人曾在该标策划起义计划。主要密谋者逃往上海和四川。群治学社的所有重要文件或已转移或预先烧毁,也没有人被捕。不过,革命党人不能再以群治学社的名义进行活动。1910年

9月18日，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杨王鹏被推举为社长。^⑤

振武学社的组织基础与群治学社相仿，但有一点跟所有别的革命团体都大不一样，即精心策划的干部会代表制度，由代表们组成基层组织的核心。1909年以前，革命团体无法有效地控制新军部队里形形色色的小组织。随着革命团体内部人数持续增加，很有必要形成某种组织机制。为此目的，群治学社曾作过新的尝试，首先采用代表制。后来，振武学社把代表制发展成为一项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代表由他们所在部队的普通社员推选产生，负责在各标、营、队、排、棚开展策反活动，干部会只在标一级召开。如果某一代表无法出席干部会，他所在兵营的同志代替他参加会议。意味深长的是，代表们组成了振武学社的核心，形成了一个类似总委员会的干部集团，实际上也就是决策机构。信息和决策通过各级代表，层层转达到普通成员。为了防止社员知道其他兵营的同志，严格限制革命党人在不同部队之间自行交往，^⑥ 目的在于减少泄密危险，尽管这类交往有时在所难免。

这项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一旦爆发革命，代表们可以按照干部会的指示，像军官指挥士兵那样去指挥他们所在部队的同志。^⑦ 这种指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革命士兵通常缺乏赢得其他士兵尊重的威望，也不具备军官有效展开军事行动的专门知识。所以，代表的特殊身份有助于部分解决军事指挥的问题。

深入基层组织似乎有某些列宁主义工作方法的迹象，但这种创举纯粹是为应付困难环境而因地制宜作出的对策，因为身处兵营的革命同志不可能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代表由他们所在部队的同志推选出来，使代表制含有某种“民主”色彩。所有行动小组接受“上而”的命令，使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中的”。

振武学社在1910年10月11日召开第一次各标代表会议。驻武汉的8标新军中，第三十一、三十二、八(炮兵)、四十一、四十二标的

代表出席了会议。据说,前一个月总共已吸收了240名新成员。这年年底以前,革命势力无疑已遍及大多数新军部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振武学社并不试图策反巡防营,因为巡防营对革命思想反应很冷漠。^⑨

就像下一章将要论述的那样,1901年的特点是各地爆发了一连串叛乱。因此,武昌当局加紧防范。黎元洪协统很快就发现潘康时从事颠覆活动,将潘逐出军队。接替潘康时军内职务的是黎元洪的一个亲信。他的高度警惕性导致杨王鹏、李六如和另一些革命党人被开除军籍,使振武学社的工作遭到破坏。临近年底,詹大悲编的另一份中文报《大江报》问世,风格跟已停办的《商务报》相仿。^⑩

从以上所述湖北新军中的革命运动,可以看出又一个显著特点:每次遇到挫折,革命士兵总是马上成立新的团体。他们利用清政府允许在改革过程中成立文化团体这一政策,必要时改变革命团体名称,以应付疑虑重重的政府当局,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从早期革命团体到振武学社,其间有明显的延续性,每个革命团体都比前一个革命团体有所改进。与此相仿,1911年1月30日春节那天,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文学社的章程发表在《大江报》上,佯称以探讨文学为目的。从一开始起,文学社就迅速发展成员,扩大团体的活动范围,以期成为强大的组织。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1人,下设文书部和评议部。文书部设文书4人,会计1人,庶务1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名。社员的入社金和活动经费捐助金跟振武学社相同。蒋翊武、詹大悲和刘复基分别被推举为社长、文书部长和评议部长。副社长一职暂时空缺,待文学社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再推举。^⑪

蒋翊武、詹大悲和刘复基3人地位上升,是因为文学社前身振武学社的领导人或被开除军籍,或处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蒋翊武

曾一度负责过振武学社，已被证明是一位能干的领导人。刘复基是蒋翊武的好朋友，一年前他到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当兵以来，待人接物方面精细老练，持重得体，在士兵中声誉鹊起。^②

詹大悲是文人，从没当过兵，他取得地位，颇令人感兴趣。他被推选为文书部长，表明文学社并不墨守只有军人才能加入革命团体的陈规，也反映出文学社更加倚重于詹大悲的《大江报》，实际上把《大江报》当作团体的喉舌。要强化革命宣传，詹大悲是最佳人选。《大江报》调整方向，注重时事政治，调子变得更加激进，还时常揭露新军军官的腐败以及军官对士兵的虐待。在文学社资助下，《大江报》免费分发给所有感兴趣的士兵，越来越受到欢迎，以致被视为反对官僚腐败最强有力的武器。^③

文学社的进展颇为可观。不到2个月时间，加入文学社的士兵几乎遍及湖北新军每一支部队。1911年3月15日举行首次标代表会议，代表来自第二十九、三十一、八（炮兵）、四十一和四十二标，另一些代表来自第八工程营、宪兵部队和军需部门等不以标为建制的单位。明显的进展使推选副会长有了正当理由。结果王宪章当选。他在满人占优势的第三十标里任排长。与此同时，第四十一标士兵章裕昆奉命对革命力量尚来建组起来的第八马队标进行渗透策反。^④

在继续吸收社员的问题上，围绕是否要减轻社员交费义务展开了辩论。章裕昆提出普通成员不必交费，但在社里担任职务的人应该捐助经费。他争辩道，许多对文学社感兴趣的士兵犹豫彷徨，不敢入社，是因为他们军饷微薄，还要养家活口。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尽管刘复基以可能引起经费困难为由表示反对。结果，社员人被大幅度增加，不少社员在力所能及时继续交费。不过，刘复基的担忧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文学社不久就面临着严重的经费问题。

1911年4月广州起义以后，湖北当局禁止举行标代表会议，以

防不测。刘复基唯恐社员之间的交往中断，辞去军职，住进武昌城内，以便通过经常的访问，与各支部队保持联系。即使处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5月10日又召开了另一次标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武昌设立文学社总机关，增设总务部，张廷辅任部长。^⑤

第三次代表会议在6月1日举行。根据第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提议，会议决定在汉口和汉阳设立分机关。第四十二标下辖3个营。第一营驻守在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附近。第二营和标机关一起，在汉口火车站外面。第三营沿京汉铁路分散驻扎在汉口北面各军事据点。胡玉珍当选为阳夏（汉阳和汉口）分机关负责人，一名副手协助他工作。^⑥

长江和汉水将武汉分割成3个城区，文学社阳夏分机关在三地革命党人之间建立起有益的联系。阳夏分机关与文学社总机关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由于阳夏分机关活动范围较小（仅局限于1个标），不论哪一级代表每周都到分机关所在地聚会一次。经费方面，分机关所辖社员根据军饷多少交纳“规费”，还有特殊情况下交纳的“特别捐助”。这些经费都存入分机关。只有担任职务者的月费交给武昌总机关，这份月费所占比例不高。^⑦

文学社取得成功的程度可以由迅速增长的社员人数来衡量。文学社在1911年1月份成立时有800名社员^⑧，8月份增加到3000人至5000人^⑨，或者说占武汉驻军全部人数的30%左右。由于那时若干军外小型文化团体并入文学社，有些平民也成为社员。当革命运动发展到没有必要将平民排除在外的阶段，这些合并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如此，文学社仍然是军人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它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推翻清皇朝。作为行使暴力的人，革命士兵对政治教条不感兴趣，因此几乎不讨论政治改革和社会演变。意识到自己扮演的是行使暴力的角色，他们认为建立新式政府应该由军外人士领导，属于同盟会的责任范围。^⑩

四、革命团体的联合

除了已论述的一系列革命团体，还有以共进会为代表的另一类湖北革命运动。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努力，而且在武昌起义前夕联合起来，对辛亥革命的开始阶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已在其他文章里论证了共进会的历史^④，因此在这里只集中论述具有明显策反军队色彩的部分，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像其他革命团体那样，共进会反对满清政权具有种族观念和政治思想双重因素。共进会从同盟会分离出来，别立门户，它也把会党看成武装暴动的重要工具。不过，共进会对武装暴动策略所持的见解与同盟会不同，倾向于把会党作为跟军队建立起联系的渠道。共进会最早发起人之一是这样回顾早期制定策略的一次会议的：

各部意见以为共进会宗旨系在推翻清朝政权。想推翻清朝政权，必先联络各处军队的力量，组织各党各派的团结。因为军队分子多数是各党各派的分子，故欲从军队入手，又必须从各党各派入手，欲从各党各派入手，必仿照其仪式^⑤。

尽管共进会派人去广东和广西开展活动，但它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实际上，只是在湖北，这个团体才发展成为有重要意义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孙武^⑥，1908年下半年从日本回国，设法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总部，并在上海、武昌、宜昌、岳州和长沙等地建立通讯机关或分会组织。共进会的新成员大多是会党分子，主要来自哥老会，编为5个镇，分散在湖北各地，以孙武为军务部长。^⑦

共进会成立之初，没有全力鼓动会党分子去策反新军。即使把孙武的作用考虑进去，会党还是秘密社会自身的一种武装力量。

直到1909年夏华中发生几起暴动，才迫使孙武重新估价会党的革命潜力。那年7月，长沙哥老会发起早熟的暴动。8月，孙武管辖的会党武装第二、四镇未经他同意便采取行动，而且第四镇变得极难驾驭，后来只好将它解散。与此同时，华南三合会举行暴动，当地部分共进会武装力量也行动起来，结果暴露出组织和纪律状况同样糟糕。10月，广西计划举行暴动，请孙武前往指挥，但他尚未抵达广西，起义已经爆发并惨然失败。这使他明白了会党不是可靠的同盟军。孙武一回到湖北，立即转向新军。湖北的朋友们告诉他，策反新军的工作早已开展，进行得很顺利。

孙武转变策略，使共进会产生新的特色，这反映在共进会策反驻武昌新军第三十二标的具体实践中。新军第三十二标有共进会的《秘密规约》^①，阐述其斗争是“以昭雪国耻，恢复汉业为宗旨”。共进会声称以军界为主体，但学商各界人士也可入会。由各支部队推举产生的革命代表负责推行政策，更重要的是，一旦爆发革命，他们就担当起指挥职责。代表们还有权审定申请入会者。凡经会员3人以上切实介绍入会者，必须自立盟书，声明自己的志向，并誓守一切会规。各代表有责任为共进会捐款，普通会员酌量随时纳捐。普通会员的义务是介绍新同志入会，酌情捐助经费，严守活动秘密。一般会议由标代表主持，所有会员都可以参加，而且有充分的辩论权。特别会议出席的对象酌情而定，但会议纪要的内容要传达到所有未参加会议的会员。此外，还有对会员的奖惩条款。

对外事务方面，共进会愿与其他革命团体合作。需要跟其他革命团体联系或交换观点时，共进会尽可能随时派出代表。受环境限制而需要书面联系时，必须用隐语写信、专人面呈。会员之间的书信往来，不准涉及秘密事务。只有遇到特殊情形才用密信，先经代表检查，再由专人送交，看后烧掉。

关于吸收新会员，《秘密规约》规定，老会员只能发展亲密的朋友。有些会员接受观察当局动向的特别任务，必须定期向共进会汇报。普通报告交给最接近代表的会员，由他们转交给代表。特别报告则由执行任务者亲手交给代表，以确保安全。当会员在执行任务时身陷险境，他应该作好自我牺牲的准备。共进会方面，则尽一切努力解救他。如果他不幸牺牲，共进会替他办丧事并赡养他的家属。

所有这些规约都证明，共进会是以振武学社为楷模，精心组织起来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共进会吸收会员时，平民与军人兼收并容。二是共进会主张所有会员都参加会议，至少同一标里的会员要一起开会。全体会员参加决策过程，而没有振武学社标级干部会那样的内部核心组织。

在吸收新会员之前，共进会也采用换帖结义的方式，先进行试探性接触。每个新会员被告知，不得对父母、妻子、子女以及亲戚等一切人泄露活动情况。^④某些兵营误以为孙武是孙逸仙的胞弟，增强了共进会的感召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1911年5月，共进会有1700名会员，同年8月就增加到2000人左右。^⑤

1911年4月广州起义流产后，湖北的革命党人比以往更相信，长江中游地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地革命团体必须马上从相互竞争转向协力战斗。于是，共进会在5月举行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与文学社联合。^⑥

这两个团体领导人员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差别很大。文学社的领导人大多是受过地方教育的湖南籍人，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跟湖北以外的革命团体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另一方面，共进会的领导人是湖北籍人，曾在日本受过教育或生活过，而且对其他省份的情况变化比较了解。因此，文学社领导人对归国留学生心怀疑虑，唯恐双方力量一旦联合，他们自己会上当受骗。例如，蒋翊

武觉得共进会头面人物计谋多端,骄傲自大,看不起文学社。而且,文学社是独立自主的组织,由出身微寒的士兵负责。共进会的领导人物则出身于较富裕的家庭。^⑩

一般说来,两个团体的普通成员并不特别在乎自己属于哪一个组织。他们都是当地人,成长的环境大同小异,因此形成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他们不在乎加入哪个团体。实际上,不少人既是文学社社员,又是共进会会员,根本不知道两者有何区别。^⑪

双方领导人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维系双方的凝聚力尽管不很强大,还是使他们结合起来,增进了同志般的友谊与诚意。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是共同的愿望,此后就成为双方商谈中压倒一切的主题。紧迫感与日俱增,至少促使他们暂时摒弃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的猜疑,从而使双方联合起来。

9月14日两个团体正式联合,总共有五六千名革命军人,或者说至少占湖北全部新军的三分之一。^⑫另三分之一军人属于骑墙派,其余的看来仍然忠于清政府。^⑬

领导机关合并的过程进行得相当顺利,成立了军事筹备处和政治筹备处。^⑭约瑟夫·法斯指出,文学社在军事方面享有较大权力,因为文学社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共进会则由于一些平民领导人跟同盟会有联系,在政治筹备处处于支配地位。^⑮

最后一点,湖北革命团体的经费自给,具有较大独立性。他们主要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跟同盟会的关系很松散。^⑯这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分散的特性。这种特点虽然可以说是弱点,但又构成武昌起义的基本条件,成为一场成功革命的导火线。

五、湖北新军滋长不满情绪

革命势力在新军中发展,不完全是革命党人工作的结果。如

果没有1910年以后新军中普遍滋长的不满情绪，无论文学社还是共进会都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设在武昌的湖广总督一职先后由2名满员出任，1910年端方在位，此后是瑞澂。他俩没有及时向清廷奏报革命运动的蛛丝马迹。端方是一个腐败的官员，不具备前任张之洞那样的谋略和才干，军人们对他毫不敬畏。^⑩瑞澂虽然能力强些，但处在财政困难时期，统治已经面临灾难。

1910年10月是湖北新军的多事之秋。第八马队标开小差的达90人之多，而且无法有效地填补缺额。军中实施严酷的体罚。某标一个士兵被发现在兵营里赌博，被一名军官鞭打至死。这件事马上激起士兵们强烈不满。另一起事件是，一个士兵未获允准外出一天，被杖责一千下，后来他枪杀了下令惩罚他的官员。^⑪

军队时常被调离武汉，用来协助平息湖北别的地区或其他省的暴乱和骚动。军人普遍厌恶干这类事，从而导致士气低落、纪律败坏和开小差。许多军人沉湎于赌博，还有些军人在妓院里惹是生非，有时与巡警发生冲突。^⑫他们还担心被调到俄国人占领的东三省去。东北的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任何从华中去那儿的人都不适应寒冷的气候和反差太大的生活环境。1911年3月，第三十一标的士兵听到要调往东北的传说，开始恐慌不安，不少人开了小差。第四十一标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军官担心发生更多开小差事件。虽然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有些军官本身也害怕调动，感到忐忑不安。^⑬仅3月份1个月里，各部队上报的逃兵数就达254人。^⑭

9月四川发生动乱，使湖北新军开小差的继续上升。大量湖北部队开赴四川，留守湖北的部队里不少人找各种借口请假，另一些人干脆不辞而别。^⑮每一个营都有逃兵。当局在那个月里招募兵员，但未能补满缺额。结果，军事当局被迫不考虑应募人员的出生地，只要视力正常，身体合格，就一概收下。^⑯虽然作了所有这些

努力,开小差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新军军费预算占湖北省开支50—60%,省里经费支绌加剧了军人的不满。^⑭1910年初就传说要削减所有武昌驻军的俸饷,但官方予以否认。^⑮临近年底,武昌政府宣布削减新军各项开销,总数达559614两银。^⑯汉口的中文报也报道湖北财政窘迫,必须削减各级军官的俸银。军人对削减俸饷不满而开小差,有的空手溜出兵营,有的携带武器出走。^⑰

1911年,当局已经不可能给官兵发放足额的俸饷,于5月宣布各级军官俸银减少40%。^⑱士兵饷银减去多少不很清楚,大约20—30%。^⑲按原计划要扩充为一镇兵力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欠发俸饷好几个月。为了给新军军饷开辟财源,当局限令湖北省全部绿营军在7月以前遣散。行政管理、教育及公共工程等各项经费也大幅度削减,因为清政府认识到减扣新军的俸饷是十分危险的。^⑳新军的俸饷最后还是减扣了,这表明财政形势很严峻,军事当局中的地位也不稳固。

在米价上涨的岁月里,士兵即使领取足额饷银,还是不敷需用。1910年至1911年,到处发生自然灾害,洪水泛滥,蝗灾和时疫横行,使农作物遭受极大损害,给民众带来无穷的苦难。下一章将进一步阐述这些灾情及其后果。要养家活口的士兵自然站在贫苦民众一边,表达他们的不满。

这时,官兵关系也很糟糕。不少军官取得职位,靠的是私人关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功绩。这些军官生活奢华铺张,腐化堕落,而且还虐待士兵。1911年8月,辎重营的12名士兵袭击第八马队标统带喻化龙的住宅,但没有找到他,于是就伤害他的母亲,强奸了他的老婆,还掠走大量黄金。其中6名士兵后来被捕,他们都承认,因为受了喻化龙的虐待,想杀死他。9月,一名愤怒的士兵枪杀了虐待他的长官。^㉑

财政形势恶化,腐败现象随之增加,提升军职与购买军火过程中,更是弊端丛生。初等军事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极少有机会升到排长以上的职务,他们由此产生的怨恨已蓄积长久。大多数士兵实际上一直没有提升过,以后也没有指望。^⑤ 财政困难加上腐败成风,使得按步就班的升迁已经不再可能。此外,士兵的军饷普遍被军官贪污中饱,各项经费减扣中也包含贪污因素在内。

1911年4月,《大江报》揭露第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麟的贪污腐化行为。李襄麟勃然大怒,收买了一个小流氓,企图谋杀调查他腐败行径的记者。但《大江报》接连几天仍然攻击他,使当地民众大为震动,以致当局被迫下令彻查,结果撤去了李襄麟的职务。^⑥

从此以后,《大江报》深受士兵们的欢迎,而腐败军官则“畏之如虎”。7月26日,《大江报》登载何海鸣撰写的煽动性社论,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8月1日,《大江报》主编兼发行人詹大悲和几个报社同仁一起被捕,《大江报》被迫停办。在汉口商人和慈善机关的支持下,地方报纸抗议总督的高压措施。据报道,省咨议局准备向总督提交请愿书,并威胁道,如果不宣布詹大悲无罪,省咨议局将自行解散。^⑦ 几天以后,何海鸣也遭到逮捕。但是,省咨议局没有为这件事提交请愿书。

过了几星期,另一份跟革命党人没有瓜葛的地方报纸《夏报》详细报道了第三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萧国斌的腐败行为,并刊登许多受过他虐待的士兵写给报社编辑的匿名信。萧国斌以诽谤罪控告《夏报》。但在法庭审理这件案子之前,《夏报》主编彭希民被诱骗到一个地方,遭到一伙据信受萧国斌指使的军人的毒打。此后,彭希民被扣押在刑堂,冠以诽谤罪。萧国斌的横蛮行径激起地方民众的强烈抗议,总督瑞澂只得命令兵备处惩办他。由于萧国斌是铁忠的心腹,而铁忠与兵备处总办有关系,结果萧国斌没有受到

处罚。^①

由于张彪将军决不是一个“廉洁”的指挥官，这种局面就复杂化了。他被指控为私吞 100 万两银，这笔款项原定用于购置军装、军用被褥和医疗设施等物。据报道，他获取的赃款大多用于购置房屋地产，并由此成为两湖地区最大的地主。^②

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对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的状况概括如下：

大量迹象表明，第八镇的军纪已经败坏透顶，士兵不满情绪相当严重。两个月以来，当地报纸连续不断地报道军人滋事哗变、反抗长官、大量开小差、受到虐待与过分的惩处，以及军官侵吞公款等各类事件……当局并不否认这些令人忧虑的情形，也不掩饰他们对局势感到焦急，对军队里出现革命党人感到恐惧。^③

显然，如果没有新军中普遍的不满情绪，如果没有这种不满情绪为革命宣传畅开方便之门，湖北革命党人就无法获得那么大的支持力量。加入革命团体的军人未必是共和事业的狂热信徒。他们满腹牢骚，但又充满期望，似乎推翻了清皇朝，一切都能如愿以偿。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社会发生某种变化。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队里创造出不满现状的情绪，而是利用军人不满情绪，推波助澜，使之达到顶点。归根结底，革命党人的影响和军队中的怨愤汇聚起来的合力，逐渐毁坏了这架军事机器。

注释：

- ① 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57—158页。但我并不赞同埃斯里克以下观点，即湖北军内的策反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时期的革命活动相比”，并没有“显著区别”。
- ②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280—281页。
- ③ 赵尔巽等编著：《清史稿》兵3，第9页。
- ④ 参阅本书第3章内表5、表5。

- ⑤ 引自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104页，案卷号2106/2—5。
- ⑥ 同⑤，第152—156页。
- ⑦ FO371/214，柯乐乐撰写的《关于第八、十一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5月13日致格雷的第221号文件中。
- ⑧ 同⑦，第208—209、208页。
- ⑨ FO371/635，柯林斯上尉撰写的《第8镇部队札记》，附在朱尔典1909年3月9日致格雷的第106号文件中。
- ⑩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424—425页。
- ⑪ FO371/39，A·G·少校撰写的《汉阳兵工厂备忘录》，附在康乃吉1906年8月4日致格雷的第326号文件中。
- ⑫ 陈夔龙：《庸盦尚书奏议》，第9卷，第13页。
- ⑬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2页。
- ⑭ 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45页。
- ⑮ 同⑭，第43页。
- ⑯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56页。
- ⑰ 同⑯，第281页。
- ⑱ 例见，同⑱；《民立报》，1911年9月2日，第4版。
- ⑲ 1908年亨利·伦纳德上尉把张彪描写为，“……如果发生战争或动乱，这位人物将在中国的军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看上去约52岁，有一张极像日本人的脸，人很精瘦，而不像那些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往往长成圆胖身材。他在日本呆过不少时间，举止从容而有尊严。”参阅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1900—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206—207页，案卷号2106/2—5。
- ⑳ 参阅下文。
- ㉑ 同㉑，第9、24页。
- ㉒ 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军官全部名册，参阅胡瑛云：《开国战史》，表10和表11及该书21页有关内容。
- ㉓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70卷，第4页。
- ㉔ 同上，第55卷，第11—12页。
- ㉕ 《张文襄公全集·电牍》第68卷，第11、15页。
- ㉖ 对这次起义的不同解释，参阅E·琼·斯密特：《自立会——一些中国人及他们的反叛》，见《中国论丛》第7期(1958年12月)，第51—63页；冯兆基：《唐才常起义》，见《远东史学论丛》第1期(1970年3月)，第70—114页；同⑱，第28—33页；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见吴湘相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卷，第41—160页。查尔顿·M·刘易斯的近期著作有力地刻划了这么一种模式，保守的文人学士、知识界的急进改革者及秘密团体为改革利益走到一起来，但在如何发动革命问题上意见分歧，又分裂成不同营垒。参阅他写的《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观念和制度的转变(1891—1907)》，第83—109页。并参阅丹尼尔·H·贝斯：《中国进入20世纪——一张之洞与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第78—91页。
- ㉗ 参阅哈罗德·Z·斯钦夫林：《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源起》第4章；刘吉祥：《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第3章。

- ⑳ 《苏报》，1903年2月23日，4月11日；《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第3页。
- ㉑ 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第2卷，第476—477页。
- ㉒ 哈罗德·Z·斯钦夫林：《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源起》，第260—262页；刘吉祥：《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第26—27页。
- ㉓ 《苏报》，1903年5月21日，31日；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卷，第113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6—107页。
- ㉔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卷，第113—114页；朱炎佳：《吴禄贞与中国革命》，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辑，第166—167页。
- ㉕ 丹尼尔·H·贝斯：《中国进入20世纪——张之洞与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第147—148页；欧内斯特·P·扬：《改革家如同谋叛者》，见阿伯特·费尔惠克等编：《中国近代史探讨》，第251—254页。
- ㉖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第181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3—4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0—11页。
- ㉗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卷，第113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3—4页。
- ㉘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4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页。
- ㉙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62页。
- ㉚ 宋教仁情况，参阅刘吉祥：《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第8—9页。吕大森、曹亚伯和朱子龙的情况，参阅注⑳，第58、64—65页。
- ㉛ 同⑳，第55—57页，其中有成员名单。
- ㉜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卷，第553—554页。例如，宋教仁即有关成员之一。
- ㉝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1卷，自叙，第3—4页。
- ㉞ 同⑳，第56、65页。
- ㉟ 同⑳，第55—56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5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12页；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20—21页。
- ㊱ 留欧湖北籍学生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为1905年建立同盟会欧洲支部作出很大贡献。参阅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卷，第115—120页。
- ㊲ 《张文襄公全集·公牍》第21卷，第1—13页。
- ㊳ FO405/157，《总领事金璋致萨道义》，附在萨道义1905年12月26日致格雷的第452号文件。
- ㊴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卷，第34页；由于刘静庵从未到过日本，看来他肯定是在武昌加入同盟会的，并将入会宣誓寄到东京。
- ㊵ 同⑳，第73—77页；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卷，第64—65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卷，第52—66页。
- ㊶ 杨铎：《武昌革命真史之商榷》，见《江苏博物馆月刊》第2辑第1期，第5—6页。
- ㊷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1卷，第13—14页。
- ㊸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76—77页。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1卷第10页，有5名评议员，但不清楚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 ㊹ 关于成员名录，参阅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9—72页。
- ㊺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77页。有两名作者断言日知会在策反军队过程中倚重军官而忽视士兵，这种说法是不合实情的。参阅李春堂：《辛亥首义记事本末》，见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卷，第112页；熊秉坤：《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局促》，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

- 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263页。李春萱和熊秉坤都不是日知会成员，他们的记叙是成问题的。我集中手头所有资料，仅仅发现6名军官加入日知会，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人担任日知会干部。
- ⑤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78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6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2页。
- ⑥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卷，第75—78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卷，第195—196页。
- ⑦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1卷，第130页。
- ⑧ 同⑦，第135—136页。
- ⑨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卷，第11—12页；J·金姆·芒森莱特：《法国人失败的交往》，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2年11月第1期），第77—95页，86页的内容最有参考价值；同⑨，第82页。
- ⑩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卷，第11页。
- ⑪ 有关这次起义的记叙，参阅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卷，第461—536页；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58—65页。
- ⑫ 其余被捕者是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和殷子衡。
- ⑬ 同⑫，第147—148页；同⑬，第17—27页。
- ⑭ FO371/223，《总领事霍必兰致朱尔典》，附在朱尔典1907年1月7日致格雷的第9号文件。
- ⑮ 同⑭，第130页。
- ⑯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77页。
- ⑰ FO371/220，报纸摘要，附在上海卡内门公司1907年4月29日致格雷的文件中。
- ⑱ FO371/220，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中国动荡的备忘录》，附在朱尔典1907年5月2日致格雷的第211号文件中。
- ⑲ FO371/220，《来自芜湖的情报摘要》，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22日致格雷的第343号文件中。
- ⑳ 这些起义的有关细节，参阅郑谢利：《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及财政（1905—1912）》，未刊博士论文，第220—239页。
- ㉑ 同⑳，第142页。
- ㉒ 同㉑，第3卷，第23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8—9页；同㉒，第63、100页。
- ㉓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205—206、209页；陈夔龙：《庸盦尚书奏议》第9卷，第7—8页。
- ㉔ 同㉓，第145—146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4—5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9页。
- ㉕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第143—146页。
- ㉖ 同㉕，第147—149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7—8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10页。
- ㉗ 1970年1月，在台北万耀煌家里我采访了他。万耀煌，湖北人，曾是群治学社组织者之一。1908年他在武昌入伍时曾用名万奇。民国时期，他出任过若干高级军职，抗日战争后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赴台湾，并任党务顾问和革命实践研究院负责人。
- ㉘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118页。

- ⑬ 同上,第3卷,第35—36页;同⑩,第147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9—10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10页。
- ⑭ 同⑩,第1卷,第303页;同⑭,第158—159页。
- ⑮ 同⑭,第158—169页;同⑩,第2卷,第47—49页。
- ⑯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7—18页。
- ⑰ 同⑰,第166—167页。
- ⑱ 同⑰,第262—263页;同⑩,第10页。
- ⑲ 杨度(1875—1931)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都不喜欢的神秘人物。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似乎赞同革命,到1905年却又宣称拥护君主立宪制,但他从来没有同不信任他的立宪派人士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1908年他又成为负责预备立宪的第四号高级官员。1911年,他成为隶属于皇族内阁的统计局负责官员。参阅吴湘相:《民国政治人物》第1卷,第69—85页。
- ⑳ 同⑱,第12页;同⑱,第163—171页。
- ㉑ 同⑱,第12—15页;同⑱,第152—153页。
- ㉒ 曾省三:《武昌首义之原起》,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55/7;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第2卷,第433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266页。
- ㉓ 同⑱,第155页。
- ㉔ 同⑱,第16页;同⑱,第303页。
- ㉕ 同⑱,第17页。
- ㉖ 同⑱,第18—21页。
- ㉗ 同⑱,第235页。
- ㉘ 同⑱,第11页。
- ㉙ 同⑱,第22—23页。
- ㉚ 同⑱,第23—24页。
- ㉛ 同⑱,第2卷,第17—21页;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4卷,第62—63页。
- ㉜ 同⑱,第26页。
- ㉝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卷,第4页;《民立报》,1912年10月7日,第3版;1912年10月8日,第3版。
- ㉞ 据以上资料,文学社人数在8、9月间达到3000人。章裕昆在《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7页把8月份人数高估为5000人。由于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的正式文件大多被烧毁,因此人数无法证实,难以讲清这些数字有多少可靠性。但是,考虑到文学社深入细致的活动,成员达到3000人之说还是可以相信的,而章裕昆估计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 ㉟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14页。
- ㊱ 冯兆基:《晚清革命团体共进会》见《东方研究杂志》第11卷第2期(1973年7月),第193—206页;并参阅刘吉祥:《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第74—76页。最近的论述见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53—158页。
- ㊲ 邓文翠:《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见《近代史资料》第3期(1956年3月),第16—17页。
- ㊳ 孙武,湖北人,毕业于武昌武备学堂。他任低级军官不久,即于1900年去湖南任军

事教习，很快被提升为岳州驻军的营管带，并在那里参与了唐才常起义。此后，他用了化名，逃往广东，又转赴广西。1904年他返回湖北，而后去日本学习海军课程，1906年回到武昌，第二年他再次赴日之前，去东三省和香港，研究那里的革命形势。参阅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89—190页。

- ⑮ 同⑮，第503—505页；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4卷，第13—14页。
- ⑯ 这些规约记载在林岳等1913年编的《前三十二标革命实录》，国民党档案馆藏。规约复印件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125—126页，文件中还有标代表李承牧在1908年末的签名。但这个日期是错的，因为直到1909年孙武才开始有计划地策反新军。此外，孙武尽管不是这支新军部队的成员，却被推选为第三十二标共进会总监，注意到这点也是很有意义的。
- ⑰ 同⑮，第3、15页。
- ⑱ 同⑮，第93、121页。文中所列各种数字还是证据不足的。但是，既然文学社拥有3000或3000名以上成员看来是可信的，那么假定共进会有2000名左右会员也是合乎情理的。
- ⑲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4—37页。会议还通过另外3条决议：由于当局在武汉已作了防范，因此星期天的所有会议将取消，武汉所有秘密团体的基层组织暂停活动；湖北和湖南将起革命带头作用，并在起义爆发这天互相支援；武昌的新军将作为发动起义的革命中坚力量。
- ⑳ 同⑮，第71页；蔡寄鸥：《鄂州血史》，第56页。
- ㉑ 同⑮，第93页。
- ㉒ 据《清史稿》兵3，第9页，1910年湖北官兵共16104人。我查阅过的大部分二手资料，把1911年的武汉官兵估计为1.5万人左右。
- ㉓ 这种说法有多种资料为依据，特别是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77—80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268—269页。
- ㉔ 同⑮，第23—29页。
- ㉕ 约瑟夫·法斯：《湖北省革命运动与辛亥武昌起义》，见《东方文库》第30期（1961年），第138页。
- ㉖ 参阅冯兆基：《晚清革命团体共进会》，见《东方研究杂志》第11卷第2期（1972年7月），第200—201页；冯兆基：《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见《中国研究会学报》第7卷第2期（1974年），第487—493页。周锡瑞有类似见解，参阅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43页。
- ㉗ 刘周生：《世载堂杂忆》，第55—59页。
- ㉘ 《民立报》，1910年10月19日，第3版；10月20日，第2版；10月25日，第3版；11月22日，第4版。
- ㉙ 《民立报》，1911年3月24日，第4版；6月25日，第4版。
- ㉚ 《民立报》，1911年3月29日，第4版；FO228/1301，《1911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葛福1911年4月14日的专件中。
- ㉛ 《民立报》，1911年3月26日，第4版。另一份资料认为开小差人数是261人；参阅FO228/1301，葛福1911年5月4日致朱尔典的第46号文件。
- ㉜ FO228/1802，葛福1911年10月9日致朱尔典的第94号文件。

- ⑮ 《民立报》，1911年10月3日，第4版。
- ⑯ 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13页。
- ⑰ FO371/863，李德立撰写的《中国政治形势备忘录》，附在卡内门公司1910年3月2日致外交部的文件中；FO228/1761，《1909年第四季度情报》，附在法磊斯1910年1月14日专件中；以及法磊斯1910年7月5日致朱尔典的第73号文件。
- ⑱ 《民立报》，1910年12月24日，第4版。
- ⑲ FO371/867，《1910年第三季度领事馆情报述要》，附在麻木勒1910年11月24日致格雷的第428号文件中；FO223/1301，葛福1911年3月6日致朱尔典的第22号文件。
- ⑳ 《民立报》，1911年5月9日，第4版。
- ㉑ 同⑳，第163页。
- ㉒ 同⑳；《民立报》，1911年7月10日，第4版。
- ㉓ 《民立报》，1911年8月31日，第4版；9月7日，第4版；10月10日，第4版。
- ㉔ 同⑳，第1卷，第506页。
- ㉕ 《民立报》，1911年4月25日，第4版；5月31日，第4版；6月6日，第4版。
- ㉖ 同⑳，第27—28页；《民立报》，1911年8月5日，第3版；9日，第4版；11日，第4版；18日，第4版；23日，第4版；24日，第4版。
- ㉗ 《民立报》，1911年3月8日，第4版；18日，第4版；27日，第4版；28日，第4版。
- ㉘ 《民立报》，1911年9月2日，第4版。
- ㉙ FO228/1302，《1911年3、9月份情报》，附在葛福1911年10月5日的专件中。

第六章

大江南北的其他军队

由于革命党人在驻武汉新军中的力量异常强大，湖北的情形成了特例。其他地区革命党人策反军队的活动效果相对差些，给人的印象也不那么深刻。这并不是说湖北以外的军队没有明显的怨愤情绪，而是要说明这种对现状的不满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革命党人的策反活动并不是主要的。结果是相同的：军队最终不再支持清皇朝。

本章考察大江南北其他军队不满现状的情形，那里的革命形势在 1910 年前后变化多端，而且富有爆炸性。本章论述这一地区形势时，主要着墨于财政状况、自然灾害和动荡的局势。

一、财政危机

辛亥革命前，全国财政一片混乱。中央与行省的库存银两都不足以使收支达到平衡。政府正在实施改革计划，把大量钱财用于一系列改革，在防务与教育方面的花费特别大。许多公用事业规划因资金短缺暂缓实施。各类日用品价格上涨，造成铜钱贬值，人民日益贫困。到处设立新的税收项目，原有的税收项目则增加税额。然而，由于官员中饱私囊及征收赋税过程中的耗费，只有一小部分的税款进入国库。国家税收制度若不作必要的整顿改革。

清政府就无法有效地增加岁入。

可以引证大量实例说明财政状况的混乱。在上海，两名地方官员因财政赤字被迫于1910年初自杀，尽管赤字不是他们的失职造成的。^①在四川，禁止种植罂粟使省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混乱，以致某一地区赋税过重，迫使一些体面人家也出卖他们的女儿。^②在湖北，银锭被非法装运到西部地区进行鸦片投机贸易，使本省商业受到影响。土地买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流通中的纸币大大贬值，但是，无担保纸币的印发仍未受到制止，而财政金融机构又拒绝纸币兑换硬币。^③

1910年春，上海掀起震动市面的橡皮股票风潮*，全国各地的钱庄、银号以及洋行展开了疯狂的投机。不幸的是，同年仲夏橡皮股票风潮骗局露底。钱庄、银号持有大量记在政府存款帐户上的不值钱股票，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以致几个月后股市暴跌，造成金融大危机。接踵而至的是钱庄、银行纷纷破产，金融恐慌，市面大乱。后来，在西方外交使团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撤回向钱庄、银号提取存款的成命，局面才趋于缓和。^④但是，这场危机产生的冲击力，影响到每个通商口岸。上海本身首当其冲，南京、汉口、汕头、广州和天津也受严重影响。仅汉口一地就倒闭了几十家工厂和公司，对内对外贸易都跌入低谷。^⑤

1910年底，湖北面临预算赤字300万两银的困境，省政府被迫向几家钱庄借银200万两。^⑥尽管有了这笔借款，第二年初省财政赤字还是高达200万两银。即便大幅度削减开支并严行节俭，仍然不能使收支平衡。为了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有所保证，湖北省增收附加税。平民百姓怨声载道，商人也抗议强征印花税，并威胁要

* 本世纪初，西方冒险家谎称集资开发南洋橡胶树种植园，购股者必获厚利。1910年3月起，上海橡皮股票狂涨。7月初，麦边等投机商人卷股款潜逃，股票成为废纸，引发全国金融危机。详见《旧上海社会百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54页。

以总罢市作为最后斗争手段。^⑦新成立的省谘议局不懂得必须节约办事才能顺应民情,仍在提倡兴办教育、发展交运通讯等耗资巨大的计划,而不考虑库存银两早已不敷使用,这就使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了。^⑧

湖南省 1911 年财政预算赤字超过 500 万两银,其中一二百万两的额外开支用于前一年平息骚乱、赔款和救灾。^⑨省政府有许多规划,却极少考虑财政状况是否许可。每年教育经费约需四五十万两银,但实际上只能得到 10 万两银。巡警经费预算为 20 万两银,只领到计划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新军一项就要花费一二百万两银。临时禁运反而造成粮食走私,使税收大大减少。统计数字表明,厘金和其他税源或照原额征收,或收不足额。^⑩

浙江省到 1910 年底赤字远远超出 70 万两银^⑪,到 1911 年 6 月赤字已逾 100 万两银,而省库还负债 50 万两银,主要是与各类银行的纠葛,以及盐道、粮道和厘金局拖欠应交税款。此外,需解送中央政府的 82 万两银还没有着落。^⑫

北京和地方当局都不得不举借外债来维持其统治机制。有些是直接借款,即向外国银行和洋行举借款项,得到北京的许可和担保。其他是范围广泛的间接借款,即相对外债而言的所谓国内借款,方式之一就是发行债券。1910 年,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借内债 1000 余万两银。中国的信誉还是不错的,一直接期偿付外债。但连续举借巨额债款,加上它没有能力整顿改革财政税务制度,也无法通过开发自然资源来增加国库收入,因此危机四伏,即将“陷入巨大的灾难,使外国牢牢控制住中国经济命脉。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为阻止这种局面的产生,一直在作艰苦的奋争。”^⑬

入不敷出、财源枯竭,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的现象。就有关新军的情况而言,长江流域各省财政困难的程度,总体看来要比中国北方和南方严重。到 1910 年,北洋军队非但已经编练得相

当不错，而且军费来源比直隶和东三省以外的驻军要充足。除了云南和广东的部队，南方各省新军的发展就迟缓多了，而且其规模、素质和训练状况都及不上中国中部和北方的新式军队。因此，财政困难对南方造成的压力比长江地区轻些。长江地区的新军已经难以维持现有的水平，至于有些省的文武官员希望扩展军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削减军费自然会使士气低落，何况这一时期水灾和饥荒频繁发生，军人处境更加艰难，这就是下一节要论述的内容。

二、水灾、饥荒和骚动

辛亥革命以前，连续两年发生严重水灾，加剧了长江流域的财政困难。1910年2月以来，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雨水特别多。这年年中，江苏北部和安徽的大片土地被淹没。东至大运河，西、南到淮河和葛河，这一地区灾情最为严重。1.97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秋粮作物颗粒无收，只有半数麦田可以播种第二年春粮。成群结队饥饿的难民一路乞讨南下，流落到镇江、九江和芜湖等地。军队被调派到受灾地区维持秩序，镇压盗匪。^⑭

在安徽省，洪水冲垮40万幢房屋，使25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50万人死于饥寒和瘟疫，20万人沦为盗匪。^⑮1910年9月和10月，湖北省从沙市到沔阳，当阳的低洼地区一片汪洋，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⑯

1911年初，南京和镇江到处可见来自饥荒地区的穷苦难民。仅南京一地，靠慈善团体和政府救济才得以苟延残喘的难民就有5万至10万人。那里的米商对难民无动于衷。4月至6月之间，约6万人死于斑疹伤寒和热病，另一种致命的时疫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⑰

接着发生的情况更为悲惨。6、7月份连降暴雨，使长江水位升到异乎寻常的高度。9月12日，武汉水位标记测出的水位达9.27米，创历史最高纪录。整个地区变成巨大的内陆湖，成千上万的难民被迫挤到任何一块高出水面的孤岛上。^⑧上海到汉口之间千里赤贫，满目凄凉，被描写为“惨不忍睹”。汉口的水位上升到“实际上已超出人们记忆”的高度。在宜昌地区，外国旅行者是这样描绘农村灾情的，犹如“内陆海伸延数十英里，眼前一片浩瀚”。湖南省向来以盛产稻米著称，彰德地区这时也被洪水淹没，大批农田被水冲垮。许多难民靠吃树皮草根为生。据报道，还发生了一些人吃人的情况。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⑨

在安徽，淮河再次施虐。到8月份，约有10万公顷稻田被洪水冲毁，使秋收毫无指望，50万人无家可归，避居在草棚子里，等待救助。芜湖的主要街道水深达0.9米。在江西，南昌周围广大地区被洪水淹没，40%的农作物被毁，九江则挤满了从邻近地区逃来的难民。^⑩

水灾非但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引起稻米和其他食品严重短缺。1910年春米价上涨，导致安徽、江苏和湖北等省的许多地区发生骚动。有些地主和绅士卑鄙无耻地囤积粮食，以便等待时机牟取暴利。据英国情报，长沙一些地方绅士将大批粮食集中囤积在较高的地方，引起米价上涨。^⑪4月和5月发生的米骚动，显然是贫苦民众不堪忍受凄惨境况的结果。1911年长江流域的形势继续恶化。长沙7月初的米价每担5000至5200文，同月下旬涨到6200至6300文^⑫。武汉8月底每担米5000文，9月份涨到7000至8000文。^⑬7月份南京每担米7元，到9月份达9.1元。同时期上海每担米最高牌价达到12元。^⑭辛亥革命前夕的米价比正常价一般要贵50%。^⑮中国的无耻米商“囤积居奇”，使形势雪上加霜。饥饿的人群冲击政府粮仓，抢劫运米船，攻击地主、富

商和那些利用分发食品与救灾物资中饱私囊的政府官员。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是势所必然的。^⑧

接连发生悲剧的原因是，前几年的洪水早已造成大范围的灾害和饥荒，人们期望1911年灾情总会有所缓和，但气候不合时节，连绵不断的雨水远远超出正常降雨期，使希望化为泡影。人民群众处在如此境地，怨愤难忍，对清政府恨之入骨，因为清政府忽略了预防措施，使灾情无法控制。

政府军队，至少某些部队，是同情贫苦民众的。食品短缺，米价上涨，使军人遭受到跟平民百姓同样多的苦难。何况，大多数军人的家属和亲戚也直接或间接地蒙受水灾和饥荒的打击。军队不可能无止地被用来镇压动乱，因为民众痛苦到无法生存时才发生骚动的。新军士兵在平息民众暴乱时受到良心的自责，而且到处是动乱和镇压，使军人越来越感到政府动用军队对付老百姓是错误的。

毋庸置疑，长江流域的财政和社会状况为政治鼓动家散布动荡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某一时期内受灾地区越大，地方骚动成为革命动力的危险性也相应增加。我们已经论述了湖北新军中的革命活动 and 不满情绪，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长江南北其他地区军队的情况。

三、湖南的新军

湖南是晚清时期改革最起劲的省份之一，那里进行了多项改革，尤其在教育、收回利权、工业化、开矿和宪政改革等方面。^⑨然而，湖南在军事领域的改革远远落后于湖北。驻扎在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兵力相对较弱，1911年有兵员4443人，资金缺少使它无法扩建成镇。遣散旧式军队进展极为迟缓。辛亥革命前夕，

仍在服役的旧式军人估计多达 25053 人。^⑧

湖南新军虽然规模有限,但素质是不错的。实际上,湖南长期以来享有产生优秀军人的美誉。1906 年 7 月,一名英国军官发现来自湖南北部的军人大多跟北方华人一样高大强壮。他们看上去机敏灵活,“十分好客有礼”,训练情况“很好”。^⑨跟其他省一样,湖南也开办军事学堂,但质量不及湖北的军事学堂。湖南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通常去武昌深造,而湖北的军官有时派往湖南新军任职。

湖南军队也以士兵中会党分子众多而“恶名远扬”。1906 年 12 月,在萍浏醴起义后不久,张之洞奏称哥老会成员在长沙新军里有 500 人,在岳州巡警里有 500 人,在省内其他军队中有 3000 人。^⑩确实,会党势力成为湖南军队平息暴乱极不得力的原因之一。除了训练不足,军纪欠佳之外,相当数量的湖南军人同情叛乱者。部分造反者有来福枪,但大多数造反者只使用滑膛枪、刀剑、长矛、竹竿和农具。这就使一名地方官相信,“情势如此危急,并非造反者精心筹划所致,而是他自己的部队形同虚设,不足依恃。”^⑪直到一标湖北部队开到出事地点,造反者才四散逃离。

人们由此会想起,会党分子和湖北新军的密切关系曾使共进会某些领导人利用会党来策反军队。负责组织湖南秘密团体的是焦达峰,他后来成为湖南第一任都督。焦达峰出身于浏阳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地方民团首领,拥有 500 亩土地。焦达峰在浏阳和长沙受过教育,唐才常和谭嗣同的革命行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学校里,他对军事技术特别感兴趣。他似乎跟父亲发生过冲突,选择了“从家庭开始的革命”。后来,他被赶出家门,发现他自己很容易与会党融洽相处。焦达峰经常往返于湖南和湖北之间,1904 年结识了湖南激进学生禹之谟,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革命思想。禹之谟被长沙当局逮捕后,焦达峰逃亡到日本,旋即加入

同盟会。他在1906年回到湖南，参加萍浏醴起义。起义遭到镇压后，他再度赴日本，因为学习军事课程受到阻挠，就进入一所铁道学校。他在东京积极参与共进会的筹建活动。1908年底他返回湖南，着手发动会党，并与在汉口开展革命活动的孙武合作。^②

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910年才开始注意当地新军（估计他们受了湖北同志的影响）。这时，第四十九标一名炮兵排长陈作新热衷于推进革命事业。陈作新也是浏阳人，毕业于长沙弁目学堂，在接受低级军官职务之前就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他在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担任教习，与军人学员建立起良好关系，看来对他们还起过一些影响。他还帮助别人在士兵中秘密分发反帝反清的宣传品。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期间，他怂恿平息骚动的部队指挥官发动起义，结果自己反而被革职。^③

然而，湖南部队对骚动者不怀丝毫敌意。据报道，6000名军人在1910年4月与骚动者一起劫掠学校和商店。^④但后来发现报道失实。^⑤按照《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军队似乎已“不可靠”，但这仅仅表现为他们不向烧毁衙门的闹事者开火。湖南巡抚孤立无援，一走了之。布政使和其他官员，以及有权势的地方士绅下令不要向乱民开枪。^⑥原因之一是，他们不赞成巡抚应付危机的方法。另一条没有明讲的理由是，他们知道军队同情哪一方。

其时，英国驻华公使馆参事麻木勒代理馆务，他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急件中抱怨“湖南军队冷漠迟钝”。传说有两名军人因向人群开枪而被斩首，英国驻长沙领事相信这是真的。^⑦用麻木勒的话来说，军队一直是“消极的旁观者”，但实际上把他们刻划成同情者将更加贴切。

湘潭的情况大同小异，外国人从那里发出的一份报道说：

现在数百名军人聚集在这里，发生骚动时他们还在米沙。他们是英气勃勃的小伙子，而且通情达理。今天，我问几个军

人，他们为什么听任暴徒放火和破坏。他们回答道，他们无能为力，因为上级不允许他们向暴徒开火……^⑧

上面提到的“暴徒”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遭受饥荒的难民。部队虽然已经警告骚动者，胆敢肇事生非者将被枪杀，却又故意隔岸观火。他们对骚动者和平民百姓异乎寻常的友善行为不啻是一种信号，可以解释为军队不愿以任何血腥镇压的方式来平息骚动。

与此同时，当地革命党人日趋活跃。策反军队的活动现在由骑兵低级官佐刘文锦负责。有关他家庭出身的资料极少。刘文锦是湖南人，似乎毕业于长沙一所弁目学堂，可能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他起初的策略是试图策反队官，但得到的反应极冷漠，于是被迫把工作重点放到普通士兵和正、副日中。1911年4月召开了革命军人会议，68名代表分别来自第二十五混成协总部，第四十九、五十标，炮兵营、马队营、工程营、辎重营和水师营，其中没有一个是正式军官。会议讨论了与广州起义计划相呼应、同时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但似乎没有作出决议。这表明湖南革命党人还没有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长沙当局听到了这次会议的风声，由于害怕激起整个混成协发生兵变，没有对他们采取惩罚措施。刘文锦后来奉命去北方购买马匹。谣传他可能在途中遇害，但悲剧未曾发生。^⑨

这时，四川路权之争的风波正冲击着湖南。省谘议局的抗议和爱国学生对军队施加的影响，使军人们明白了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局势下，200名湖南军人8月份再次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国内的革命形势。不过，会议还是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⑩

从上述革命颠覆活动中，可明确地归纳出三点结论。一是普通士兵和正、副日起了主要作用，这表明湖南与湖北策反军队的模

式是相仿的。湖南和其他许多省一样，高级军官任用外省人。协统萧良臣和标统黄鸾鸣，余钦翼都是北方人，正式军官不是来自北洋军，就是来自湖北军事学堂的毕业生。萧良臣在他的湖南籍部属里很不得人心。对普通士兵来说，升为军官几乎毫无可能性。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士兵在这种境况的不满情绪。^④

第二，湖南革命军人在组织方面力量薄弱，与湖北革命军人相比，差距很明显。湖南没有文学社那样组织严密、自成系统的团体，也没有湖北式的干部代表制度。总之，湖南激进军人无法离开湖北支持而采取独立行动。

最后，湖南新军和会党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联系，典型的例子就是陈作新和刘文锦为一方与焦达峰为一方之间的关系。焦达峰总是密切联络会党，看来十分渴望在当地革命运动中发挥他的影响力。但他缺乏政治领袖必备的才华、魅力和地位。

尽管缺乏杰出的革命领袖，湖南新军对清皇朝离心离德的倾向仍然跟湖北新军差不多，还是省政府缺乏资金这个老问题使军队骚动不安的。1911年湖南花在新军方面的开销（包括协济北洋军的费用）占全省各项改革总支出的34.28%。^⑤这年年初，军饷已拖欠4个月之久。由于临近春节，军人越发愤怒，扬言要哗变滋事。巡抚余诚格被迫责令高级指挥官尽一切努力筹集资金，在阴历年三十夜之前给军人发饷。^⑥

然而，这时北京正在对湖南施加沉重压力，要把第二十五混成协扩建成镇。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任务，军事当局被迫裁减炊事兵，以及苦力和马夫等役夫，减发军服、被褥及饲料，以节省资金。^⑦显然，北京领导层并不了解湖南全省的气氛和真相。

1911年夏，湖南陆军小学堂的毕业生也感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变得心怀怨愤。事与愿违，他们没有机会被选送到武昌接受中级军事训练。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成为正式军官的机会，只能充

任不入流低级官佐聊以自慰。^⑤

四、安徽的新军

安徽是中国享有良好尚武声誉的省份之一。安徽籍军人一般都高大结实，而且以胆量和忍耐力著称。安徽青年大量加入北洋军，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新军各镇。但安徽本省的军事发展却处在极落后的状态。原计划在安徽编练 1 镇新军，实际情况与目标有很大距离。1907 年，安徽新军有 1 个步协 3000 人，1 个马队营 300 人，1 个炮营数百人，全都驻扎在安庆。此外，还有 130 名精壮军人组成的巡抚亲兵队，使用汉阳兵工厂制造的 5 发毛瑟枪。新式军人全是汉人，其中安徽兵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少数士兵来自湖北和湖南。他们年轻、健康，看上去很机敏。征募兵员带有强制性。^⑥

安徽在军事上比华北和华中地区任何一个省都落后，原因在于极端贫困。非但第三十一混成协无法扩充兵力，达到镇的建制，而且新建的两层营房东倒西歪，波形薄铁皮覆盖的房顶由空心砖墙和木框架支撑着。军务不景气的另一个原因是，60 余岁的满员巡抚恩铭（1906—1907 年在任）决不是一个热情的改革家。辅佐他统辖军队的省督练公所由 3 名文官经营，其中 2 人看来没有多少军事知识。除了增设 1 个辎重营外，恩铭对加强混成协兵力不感兴趣。^⑦

统辖第三十一混成协的不是协统。一位听命于省督练公所的地方官名义上管辖该协。2 名中年标统分别掌管 2 个步标，一个是安徽人，另一个是外省人，都毕业于旧式武备学堂。新建的安庆陆军小学堂 1907 年有 220 名学生，年龄在 15 至 18 岁之间，大多来自安徽本省，每天学习 6 小时。学堂监督是一位姓蒋的安徽籍

统领，他毕业于江宁武备学堂，在日本呆过3年。^④

1908年11月，炮兵军官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兵变。这次兵变的背景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北京陷入一片混乱和无可奈何之中，使人们对清皇朝将来的命运产生了深沉的思考。江苏人熊成基出身于书香官绅人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地方官员。青少年时期，熊成基读书很不用功，在芜湖过着挥霍奢侈的生活。直到19岁那年，他才为自己感到羞愧，于是到安庆一所武备学堂学习。他后来加入新军，被推选去攻读炮兵速成专科。毕业后，他就任驻南京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后来又调到安庆任炮营队官。他参加了由激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岳王会。这些军官经办一所小酒店，为革命工作筹集资金。^④

1908年秋，当局准备在太湖地区举行南方新军秋季大会操，荫昌和两江总督端方将前往检阅。熊成基与他的同伙打算在大会操结束时刺杀端方，乘机发动兵变。但这项密谋未能付诸实施，因为巡抚朱家宝（1908—1911年在任）将他怀疑有革命倾向的军官全部留在安庆。熊成基于是决定，待部分新军开赴太湖演习区后，在省城发动起义。他的计划是，用一队骑兵和一支炮兵营占领安庆，这支起义部队然后将向南京进发，以期得到其他省份革命党人的支持。

安庆驻军有3854人，第二步标第一营504人被派往太湖地区执行特别任务。另2个营的官兵大多分散在安庆北边各兵营里，其中只有200人真正在城墙之内。第一步标的3个营驻扎在安庆城东不到2公里的地方，马队则驻守在城西大门外，炮营布置在城东侧沿河岸的旧要塞上。

知道光绪帝和西太后的死讯后，安庆市民盛传城内将发生动乱。巡抚朱家宝匆匆从会操地点赶回，11月18日抵达安庆后，马上采取防范措施。11月19日夜间，熊成基开始行动。炮兵营管

带拒绝参加起义，被杀死。起义官兵接着攻击马队营管带，他头部负伤，设法逃脱。此后，马队官兵试图劝诱第二步标加入起义，但遭到拒绝。不过，第二步标或多或少保持着中立，直到起义以失败告终。于是，骑兵加入了炮兵的起义。由于缺少弹药，炮兵无法使用克鲁兹特炮。他们企图用武力闯入城里，但未成功。这时，巡抚朱家宝身披将军服，骑马出现在战场上。他亲自指挥城防，命令高级官员走出衙门各尽职责，劝令商店照常做生意，安抚惊恐失措的市民。第一步标按兵不动，既拒绝平息兵变，也不加入起义。于是，省里旧式军队配备好充足的弹药，被调来镇压兵变。巡抚在第二天就完全控制住了局势。由于他行动迅速果断，只有800人参加兵变，其中步兵400人，骑兵100人，炮兵300人。他们与720名旧军队官兵交战。如果起义官兵打进城内，缴获军械库武器，其他新军步兵很可能会响应起义。^②

这次兵变计划不周，领导无方。曾答应给予支持的步兵军官到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显然，大多数军官仍然效忠于清政府，因为他们怀疑革命的前景，唯恐参与革命会断送他们个人的前程。尽管如此，这次兵变严重到足以使当局震恐。巡抚朱家宝下令严厉镇压，结果杀死300人。熊成基逃亡到日本，另一些人去广州和香港避难。第三十一混成协随之遣散，重新整顿组建，以确保部队的忠诚。^③

尽管可以把这场兵变刻划为一次革命尝试，熊成基的行动似乎也出于革命热情，但动乱的根源必须追溯到驻扎在东大门外的炮兵和骑兵部队的不满情绪。《北华捷报》曾作了如下论述。

这些部队的官佐弁目在相同的军事学堂接受同一模式的训练，身居高位的人独揽大权使这些军校毕业生下决心改变现状，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④

情况确实如此，在自我奋斗过程中被剥夺公平竞争机会的军

八

官,最容易受革命影响。

重新组建的混成协里老兵占30%,新招募的兵员是清一色的安徽人(军官另当别论)。应募者十分踊跃。负责招兵的官员报告道,每个空额可以被重复填补3次。^⑤许多受怀疑的新军军官被撤换,补充的军官中有不少是旧式部队的军官,他们无法激励部属的信心。^⑥

军官级别越高,越是平庸无能。江苏籍协统余大鸿曾在旧式军校江宁陆师学堂受过教育,1904年赴日留学,由于日俄战争爆发,只学习了10个月就回国了。他浪费了大量军费,部分原因是他本人才识不足。其他军官同样腐败,他们中的“八毒蛇”最令士兵深恶痛绝。何况,省里财政紧缩正在促使动荡局面大大加剧。为培训军官开设的军事学堂关闭了,军官俸薪在1911年7月削减了20—30%。^⑦无论如何,这种状况就足以破坏士气,为革命势力增长大开方便之门。

五、江西的新军

在江西的新军是第27混成协(按计划将编练成第十四镇)。驻守省城南昌的部队有1个步标(第五十四标),1个炮营、1支马队以及工程和辎重部队各1支。另一个兵力相仿的步标(第五十三标)驻扎在九江。大约直到1909年,驻南昌的步标由一名姓廖的标统管辖。他曾留学日本7年,阅历丰富,被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军官。该标五分之四的士兵来自湖南,年龄在17岁到25岁之间,看上去聪明有活力。他们每天训练2次,每周野外操演2次,打靶练习1次。兵营的条件很差,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未能建造新的营房。出于各种原因,开小差的人数相当多。士兵的军饷比其他大多数省的新军低些,正兵每月4.2两银,副兵每月3.9两银,而且

军
官
近
代

必须自己筹集粮食。军官几乎全是武昌和南京两地军事学堂的毕业生,而且大多去过日本。第五十三标标统陈得龙是四川人,他曾留学日本二至三年。跟南昌那个步标不同的是,九江新军官兵大多是江西本省人,尽管两个营管带分别来自湖南和湖北。^⑤

大约在1909年,吴介璋调任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他是江苏人,毕业于江宁陆师学堂,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教习。两名新标统马毓宝和齐宝善协助他工作。他俩分别统辖第五十三标和第五十四标。吴介璋教过的许多学生被任命为该协军官,取代了外省军官。^⑥

第二十七混成协的战斗人员,在1910年估计为4300人,1911年上升到5324人。在南昌,大量外省军人被本省自愿入伍者取代,但这些新兵的体格及总体情况都很差。九江新军士兵的素质要好得多了。由于江西没有建立起后备役军队,士兵在新军里服役不限于3年,因此许多军人年纪偏大,很少看到其他新军部队里常见的年轻小伙子。他们是被粗制滥造出来的军人,军事技术粗放。不过,听说他们的行为还算规矩。他们的课堂学习和室外一般训练勉强差可,但体育锻炼就差得可怜了。士兵打靶练习似乎每月才一次,一年总共打15发子弹。步枪实弹练习的机会少,是因为没有钱买子弹。协统吴介璋与标统一样,都是无能之辈。总的看来,这个混成协的素质在全国新军中属最差的部队之一。在行军队列中为数不多的矮种马也是瘦弱不堪,可见平时饲料不足,得不到应有的照料。^⑦

1911年江西财政预算赤字达178万两银,致使军队条件与军人情绪进一步恶化。军队的训练受到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省政府在6月份被迫关闭几所军事学堂,把存下的几所合并为一所,并裁减人员。没法搞清楚紧缩编制的范围,但只要实施裁减兵员,情况就糟到足以令士兵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此同时,高级军官和

低级官佐的俸银分别减扣30%和20%。俸薪在减少,而米价却在上涨,南昌和该省其他地区正在发生骚动。^⑨

1911年以前,江西几乎没有名符其实的革命运动,那里同盟会的活动通常只限于极少数人开展些零星的活动。^⑩1906年前,曾有几个以研究会形式存在的革命团体,其中知名的是南昌的易知会,九江的讲学社,但1906年以后都消声匿迹了。这些团体或自动解散,并入同盟会,或在萍浏醴起义后被江西地方政府查禁。

那些单独活动的同盟会会员试图向当地新军灌输革命思想,李烈钧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他领导了九江的辛亥革命。李烈钧是江西人,曾在江西武备学堂受教育,此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他回到江西不久,即去江西新军第五十四标任职。该标军官大多出身体面人家,少数人还取得过廪生和秀才的功名。标统及其属下的3名营管带都是同盟会会员,还有不少军官是李烈钧过去的同班同学。1910年,李烈钧受到滥用军费的指控,被迫辞去职务,到云南任讲武堂教习。在此期间,江西巡抚冯汝驥(1908—1911年在任)“清洗”了第五十四标,严厉惩处并杀害了一些革命党人或被怀疑为革命党的官兵,撤换了大批“不可信赖”的军官,并将整个标调往萍乡。江西巡防营中路军改编为新设的第五十五标。留在南昌的新军只剩下1个炮营、1个马队、以及工程和辎重部队。但他们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军官中仍有少数同盟会会员。与南昌形成对照的是,九江受同盟会的影响要少得多了,第五十三标的军官似乎没有一个是同盟会会员。^⑪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西省首举革命义旗奋起响应的是九江。

除了这些军官个别地发挥作用外,还有共进会江西分会从事的活动。1909年,邓文肇从日本回国后即着手组织共进会江西分会,他自己担任会长,若干名南昌女校的教员任副会长,协助他工作。到这年年底,约30人加入了江西分会。跟共进会其他分会相

同,江西分会也很重视会党。农闲季节,宣传队被派往农村,但这只是争取农民支持的零星活动,根本就没有发动农民的明确纲领,因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共进会江西分会马上把注意力转向当地新军,派出一些会员渗透进新军和军事学堂,与不满现状的低级官佐建立起直接联系。遗憾的是,几乎没有江西分会进一步活动的资料。看来,这个团体不如在湖北新军中活动的共进会,没有发展为活跃的、凝聚力强大的革命组织。由于邓文翠再次赴日,后来一名较能干的副会长又去世,共进会江西分会到1910年初已经名存实亡。^②

九江非军界组织中,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改良主义团体——书报社。这个团体的创建人是以前鼓吹过革命的福建人林森和九江商会副会长之子吴铁城。书报社提供上海和香港出版的书籍杂志,深受不同阶层人士的欢迎,其中包括清朝官员、商人、教员、钱庄老板、写字间职员以及新军军官等。改革思想通过读书看报得到了传播。书报社鼓吹废除裹脚陋习、禁止吸食鸦片、改善公共卫生等社会改革。1910年,书报社支持省内立宪派发起请愿运动,敦促北京尽快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搞到后来非但使立宪派对清政府失去信心,而且也使吴铁城和林森相信,应该用更激进的手段来对付清皇朝。于是,书报社从改良走向革命,进一步发展同新军军官的关系,邀请部分军官指导当地商会组织开展军训。后来成为九江都督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与吴铁城过从甚密,其他新军官佐也成了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在此期间,书报社与湖北革命党人保持联系,跟詹大悲和何海鸣的往来就更多了。为了便于工作,吴铁城以《大江报》驻九江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③ 尽管没有任何起义计划,但新军中的低级官佐已经显得按捺不住,他们后来都投身于江西的辛亥革命。

六、江苏的新军

江苏原计划编练两镇新军。第九镇在1904年开始组建,实力不如北洋军和第八镇。镇统制徐绍楨原先是地方候补道台,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他是个酒鬼,患有肺结核病,而且以极不诚实而臭名远扬。协统、大多数高级军官及参谋官是浙江人,并在日本学完军事课程。低级军官大多是本省人,毕业于江宁陆师学堂。正、副目多半出身行伍,看上去衰老萎靡。1907年以前,士兵主要是自愿从军的湖南人,此后,他们被江苏南部的新兵取代。大量新兵体格很瘦弱,作风也懒散。由于实践不足,训练水平仅仅达到勉强差可。^④到1909年底,第九镇兵员据信已充补足额,第三十五标屯兵镇江,第三十六标扎营江阴,其余部队集中在南京。此外,还有居守苏州的第二十三混成协。按计划该协是今后扩充为第十二镇的基干力量。估计第二十三混成协兵力为2100人,下设第四十五、四十六步标。总的看来,这些部队的军人身体单薄,大约一半人显得很年轻。但是,根据1908年11月在安徽举行军事会操的情况来看,江苏新军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士兵的外观较机敏,训练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待遇一般还算不错,官兵定期领取俸饷,尽管“克扣”饲料及其他物品的歪风盛行。●

江苏开设4所军事学堂。江宁陆师学堂按计划将改为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开办得不错,有300名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的本地学生。第三所是讲武堂,而向江西、安徽及江苏3省军官,并为第九镇所有军官提供为期3个月的轮训。最后一所是军事测绘学堂,每期学生20人,学制2年。

江苏北部在行政管理上称江北,驻清江浦的一名特殊官员江北提督统辖新军第十三混成协(计划以该协为核心,扩展为第七

镇),4500名士兵是在1906年从直隶镇定调来的,大多数军官来自直隶、山东、安徽和江苏,少数来自湖南。协统和标统的“举止相当有教养,显得通情达理,见识广博”,而低级官佐的素质,即使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次等的。士兵年轻、健康,看上去比南京驻军有精神。但是,部分士兵在某些场合表现得傲慢粗鲁,言行举止不及湖北和湖南的军人。^⑥镇统制是王士珍,他继荫昌之后在1907年任职。段祺瑞在1910年接任镇统制,并同时出任江北提督。江北提督一职很重要,权力相当于统辖一方文武大权的巡抚。在江北提督任上的段祺瑞不受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管辖,只在他统辖当地新军有关事务方面直接听从陆军部命令。他的权力跟热河或察哈尔的满洲将军或八旗都统相仿。清廷让他担任江北提督,意在防止两江总督控制原先在直隶编练成的第十三混成协。段祺瑞在接受这项命令之前,任驻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在他的管辖下,江北新军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⑦

长江下游地区的军队不满现状由来已久。1906年10月在上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爵士就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提供过这方面的讯息,还说袁世凯已经预见到这一地区容易滋生严重麻烦,对他本人统辖的部队作了些特殊安排,以便随时相机开赴那里。^⑧英国驻南京领事私下跟一名清朝官员谈起这个问题,长江下游地区总的形势将取决于清政府是否能够成功地向募自当地的新式部队灌输效忠意识,按原定意图把他们培养成忠君爱国的优秀军人。新兵刚入伍时,就受到隆重欢迎,“军校师生排列成队,挥动旗帜,唱爱国颂歌”。但是,不久他们就觉得期望与现实相背离,平时被分派做日常苦力活,于是产生牢骚怨恨。1906年7月,士兵跟巡警争吵后发生骚乱,在闹事过程中不听从他们长官的命令。^⑨铁良在1907年夏告诉一名美国外交官,北洋军队训导有方,但对长江地区怀有不满情绪的军队,“他不能说同样的话”。^⑩

1908年伦纳德上尉报告道，第九镇实际上没有称职的军官，士兵则“无法无天，任性散漫透顶”，竟然企图谋杀两名日本教习，并威胁江宁陆师学堂派来的中国军官。尽管政府竭力招收正派青年入伍，仍然有许多士兵是鸦片鬼。他们算不上受过新式训练的军人，“除了编制以外，迄今为止实际上还是旧式军队”。不少士兵染上性病，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甚至某些军官及镇统制本人也是如此。^①

1911年，第九镇成为全中国新军各镇中名声最坏的部队。1月12日，驻江阴的第三十六标产生强烈不满情绪，致使近百名士兵开了小差。据情报资料，事情起因于部分士兵想升为不入流官佐，但升迁途径受阻，他们由失望产生怨愤。^②情报还表明，这时革命党人在南京部队里活动，预谋在6月份发动反对清皇朝的兵变。这促使南京当局从江苏省其他地区调来巡防营。形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两江总督觉得有必要对部队进行训话，收回他们的弹药和枪、炮。上述情况表明，一旦发生反对清皇朝的起义，这些部队多半会投入革命党一方。^③

南京部队骚动不安的部分原因是军官层内存在门户之见。那些留日军官属士官系，另一些则毕业于地方军事学堂。后者大多是下级军官，他们对年轻无经验而又狂妄自大的留日归国军事学员占据营以上的高级职位耿耿于怀。何况，士官系军官的生活方式与低级官佐及士兵的习惯不一样。忿忿不平的官仕们希望革命会把那些归国留学生驱逐出军队，为他们自己开创新的晋升机会。^④

部队滋生怨愤的另一个因素是军费不足。早在1910年，这支部队的军需部门就禀报两江总督，这一年拖欠的俸饷已达69万两银。^⑤10月下旬，当上司宣布所有获准离队去江宁陆军中学堂学习的军官，只发给平时俸薪的70%时，学员们情绪十分激愤。他们

过去领取全俸，这次减扣俸银是财取困难引起的。此后2个月没有给部队发放俸饷，欠发总数超过30万两银。镇统制徐绍楨忧心忡忡，决定从1911年计划款项里提取资金，必要时先发给士兵饷粮，暂时不发军官俸银。^⑭

驻苏州的新军也不安分。1910年2月，第四十六标二三百名士兵已经在那里哗变滋事。粗粗一看就知，那次兵变起因于细琐小事：戏院不准没有付足钱的士兵进入，这些士兵就动手捣毁几家日本人开设的商店，并攻击在现场的4名英国人。事后，外国人所有的损失得到了赔偿，但地方军事当局没有惩处这些“难以驾驭的军人”。2月13日又发生一起军人骚动，一名警官和若干名巡警被打伤。但是，肇事生非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扣发士兵的饷银，部队的指挥官凑巧又在这时调换，新上任的指挥官在实施军纪方面的名声是很可怜的。^⑮

过了一些日子，驻清江浦的第十三混成协在3月8日发生兵变。由于军饷不足额，以及一个士兵因细小过失遭受过分严厉的惩罚，军人的忿恨郁积了一个月之久。据几家地方报纸报道，兵变者扬言要毁掉整个协。外交官们问及此事，中国官员否认那里发生过严重兵变，但承认新军部队因饷银欠发情绪不好。^⑯

这次兵变是有预谋的。兵变者约定，一旦步兵放火烧兵营发出信号，士兵们便猛烈攻击管理军火的军官，夺取机枪后，洗劫清江浦和淮安，然后向西北方向进发，袭取徐州。3月8日晚上，一名值班放哨的排长发现一名士兵把煤油浇在营房顶上，就朝他开枪。放火士兵被捕后供认，事先已谋划发动兵变。这时，其他谋反者企图袭击值班的官长。约有10名兵变头目被捕，军官们通宵达旦地在兵营里巡逻。被捕军人后来都释放了，因为该郁队长官恐怕一旦惩处其中任何一人，就有可能造成突发性的全面叛乱。他还下达命令，允许任何愿意离开部队的人退役，除补发军饷外，再加给

回家的路费。约有 200 名士兵从这项慷慨承诺中得到好处，没有一人因此受惩罚。^⑧

然而，士兵饷银问题总是很难解决，第二年军费反而削减，问题就更严重了。那时，第十三混成协已扩编为第七镇，军费预算被砍去 36 万两银。到 1911 年 5 月，军官俸薪减少 20%，弁目和士兵的饷银减少 10%。根据陆军部要求，低级军官要调换军服以合符北京的标准，又增添了一笔开销。除去各项扣款，他们养家活口的钱就所剩无几了。^⑨ 同年，苏州新军军费削减 20 余万两银，加上高级军官侵吞军饷的腐败风气由来已久，局势更加严重。^⑩

就革命活动的情况看来，第九镇里也有一些激进军官。1907 年以前，他们聚集在赵声周围。赵声是江苏人，江南陆军学堂早期毕业生，留学日本时间不长，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中国革命党人。回国后，他在上海和长沙从事过教育工作。1905 年，他被任命为第九镇招募新兵的参谋官，后来升为队官。经由他援引，一批有文化的人成为官佐。他才华过人，很快擢升为第三十三标标统。他发起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以娱乐消遣为幌子，其实是同情革命事业军人的会议场所。在训练和野外演习时，他常常讲到太平天国运动，国家民族的危机，有时闪烁其词地暗示一些问题，让听者自己去领悟其中反对清皇朝的含义。据称，他的追随者有军人和学生等 2 万人（不免言过其实），他正在等待适当时机，准备会合安徽和江西的新军同时起义。1906 年底或 1907 年初，两江总督发觉他在部队里鼓动革命，解除了他的军职。^⑪ 他在 1907 年离开江苏赴广东以后，江苏再也没有谁能领导和组织当地新军中的革命分子，但这并没有改变部队的革命倾向。诚如英国驻南京领事评论的那样，江苏新军“以充斥煽动性言行而闻名”。^⑫

七、浙江的新军

按计划,浙江新军应发展成第二十一镇,但直到1911年仍未编练成镇,只是设立了一个镇级机关。浙江新军维持在1个混成协的兵力,下设1个步协、1个马队营、1个炮队营,以及工程和辎重部队各1队,全部驻扎在杭州。按惯例,这些部队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浙江巡抚,组织编制等具体事务归陆军部属下机构统筹。浙江巡抚张曾敳(1905—1907年在任)是直隶人,张之洞的侄子。他把极其无能的亲戚李易知*提升为第一标标统,被认为是任人唯亲。李30余岁,对军务一窍不通,而且总喜欢穿文官的长袍式官服,一点军人气质也没有。他狠揍军人的名气倒很响亮,致使许多士兵离开第一标,到对待士兵较宽厚的第二标去当兵。第二标标统蒋尊簋是浙江人,曾留学日本5年,以“大好人”著称。蒋和李之间的矛盾不小,2个标的士兵也相互有磨擦。^④

1907年6月柏来乐访问了第一标,他了解到部队每天训练2次,每次1小时。训练状况大体上不错,但操演方面不及北洋各镇。他还评论道,“队列在行进时不整齐,间距糟透了。士兵们的眼光时常朝着地面,立正时没有把枪支收回原处。前后排距离应当保持80厘米,但他们的排距太近了。”^⑤部队里没有医院,但有两名军医(不清楚每标两名还是每营两名)。其中一名军士级医生曾在地方教会医院受过培训,另一位是土郎中。1910年,柏来乐的后继者韦乐沛在那里发现了更多的军医,一半受西式训练,一半受过中国传统医学的训练。药房里的药物相当多,还有一间中药房。^⑥

1906年至1909年,革命党人为策反第一、二标军人尽了些努

* “李易知”系据原文音译。

力。标统蒋尊簋是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会员,1903年在日本曾卷入中国留学生的激进主义运动。在他统辖下,第二标形成了有文化青年组成的新式军官集团。他还帮助地方建立军事学堂。有些军事学堂学生受他影响,参加了光复会。1907年他被牵入秋瑾起义事件。秋瑾曾在第二标和军事学堂里吸引了许多追随者。第一标和第二标后来合并成第四十一混成协,出乎蒋尊簋意料,他没有被任命为协统。怀有敌意的新协统杨善德迫使他辞去职务。1909年他赴广西以后,浙江新军中的革命策反活动几乎完全停止了。⑦

另一个被认为同情革命事业的知名军界人物是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伍元芝。伍是江苏人,晚清进士。尽管外貌像文静的书生,他激励学生做民族英雄,为中华民族报仇雪耻,被认为间接地支持革命。许多学生看来的确受了他的影响。

其中之一是才华出众的学生黄郛。他没有修完浙江武备学堂课程,就被选为官费生,派赴日本振武学堂留学,完成学业后又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黄郛参加了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前文已经提到过,铁血丈夫团是黄兴出于革命目的建立起来的。黄郛在每年回国度假期间,经常跟同事谈论日本政治和国际形势。他曾把一些日本战争史著作译成中文,给同事看,以激发他们的民族觉悟。毕业回国后,黄郛在北京军谘府任职,但仍与浙江和江苏的激进分子保持经常的接触。⑧

总的看来,对浙江新军的革命策反进展甚微,伍元芝和黄郛都未曾对当地军队产生重大影响。自从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策划的起义流产后,浙江的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黯然失色。⑨即使如此,中下级官佐里还有许多不满现状的人和革命的同情者。在浙江卷入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⑩

同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的财政问题破坏了部队的士气。1910年下半年,省政府感到不可能如期解交当年额定京饷30万两银,以财

政已困难到无法维持本省军队为由，奏请清廷减免一半京饷。严行节俭的结果，使部队从开小差到哗变滋事。每逢周一军队例假日，每排至少报告一起开小差事件。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兵来自外省。由于时间不够充裕，其中20%新兵的家庭社会背景未经军官仔细审核，因此大批不合格的士兵后来被开除军籍。但在下一次招兵中，同样的情形周而复始。^⑩更为严重的是发放俸饷困难重重。1911年夏，减扣高级军官俸银20%，低级军官俸银30%。士兵受到多大影响不甚清楚，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最倒霉的，因为高级军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使他们多遭受一层盘剥。^⑪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促使士兵忿忿不平。他们的官长有三分之二来自北洋各镇和北方的军事学堂，三分之一来自江苏，而士兵却在当地招募。^⑫本省士兵非但觉得他们的地域背景跟长官不同，难以建立起良好的官兵关系，而且还认为外省人占据全部军官职位影响了他们的前程。

八、小 结

总之，长江流域军队不满现状是郁积种种怨愤的结果，例如军官腐败、士兵受虐待、晋升机会减少、编制紧缩、米和其他食品涨价以及俸饷减扣等。革命党人乘隙活动，犹如火上加油，以致到清皇朝垮台前夕，军人的怨愤情绪已上升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军官和士兵各有自己的苦恼和怨恨。军官和部分士兵来自低级士绅家庭。大多数普通士兵出身于农民，同情乡村民众，但未必像田中义一断言的那样，新军的不满代表了“农民的不满”。^⑬

军队骚动不安的所有因素中，清政府没有能力按时发给足额俸饷被证明是最重要的一条。陆军部十分明白拖欠军队俸饷的危

险性,责令严厉惩处在这方面有任何懈怠失职的官员。然而,经费支绌使地方当局在许多场合顾不上陆军部的命令。^⑤

士气低落造成军纪败坏,而纪律无法维持又助长了军队在1910年哗变滋事。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似乎都害怕军人,不愿迅速而严厉地惩处违反军纪的士兵,也不愿为此大力维持军官的威信。结果,军官不敢采用激烈的纪律措施来惩罚违纪肇事者,不少部队的士兵已放任到不受管束的程度。^⑥而且,“无法无天”的士兵时常跟巡警发生冲突。陆军部希望减少军警之间的摩擦,试图仿照日本模式建立一支新式警察武装。但直到1910年,这支新式警察武装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部分军队和地方巡警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⑦

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种子在兵营里找到了肥土沃壤。心怀不满的军人对满清皇朝没有感情、动辄责怪清政府搞得社会动荡不宁,而军队本身就是动乱的组成部分。后来,长江南北的新军与省谘议局或革命党领导人物合作,率先响应武昌起义,这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注释:

- ① FO371/864,《总领事雷必兰致麻木勒》,附在麻木勒1910年7月17日致格雷的第200号文件附件2中。
- ② 同上,附件6;并参阅FO371/869,《1910年第一季度情报述要》,附在麻木勒1910年6月10日致格雷的第194号文件中。
- ③ FO371/864,《总领事法磊斯致麻木勒》,附在麻木勒1910年6月17日致格雷的第200号文件附件1中。
- ④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64—66页。并参阅《民立报》,1910年10月13日,第5版;14日,第3版。
- ⑤ 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第3章,附录。
- ⑥ 《民立报》,1910年12月19日,第4版。
- ⑦ FO371/1090,《1911年第二季度情报述要》,附在朱尔典1911年9月16日致格雷的第363号文件中。
- ⑧ FO371/1090,拉姆齐撰写的《1910年第四季度情况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4月25日致格雷的第176号文件中。
- ⑨ 同⑦;周锡瑞认为,湖南省财政预算收入674.5万两银,支出831.7万两,参阅他写

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15页。周锡瑞所用资料是巡抚杨文鼎的奏折。但是，杨文鼎可能低估了不足之数。

- ⑩ 同⑦。
- ⑪ 《民立报》，1910年12月24日，第3版。
- ⑫ 同⑦。
- ⑬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68页。
- ⑭ FO371/867，《1910年第一季度情报述要》，附在麻木勒1910年6月10日致格雷的第194号文件中；同③。
- ⑮ 《民立报》，1910年10月14日，第4版。
- ⑯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第3版；14日，第3版；28日，第3版。
- ⑰ FO371/1090，《1911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朱尔典1911年6月22日致格雷的第200号文件中。
- ⑱ 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3页。
- ⑲ 《民立报》，1911年7月8日，第2版；17日，第3版；19日，第2版；8月29日，第4版；《泰晤士报》，1911年8月15日，第3版。
- ⑳ 《民立报》，1911年7月21日，第4版；MP321/305，1911年8月16日剪报，报名不详。
- ㉑ 同⑰。
- ㉒ 《民立报》，1911年7月17日，第4版。
- ㉓ 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63页。
- ㉔ 《民立报》，1911年9月6日，第5版；9日，第4版。
- ㉕ 同⑩。
- ㉖ 参阅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农民起义部分，尤其是第413—423、497—525页。并参阅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第39—41页。
- ㉗ 晚清湖南的革命运动，参阅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查尔顿·M·刘易斯：《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观念和制度的转变（1891—1907）》；查尔顿·M·刘易斯：《湖南精英与改革运动（1895—1898）》，见《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1期（1969年11月），第35—42页。
- ㉘ 沈懋：《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见《社会科学》第2辑第2期（1937年1月），第374—375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296—300页。
- ㉙ FO371/3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湖南新军的报告》，附在康乃吉1906年7月9日致格雷的第295号文件中。
- ㉚ FO371/223，《来自湖广总督的密件》，朱尔典1907年1月7日致格雷的第9号文件附件2。
- ㉛ FO371/220，《1906年第四季度长沙情报摘要》，附在朱尔典1907年2月21日致格雷的第98号文件中。
- ㉜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4卷，第164页；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66—167页；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第97—98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2卷，第137—138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130—131页。
- 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160页；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70—171页。

- ③④ 《泰晤士报》，1910年4月18日，第7版。
- ③⑤ 同①。
- ③⑥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497—498页；《北华捷报》，1910年5月27日，第512—513页。
- ③⑦ FO371/867，麻木勒1910年5月5日致格雷的第142号文件。
- ③⑧ 《北华捷报》，1910年5月6日，第310页。
- ③⑨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79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3册，《各省光复》第1部分，第9—10页。
- ③⑩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3册，《各省光复》第1部分，第11页。
- ④①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卷，147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159页。
- ④② 同③⑧，第114页表4。
- ④③ 《民立报》，1911年1月2日，第2版。
- ④④ 《民立报》，1911年7月18日，第4版；27日，第4版。
- ④⑤ 《民立报》，1911年9月7日，第4版。
- ④⑥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安庆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255页。
- ④⑦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安庆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④⑧ 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第222页，案卷号2106/2—5。
- ④⑨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卷，第221—229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766—770页；玛丽·巴库斯·兰金：《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上海浙江的急进知识分子（1902—1911）》，第180页。
- ④⑩ FO371/435，《安庆兵变报告》，朱尔典1908年12月4日致格雷的第543号文件附件2。
- ④⑪ 美国首都华盛顿档案馆藏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十进制卷宗，1910年中国国内事务类（以下略作USDS）893.20/18，驻南京领事1911年4月14日致国务卿第92号文件；《北华捷报》，1908年11月28日，第527—528页。
- ④⑫ 《北华捷报》，1908年11月28日，第528页。
- ④⑬ FO371/871，韦乐沛撰写的军事报告，附在麻木勒1910年6月14日致格雷的第195号文件中。
- ④⑭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256页。
- ④⑮ 《民立报》，1910年11月19日，第4版；1911年5月23日，第3版；7月13日，第4版；23日，第4版；8月25日，第4版。
- ④⑯ 同④⑮，第227—231页；FO372/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九江新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④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卷，第304页。
- ④⑱ 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2年中国年鉴》，第225页；同④⑱。
- ④⑲ 《民立报》，1911年7月8日，第3版；5日，第4版；13日，第4版。

- ⑩ 江西革命运动的详细研究，参阅塞缪尔·耶尔·库伯：《江西的变革（1905—1913）》，未刊博士论文。我撰写江西有关内容时，很重视参考这篇论文。
- ⑪ 塞缪尔·耶尔·库伯：《江西的变革（1905—1913）》，第112—113页，引用了李烈钧写的《李烈钧将军自传》第7页内容。
- ⑫ 同⑩，第345—349页。除了这里引证的资料，我未曾找到关于共进会江西分会的任何其他资料。
- ⑬ 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第16—21页；塞缪尔·耶尔·库伯：《江西的变革（1905—1913）》，第103—106页。
- ⑭ 同⑩，第218页；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九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⑮ 同⑩，第234页；FO371/432，《关于第九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1月3日致格雷的第497号文件中；WO33/549，伦敦陆军参谋部1908年12月整理的《江苏省军事报告》，第59—63页。
- ⑯ 同⑩，第233—234页；同⑩，第199页；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驻清江浦第九镇及其他部队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7日致格雷的第321号文件中。
- ⑰ 同⑩，第208页；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9页；WO33/552，伦敦陆军参谋部1910年8月整理的《江苏北部军事报告》，第51—52页。
- ⑱ 同⑩。
- ⑲ FO171/223，《领事柯魁良致朱尔典书》，附在朱尔典1907年1月7日致格雷的第9号文件。
- ⑳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245页。
- ㉑ 同⑩，第219页。
- ㉒ FO371/853，韦乐沛撰写的《关于中国陆军军纪涣散的报告》，附在麻木勒1910年4月30日致格雷的第134号文件中。
- ㉓ USDS893. 20/14，驻南京领事1911年2月20日致嘉乐恒的第76号文件；WDGS6562—1，《1910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6—27页。
- ㉔ 同⑩，第235—236页。
- ㉕ FO228/1762，《1910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葛福1910年4月13日专件中。
- ㉖ 《民立报》，1910年10月19日，第3版；1911年1月25日，第3版。
- ㉗ 同⑩；《北华捷报》，1910年2月18日，第356页。
- ㉘ 同⑩；并参阅FO371/863，麻木勒1910年4月4日致格雷的第108号文件。
- ㉙ USDS1518/374，《驻南京副领事致费勒琪书》，附在费勒琪1910年4月1日致国务卿助理的第160号文件中。
- ㉚ 《民立报》，1911年5月20日，第4版；8月15日，第4版；FO228/1799，《1911年第三季度情报》，附在领事皮兹堡斯1911年10月3日致朱尔典的第25号文件中。
- ㉛ 《民立报》，1911年4月11日，第4版；7月1日，4版。
- ㉜ 同⑩，293—302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4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4部分，第415—420页。
- ㉝ FO223/1804，《1911年第二季度情报》，附在领事伟晋瓊1911年7月13日致朱尔典的第21号文件中。
- ㉞ 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杭州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7月5日致格雷的第319号文件中；FO228/1663，《1907年第三季度情报》，附在代领事施弥德

1907年10月1日专件中。

- ⑮ FO371/214, 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杭州驻军的报告》。
- ⑯ 同⑮。
- ⑰ 同⑮, 第93—96页; 玛丽·巴库斯·兰金:《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上海浙江的急进知识分子(1902—1911)》, 第194—197页。
- ⑱ 同⑰, 第91—93页; 第96—97页。
- ⑲ 玛丽·巴库斯·兰金:《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上海浙江的急进知识分子(1902—1911)》, 第190页。
- ⑳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各省光复》第2部分, 第147页。
- ㉑ 《民立报》, 1911年10月15日, 第3版; 1910年11月12日, 第3版。
- ㉒ 《民立报》, 1911年8月25日, 第3版; FO228/1801,《1911年上半年情报》, 附在领事赛斐教1911年7月16日致朱尔典的第7号文件中。
- ㉓ 同⑲。
- ㉔ 田中义一:《新军》, 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第382页。
- ㉕ 同⑲。
- ㉖ 《北华捷报》记者在评论1910年广州和苏州军队闹事时, 呼吁中国政府:“追查那些军官的责任, 他们放纵士兵胡作非为……”, 见《北华捷报》, 1910年2月18日, 第354页。
- ㉗ 同⑲。

第七章

华南新军与北洋军

本章论述的华南新军限于广东和云南两省，因为同盟会革命党人在广东孜孜不倦地工作，爱国军官为了在云南部队里传播革命思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北方新军的论述重点，放在1911年以前驻守京畿地区和东三省的北洋军。北洋军被看作大清帝国的军事堡垒，革命党人对北洋军的策反活动效果较小。但是，政治鼓动与军人自发的怨愤对北洋军也起作用的，破坏了部分部队对清皇朝的效忠意识。

一、广东的情况

据清廷计划，广东要组建两镇新军，先编练一镇，另一镇取决于今后财政状况。新军的扩建极其缓慢。1906年，两广总督的亲兵队改编为新军2个标，只有步兵3000人。炮兵、工程兵及辎重兵等部队计划到1907年编练，那时在地方军事学堂学习这些专业的学员将完成学业。由于广东多丘陵，地形高低不平，骑兵被认为无关紧要，事实上好几年都没有组建骑兵。士兵大多是安徽人和四川人，另一些来自广西与云南交界地区，广东本地人寥寥无几。士兵年龄通常在16岁到20岁之间。服役年限不作规定，因为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1903—1906年在任)认为，现役士兵退伍后找不到

工作,会沦为盗贼。1906年发生二三起开小差事件,逃兵被抓获后砍头示众,看来是为了对部队起威慑作用。^①

有两所军事学堂在1906年进行教学。广州的陆师学堂有学员180名,其中步科60人,炮科、工程科和辎重科各40人,由3名队级军官任教。入学考试内容是中文写作、初等数学和化学。2名中国人任总办,由中国教习辅佐的日本教习提供实质性的指导。设在黄埔的武备学堂有学生120名,学制5年,其中2年是基础教学。最年轻的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大的几个学生26岁。二三十名学生因行为不端被开除。

1906年下半年,这所武备学堂迁到广州,与陆师学堂合并为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该学堂转为讲武堂,学制1年,培训高级军官。在此之前,在黄埔开设了一所陆军小学堂。计划在广州开设的陆军中学堂从未付诸实施。^②

1907年初,两广总督周馥(1906--1907年在任)着手组建第三个标,由现存的2个标提供部分兵源,再训练部分新兵。按设想,新建的标要成为广州新军的楷模,新兵从广东本省招募,标准是能读会写、身体健康。强调从本省招募兵员这一条,前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在任时不以为然。但是,从本省招兵的工作不免令人失望,当局认为志愿报名者个人动机过分强烈。征募新兵的军官要去有关的府会晤地方官员,以便得到必要的协助。在招兵军官抵达之前,地方官员晓谕本辖区青年,说明他们对国家应该承担的军事义务。每个愿意入伍的人要详细填写家庭与本人情况,以及担保人的姓名。合格的青年住进招兵站,每天领取津贴,等候调往广州。^③

那时广东已设立了省督练公所。鉴于新军素质不高,炮兵和工程兵特别差劲,周馥把所有新军步兵合并为2个标,每标设3营(附设1个学兵营)。在步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分兵种训练过程中,

选拔可造就的士兵,让他们担任正、副目。1907年秋举行的阅兵表明,有些士兵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标准。表现太差的士兵后来被淘汰了,结果每标只剩下2个营。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征募新兵,以补充部队的兵员。^④

1908年初,张鸣岐接任周馥两广总督职位(1908--1911年在任)。张鸣岐走马上任后首先办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对省督练公所进行了有效的改组。为了提高督练公所办事效率,他任命3位精明强干的人物分别担任督练公所下属3个处的总办,他们是湖南人韩国钧、傅文通和湖北人李哲湘。他还打算再编练3营步兵,使广州新军的兵力达到混成协的标准。此后,再编练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共4营。这位总督设想的混成协,估计每年要花费60万两银。为了筹措这笔款项,计划第二年大量遣散本省绿营部队,至少要裁撤绿营官兵70%。^⑤

广东的新式军队从1907年底的2800人^⑥增加到1910年的5600人,但比旧式军队少得多了。1910年分散在该省各地的旧式军队有巡防营38729人,八旗军7550人,绿营军4829人。^⑦一名美国军官认为广州新军全部兵力(当时有3个标,尚未组建成第二十五镇)为6400人,但他又补充说实际战斗人员要少得多。^⑧驻广州新军在1911年还是一个混成协,但设置了镇级机关。^⑨

1907年以后,新兵招募工作颇得人心,吸收有文化青年入伍进行得相当顺利。到1910年,大多数新军士兵是广东本省人。许多军人与普通学生一样,富有爱国主义意识。有些军人已经懂得,他们可能要为祖国而战斗,或许将为祖国而牺牲,但他们不怕死,发誓要献身于中国的事业。^⑩

爱德华特·罗兹曾引用文件论证,义和团运动以后的10年里广东实施了许多改革。同时,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1905至1907年开展得相当有力而活跃,但到1911年变得衰弱并发生了分

裂。^⑩就策反当地新军而言，同盟会活动的特点显然是时断时续，成效甚少。1906至1908年，同盟会会员很少在广州郊外的乡村城镇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只是吸收屈指可数的几个高级军官入会，没有试图去赢得低级官佐的支持，也没有深入到士兵当中去。

黄兴在这些年里跟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有过几次个人交往。1904年秋，黄兴在上海会晤郭人漳，从此发展起良好的友情。1906年初，黄兴去桂林会见在那里任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郭人漳拒绝采取任何公开行动，借口是他跟陆军小学堂总办蔡锷的关系不好。1907年5月，革命党人正策划在广东西南部的钦州发动另一次起义，黄兴赴钦州再度拜会已调往那里的郭人漳。与此同时，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奉命去运动赵声。赵声当时任新军标统，率军临时驻扎在钦州附近的廉州。赵声被第九镇解除职务后来到广州，进入广东新军，开始时任营管带，并加入同盟会。尽管赵声有革命热情，但他跟郭人漳持同一态度，表示只有组织起数量“可观的”革命军队，他的部队才能支持这次起义。言下之意或许是，除非其他部队的指挥官同意起义，否则他们不会首举义旗。到9月起义爆发时^{*}，郭人漳对起义力量不屑一顾，赵声见郭人漳不愿采取行动，于是决定不支持那场看来组织差劲、武装力量软弱的起义。^⑪

1908年1月，黄兴和谭人凤第三次请求郭人漳援助，郭答应支持他们。但3月份发生的起义看来没有成功希望时^{**}，他转而又改变了主意。那年秋季，同盟会领导人企图在广州新军里煽动兵变，但后来发现赵声的第一标尚未作好充分准备，被迫转向士兵中有大量会党分子的巡防营，企图发动“保卫亚洲”兵变，但未谋划成功。^⑫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要争取军队的支持，革命党人仅仅跟几个高级军官友好交往是不够的。即使这些军官同情革命，但在

* 指1907年9月的钦廉防城起义。

** 指1902年2月27日爆发的钦廉上思起义。

起义力量强大到极有可能夺取胜利之前，他们不愿对清政府反戈一击。

除了这些靠私人关系的活动，部分失意学生对策反广州新军也作了个别的努力。这些学生因品行不端、学习太差，被陆军小学堂开除。他们投身革命，部分原因是学业上失败，部分原因是加入同盟会并受了影响。他们对军事学堂的学生进行宣传鼓动，使三四十名军校生参加了同盟会。^⑭但是，这些分散零星的努力远远不能争取到新军士兵的普遍支持，而且也无法形成有组织的革命颠覆活动。

直到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建立后，才开始对新军进行有组织的策反。此后，同盟会南方支部与同盟会香港分会之间才有分工。香港分会成立于1907年，冯自由任会长。那时，南方支部负责军事策反，并在广东发动起义，而香港分会致力于会务，以及在香港发展新会员。^⑮

胡汉民负责同盟会南方支部，选定赵声作副手。赵声虽然没有给1907至1908年两广一系列起义提供实质性支持，但参与了在部队里传播革命思想的活动，结果在1909年初被迫弃职。后来他赴香港，在胡汉民手下工作。由于赵声已经离开部队，只能依靠军内老朋友倪映典。倪映典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曾在新军第九镇做过炮兵低级军官，后来调往安徽，在那里卷入熊成基兵变，兵变失败后逃到香港并加入同盟会。他用了化名，在广州新军第二炮标当排长。^⑯

重新获取军职后，倪映典成为广州新军内部革命活动的组织者。他的宣传主题集中在种族色彩浓厚的排满反清，强调北京政府里满人已占尽优势，攻击现行的宪政改革是一场骗局。他宣称革命事业获得了学生、教员、学者、地方报刊、商人及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他还计划把革命军人按新军编制组织起来，也设置协、

标、营各级指挥官，他自命为革命军队的协统。每个革命军人得到一张香港印制的同盟会会员证，上面写明本人详细情况、入会日期。同盟会许诺付给每个入会军人10元入会津贴，由于经费短缺，这笔津贴延搁未付。但是，物质奖励和纪念品确实是有的。例如，一名积极勤勉的同志可望得到1块表或类似的奖品，发展10个同志入会者奖优等勋章，向100人以上进行秘密策反活动者获优等特别勋章。同盟会还答应入会军人，一旦推翻满清皇朝，他们将得到提升。不论是谁，只要他鼓动起一支新军部队起义，就将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⑩ 这条规定，对那些怀有晋升雄心的低级官佐和士兵具有刺激作用。当然，这也造成另一方面的问题，部分军人的革命热情是以能得到多少好处为转移的。

同盟会南方支部参照倪映典的建议，制定了策反军队的十条章程，声称其目的是“果敢切实”地发动广州新军、旧式水、陆师等所有武装力量，并将设立对南方支部负责的3个中心。实际上，南方支部指定这些中心的负责人，并提供活动经费。吸收会员首先从弃目着手，因为革命党人相信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能影响普通士兵。虽然章程要求革命同志应该为总起义随时作好准备，但没有确定革命的具体日期。^⑪

广东策反军队的模式至少有3点跟湖北模式不一样。首先，广东革命党人对巡防营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新军，因为巡防营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新军，即使革命党人把新军全部争取过来，只要旧式军队抱敌对态度，他们还是有足够力量守卫广州的。因此，同时争取新军和巡防营的支持是因地制宜的策略。湖北的情况则相反，革命党人集中做新军工作是明智的，因为新军兵力达到16104人，而八旗军兵力9539人，绿营军7262人，巡防营7600人。^⑫ 在湖北，革命党人一旦争取到新军，就能从容对付各类旧式军队。

第二，广州的策反活动受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指挥和资助，南方

支部主要的鼓动家是军外人士,尽管有少数鼓动家在军中服役。因此,革命军人受平民团体的控制,两者实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倪映典跟广州的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按规定要向香港方面作定期汇报,而在香港的决策人物是胡汉民和赵声。^②在湖北,革命军人不受任何军外组织的指挥,这就避免了革命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扩大隔阂。但是,广州存在着这种隔阂。我们即将论述,广州军内外隔阂是革命运动的严重缺陷。

广东模式不同于湖北模式的第三方面是,排长和弁目主要是当地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正式军官不是由北京任命,就是从留日军校毕业生中吸收,而本省培养的军人升任正式军官者寥若晨星。倪映典充分利用了军官成份中存在的问题。^③

由于倪映典必须定期奔走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他的活动引起军事当局的注意。1909年6月至11月,包括倪映典在内的一些军人因涉疑酝酿革命,先后被逐出军队。此时,据说有3000名新军军人加入了同盟会。革命党人遂决定利用春节假期发动起义,假期从2月10日开始。按计划,新军将率先发难,巡防营和本省人士组成的辅助性突击队作策应。起义日期定在2月24日。除夕那天,第二标和第三标的一些军人为细琐小事与巡警发生冲突,若干名军人被拘押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军人攻击巡警。军事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取消了春节假期。军人们要求当局撤回成命,遭到拒绝后,他们就煽动闹事。^④

那时,倪映典虽然已被解除军职,仍然留在广州组织革命活动。他唯恐军人与巡警的冲突会打乱起义计划,赶赴香港,与南方支部商议对策。考虑到军人已经失控,他建议提前起义。于是,南方支部决定2月15日发动起义,并立即将倪映典派送回广州。黄兴、赵声和胡汉民都答应倪映典,在他发动起义后,他们也参加。由于2月10日暂停摆渡,倪映典直到12日才赶回广州。他抵达广州

时，第一标数百名军人已经发动兵变了。他别无选择，只能根据局势变化马上采取行动，于是率领1000名起义者攻打总督衙门。但他们的人数少于提督李准指挥的保皇部队。倪映典遭到杀害，第二天当局控制了广州*。

这次兵变失败反映出军外人士控制军内革命运动的根本性缺陷，尤其糟糕的是军人没有自己的革命团体。在香港的同盟会领导人对广州革命军人未能取得充分的组织控制。结果，地方形势突变造成联系中断时，军人贸然自行其事，因为他们没有受同盟会领导人或军内团体的约束。香港与广州之间的距离，军外领导人与普通士兵之间的隔阂，使兵营里的军人难以实施南方支部领导人的决定。

接着发生的是广东革命运动最壮观的一幕，1911年4月广州起义。有关这次起义的轶事传闻被反复讲述^②，于此只需提几点耐人寻味的看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首先，出乎同盟会领导人意料，新军并没有对清政府反戈一击。其次，巡防营迅即镇压了平民组成的起义队伍，守住了广州城。其三，这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华南一系列武装暴动的最后一次尝试。在给清政府猛然一击的同时，失败的起义使广东革命士气遭受严重打击，以致人心涣散。赵声沮丧之余死在香港，即使不屈不挠的黄兴和胡汉民也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黄兴万念俱灰，竟然4个月没心思给任何人写信。当他听到他的朋友杨守仁自杀的消息后，一度考虑自寻短见，一死了之。同盟会自己承认，5年内无力再次发动起义。

尽管新式部队没有参加这次起义，但两广总督怀疑他们同情革命运动，并不信任他们。起义爆发前，当局逼迫新军从广州城内撤出去，到东大门外看管农作物。如果新军加入革命党人一边作

* 这场“兵变”，史称广州新军起义。

战，他们优良的武器装备将使革命党人大大受益。诚如美国驻广州副总领事指出的那样，“很可能他们（新军）对广州不是安全的因素，而是危险的源泉”。^{②4}

提督李准指挥的巡防营是广州政府掌握的训练最出色、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挫败兵变和革命，支撑着地方政权。他们的兵力多达4500人（不包括广州以外的巡防营），分成15个营。他们的忠诚在这次起义中得到很好的考验。广州起义后，广西提督龙济光率领的2700名广西巡防营官兵调入广州。广西巡防营的实力与广东巡防营不相上下，由于他们来自外省，被认为是对付广州骚动的有用工具。^{②5}8月中旬，继革命党人企图谋杀提督李准之后，新军被分割开来，调往广东省不同地区，只剩下少数几个营留驻广州。^{②6}

二、云南的情况

根据新军编练规划，云南将建成2个镇。但是，云南的军事状况直到1907年仍是够可怜的。云贵总督丁振铎（1904—1907年在任）是一名腐败无能的行政官员，对军队事务漫不经心。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是绿营军，直到1905年地方当局才半心半意地在昆明编练新军。新军3个步营组成1个步标，加上四分之一营兵力的炮兵，总共约1500人，由当地一名道台组织管理。^{②7}云南新军素质低劣，他们的实力在丁振铎任云贵总督期间没有明显提高。

蒙古旗员锡良于1907年5月接任丁振铎的云贵总督职位。他一到昆明就发觉，新军徒有虚名，实质还是老样子。人们往往把新军混同于旧式军队。新军的新式武器数量极少。由于营房没有竣工，新军士兵夜间在街头游荡，军纪散漫，跟旧式“勇营”差不多。更有甚者，军事学堂里没有受过近代教育的教习，事事处处杂乱无

章。^②

1903至1907年锡良任四川总督，在整顿编练四川军队方面有所建树。他接任云贵总督职务后，决心去除云南新军里的“弊端”，于是起用能干正直而有经验的文武官员，撤换无能的官员，由此清除了许多腐败现象。从四川调来一些受过近代训练的教习和军校毕业生担任负责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宦。他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曾留学日本，在出任云南新军负责长官之前任四川讲武堂会办。^③

锡良还从四川带来一营训练良好的新式部队，其中约100人组成亲兵队。此外，调来一营广州新军。这支部队早已由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调经广西，开赴云南方向。这是因为岑春煊以为自己将调任云南，但他估计错了。这两个从外省调来的营逃兵不少，因为他们感到饷银不足以供养分居两地的家属。^④

在锡良的督理下，云南新军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他下决心至少要建成一个兵员足额的镇，新军经费专款专用，而不必遣散对维护地方法律秩序还起作用的各类旧式军队。他建立起一所测绘学堂，兴办皮革制造业，建造了新营房和一个宏大的练兵场，并在昆明城外筑起有防御设施的兵营。^⑤

锡良上任后六七个月内，昆明新军兵力增加到3125人，设有4个步营和1个炮营，但尚未建立骑兵和工程兵部队。五分之二的新军部队由外省调入，步兵使用毛瑟来福枪，炮营拥有四五十门山炮。士兵每天训练2次，有些训练项目每天都得坚持，至少条文上是这样规定的。当地兵工厂恢复了生产，制造毛瑟枪子弹，而且打算重新生产来福枪和山炮，此类枪炮在前总督丁振铎任职期内一度停造。^⑥

锡良十分重视军事教育，选用了较好的教习。1907年底，武备学堂有200名学生，分成2班，不需要交学费。但是，如果学生在完

成学业前潜逃或退学，他们的父母必须按规定偿付学费。陆军速成学堂有100名学员，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他们的训练科目有对抗演习、步兵操典、算术、中国式射击及发信号等。或许因为合格的教员太少，所以没有设外语课。1908年，锡良创设陆军讲武堂，开始培训新一代云南陆军在职军校生。云南在提高军事效率方面干得劲头十足。英国驻昆明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员证实了这种情况，“按西方模式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军事改革体现出人们无与伦比的诚意”。^⑧

1909年，云南编练成新军第十九镇，据可靠资料，兵员尚不足额。1个标驻扎在昆明城北门外的大场坝，另1个标在南门外巫家坝，第三个标在蒙自西北53公里处的理安，第四个标在大理。每标下设3营，每营约500人。还有3个过山炮营。当炮兵接受充分训练后，将配备54门最新式的75毫米口径克虏卜山炮。工程兵人数少、技术差。由于难以获得合适的牲畜、挽具和鞍座，辎重部队尚未建立。^⑨

士兵定期领取足额军饷，仪表整洁、营养良好，而且军纪不差。虽然军官们认为云南人多少有点野蛮，要求用体罚加强军纪，或许由于锡良坚持己见，军中还是取消了鞭责。

极大多数军官是外省人，在北京或天津受过培训，少数军官曾留学日本。镇统制陈宦1909年随锡良去东三省后，统制一职由安徽籍协统崔祥奎接任。崔祥奎在中国北方度过15年军事生涯，还去日本留学2年。他精明强干，劲头十足，执行军纪严明，深受锡良赏识，因而在1908年年底被任命为镇统制。但年轻的协统张仪办事效率不高，标统级总参议官张青泰缺乏优秀军官的尚武气质。有些军官似乎不愿在云南服役，包括一名标统在内的几名军官辞职离去，其中二三人故意违反军纪，以求被解除军职。另一些军官的辞呈未获同意，正待新总督李经羲上任后酌情处理。

云贵总督李经羲(1909—1911年在任)具有前任那样的改革热情,但由于经费不足,他不打算编练第二个镇,而是强调要提高第十九镇的素质。^⑤他的努力在第二年已被证实相当成功。德国陆军退役中尉克拉特曾观察过云南新军在1909年和1911年的两次会操,对云南新军在短短时间内取得明显进步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并不否认军官缺乏经验造成了一些战术错误。^⑥

由于大力推行招募当地人入伍的政策,到1910年所有新军士兵都是云南本省人。新兵大多是自愿应募的,饷银标准与中国北方的新军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军官的人数正在增加,取代了不安心工作的外省军官。这一年,约有半数军官是云南人,从四川调来的军官占25%,其余的来自华中和华北。但必须指出,云南人担任低级军官,外省人在高级军官中占尽优势。^⑦

尽管如此,军官人事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一年前,云南籍日本军校毕业生李根源就任讲武堂总办。经李根源援引,另一名云南籍日本军校毕业生罗佩金不久出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他俩都是同盟会会员,留日期间政治上很活跃,而且都受到去广西任职的聘请,但他俩都觉得在广西工作缺乏吸引力。他俩同样出身体面人家,又中过秀才,并且都表现出激进倾向。^⑧

同时升起的地方军事明星中,更为光灿夺目的人物是第三十七协新协统蔡锷。湖南人蔡锷曾是秀才,1901年进日本成城学校,毕业前去日本第二骑兵联队见习,1903年进入士官学校。留日期间,他与中国改良派人士和革命团体积极交往。他是中国尚武主义的坚定信徒,十分关切中国的民族危机,本著作对此将进一步展开。1904年他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先后去江西、湖南和广西军队任职。他在广西工作5年,在军队和军事学堂历任重要职务。受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请,他转赴云南任职。他与李根源、罗佩金一样,

也是同盟会会员。^⑳

由于深得云贵总督信任,蔡锷在1911年任用或提升一些他喜爱的归国留日军官。经他援引,第七十四标标统曲同丰升任第三十八协协统,原职空缺由罗佩金填补。归国留学生非但被授予军官职衔,而且在讲武堂里取得支配地位。1911年云南讲武堂29名教习和负责官员中,24人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3人是日本测绘学校毕业生,另2人的学历情况无从考证。^㉑

这些归国留学生大多是云南人。第三十七协11名标统和营管带中,7名是云南人,四川人、河南人和湖南人各1名,另1人的籍贯难以查考。^㉒但应该注意到,没有一个云南人官至协统或协统以上。接任崔祥奎镇统制一职的原协统钟麟同是山东人,上文已提到蔡锷是湖南人,协统曲同丰是河南人,做过段祺瑞部属的陆军总参议靳云鹏是山东人。事实上,来自山东的中高级军官人数众多。从总体看,这些北方军官仍然是云南军队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就像士官系与北洋系存在着门户之见一样,这时云南籍军官与外省军官之间的感情也不融洽。^㉓

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军官和教习是云南军队里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角色,讲武堂成为鼓动革命的中心。威廉·约翰逊曾列举10名讲武堂教习和负责官员,其中7人是同盟会的活跃分子。^㉔讲武堂的学员可分为3类,A类是新军第十九镇营管带到排长的军官,B类是巡防营类似级别的军官,C类是接受军训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普通院校毕业生。此外,还有一个特别补习班,学员来自师范学堂毕业生以及正规陆军附属军事学堂的优秀军官。教程都是1年。A、B类学员毕业后回部队任原职。^㉕

有些教习不加掩饰地鼓吹革命,并反复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有一名教习津津乐道于宋朝英雄岳飞将军抗击

金兵侵略的事迹,另一些教习讲叙明末爱国者为抗击清军、保卫大明江山而慷慨捐躯的故事,还有一些教习喜欢谈论孙逸仙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时,陆军讲武堂里还传阅包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内的各类宣传品。^⑤

激进军官和教习的民族主义锋芒,主要指向帝国主义,而不是鼓吹种族色彩的排满斗争。云南地处边陲,面临驻安南法军和驻缅甸英军的威胁,是培育反帝种子的肥沃土壤。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那里获得了建造铁路的特许权,看来他们正在加紧活动,以攫取更多权益。英法侵略行径激发起云南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出于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愿望和目的,大批学生选择当兵从军这条路,准备为此献出他们的生命。^⑥

1910年4月,法属安南到云南的铁路竣工,激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车抵达昆明时,李根源眼看中国为维护主权和铁路权益的努力再次失败,感到羞愤难当。讲武堂给学员放1天假去看这列火车,并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一名教习看着首次开到昆明的这列火车,悲愤交加,忍不住当场哭泣起来,随他前往的学员也饮泣流泪。^⑦

在铁路事件前后,中国政府为片马与英国人发生争执。片马是云南西部腾越与英属缅甸之间有争议的小村落。1910年5月,北京正式宣布对片马拥有管辖权。英国代办回答道,英国政府认为片马是缅甸领土的一部分。此后的谈判,中英双方只是重申各自全然不同的观点。这年12月,英国向片马派出远征军,第二年1月占领了片马。北京政府抗议英国侵犯中国边境,重申中国对片马拥有无可争议的 sovereignty。^⑧

云南谘议局对英军占领片马反应非常强烈,要求清政府坚持强硬立场,否则进一步的外来侵略将接踵而至。^⑨陆军军官和军校学员也异常激愤,极力敦清清政府不要让步。军事学堂里的爱国主

义情绪高涨,数百名军人前往腾越和片马。1911年4月,英国人的态度趋向缓和,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大动干戈把中国人赶出片马了,而且他们发觉中国人管理这一有争议地区的证据比他们原先估计的要充分,于是撤回了远征军。^⑤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英帝国主义的一次失败。

总之,教习们传播并鼓动爱国主义思想观念,在讲武堂里得到很好的反响,讲武堂的毕业生又回到他们的部队里去传播爱国思想。据推测,1910年到1911年讲武堂培养了800名革命军官,分配到现役部队,对士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⑥

蔡锷被看作为革命领袖,广西省咨议局的确曾建议总督李经羲不要让他负责军务。^⑦毫无疑问,蔡锷参与了对当地军队的鼓动,但作为协统,他的行动是十分谨慎的,从不以激进人物的姿态出现。事实上,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并注释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军事格言。^⑧他这样做究竟想掩饰他的革命活动呢,还是他确实不属革命党人,这是难以判断的。尽管如此,云南军官集团中有些革命分子正在努力促使清皇朝垮台,这点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很难判断军官或士兵中是否存在革命团体。云南的激进分子跟广东不一样,他们不受同盟会领导;与湖北革命党人的差别在于,他们没有把自己或士兵紧密地凝聚起来。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时,他们也未能成功地阻止裂痕扩大。譬如,一批激进分子希望一名云南籍军官做他们的领导人,另一批激进分子则倾向于蔡锷。何况,在云南军队服役的原北洋军官对激进行为反应冷漠,成为革命事业的障碍,使这种局面更加复杂了。^⑨

但是,部队的不满情绪未必需要一场革命运动来激发。跟其他地区一样,1910年到1911年云南的财政状况不景气,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第十九镇每年正常开销需银150万两,其中110万

两由省政府拨给,其余的由北京政府补足。^⑤虽然第十九镇在1910年已经组建完毕,但要维持现存水平却有困难。禁止鸦片贸易,使地方政府的年收入大为减少,何况民众普遍贫困,已经没有增加赋税的余地。维持第十九镇正常开销还短缺资金80万两银,北京的年度拨款已拖欠长久,湖北理应每年协济云南30万两银也交不足数。^⑥英国驻昆明总领事在1910年8月报告道,云贵总督下令军官减发俸薪20%。柏来乐在12月访问云南期间也发现,当局很难觅到银钱来支付军人俸饷。^⑦

由于通货膨胀及其他因素,第十九镇1911年的预算上升到210万两银,占全省总开支的三分之二。后来削减到190万两,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出云南省财力承受限度。结果政府下达命令,尽快遣散更多的旧式部队,对新军则大幅度削减军装、被褥、口粮及其他各种军需品的供给数量,使预算降低到177万两。但省库至多只能提供146.1万两银,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削减军费。于是,军事学堂裁减教职员工。1911年7月,人们议论纷纷,说讲武堂因经费支绌要关闭(另一个理由如云贵总督所说,云南军队已经有足够的军官)。^⑧

云南也遭受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1911年以前连续几个好年成,粮价随之下跌不少。不幸的是,1911年刚开始就时常发生水灾,这年夏季罕见的暴雨毁坏了全省粮食作物约40%,洪水冲垮了昆明附近的几个村庄。稻米和其他食品短缺,引起全省普遍不满。^⑨军人也身受其害,难以忍受。

军队骚动不安还另有原因。譬如,严厉的军纪使士兵愤恨不已。云南西北部的部队在1910年10月哗变滋事。原因之一是,一月前驻四川一支部队发生兵变,因此来自四川的逃兵增多了。另一个原因是,两名云南籍弁目因赌博这种轻微违纪行为而遭处决。上一年,几名逃兵被抓获后立即在大理斩首,这一事件几乎引起部队

反叛。^④

到处都发生开小差事件。1910年夏,逃兵每月平均达120人,占新军总人数1%。大理采取严厉措施阻止开小差事件,一旦抓获逃兵,即行处决。^⑤但这种威慑手段根本不能阻止士兵逃离部队。

军队孕育不满并受到颠覆,由此产生一个重大疑问:一旦爆发革命,他们还能清政府战斗吗?一名消息灵通的英国记者兼旅行家持如下观点:

这些士兵是从平民百姓中挑选来的。如果不久以后发生动乱,人们将毫不诧异地看到,士兵的军事技术仍然生疏,他们将投向能给他们最多利益的一方。曾有过如此幽默的评论,一旦发生兵变,中国士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枪杀那些残酷虐待他们、迫使他们进行长时间艰苦训练的军官。^⑥

三、北洋军队

由于把北洋军官看成对反革命人物袁世凯个人效忠的集团,因此有些论者就推断北洋军是一支保皇部队。这种推测的依据是,1909年至1911年袁世凯虽然退隐家乡,但还是跟愿意支持他的老同事们保持联系,从而控制了大部分北洋军。例如,北洋军起先与革命武装力量交战,后来又为和解进行谈判,这些都跟袁世凯有关。如此推断有对有错。说它是正确的,因为袁世凯确实对北洋高级军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军官在政治上和职业上与他合作共事,并把他推崇为军事改革家。说它是错误的,因为北洋军没有同心协力地效忠于袁世凯或清政府。斯蒂芬·麦金诺和欧内斯特·扬都十分怀疑北洋军官对袁世凯个人的忠诚。^⑦

从出身地域或教育背景看,北洋军官决不是整齐划一的集团。

他们来自北方不同的省份。北京、天津或保定培训出来的军官组成所谓北洋系。另有相当多的青年军官毕业于士官学校或日本其他军事院校,1909年到1911年这类军官进入北洋军的人数特别多。还有少数军官以前是旧式部队指挥官或土匪首领。这三类军官有各自的雄心,对清皇朝统治的态度不尽相同。例如,国内培训的军官被安置在高级职位上,他们的职权使毕业于日本的青年军官感到怨恨。

士兵似乎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基本需要以及按时领取足额军饷,这在1910年和1911年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那时通货膨胀,粮食短缺,全国各地财政极不景气。只要能定期领取全饷、充足的食物和衣服被褥,士兵就满足现状并听从命令,至于谁来领导他们并不重要。反之,如果他们的基本需要被忽略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转而反对自己的长官。

一般说来,北洋军的纪律比南方各镇新军要严明得多,但北方军人的不满情绪同样存在。一名传教士在1908年9月报告道,第五镇驻济南的部队中会党分子占了三分之一,“反对清皇朝的情绪溢于言表”。^⑤更为重要的是,北洋军仍然实施体罚,而且比其他地区更厉害。一名高级军官坦率地告诉英国驻华陆军参赞:

兵营里每月平均有100名士兵遭到体罚,其中90%的人受杖责……其余的人被左右开弓的鞭子抽打肩膀,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野蛮惩罚方式……不给受伤士兵敷抗菌防腐药剂,听任伤口腐烂……一两名士兵的耳朵被箭状利物刺穿。1907年,一名士兵因偷盗一支左轮手枪被割去耳朵。^⑥

此外,官兵关系很差,中级军官“恶劣而愚昧无知”,不能“真正控制军人”。士兵理所当然不喜欢甚至厌恶那些无法使人产生信心的军官,低级军官对他们上司的职权也心怀不满,全力以赴工作的高级军官看来寥若晨星。例如,当地兵备处和参谋处若干名留过洋

的军官一味酗酒，对陆军训练事务漠不关心。^⑥

原先不想当兵或已经按规定服役 3 年以上的士兵厌倦军旅生活，许多军人希望退役。在山东，一名年轻士兵交付 200 两银就获准解除兵役。在第二镇驻地保定，一名士兵花 100 两银可以买到离开军队的自由。1907 年夏移师东三省的第三镇，在 1908 年有 75% 的士兵是征募入伍的。在服役期届之前想离开部队的士兵，必须将申请书提交给部队指挥官，再转呈上级机关审批，有幸获得批准的机会是极少的。^⑦看来，兵役制度本身就很容易导致腐败和敲诈勒索。

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小差是北洋各镇严重的问题。日俄战争期间及 1905 年军事大会操中，北洋军人不辞而别的现象已属司空见惯。据练兵处一名高级官员说，逃兵在 1905 年占部队人数 15%，在 1906 年略微少些。此后两年里情况有好转，但从 1909 年起开小差又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了。即使满人组成的部队也不能免受这股风气的影响。据报告，1910 年满人逃兵为数不少，禁卫军和拥有大量满人的第一镇情况尤为严重。^⑧一般说来，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开小差比例较高，这些镇和协的军心不够稳定。反之，从当地招收的“志愿兵”倾向于长时期在军中服役。

导致开小差的因素很多，例如体罚、严厉的军纪、艰苦的操练、紧张的体育训练，^⑨军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各种个人原因等。军事当局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处决被捕逃兵，但不能有效阻止士兵逃离。在驻东三省第三镇中，军人开小差的原因还包括不适应漫长的隆冬，从中国内地征募来的士兵无法忍受严寒和野外训练。1908 年，这些士兵大量逃跑并加入地方盗匪团伙。^⑩

自从调防东三省后，第三镇的状况越来越差了，在 1908 年被认为是北洋各镇中最差的一镇。尽管士兵待遇不错，定期领取俸饷，尽管军事职业像别的地区一样更加得人心，但第三镇的部队还是

每况愈下。部分原因是第三镇统制曹锟难当重任，他取代了前任能干的统制段祺瑞。^⑤该镇在1909年似乎有所进步，部队的训练看来已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士兵刻苦地练习射击技术。由于军费不足，实弹练习很不充分。军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卫生已受到相当重视。^⑥但此后两年里伙食和卫生越来越差，一般生活条件已糟到骇人听闻的田地，士兵牢骚不绝，怨愤情绪充斥兵营。^⑦

驻东三省的新军除第三镇外，还有第一和第二混成协，这2个混成协兵员足额后将分别达到5179人和5185人。第一混成协由第五和第六镇抽调部队组成，屯兵新民府，协统是天津人王振畿。士兵的素质原来就相当好，操练时颇为壮观，总之，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部队。^⑧驻沈阳的第二混成协由北京人王汝贤*统辖，直到1910年底才由蓝天蔚接任。英国驻华陆军参赞称，第二混成协是他在满洲所见“各军中最精壮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官兵来自精锐的第二镇和第四镇^⑨。

除了从长城以南调来这些部队以外，还在东北当地募练新军。沈阳编练成1个步标和1个过山炮营，吉林编练成1个步协，但齐齐哈尔在1910年以前未曾募练新军。北京计划最终在东北布置4镇新军，奉天2镇，吉林和黑龙江各1镇。^⑩

1909年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其他部队合并，组成第二十镇，陈宦任统制，他是随同新上任的东三省总督锡良一起调赴东北的。吉林在1910年编练成第二十三镇，由孟恩远统辖。第二年，第二十四镇开始编练，按计划将调往黑龙江省。^⑪与此同时，新设的第二十四混成协也着手组建，从北洋各镇续备军里挑选兵员，已编练成2个步兵营。第二十四混成协建成后将为直隶所用，驻扎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廊坊。这支组建较迟的混成协每年经费估计需要49万

* “王汝贤”系据原文音译。

两银,其中22万两规定从续备军经费里拨给,不敷之数由直隶的烟税和酒税补足。编练这支混成协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批评。例如,英国驻华陆军参赞觉得,既然为数众多的镇兵员不足,再编练一支新的混成协是不合时宜的。何况,直隶总督管辖这支混成协跟中央集中兵权的政策相矛盾。一年前,正是这位总督在清廷集中兵权的政策下被免去对第二、四镇的管辖权。^⑩

从这些新部队的组建过程中,可以看出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中国北方新军的经费问题不像中部和南部地区那么严重。已编练成的各镇看来能够维持在已有水平,而且还有经费编练新的部队。当然,军费也有所削减,从而影响了士兵的操演、训练和装备,而且使北京的陆军兵官学堂不可能在1911年开办。但从总体上看,未曾严厉裁撤部队或减少军人的俸饷。前文已经指出,定期发放足额俸饷是维持军队士气和忠诚的关键。任何指挥官无视这条规律,他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例如,1906年夏袁世凯因经费拮据拖欠俸饷400万两银,差点使他亲自统辖的几个镇发生兵变。^⑪ 这年晚些时候,袁世凯失去了对第一、三、五、六镇的统辖权,有谣言说这些部队的俸饷要受影响,^⑫ 再次沉重地挫伤了军人的士气。从此以后,北京下决心不许拖欠北洋军队的俸饷。这是北洋军队不发生兵变的重要原因,尽管前文描叙的军人不满情绪依然存在。

何况,1911年夏陆军部和军谘府官员的俸银大幅度增加,与各省督练公所厉行节约形成鲜明对照,引起国内报纸众多的批评。另据报道,高级军官在筹备那年新军秋季会操时滥用政府拨款。^⑬ 总之,尽管北京政府靠举借外债应付财政困难,尽管资政院预算辩论后军费随之削减,北洋各镇在经费上比南方的新军要好多了。

东三省在1910年下半年爆发淋巴腺鼠疫,并对华北部分地区造成威胁。但是,直隶和东三省都没有发生重大水灾、旱灾或饥荒。投入防止鼠疫工作的新军表现极出色,驻哈尔滨的第三镇为

此失去了300官兵,但军人们看来心甘情愿、精神振奋地完成他们的工作。^④鼠疫没有引起严重问题或社会动荡,北部中国食物短缺的情况并不严重,唯一的例外是山东。1910年山东省受春旱影响,小麦长势不好,到收割季节又逢大雨,小麦作物被毁坏。这年秋黄河在利津县决口,造成山东省6年来为害最大的水灾。^⑤

虽然少数低级官佐对军队事务诸多不满,啧有烦言,但北洋军队里没有革命运动。例如,第二十镇有一个叫武学研究会的小团体,成立的目的仅仅是让不满分子时常聚会,发泄怨气,然而它不是革命组织。会长冯玉祥也承认,武学研究会没有专门制定明确的政治纲领。尽管武学研究会会员对外国侵略东北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忧虑,认为推翻清政府是建立强大中国的前提,但佐们的政治思想和具体活动都是“极为幼稚的”。如冯玉祥指出的那样,该团体既不研究革命理论,也不想方设法把自己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或寻求广泛的支持。他们所做的一点事只限于在心怀不满的军人之间发展友好关系。^⑥

毫无疑问,在北洋军中引发革命比其他地方更为困难。在军费和管理方面受制于北京政府,北洋军队一直处在清廷相当有效的控制之下。要是那思发生策反军队的活动,将会被轻易而迅速地扑灭。按一般情况看,在日本受过教育而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军官是有可能成为革命代理人的,但他们已经被安置到指挥官或参谋官等称心如意的职位上。佐们对清皇朝的政治态度看来既爱又恨,十分矛盾,摇摆于革命与君主立宪制之间,或许更倾向于后者。

有若干名指挥官值得一提,名列其首的是驻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我们曾提到,吴禄贞从士官学校毕业不久即回湖北工作。后来他调往北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在北京时引起铁良的敌意,因此他没有多少机会来表现才干。1907年,他

应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的邀请,担任徐的军事参议。后来,日本人侵略黑龙江边陲地区的延吉,使他有了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他动员起当地强悍的胡匪进行反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东北。结果,他的军衔升至正参领,出任延吉边务帮办,1909年升为陆军协统,兼延吉边务督办。一年后,他被授予副都统这一显赫的军官职衔。八旗军每一旗设2名副都统,全国总共才48名副都统。此后,他被派赴法国和德国观摩军事演习,1910年12月回国后出任新军第六镇统制。^②

追根溯源,第六镇原先是袁世凯在1900年带入北京的部队,其中许多军人是按旧规章招募来的,大批军官素质低劣。吴禄贞自然十分看不起他们,这些军人实际上也不欢迎他。吴禄贞认为,400名军官中只有一半合格,另一半军官应该解除职务。他扬言要开除他们,引起有关军官的骚动,并遭到陆军部侍郎寿勋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的一些亲信也面临着被解除军职的威胁。于是吴禄贞愤怒地具文禀报荫昌,但只是惹起荫昌的反感。吴禄贞又向吏部尚书肃亲王抱怨,描述第六镇不景气的状况,并表示他急于改善部队现状。他还奏请清廷采取措施整顿军队。然而,所有努力都未获成功。1911年初的几个里,吴禄贞逗留在北京的时间比他在部队里的时间还长,部分原因是他觉得第六镇难以管辖,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自己的改革设想得到一些满族权贵的支持。^③

不很清楚,吴禄贞是否因为屡遭挫折才转变为革命党人的。但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他同梁启超有书信往来,商讨各种事情,其中一项跟1908年底袁世凯交出政治权力有关。他俩或许讨论过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因为1911年春以来梁启超一直在考虑发动政变。^④与此同时,吴禄贞似乎跟武昌文学社若干成员有联系。无论估计正确与否,反正湖北的革命党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一旦爆发革命,吴禄贞将返回湖北出任军事首

领。^⑧如欧内斯特·扬指出的那样，“改革派”和“革命党人”之间没有明显区别。^⑨在同一时期，吴禄贞可以充当“改革派人物”，也可以成为“革命党人”，何去何从，取决于这个国家当时政治和军事的实际情况。

还有两名指挥官张绍曾和蓝天蔚，被认为在他们管辖的部队里传播革命思想。张绍曾是直隶人，1899年经直隶总督推荐被派赴日本留学，1902年毕业于士官学校，跟吴禄贞同届。他回到直隶后在陆军里担任过多种职务，不久升任副指挥官。第五镇建成后，他担任总参议官。1904年出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1909年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1910年12月陈宦赴海外考察，他接任第二十镇统制。^⑩

蓝天蔚是湖北人，1904年毕业于士官学校（属第二批中国学生）。他回国后即赴武昌担任湖北将弁高等师范学堂教习，但为时不久。1904年秋，他调赴华北（确切任职地点不清楚），后来去东北任职*。1909年，他出任驻沈阳第二混成协协统。^⑪下一章将要论述到，1911年10月19日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联名上奏朝廷，提出十二条政纲，建议成立立宪政府。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投身于推翻清皇朝的活动。另一面也应该公正地说，他们对清廷的忠诚性多少令人怀疑。

据做过陆军部官员的同盟会会员蒋作宾说，北洋军队里的革命影响微乎其微。蒋作宾是湖北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第四批中国学生，自称曾在军队里鼓动革命。他回国后即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教习，在那里利用职务之便散布革命思想，组织对军队的策反活动。他在1909年10月参加陆军部组织的军事考试，名列第二。他在考试中的优异表现受到赏识，被调进陆军部军衔司任职。该司

* 蓝天蔚赴日本考察，又考入陆军大学，直到1909年才回国。

分管军官的任命、调动以及授予世袭军衔。他向荫昌提出建议,应当撤换包括北洋军在内的全国各地新军中老朽无能的军官,代之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尤其是外国军事院校的毕业生。蒋作宾相信,5年之内北洋军将被新一代的爱国军官控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认为是革命的同情者。这份建议在陆军部激起强烈共鸣,荫昌本人也渴望通过任用更多归国军校毕业生,提高军队实力。这就使军队指挥官成份发生重大变化。除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毕业于日本军校的爱国军官被任命为各级军官。蒋作宾认为,武昌起义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再等二三年,革命党人便能控制北洋军并完成这场革命,而袁世凯则无从成为革命的主要受益人。④

四、结 论

前面三章已经论证,长江流域的陆军普遍产生不满情绪,南部中国的陆军不满程度要轻些。湖北新军里有组织的革命运动一枝独秀,其他省的军队没有类似现象。军人不满现状是传统怨愤、民族主义以及革命鼓动共同作用而引起的,不满的程度因地而异。中国北方的北洋军也有其不满之处。但从总体看,北洋军与其他地区的新军相比,对清皇朝的威胁要小得多了。

各地革命活动的模式也不一样。在湖北,普通士兵既是军内策反的重点对象,又是革命领导人的来源。湖南的模式与湖北相仿,但没有文学社那样凝聚力强、组织严密的革命团体,而那里的会党分子似乎扮演了更活跃的角色。在广东,同盟会的影响最为明显,但由于组织软弱,没能使策反军队工作做得更加成功。在云南,军事教习和军官是生气勃勃的人物,但那里策反军队工作缺乏一致的目标,也没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其他地区的革命活动则

限于中下级军官无组织的个别努力。

就军官的效忠意识而言,北方和南方的高级军官一样,都是清皇朝较可靠的力量。他们不愿贸然行动,以免损害个人事业上的利益,除非得到更辉煌前程的保证,而诸如此类的保证是不可能有的。与此相反,中下级军官的忠诚性是极不可靠的。他们更怀有理想和雄心,维护清皇朝统治对他们没有多少实质性好处,他们更急于行动,以便取得军队指挥权和其他报答酬赏。而且,他们比较接近普通士兵,一旦发生革命,很可能从士兵中获得支持。

下级官佐确实已经对清政府构成威胁。1910年7月美国来华传教士W·J·卡尔奥给国务卿的一份急件中概括了当时的局势:

在难以获取陆军“士气”及军纪状况可靠情报时,有一点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即有朝一日土耳其的革命模式在这里重复的话,真正的革命将由中国下级官佐发动。^⑤

注释:

- ① FO228/1624,《关于广州驻军的报告》,附在柏来乐1906年2月7日致萨道义的文件中(编号缺)。
- ②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史事》第1卷,第347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337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287—288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778页。
- ③ 《东方杂志》第4卷第5号(1907年),军事,第49—54页。
- ④ 同③,第5卷第4号(1908年),军事,第49—50页。
- ⑤ 同④,第50—52页。
- ⑥ FO 371/415,1907年11月15日写成的《中国军队动态报告》,附在朱尔典1907年11月25日致格雷的548号文件附录1中。
- ⑦ 沈铤:《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见《社会科学》第2辑第2期(1937年1月),第375—376页。
- ⑧ WDG56562—1,《1910年我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7页。
- ⑨ 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6页。
- ⑩ 爱德华特·J·M·罗兹:《中国共和革命在广东(1895—1913)》,第82页。
- ⑪ 同⑩。

- ⑫ 同⑩,第110—111、115、119页;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57—58、65—69页。
- ⑬ 关于“保卫亚洲”兵变的简要论述,参阅⑩,第187—189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772—774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卷,第290—313页。
- ⑭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778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281—282页。
- ⑮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第35—36页。
- ⑯ 同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卷,第201—202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359页。
- ⑰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6部分,第521、524—526、528、530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289页。
- ⑱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6部分,第517—518页。
- ⑲ 同⑰,第374—375页。
- ⑳ 参阅邓慕韩:《广州新军运动军事章程十条》,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52/8。
- ㉑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283页。
- ㉒ 同⑱,第503、511—516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778—782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3卷,第349—354页;同⑱,第285—286页。
- ㉓ 有关这次起义的英文论述,参阅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6章;爱德华特·J·M·罗兹:《中国共和革命在广东(1895—1913)》,第197—203页。
- ㉔ USDS893.60/533,汉密尔顿·巴特勒撰写的《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附在嘉乐恒1911年6月5日致国务卿的第253号文件中。
- ㉕ 同⑳。
- ㉖ 同⑩,第212页。
- ㉗ FO37/420,《云南武装力量札记》,译自《河防日报》1907年10月26日有关文章,附在总领事伟晋颂1907年12月10日致柏来乐的文件中。
- ㉘ P·V·德斯·福格斯:《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第88—89页。
- ㉙ 同⑳,第92—93页。关于陈宦在四川的活动,参阅⑩,第3卷,第347—348页。
- ㉚ 同㉙。
- ㉛ 唐纳德·辛克莱·苏顿:《云南陆军的兴衰(1909—1925)》,未刊博士论文,第39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锡良遗稿奏稿》,第705页。
- ㉜ 同㉛。
- ㉝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锡良遗稿奏稿》,第705页;FO 223/1733,《1907年第二季度信报》附在总领事韦礼敦1909年1月8日致朱尔典的文件中。
- ㉞ FO228/1733,《关于云南陆军的报告》,附在韦礼敦1909年9月21日致朱尔典的第41号文件。
- ㉟ FO228/1765,《关于云南新军的札记》,附在总领事额必廉1910年8月13日致朱尔典的第23号文件中。
- ㊱ 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导言,第27页;FO228/1809,克拉特撰写的《关于军事演习的报告》,附在额必廉1911年2月21日致朱尔典的第14号文件中。
- ㊲ FO371/1085,柏·乐撰写的《关于云南乱军第十九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

- 1月12日致格雷的第18号文件中。
- ③ 同②,第3卷,第390页;威廉·R·约翰逊:《辛亥革命在云南和贵州》,未刊博士论文,第27—31页。
- ④ 有关辛亥革命期间蔡锷学术成就方面的论述,参阅威廉·R·约翰逊:《辛亥革命在云南和贵州》第7章。
- ⑤ 同②,第3卷,第366页;唐纳德·辛克莱·苏顿:《云南陆军的兴衰(1909—1925)》,第55页。
- ⑥ 威廉·R·约翰逊:《辛亥革命在云南和贵州》,第37页表1。
- ⑦ 同②,第3卷,第365—366、409、427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4卷,第267页;素庵和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5页。
- ⑧ 同④,第32页表2。
- ⑨ 素庵和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5页;同②,第3卷,第392页。
- ⑩ 唐纳德·辛克莱·苏顿:《云南陆军的兴衰(1905—1925)》,第69页;同②,第3卷,第391页;素庵和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页。
- ⑪ 《北华商报》,1909年1月12日,转引自唐纳德·辛克莱·苏顿:《云南陆军的兴衰(1905—1925)》,第48页。
- ⑫ 素庵和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页;阿格尼丝·斯梅德利:《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第90页。
- ⑬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14—15页;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12页。
- ⑭ 《民立报》,1911年2月28日,第4版。
- ⑮ 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12—13页。
- ⑯ 同②,第3卷,第392页。
- ⑰ 同②,第3卷,第367页。
- ⑱ 唐纳德·辛克莱·苏顿:《云南陆军的兴衰(1909—1925)》,第73页。
- ⑲ 同④,第69—71页。
- ⑳ 同④。
- ㉑ 《民立报》,1910年11月15日,第4版。
- ㉒ 同④。
- ㉓ FO371/1085,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云南驻军第十九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1月12日致格雷的第18号文件中。
- ㉔ 《民立报》,1911年5月4日,第3版;4日,第3版;7月10日,第3版;8月18日,第4版。
- ㉕ 《民立报》,1911年8月15日,第4版。
- ㉖ FO371/873,《驻腾越代领事罗斯致格雷书》,附在朱尔典1910年10月19日致格雷的第17号文件中。
- ㉗ 同④。
- ㉘ 埃德温·J·丁勒:《步行穿越中国》,第215—216页。
- ㉙ 参阅斯蒂芬·R·麦金诺:《北洋军、袁世凯及近代中国军阀主义起源》,见《亚洲研

- 究杂志》第32期(1973年5月第3期),第405—423页;耿内斯特·P·扬:《袁世凯升任总统》,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419—442页。
- ⑤⑥ FO371/43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五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12日致格雷的第407号文件中。
- ⑤⑦ 同⑤。
- ⑤⑧ 同⑤;并参阅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13页。
- ⑤⑨ FO371/859,《1909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31页;FO371/435,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二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11月2日致格雷的第505号文件中;FO371/435,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东三省中国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21日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⑤⑩ FO371/31,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中国陆军的报告》,附在萨道义1906年1月17日致格雷的第28号文件中;FO371/214,柏来乐撰写的《关于第二镇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6年11月23日致格雷的第488号文件中;FO371/41,柏来乐撰写的《评估中国陆军》,附在朱尔典1906年10月15日致格雷的第420号文件中;FO405/171,《1906年中国年度报告》,第14页;斯蒂芬·R·麦金诺:《北洋军、袁世凯及近代中国军阀主义起源》,见《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3年5月第3期),第419页。
- ⑤⑪ FO405/195,《1910年中国年度报告》,第73页。
- ⑤⑫ 紧张的操练往往十分危险而且过分艰苦,士兵在训练中时常出事故受伤。外国观察家和中国医生普遍不赞成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训练。例见F·A·麦金尼:《揭去面纱的东方》,第221—222页。
- ⑤⑬ FO371/435,柏来乐撰写的《关于东三省中国驻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08年9月21日致格雷的第425号文件中。
- ⑤⑭ 关于曹锟的小传,参阅包德华编:《民国人名辞典》,第302—305页。
- ⑤⑮ FO371/642,《东三省驻军》,附在朱尔典1909年11月15日致格雷的第421号文件中。
- ⑤⑯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98—99页。
- ⑤⑰ 同⑤⑱。
- ⑤⑲ 同⑤⑱。
- ⑤⑳ 同⑤⑱;同⑤⑲,第71页。
- ⑤㉑ 同⑤⑱,第126页;陈志让:《关于1911—1912年中国陆军的一个注释》,见《通报》第48期(1960年),第436页;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5页。
- ⑤㉒ 371/1088,《直隶新建的混成协》,附在朱尔典1911年3月3日致格雷的第100号文件中。
- ⑤㉓ FO371/217,柏来乐撰写的《关于新设立的中国陆军部备忘录》,附在朱尔典1906年11月29日致格雷的第504号文件中。
- ⑤㉔ 《北华捷报》,1907年1月4日,第30页;《泰晤士报》,1909年2月7日,第7版;马利贝斯·E·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第93页。
- ⑤㉕ 《民立报》,1911年8月2日,第3版;17日,第3版。
- ⑤㉖ WDGS6283—7,《1911年2月军事报道述要》,第10页;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60页。
- ⑤㉗ FO371/867,《1910年第二季度情报述要》,附在麻木勒1910年9月8日致格雷的第302号文件中;FO371/1090,拉姆赛撰写的《1910年第四季度报告》,附在朱尔典

1911年4月25日致格雷的第176号文件中。

- ② 同①,第120—124页。
- ③ 朱炎佳:《吴禄贞与中国革命》,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辑,第168—180页;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第2卷,第379页。
- ④ 同②,第5卷,第452—453页;《民立报》,1911年4月4日,第2版。
- ⑤ 欧内斯特·P·扬:《改革家如同谋叛者》,见阿伯特·费尔恩克等编:《中国近代史探讨》第25页。
- ⑥ 万迪休:《万迪休与曾省三论辛亥首义要书》,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53/3。
- ⑦ 同⑥,第252页。
- ⑧ 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第2卷,第376页;WDGS6790—42黎富恩上尉撰写的《1911—1912年中国革命札记》,附录F,第2—3页。
- ⑨ 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第2卷,第380—381页。
- ⑩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第6—8页。
- ⑪ WSDS1518—422,嘉乐恒1910年7月5日致国务卿的第46号文件。

第三部分

革命及其后果

第八章

1911—1912年的革命

前文已讨论过，军队不满现状是社会动荡的一个方面，而社会动荡对满清皇朝最后两年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使清皇朝从1910年起地位越来越不稳固。我们已经论述了其中某些因素，如中央统治衰微，经济状况恶化，自然灾害严重，农作物欠收，以及引起民众不满的新增赋税、通货膨胀及食物短缺。其他因素还包括在学生和民众中广泛传播的反帝情绪，国内报刊的自由言论，铁路权利的争执，更为重要的是省咨议局的离心离德。

引发革命的因素在这里一览无余。铁路风潮揭开了革命的序幕，武昌部队随之起义。在革命开始阶段，南方和东部各省的新军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经省咨议局、富裕商人和同盟会领导人共同努力，才完成了革命。在北方，北洋军在忠诚性方面的表现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有些部队想利用动乱实现君主立宪制。到最后，即使效忠皇帝的部队也认识到君主制度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于是逼迫清廷进行和平谈判，迫使清帝逊位。

一、瓜分危言和舆论宣传

1910年到1911年危言四起，传播广泛，都说中国将被外国列强瓜分。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由来已久。1910年初地方报刊登载一

份有关“瓜分”的材料，许多城墙上张贴了类似的宣传品。反帝情绪就更加强烈了。学生们变得兴奋狂热，纷纷表示要加入义勇军，击退外来侵略。包括若干教会学校在内的许多学校，学生们要求得到武器和获准进行军训。在排外情绪一直特别强烈的湖南省，学生要求巡抚发给他们枪支，但遭到严厉申斥。长沙法律专业的学生召开公众集会，并毅然宣告，任何外国人胆敢向湖南发动侵略，率先进入者必将死无葬身之地。^① 南京的学生远远避开他们的外籍教师。清政府没有发给学生任何武器，但对在华外国人怀有深深的潜在敌意。^②

为了偿付外国借款和赔款，为了用中国自己的钱建造铁路，民间发起了一场募捐运动，从而激起更强烈的反帝情绪。南京所有的学校和部分街道都放置了募集钱款的箱子。成都则举行多次集会，讨论偿付外债的办法，并拟订了一些章程。^③ 地方报纸连篇累牍地揭露外国对中国的阴谋，讨论迫在眉睫的东北危机，论述普及军事训练的必要性。由于报纸数量众多，发行范围很大，报界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各地出现了一些语气强硬的声明，攻击中央政府和官员们贪污腐败，没有能力抵制外来侵略。英国驻南京领事报告道：

地方报纸……积极参与激发排外感情的活动。上海的报纸经常刊登耸人听闻的电讯，内容是揭露欧洲列强阴谋攫取中国领土和主权，据说电报是中国驻外大臣们发给中央政府的。中国人受外来侵略和奴役是报刊重要文章永恒不变的题材。印度、埃及、波兰和朝鲜的命运时常被引证，以告诫民众，务必使中国免蹈前车覆辙^④。

尽管外国列强一再否认有瓜分中国的企图，但瓜分危言并没有沉寂下去。1911年第一季度，中国地方报纸，尤其是汉口的报纸，用大量篇幅揭露英国、俄国和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欺凌和侵略行

为。救亡图存的各种方案层出叠现,其中包括设立“民军”的建议。3月初,上海和汉口的报纸发表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来电,说俄国人和英国人分别侵占了伊犁和片马,法国步步进逼,要求获得在云南的开矿权。这份电报还说他们已筹集了2万两银,发起了救亡运动,并力促省谘议局组织“民军”。北京迅速作出反应,命令武昌当局镇压那里的学生运动,禁止地方报纸发表来自海外的煽动性电报。北京政府还规定,留日学生寄给国内学生的信件一律先交省提学使司审查,然后才准予寄送收信人。^⑤

此类谣传和学生电报也在福建产生极大震动。布告张贴在厦门、福州和泉州等市城墙上。号召民众集结起来训练,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一名日本海军将领率领几艘炮舰在1911年初访问福州,这一行动加剧了骚动,使人们怀疑日本人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⑥

随后几个月里,长沙、成都、重庆、宜昌、昆明、桂林、梧州和厦门等地进一步传播耸人听闻的危言。宜昌组织起了四五百人的义勇军,但在当局高压措施下,其他地方的义勇军运动似乎极少成功。在四川,民众对外国人一般不抱敌对态度,不过对外国传教士的工作表现出不友好态度。7月初,成都郊外发生几起规模不大的骚动,就牵涉到两名传教士。^⑦

旷日持久的瓜分危言使美国驻华公使觉得“有些活动是有组织的,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反对外国人,并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⑧然而,这种反帝情绪与以往导致1900年拳乱的盲目排外仇外不同。它表现得较为文明,目的更加明确,并不是直接反对外国人,而是反对外国人在华攫取的特权,反对外来侵略对中国生存的直接威胁。这反映出令人费解的两重性:中国学生承认中国积弱落后,但又相信他们自己有能力跟随帝国主义国家的脚步前进。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增强它跟外国对抗的地位,但清政府如果不能达到这个

目标，它只有退出历史舞台。

显然，反帝思想感情并不是学生阶层独有的。有些地方官员出于同样明显的理由对外国人“不友好”。例如，南京的官员们往往无视外国人根据条约和协定可以享有的权益和特权，限制外国商人的活动范围，使他们几乎都不可能在租界以外购买土地。^⑨山东的官员们滋长着一种反帝精神，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以期收回1898年以后被德国控制地区内的全部主权。这些官员们坚定而机智，把德国人的权益遏制在租借地以内，挫败了德国人企图将势力扩展到山东全境的野心。^⑩

二、立宪派和省谘议局

由于民众不满，更重要的是与立宪运动有关的改革精英们离心离德，使清政府在1911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旧学人士于混和而成的改革精英占据了省谘议局不少席位。如果他们在1911年不背弃朝廷，清皇朝或许尚能苟延残喘。他们的政治态度、社会背景、成员构成以及他们卷入立宪运动的情况，另有论著阐述。^⑪这里只是对有关的发展线索作必要概括。

立宪派人士离心离德，是因为清政府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立宪派人士吁请尽早召开国会，但未获成功。1910年他们在北京已经呆了一段日子，到这年年底各自回到原省。他们感到跟清政府格格不入，决定支持革命事业。满清皇族在1911年5月8日成立的内阁里占据优势，更增加了立宪派人士的失落感。结果，来自16省的40名代表在6月会聚北京，建立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这两个党派的成立，表明立宪派人士渴望以强有力的反对党地位扩展他们的权力。^⑫如果有机会以“执政党”名义获取权力，他们必定会抓住这个时机。清政府不情愿与热情的改革者们扩大

政治合作，是自食其果的致命失误。清政府可望指望改革派人物的忠诚来反对革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省谘议局与清政府的关系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立宪政体与专制制度，地方权力与清廷利益，反帝与外来的侵略。议员权益和地方自治问题是宪政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要点。省谘议局自视为代表“民意”的新机制，是未来政府的基础。作为民众的代表，省谘议局议员觉得他们得到的审议权是不充分的，要求在省务管理与实施他们决议的权力方面拥有更直接、更有影响的发言权。他们倾向于抵制清皇朝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因为当局的独裁专制已成为实施宪政的障碍。

鉴于省政府只是清廷的代理机构，省谘议局渴望得到地方财政的控制权。例如，1910年秋直隶总督陈夔龙（1909—1911年在任）为筹办工业举措320万两银，遇到了麻烦。尽管这笔债款已经由清廷批准，但遭到省谘议局的反对。这位总督被迫交给省谘议局100万两银，用于改善棉花种植及其他重要实业，矛盾才得以解决。^③

确实，谘议局与清政府动辄发生冲突的症结是地方财政预算，这已成为谘议局批评政府的主题。江苏发生的事件与直隶相仿。由于两江总督拒绝按省议员提案削减地方预算，1911年5月江苏省谘议局全体议员提出集体辞职。尽管总督的做法已获得清廷认可，到8月份他还是在每一点上向谘议局作出让步。此后，议员们撤回了他们的辞呈。^④

绝大多数省议员是本省人（因有回避制度，总督和巡抚不是本省人），他们所关心的是维护和促进本省利益。当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发生冲突时，省里精英就会跟清政府官员对抗起来。促进地方利益是1909年至1911年间各省创办新事物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地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诚如傅因秋指出的那样，“这

种地方主义既离不开官僚政治，又要置身于官僚政治之外，它朝着完善国家政治机制方向发展。因此，它不是国家主义的障碍，而是趋向于国家主义的过渡形态”。^⑤

由于北京对全国铁路干线实施国有化政策，影响谘议局与清政府关系的问题在1910年夏发展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在四川，路权问题使省谘议局站到反对中央政府斗争的最前列。

三、四川铁路风潮

清廷于1911年5月9日发布上谕，令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中央政府直接控制。^⑥这道上谕称，以前各省所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但是，铁路支线仍由各府县私人企业控制。1911年5月20日，邮传大臣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约借款600万两银，用于接通北京—汉口和汉口—广州的铁路干线。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的抗议风潮，那里的士绅、铁路股票持有者和省谘议局议员认为清廷正在把国家利益出卖给外国。

这些省份所关心的是，铁路干线国有化意味着中央政府将在政治和财政方面进一步控制它们。在省议员看来，这种控制有碍于省自治权与地方自治政府的发展，尤其是损害了宪法大纲。铁路借款的谈判未曾征求过各省意见，省谘议局理所当然产生忧虑，它们的权力非但无法如愿扩大，而且将受到更多的限制。省议员们渴望捍卫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且痛恨西方资本侵入那些纯属中国人权益方面的事业。

一场保路运动被发动起来，并向社会各阶层寻求支持。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反应强烈，因为他们意识到将被迫为偿还铁路借款交纳重税。对外来侵略向来敏感的学生变得极其兴奋，而且痛恨

清政府的政策。

湖北、湖南和广东的骚动并不十分严重，因为股票持有人得到了现金与有息债券方式支付的投资赔偿，从而很快就平息了怒火。但四川的筑路投资款额太大，以致清政府没有能力按同样方式偿付股票持有者的投资。于是，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由地方士绅领导，其中有些是四川最开明的人物。他们要求把铁路借款协定交给资政院与省咨议局审议，有关铁路的建筑权交还给四川省和商办企业。^⑦

四川股票持有者几次聚会讨论局势。8月25日他们作出决定，不纳“正粮”，不纳“捐输”，政府应拨出地丁税支付“借用”股票的利息，不动产不可作为交易物（因此不必交运输费），四川不再承担任何政府借款。他们还决定在成都举行罢市罢课，并组织地方民间武装抵抗官府镇压。不久，商店门口排起刻有已故光绪皇帝大名的牌碑，因为光绪皇帝曾允许四川的铁路商办。许多街道筑起了平台，台上搭起简陋的小棚子，棚里供上光绪皇帝的画像以及瓶子、香壶和其他祭坛用物。示威者高呼“川人自保”的口号，这种口号与省咨议局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维护省自治权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意味深入地反映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立场。

9月7日，清政府调来部队干涉，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罪魁祸首”。被捕者中重要人物有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和其他成员，铁路股东会副会长，电报局总办以及提学使司属下若干名官员。当民众要求当局释放这些有名望的“叛逆者”时，巡防营向骚动者开枪，杀死了一些人。此后几星期里，政府军跟同志军及民众组成的起义者发生一系列冲突。外国侨民开始撤出成都。^⑧不久，暴力行为蔓延到四川省其他地区，同盟会革命党人、哥老会等会党分子都投入了武装斗争。^⑨四川总督赵尔丰（1908—1911年在任）被迫请求清廷增援。9月下旬，湖北新军一支应急部队开抵四川，^⑩这时四川

正处在反叛高潮阶段。

调用湖北新军的理由是四川新军本身极不可靠。事实的确如此，驻成都的新军在对付暴动者和起义者时并不“积极”。四川新军第十七镇兵员不足额，朱庆澜任镇统制。他在9月检阅部队时，命令加入保路同志会的军人站出来，要将他们开除出军队。所有的军人都站出来了！朱庆澜被迫收回成命，士兵则拒绝操演。“巡警和地方新军部队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四川人，同情保路同志会”，英国驻成都代理领事报告道，“他们宣称将拒绝向四川同胞开火”。^②

铁路问题引发的鼓动宣传和对抗情绪毫无疑问激起了倾向革命的精神。但是必须指出，此后不久武昌爆发革命的直接原因不是铁路纠纷造成的，而是10月10日夜间的兵变引发的。直到那时为止，四川以外的各省谘议局无论感到多么沮丧失望，都未曾策划过任何起义，也没有拟定过直接对清政府统治机制进行挑战的计划。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各省谘议局都没有把握争取到新军的支持。只要军队的支持还未到唾手可得的程度，改革精英们宁可静观其变。

四、武昌起义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作者外，历史学家很少重视对武昌起义的研究。^③ 正统的国民党作者把武昌起义看成同盟会发动的一系列起义的最后一击。论及辛亥革命的西方学术著作，在片面地展示这场革命运动性质的过程中，并不把武昌起义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和西方的大多数作者都认为，10月10日武昌起义仅仅是一场偶发事件。孙逸仙本人则把武昌起义的成功归因于总督瑞澂和张彪将军的逃跑。^④ 鲍威尔同意这种说法，他在《中国

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论证道，“由于只有两个营卷入开始阶段的兵变，如果总督与张彪将军坚定果敢地采取行动，他们或许能够使大多数部队保持忠诚。”^④ V.P. 达特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瑞澂缺乏沉着坚毅的精神，以及张彪五十步笑一百步的表现，革命党人的胜利是绝无把握的”。^⑤ 其他作者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与革命运动关系不大，主要是改革精英（尤其是立宪派人士）离心离德的结果，从而倾向于贬低打响革命第一枪的军人的贡献。

把武昌起义的成功看作侥幸取胜，势必忽略湖北革命党人的实力以及策反湖北新军已取得的成就。尽管武昌起义没有现场最高革命领导，而且突然爆发的起义多少有些早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具有失败的全部不祥之兆。但事实证明它是一场胜利，取得了直接的成功，并成为南方和西部各省纷起造反的灯塔。如果武昌起义未能顶住清政府企图扑灭它的压力而坚持下来，它将同1911年4月广州起义或1908年11月熊成基发动的兵变一样，成为又一次惨败，心怀异志的政革精英们将继续静观局势变化，省谘议局也不会那样迅速地宣布支持革命。武昌起义是一次漂亮的军事政变。随后发生的革命大大扩展了这次军事政变的成果。我们不妨从军事角度解释武昌起义的成功，而不从革命本身去寻找答案。或许，湖北兵变部队不能对革命的最终结果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当立宪派人士灰心丧气地作壁上观时，要是没有武昌部队首举义旗反对清政府，或许就不会有1911年的革命。

各省谘议局似乎认识到，从军事角度看，武昌起义不同于四川保路风潮、4月广州起义和以往所有的造反。1911年4月和9月都不是议员们反叛的适当时机。然而，10月10日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大批新军部队事实上已经断然背弃了清皇朝。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暗萌异志的议员们才敢坚决行动起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清政权的覆灭才不可避免。

武昌起义爆发的本身就是一场很令人感兴趣的事变。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联合起来(参阅第五章),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领导人聚会,初步决定在10月6日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他们把这个计划通知了焦达峰,希望他同时在湖南发动起义。蒋翊武和孙武分别被推选为革命军队的临时总指挥和临时参谋长。革命官兵被组织成10人、30人或90人等大小不同的起义单位,各支起义部队由新军中推选的代表率领。起义计划制订得颇为周全,驻扎在武昌城外的辎重部队和工程部队以放火烧营房为行动信号,炮兵营随即占据军事要地,与此同时工程兵营杀开血路,攻取军械火药仓库,步兵将会同其他部队攻占总督督署,骑兵按计划在外城巡逻,驻守在南郊的另一支炮兵部队将开进城。根据计划,驻汉口的第四十二标一部将占领制约全局的要隘武胜关,另一部攻取汉阳兵工厂和附近的防御工事。在任何情况下,革命部队都必须接受军内主要代表的指挥。^②

同盟会几乎没有参与这项密谋。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未曾施加显著影响力,以推动引发武昌革命爆发的局势。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军人确实没有得到黄兴和宋教仁的领导。^③

湖广总督瑞澂在9月29日预先向驻汉口外国领馆发出警告,说他收到广州一份电报,提及1000名革命党人已离开武昌,可能会引发骚动。^④第二天,一名中国学生给美国领馆通风报信,说陆军的兵变已迫在眉睫,他们将攻击督署。湖北当局承认已听到类似风声,对局势表示极为担忧,形势确实十分严峻,以致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觉得有必要让一艘英国军舰停泊在港口,以备不测之需。^⑤

这时,汉口的中文报纸推波助澜,广泛扩散革命定于10月6日发动的传闻。因此,革命党领导人被迫推迟起义,但没有确定起义

的最终日期。^⑩ 10月9日，孙武和几名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内的革命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他们负了伤。孙武避居到一家私立医院。俄国租界当局闻声赶来，搜查了这所机关，找到会员名册和其他文件，抓去了若干人。3名革命党人立即被清政府当局杀害了。现在，尽管革命党领导人有的受伤，有的隐身匿迹，普通革命士兵已别无选择，只有按照9月24日拟订的计划发动起义。

除了镇和协的机关、军官教习团以及第八辎重营外，其他各支部队都有革命党人。然而，他们在武昌城内外都不占优势，只有约三分之一军人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参见表五和表六）。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军人保持中立或踌躇观望，他们很可能在武装起义过程中投身革命。满族军人不到10%。

由营代表熊秉坤率领的第八工程营首先发动起义。^⑪ 革命党人没遇到多大抵抗，迅即占领弹药仓库。驻扎在武昌城外的辎重、工程、炮兵各部队立即响应。他们强攻入城后，占据各要点，并派出一支分遣队增援已占领弹药库的部队。与此同时，城内兵变者也赶紧采取行动，第二十九、四十一、三十一各标先后起义。在第三十标中占优势的满族军人孤立无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快逃离武昌城。

起义军人得到炮兵的支援。在炮兵的压力下，骑兵被迫起义，接着第三十二标400名军人也起义了（该标其他营已被调往四川对付铁路风潮）。总督瑞澂事后向清廷奏报道，大批革命党人从各兵营里蜂拥而出。瑞澂的描叙并非夸大其辞。革命军人代表们顺利地执行他们的任务，而高级指挥官和普通军官无法控制士兵。后来，原先中立的军人或逃离是非之地，或投入革命党人一边。

张彪将军被迫进行抵抗。第八工程营发动兵变后，他反应敏捷，在督署周围设置两道防线。他的主要支撑力量是几天前进入武昌的第八辎重营，还有巡防营、总督亲兵队以及来自各军事机关保

表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部队

单 位	指挥官态度	革命党代表	评 论
第八镇机关	反对革命	—	无革命党人
第二十一混成协机关	反对革命	—	无革命党人
第二十九标(步兵) [△] 第一、二营	反对革命	5	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第三十标(步兵) [△] 第一、三营	第三营管带曾留学日本,态度不清楚。其他指挥官反对革命。	4	第一营中满人占优,第三营满汉各半。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第八营(工程兵) [△]	反对革命	12	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第四十一标(步兵) [#]	标统曾留学日本,态度不清楚。	1	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测绘学堂80名学生 [#]	无指挥官	1	十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宪 兵	??	1	大多是满人,革命党人极少。
军事教习 [#]	?	—	无革命党人
3营巡防营	?	—	11月9日奉命进城守王督署,无革命党人。
1支机枪队	?	—	驻守在总督府,无革命党人。
1支骑兵部队	?	—	
1支消防部队	?	—	
混杂的部队	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和第四十一标第一、二营各有少量部队留在武昌城里。第四十二标有100名军人为了训练方便,与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同驻一地。		

* “?”在原表中如此。表六同。

▲ 属于新军第八镇的部队。

* 属于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部队。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23—24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77—78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268—269页。

持忠诚的部队。张彪亲自指挥这些部队，企图劝说起义军人回到各自兵营，但白费了口舌。革命军人在炮兵支持下，最终冲破保皇部队筑起的封锁线。总督瑞澂命令张彪坚守阵地，等待援兵，然后径自逃离武昌。但时隔不久，张彪也被迫退往汉口。如果不是因为起义军兵势浓厚，能干的官员瑞澂和有才华的指挥官张彪是不会败逃的。

胡祖舜认为，在武昌的新军约有4000人，其中半数在起义过程中逃跑。革命党人掌握的新军约2000人，包括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⑤他搞不清张彪保皇部队的兵力。但他对武昌新军兵力的估计是错误的。据清朝官方资料，1910年湖北新军有16104人。^⑥革命前没有多大变化。辛亥革命前夕，半数新军调往四川或湖北其他地区。由此推算，留在武昌的新军约有8000人，这是胡祖舜估计数字的两倍。

日本军官寺西中将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经过，他在报告中估计，革命爆发时共有战斗人员6000人左右，其中有5个步营，3个炮营，以及工程营和辎重营各1个。他说这些部队全都参加了起义。从我们已经论述的情况可以断定，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且，他没有提到骑兵，那时武昌有4支骑兵部队。^⑦

曾亲身经历武昌起义的另一名作者邵百昌估计，10月10日在武昌的新军官兵共8517人，还有7587人已调往四川，其中有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因病因故离开部队的有500人。革命军队，包括那些受当时气氛激励而加入进来的军人，共3959人。另一方是保持忠诚

的部队,包括警察武装在内,共5049人。但是,500名宪兵和1500名巡警同起义部队稍一接触就逃离武昌,因此实际作战的保皇部队仅剩下3049人,战斗人员比革命军人少500人。⑧

尽管无从核实邵百昌的数字,但他的估计基于亲身经历,以及各种私人和半官方的资料,大体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兵变者实

表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外的部队

单 位	指挥官态度	革命党代表	评 论
第三十二标(步兵) [△] 第二营一部分	反对革命	3	只剩下左队和右队,其余部队已调走。革命党人不多。
第八标(炮兵) [△] 第一、二、三营	标统曾留学日本,态度不清楚,第二营管带也曾留学日本,据说同情革命。第一、三营管带反对革命。	7	三分之二是革命党人
第八标(骑兵) [△] 第一、三营	反对革命	5	革命党人不多
第八营(辎重兵) [▲]	反对革命	—	无革命党人
第二十一营(骑兵) [*]	反对革命	7	有少量革命党人
第二十一营(炮兵) [*]	反对革命	2	有少量革命党人
第二十一队(辎重兵) [#]	反对革命	3	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第二十一队(工程兵) [#]	反对革命	2	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

资料来源与表五相同。

“△”、“*”所示意义参阅表五。

力雄厚，才使当局镇压他们的努力无法奏效。看到保皇部队军心动摇，瑞澂和张彪才被迫逃离，他俩都没有为丢失武昌遭到申斥。

五、湖北军政府

10月11日夜間，汉阳革命军人在文学社阳夏分机关领导下起义。迫使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管带宋锡全支持革命党人后，他们占领了兵工厂和铁厂，获得大量弹药。第二天早晨，驻汉口的第二营也发动兵变。中午以前，革命军人集聚在汉阳兵工厂，推选宋锡全为革命部队临时指挥。^④张彪的部队被驱赶到10公里之外的火车站附近，在那里等待清政府的增援。

占领武汉，为辛亥革命打好了漂亮的第一仗。这时，当务之急是要马上建立湖北军政府，以恢复法治与秩序。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被认为是军政府都督的合适人选。汤化龙有进士头衔，曾要求清政府尽早召开国会。他对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十分失望，攻击“皇族内阁”及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在武昌起义前几个月，他捐给文学社20元，表达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当然，他的资本是他在湖北省谘议局的地位以及他在地方精英中的影响。但是，当革命党人请他出来主持局面时，他却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出任都督一职。他在谘议局的同事胡瑞霖坚决劝阻他接受这个职位，向他指出他们同革命团体没有密切关系，而且革命的前景很难预测。汤化龙对革命军队的实力似乎也心存疑惑，遂以没有军事知识为由，拒绝接受送上门来的都督职位，表示只愿出任文职。^⑤

受各种因素影响，革命党人最终作出选择，用枪口逼迫并不同情革命的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军人在军内的职位太低，没有足够的感召力使革命运动获得社会尊重，何况文学社的领导人不久前曾酝酿让黎元洪出任都督。^⑥黎元洪有宽厚对待部属的良好声

誉,因此能被革命军人接受。由于他在武昌颇有美誉,人们期望他站到革命阵营一边,可以使革命赢得省谘议局的同情,从而有利于建立起一个新政权。起义引起的混乱状况要求立即为维持法治和秩序作出努力。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没有在争夺显赫职位的舞台上作表演。不过,即使他们取得了新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相互间的猜忌也会使他们难以产生出都督的人选。归根结底,革命党人最关心的是推翻清皇朝,所以他们不反对革命团体以外的人出任都督,只要这个人选符合他们的革命目标,并愿意合作。^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为革命党人推派黎元洪出任都督感到痛惜,认为这是革命党人与非革命党人之间的政治妥协,反映出革命团体政治上的软弱性,是革命开始走向失败的标志。^⑤但在湖北起义军人看来,他们当时迫使黎元洪为革命效劳是值得的。黎元洪是这么一个人物:他受到当地军队的尊敬,他得到省谘议局和地方民众的支持,而且他似乎能够对不满清皇朝的其他省份产生影响。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从汉口外国侨民角度看,他具有“远见及组织才干”,这种才识在他以后领导运动过程中得到证实。^⑥黎元洪的人品赢得外国人的好感,因为他看上去很能干、心地善良,他用英语交谈的能力也使他获得在汉口外国人的敬意。^⑦

在维护法治和秩序方面,黎元洪作为一种象征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稳定是省谘议局、地方精英及当地民众得以同心协力的基本条件,由此使湖北军政府有了坚实的地方基础。^⑧汤化龙和他在谘议局的同事们支持黎元洪,并在民政管理部门担任职务。黎元洪和汤化龙的声望吸引了立宪派人士和旧官僚,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安排到军政府的重要职位上。革命党人转而支持他们,希望革命党人发起的运动因此受人尊重,并希望迅速而有效地建立起一个新政权。省谘议局与清朝地方官员的和解,被认为是建立新政

权最便捷的道路，流血的代价也最小。这种妥协始自黎元洪，而不是袁世凯。确实，湖北新军与省谘议局的合作模式不久就被宣布独立的其他许多省份仿效。

六、各省的革命

10月22日湖南爆发革命，大大增加了革命事业的力量。长沙派出的增援部队在武昌外围跟华北开来的保皇部队作战。10月底以前，包括湖北在内的6个省宣布革命，另10个省在这年年底之前也宣布支持革命。

表七列出1911年10月至12月各省爆发革命的日期与情况。分析这些革命事件可以得出几点有趣的结论。首先，湖北、湖南、江西（九江）、陕西、山西和云南6省在10月份爆发起义，都是由新军领导的。尽管湖南情况有点特殊，由于会党和新军领导不力，士绅领袖不久就获取了领导权。攻陷青江浦、镇江和南京等江苏军事重镇，也是新军的功劳。

其次，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成都）、江西（南昌）和江苏9省的革命是由省谘议局会同士绅、商人和商会发动起来的。他们得到了新军的支持。如果省谘议局没有率先行动，这些省的新军很可能自己发动起义。除了南昌的革命，这些省采取重大步骤来反对现存政权之前，都在密切观察局势发展过程，小心翼翼地窥测这个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态势。各省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机会获取新军的同情和支持。结果，机运不请自来，因为新军的士兵和各级军官中有大量革命追随者。因此在许多场合，省谘议局与军队指挥官携手合作，共同经管新设立的军政府。

其三，16个省相继出现了25个都督（不包括孙宝琦，他很快就宣布取消山东省独立），其中14人与新军有关，2人是省谘议局议长，

表七 1911年10月至12月各省的革命

省 别	日 期	都 督	情 况
湖 北	10月10日	黎元洪	前文已描述。
湖 南	10月22日	焦达峰 ⁸ (起先) 谭延闿 ^P (后来)	新军低级官佐发动起义，巡防营的指挥官被杀，革命得到省咨议局的支持。11月31日一支哗变部队杀害焦达峰及副都督陈作霖。省咨议局长谭延闿继任都督。
陕西(西安)	10月22日	张凤翔 ^{*△}	新军在管带张凤翔率领下起义，巡防营作了些抵抗，省内内战3天。省咨议局支持革命，并控制了民政管理职位。
江西(九江)	10月23日	马毓宝 [*]	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率领下起义，新军其他部队响应。清朝的高级官员全都逃离九江。
山西(太原)	10月29日	阎锡山 ^{*△}	新军低级官佐起义，曾受到巡防营抵抗。巡抚和他的儿子被杀。省咨议局支持革命。
云南(昆明)	10月30日	蔡 锷 ^{*△}	讲武堂教习和新军第七十三、七十四标军官首先发难，第十九镇统制率领的保皇部队及宪兵作了些抵抗。
江西(南昌)	10月31日	吴介璋 [*] (起先) 彭程万 [*] (后来) 李烈钧 [△] (最后)	由于九江已经发生起义，江西巡抚孤立无援。省咨议局在商人团体、学校教员以及学者和学生的支持下，决定宣布支持革命。他们与新军合作，推选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贵州(贵阳)	11月3日	杨蔭诚 ^{*△}	学生、商人和记者等社会各阶层决心团结起来，支持咨议局。他们要求巡抚宣布起义，但遭到拒绝。于是咨议局转而推选杨蔭诚任都督。新军支持革命，极少用暴力。
江苏(上海)	11月3日	陈其美 ⁸	由同盟会首领组织起来的民军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得到商会和巡警的支持，江南制造局的保皇部队进行了抵抗。上海很快落到革命党人手中，吴淞随之解决。

续 表

省 别	日 期	都 督	情 况
浙 江	11月4日	汤寿潜 ^o	巡抚拒绝按省咨议局要求宣布支持革命,于是新军发动起义,当地八旗驻军在强大炮火压力下投降。新任的都督曾任沪杭甬铁路总理。
江苏(苏州)	11月5日	程德全 ^o	来自上海的一部分革命党人与驻苏州新军军官协商,并得到地方士绅和商贾的支持,决定要求巡抚宣布支持革命,巡抚答应照办。
江苏(青江浦)	11月7日	蒋雁行 ^{*△}	新军起义,并建立了地方军政府。
江苏(镇江)	11月7日	林述庆 [*]	第三十六标起义,停泊在港口的12艘海军舰艇支持革命。几乎没使用暴力就建起了地方军政府。
广西(桂林)	11月7日	沈秉坤 ^o (起先) 陆荣廷 [*] (后来)	在新军支持下,省咨议局决定革命,几乎未使用暴力。巡抚成为新的都督。
安徽(安庆)	11月8日	朱家宝 ^o	省咨议局在商人支持下宣告独立。
福建(福州)	11月9日	孙道仁 [*]	在新军支持下,省咨议局宣告独立。八旗驻军进行了一些抵抗。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山东(济南)	11月12日 (11月24日又取消独立)	孙宝琦 ^o	省咨议局、地方士绅、商人、新军和巡警联合起来向清廷提出8点要求。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组织了和平请愿团,并推举巡抚孙宝琦为都督。由于孙宝琦与第五镇军官发生内部争执,不久宣布取消独立。
广 东	11月13日	胡汉民 ^R	在新军支持下,商会和省咨议局宣布独立。署理两广总督张鸣岐拒绝担任都督,逃离广州。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在他到达广州之前,由新军军官蒋尊簋任代理都督。
四川(重庆)	11月22日	张培爵 ^R	同盟会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后盾发难。

续表

省别	日期	都督	情况
四川(成都)	11月27日	蒲殿英 ^P	谘议局议长蒲殿英曾因卷入铁路风潮被捕,经川督赵尔丰同意获释。谘议局推选蒲殿英为都督。赵尔丰后来被新军士兵杀死。
江苏(南京)	12月2日	徐绍桢 ^A	江苏新军在浙军的支持下发动起义,与张勋率领的保皇部队进行过激战。
山东(烟台)	12月12日	胡瑛 ^B	同盟会革命党人诱使驻烟台的海军支持革命,在当地设立了都督职位。

资料来源:作者综合各类资料编成。

• 新军军官

A 曾留学日本的军官

B 同盟会革命党人领袖

G 巡抚

P 省谘议局议长

Q 巡抚以外的清朝文官

S 革命党和会党首领

3人是巡抚,4人是同盟会领导人,1人是巡抚以外的官员,1人是革命党和会党的首领。在14名新军成员担任的都督中,6人是日本军事院校毕业生,12人是镇统制、协统、标统或营管带,他们大多是在下级官佐压力下起义的。

其四,除武昌、南京、西安、太原、福州和昆明之外,起义省份的政治权力交接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些地方的巡防营作了些抵抗,但从总的情况看来,旧式军队认识到要抵抗一场由新军或省谘议局领导的运动是徒劳无益的。

由此可以证明,无论单独行动,还是与省谘议局、地方士绅、富裕商人和商会联合起来斗争,新军对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新军和谘议局的合作,保证了一场较少使用暴力的革命在短短几个月

里完成。武昌起义后,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民众则恐惧、焦虑、惶惑不安,许多省份的法治和秩序失控,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⑤新军和谘议局都看出推翻清朝政权是政治上的客观需要,同时必须恢复法治和秩序,于是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局势。那些虽宣布独立但未触动省行政管理机制的省份,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不很严重。那些推翻原有统治机器的省份,法律不复存在,犯罪随之增多。^⑥于是,新的革命政权在新军和谘议局合作下,尽一切努力维持社会安宁。

对新军来说,需要军外的精英推进他们开创的共和事业。对精英们来说,也渴望建立起新秩序,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内战延长会增加外国干涉的危险性,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想担任重要官职。然而,军事首领不是文职精英的附庸。相反,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只有两名都督是前谘议局议长,而且议员大多在军政府里担任民政管理职务,这种情形便是明证。实际上,这些省级新政权的统治方式是文武结合。

文武合作构成了新政权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又受文官或武官潜在不满与内部分歧所牵制,有时文武双方相互拆台。就普通士兵而言,他们的表现与动向将取决于军内传统怨愤被消除的程度,以及是否会产生出新的不愉快因素。不幸的是,旧政权被推翻后,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了,引起全国各地大批军队的骚动不安(参阅第九章)。

六、北部中国的军事形势

武昌起义使清廷大为震惊。一二星期以前军谘府和陆军部还在准备新军秋季会操,第二、四、六、二十各镇部队与禁卫军已经沿着北京—沈阳铁路线在开平、滦州一带集结。10月13日夜闻,

当局正式宣布取消这次军事演习。陆军大臣荫昌奉命率领远征军南下镇压湖北的革命运动。第二天,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节制驻省部队与荫昌统辖的武装力量。由于北方新军的忠诚性值得怀疑,清廷寄望于起用袁世凯来增强政府对军队的驾驭力,以应付危机。^④

当第一批清军派往南方时,邮传大臣盛宣怀在京对G·E·莫里循说,这些部队“根本不可靠”,第六镇的“危险性最大”。该镇离心离德,其中数量众多的湖北籍军人看来同情武昌的叛乱部队。盛宣怀担心即将调往前线的第六镇会加入叛军一方。他还怀疑驻天津第四镇的忠诚性。^⑤

10月14日有消息说,第六镇驻保定的部队发生兵变,天津也出现麻烦。那里的真实情况透露得很少,但北京政府在10月15日承认,保定、天津及京畿其他若干地区的新军“图谋不轨”。^⑥

北洋军队被分为3个军。第一军是南征部队,包括第一镇2个营(大多是旗人),第二、四、六镇的几乎全部兵力,以及驻河南的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二军由冯国璋统管,下辖驻滦州的第二十镇、驻长春的第三镇和驻沈阳的第二混成协。载涛统领的第三军下辖禁卫军,第一镇大部、第四镇部分及驻天津的第五镇。^⑦

第一军刚开赴汉口,清廷就担心留在后方的部队,尤其是驻河南的部队可能会发动叛乱,弹药和军费短缺增加了兵变的可能性。^⑧这些担忧被证明是有根据的。湖南发生革命后不久,驻陕西省城西安的新军在10月22日发动兵变,并宣布拥护共和事业。10月26日G·E·莫里循从北京发出报告书,评论中国北方的形势:

军队中普遍存在着离异倾向,革命运动正悄无声息地迅速扩展开来。革命运动组织得很好,指导有方,以致这里正在讨论革命党人不必流血就能获取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以及迫使清政府屈服的可能性……看来潼关(在陕西省境内)无疑已

加入叛乱一方。如果开封(在河南)也发生叛乱,将会切断这个业已分崩离析的国家的铁路线,从而阻挡征战部队的退路。这一行动可能会导致革命早日成功,动乱局面提前结束。④

10月29日驻山西太原的新军在青年军官率领下起义,杀死了巡抚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沿铁路线推进到北京—汉口干线交接处,企图切断荫昌率领的清军与北京的联系。这使荫昌麾下的军人感到沮丧。据报道,他们已经无心恋战。⑤

这时,驻滦州第二十镇5000名军人拒绝乘火车南下,镇统制张绍曾致电北京,提出十二条政纲作为开赴前线的交换条件。在电报上署名的还有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以及第四十协协统潘架楹。十二条政纲内容如下。

1. 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2. 速开国会,本年内召集议员。
3. 改定宪法,经国会议决,以君主之名义宣布之。
4. 宪法改定提案之权,属诸国会。
5. 全国海陆军归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须遵守国会决议之特别条件。
6. 格杀勿论斩舍御免就地正法死刑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之。又对于一般人民之违法监督,不得随意逮捕。
7. 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并擢用之。
8. 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内举之,以皇帝勅任之。又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之,但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9. 人民负担之增加,及关于媾和等国际条约,经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之。
10. 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以前,不得照前年度预

算支出。

11. 上议院议员以法定之特别资格,由国民公选之。

12. 现时规定之宪法,国会组织法,及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当解决之际,军人有参预之权。④

大约一星期前,一些革命党人劝诱张绍曾宣布支持共和事业,但枉费了心机。张绍曾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他曾向吴禄贞陈述有关“理由”,获得吴禄贞的支持。但吴禄贞的实际态度是动摇不定的。有材料表明,吴禄贞离开北京前向几位朋友吐露衷曲,他有两种选择,或者与第二十镇部队联合起来推翻清皇朝,或者同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军队携手合作。第一种选择有困难,因为北洋军其他各镇兵力强大,足以保卫北京。第二种选择更为可取,因为走这条路可望得到与他关系良好的满族权贵们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使他所痛恨的袁世凯结束其政治生涯。袁世凯复出之际,吴禄贞还需要窥测局势发展的进程,以斟酌是否值得为他的“终极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吴禄贞没有讲明什么是他的“终极目标”。⑤

吴禄贞曾经跟载涛和梁启超讨论在北京发动政变这一颇具吸引力的设想。同时,他似乎跟山西革命部队的指挥官阎锡山有联系,商量联合向北京发起进攻的可能性。这些高级指挥官或许已经预料到清廷会拒绝他们提出的条件,这就给他们进攻北京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但是,诚如欧内斯特·扬指出的那样,他们未必是革命的。以吴禄贞为例,他“既没有选定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确定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妥当方法”。⑥

十二条政纲的泡制过程仍然是一个未解开的谜。美国陆军参赞怀疑张绍曾和吴禄贞不是这份奏折的起草人,他推定拟奏折的是资政院议员陈锦涛。⑦ 约翰·朱尔典爵士认为滦州兵变部队的目的是“迫使皇帝为宪政改革作出保证”,他们就能被人们理解为“经朝廷认可才采取行动的”,不会被看作受袁世凯的唆使而图谋

不轨,尽管他们跟袁世凯一直有联系。^⑤毋庸置疑,袁世凯是想搞君主立宪制的,但他跟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以及其他一些在十二条政纲上署名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待于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无论内幕如何,滦州兵变部队坚持强硬立场,对政治形势的确是产生重大影响的。清廷在10月30日发布罪己诏进行自责,为国家的灾难承担责任。另一道上谕不许皇室成员担任政府部门主管官员。还有两道上谕分别授权资政院制订宪法,并答应大赦国事犯。^⑥

然而,兵变部队并不满足于这几道上谕。山东1.5万名新军官兵和驻保定的第六镇联合起来,极力敦促皇帝接受政纲中其他所有要求。^⑦11月1日,张绍曾派出的一小队人带着最后通牒前往北京。第二天,他的部队截获了南下的两列车武器弹药。这项行动迫使清廷马上责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于是,资政院抓紧一切时间通过了包含宪法基本原则的《十九信条》。与此同时,袁世凯应召赴京组建新内阁。两天后的一道上谕同意颁布《十九信条》,并临时授权军队商讨有关宪政改革的事务。^⑧

从军事角度看,清廷的地位岌岌可危。第一军忙于汉口战事,而且控制晋西地区铁路枢纽的山西叛军已切断了该军与北京联系的通道。驻滦州、沈阳和长春的第二军已经处在部分哗变的状态,或许还保证忠诚的部队(包括地方部队)守在北京城内。^⑨

第六镇的情况构成另一重危险。该镇统制吴禄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兼有安抚山西叛军的使命,他率领第六镇部分军队向铁路枢纽石家庄进发。11月7日,他被第一镇的一伙满族军人杀害,这些谋杀者可能是按清廷里某个派系的指示行动的。^⑩吴禄贞在两天前曾弹劾溥仪,指责他率领的军队在汉口施暴。吴禄贞被谋杀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加剧了满汉之间的对抗。^⑪

滦州的事态仍然悬而未决。尽管清政府同意接受十二条政纲

中的大部分要求,但对第二十镇还是心怀戒备的。10月30日的罪己诏发布不久,清廷就命令张绍曾出任长江宣抚大臣,赴前线平息长江流域的叛乱。张绍曾拒不从命,反而要求拨给车厢,企图率领他的部队乘火车上北京。军谘府以库存车厢不足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⑤或许在11月8日,更可能在11月9日,张绍曾辞去了第二十镇统制一职。于是谣传纷起,说张绍曾被吴禄贞遇害一事激怒,企图带兵进袭北京。11月11日张绍曾宣布自己为都督,通知驻天津的外国领馆他将进攻天津。但是,进攻天津的意图并未付诸实施。3天后,张绍曾接到要他去北京的命令,但他拒绝照办。此后不久,他却带领7名参谋和37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去北京。同袁世凯进行了一些磋商(谈话内容不明)之后,张绍曾以需要“恢复健康”为借口赴天津,并在那里公开表示他既不支持满人,也不支持汉人。^⑥

到11月底,实际上只有直隶一地表面看来未受革命运动影响。即使北洋军队保持忠诚,北方也不可能指望把其他省份重新纳入清廷统治轨道,这种趋向已经显露出来了。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使直隶免于内部争斗,但无法挽救清皇朝。在北京,袁世凯是最能有效控制清军的人物,然而正如他对约翰·朱尔典爵士坦诚相告的那样,他无法改变这些部队“完全处于守势”的实际状况。^⑦这些部队集结在北京、石家庄和保定。为了保住这些地区,袁世凯不惜调回跟第一军保持联系的铁路守卫部队。^⑧

袁世凯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了北洋军队靠不住外,他还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财政拮据已经到了悲惨的境地,已故慈禧太后收藏的宫殿珍宝被用来应付政府急需的开销。售卖国宝所得款项中约有三分之一交由陆军部购买武器弹药或充作军队俸饷。^⑨但这笔款子不可能维持长久,而各省实际上已停止解送京饷。一旦资金不足影响了保皇部队的粮饷供给,就将严重损坏他们对清廷的效忠意识。^⑩

身处此时此境的袁世凯通过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作媒介，提议革命军队与征战湖北的第一军双方休战3天。早在11月2日和27日，保皇部队就分别收复了汉口和汉阳。但正式实施停火的前一天，即12月2日，南京落入革命军手中。清政府在湖北战场的胜利还抵偿不了南京的沦陷。其后的谈判于此不再赘述。然而，南京的陷落值得一提。

七、南京的陷落

武昌起义爆发后，盛传南京要发生革命。两江总督张人骏觉察出新军心怀异志，收缴了他们的弹药和枪刃，以防不测。新军担心一旦发生骚动，会遭到对他们怀有强烈敌意的旧式军队的屠杀，要求发还武器。两江总督想对新军作些让步，但满族将军铁良在布政使司支持下坚决反对，结果武器弹药还是没有发还。这些军人差一点就发动兵变，最终官方作出妥协才平息了他们的怒火。根据官方答应的条件，他们将被调离南京，去城外西南方向约25公里处的秣陵关兵营领取武器弹药。后来，第九镇开出了南京城。这时，该镇兵员已不足额，不少士兵早就逃散了。^①

11月6日的一道上谕命令两江总督张人骏，如果革命党人进攻南京，不要进行抵抗。但铁良拒绝承认这道上谕，宣称要跟革命党人拚战到底。他调用2000人的满族部队增强城防兵力，并在通道上布雷设防，还得到城内张勋将军统领下14个营旧式部队的支持。地方士绅和商人竭力劝说总督张人骏宣布支持革命，但遭到拒绝。不过，由于南京城内的革命党人正在等待浙江、上海、苏州及镇江等地的增援，两江总督和城内所有其他官员实际上都倾向于投降。铁良的咆哮震怒被看作虚张声势，张勋将军则被认为是可收买的。^②

11月8日，第九镇第三十四标组成的革命军先锋部队从秣陵关

向南京进发,第二天早晨攻击军事要塞雨花台,距南京城南门不到1公里。由于革命军队以为防守雨花台阵地的保皇部队已经失去斗志,在遭到反击后败退,并遭受惨重损失。^⑬

此后几个星期里,南京城外不断交火,保皇部队连连受挫,被迫放弃了几乎所有重要据点。到11月下旬,南京实际上已被包围了。这时,南京的革命武装得到浙江和江苏其他地区革命军队的增援。11月28日,革命军队炮击了南京城。为了切断张勋将军与他的部队的唯一退路,两天后来自扬州和青江浦的革命党人进攻浦口,引起激战。

12月2日南京弃守。张勋据信是受贿赂的,他与总督张人骏及满族将军铁良渡江到浦口。然后他乘火车沿天津—浦口线退往徐州。^⑭

占领南京后,革命军队与保皇部队之间的重大战斗已告结束,剩下的只有12月底发生在山西边界的若干小冲突。^⑮从政治上看,革命党领导人觉得他们在和谈中的地位更加有利了,他们毫不妥协地坚持清帝逊位。这时,他们终于可以着手筹建临时政府了。在一次会议上,大多数宣称要建立新制度的省份接受了这项提议。

八、清帝逊位

12月6日颁发的上谕准予摄政王载沣辞职,指定前摄政王醇亲王以及汉员徐世昌扶持宣统皇帝,政府事务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各部大臣处理,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临朝听政、以符礼仪。^⑯但这些决定的表面意义是向君主立宪政府进了一步,不为北京舆论所接受。与此相反,舆论怀疑隆裕太后的势力已经取代了摄政王的势力,其目的是恢复慈禧太后曾用以控制清廷的垂帘听政旧制度。^⑰

尽管1911年12月和1912年最初几个月一直在进行和平谈判，革命党人的军事领袖们普遍感到，北洋军队仍然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武装力量，不进行下一回合的战斗，共和事业就无法取得胜利。^②例如在湖南，对袁世凯的不信任是“强烈而根深蒂固的”，革命领袖们都认为最终难免要重新交战。^③革命党人已准备从杭州和上海调派军队同时进军北京。一支广州革命军已于12月4日抵达上海，扬言要经过渤海湾在秦皇岛登陆。^④

1911年年底之前，1万余人的军队从南京出发北上，集结在北京—浦口铁路沿线的临淮关和蚌埠。南京的军队迅速扩充，到1912年年初达5.5万人，有招募的新兵，也有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的正规部队。武昌的军事力量也得到增强，革命军队的兵力达4.5万人，由当地新军、招募的新兵以及安徽、江西、湖南和广西派去的增援部队组成。^⑤1912年1月16日，上海和南方各省组成的北伐军在烟台登陆，占领登州作为在山东的立足点。这些部队组成进攻北京的远征军先锋队，按计划将由蓝天蔚统率，尽管两个月以前蓝天蔚未能成功地在奉天发动革命。^⑥

这些军事行动与革命党人坚决反对清皇朝的恣态相结合，迫使袁世凯顺应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清廷和谈特使唐绍仪向袁世凯进言，东南各省完全赞成建立民国，取信于民的唯一途径是召开国民议会，切实商议未来政府的模式。^⑦而况袁世凯也明白，要支付清军俸饷和购置武器装备的难度越来越大。早些时候，清政府发行“爱国债券”，强迫官员们认购。此外，从皇室成员那里又索取到200万两银，还拿出更多的宫内宝藏换钱，以维持政府开销。^⑧最后一点，1月3日滦州宣布独立，虽然几天后就遭到镇压。^⑨但还是增加了袁世凯对北方部队忠诚性的疑虑。

袁世凯的地位正在变得极不稳定，满人恨他亲近革命党人，共和主义者不信任他这个顽固不化的保皇人物。1月16日他遭遇一

次未遂谋杀事件，据说行刺者同那些反对与革命党人和谈的皇室成员有联系。^⑳

1月17日和22日，满蒙亲王、贝勒会商国事。载泽、载涛、载洵和那桐主张用武力抵御革命，前摄政王、庆亲王和溥伦则赞成皇帝逊位。载泽最富有进攻性，他跟刚抵达北京的前驻南京满族将军铁良志同道合。他们筹商让铁良指挥清军抵抗革命军队。北京城内议论纷纷，盛传铁良想杀死袁世凯，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由于革命党人不久前杀死了他的弟弟、四川总督赵尔丰，赵尔巽对共和主义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后来谣传又有发展，说有人要发动一场义和团式的运动，来扶持清皇朝。^㉑

另一个强烈反对任何有关皇帝逊位观点的满员是军諮府军諮使良弼。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批中国毕业生，堪称精明强干，曾为增强禁卫军中的满人实力做过许多事。^㉒是他与载洵一起组织皇室成员成立宗社党。他跟铁良也配合密切，他俩曾同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讨论中国的局势。伊集院彦吉赞成中国保留皇帝，看来曾鼓励他们维持大清帝国事业。^㉓

在北京的其他官员都不敢迎难而上，尽可能推卸责任。内阁大臣和副大臣不是请病假就是找别的借口告假，几乎无一例外。^㉔和约迟迟签订不下来，给策划宫廷阴谋提供了时机。主战派增大压力，要袁世凯离开北京。据国外资料，一度已准备好用火车将袁世凯送往天津。^㉕

1月27日良弼遇刺，被炸成重伤，狂热的刺客自己当场炸死。几天后，良弼死去。1月29日发生了谋杀张怀芝未遂事件。张怀芝是驻天津清军的指挥官，近来表现出罕见的反对革命党人的劲头。^㉖这些暴力行为给反对皇帝逊位的满族权贵们以沉重打击。如约翰·朱尔典爵士评论的那样，北京感受到了恐怖气氛：

清政府的统治机制彻底瓦解了。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租界

到处是那桐之流的避难者。他们权力在握时，从来不曾想过滥用这些外国人拥有特权的地方。^⑧

在这紧要关头，清军的状况也表明尽早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例如，2月2日在北京的全部兵力约为3.34万人，其中1.44万人的武卫左军属地方部队。满族军人共1.4万人，显然比汉族军人1.9万人要少。而且，从散落街头的传单看，禁卫军近来暗示他们对汉族部队不怀敌意，禁卫军还表示，鉴于中部各省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他们决心确保北京的安宁不致于受到骚扰。^⑨

与此同时，南下征战的部队军心极其动荡。来自武昌的小册子和传单竭力劝说他们不要跟自己的同胞交战，并答应给脱离保皇部队的军人物质奖励，使南下征战部队人心浮动。^⑩那些曾为帝国事业努力奋斗的军人则感到愤怒，因为袁世凯命令他们撤离已攻占的地区，而这时革命军队正沿着北京—汉口铁路线挺进。^⑪

1月28日，段祺瑞等43名北洋军将领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及陆军部，极力主张马上确立共和政体。署名者中有一些旧政权的顽固捍卫者，如武卫左军总统官姜桂题，第一镇统制兼察哈尔署理都统何宗莲，以及统领徐州清军的张勋。这份电报的历史内幕有朝一日如能揭晓，将是饶有趣味的。显然，电报并不表明停止敌对行动是所有高级指挥官发自内心的愿望。实际上，他们中有若干人希望有机会同革命军队一决雌雄。发联名电报很可能是投袁世凯所好，使他得以利用这份电报来回答铁良和年轻贝勒的阴谋，这些满族权贵既反对皇帝逊位，又缺乏跟革命力量继续对抗的手段。人们知道，袁世凯曾表示极不愿意再次诉诸武力，但又拒绝参加任何关于皇帝逊位与否的皇室成员会议。在此期间，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们似乎已经作过尝试，要清廷相信，皇帝逊位不会失去更多东西，反而能获取许多利益。^⑫

由于军队叛离，清皇朝的事业走到了尽头。后来，载泽和他那些反对革命的同僚们离开北京前往沈阳，看看是否还有机会在满人的故土挽回清皇朝彻底崩溃的命运。^①大局已定，有待处理的事情，仅仅是商议清帝体面逊位的条件。

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民国领袖协商南北统一的办法。另一份诏书列陈优待皇室的条件。第三份诏书规劝官员和黎民百姓在新政府统治下安份守职，尽一切努力维持和平局面。^②

清皇朝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关民国建立及袁世凯僭取大总统等事件另有专著论述。^③有趣的是，一旦共和主义者决心同意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全国各地极大多数军事首领发誓支持他。留英学者、知名地理学家丁文江1912年5月致G·E·莫里循信中概括了军事首领们的态度。

关于南北分歧，尤其是南方军队不信任袁世凯的议论纷纷扬扬，实在是一派胡言乱语。我认为此类说法是相当缺乏根据的。南方的军队十分崇敬袁世凯的人品。我在这里（上海）有许多身居军事要职的朋友，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支持袁世凯的政策。有朝一日，这个国家或许会发觉军队（南方或北方的）对这位大总统过分崇敬了，他的头衔可能还会变化。即使到那时，我也不会惊讶的。我至少听到过一名高级军官表这这样的思想：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统一，我们就要让他当皇帝。^④

注释：

- ① FO371/863, 李德立撰写的《中国政治局势报告》，附在卡内门公司1910年3月2日致外交部的文件中；FO371/863, 麻木勒1910年4月14日致格雷的第108号文件。
- ② FO371/864,《领事葛福致麻木勒书》，见麻木勒1910年6月17日致格雷的第200号文件附件3。
- ③ FO317/854,《总领事伟晋颂致麻木勒书》，见麻木勒1910年6月17日致格雷的第

200 号文件附件 6。

- ④ 同②；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也报告道，“中文报纸无疑已扇起了并反情绪……”，参阅穆勒致格雷的第 200 号文件附件 1。
- ⑤ FO371/1090，《1911 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朱尔典 1911 年 6 月 22 日致格雷的第 200 号文件中。
- ⑥ FO228/1800，《1911 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领事霍必兰 1911 年 4 月 23 日专件中。
- ⑦ FO371/1090，《1911 年第二季度情报述要》，附在朱尔典 1911 年 9 月 16 日致格雷的第 353 号文件中。
- ⑧ USDS893.00/530，嘉乐恒 1911 年 6 月 5 日致国务卿的第 253 号文件。
- ⑨ FO371/863，李德立撰写的《中国政治形势备忘录》，附在卡内门公司 1911 年 3 月 2 日致外交部的文件中；同②。
- ⑩ 参阅约翰·E·斯雷克尔：《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德国人在山东》。
- ⑪ 例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 143—183 页；市古忠造：《一个前提——绅士的作用》，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 297—371 页；爱德华特·J·M·罗兹：《中国共和革命在广东（1895—1913）》，第 153—175 页；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 91—98 页。
- ⑫ 周锡瑞：《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 97 页。
- ⑬ FO371/1090，拉姆赛撰写的《1910 年第四季度报告》，附在朱尔典 1911 年 4 月 25 日致格雷的第 176 号文件中。
- ⑭ 同⑦，FO405/225，《1911 年中国年度报告》，第 41—42 页。然而，并非所有的省谘议局对财务都承担责任。实际上，许多谘议局极不理解地方政府为应付当前需求所遇到的困难。如约翰·朱尔典爵士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谘议局事实上“不必为实施它们倡导的措施提供必需的资金，也不必开创新税源来取代它们建议废除的税项。”参阅 FO405/195，《1910 年中国年度报告》，第 53 页。
- ⑮ 傅因秋：《政治割据与民族革命》，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 200 页。
- ⑯ 这一扼要的论述基于以下资料。全汉昇：《铁路国有问题与辛亥革命》，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 1 辑（1960 年），第 209—271 页；市古忠造：《1911 年的四川保路运动》，见《东洋文库研究部回忆录》第 14 期（1955 年），第 47—69 页；伊谢力克：《勉为其难的革命党人——四川与清政权的崩溃（1898—1911）》第 4 章，未刊博士论文。这一题材有价值的文献研究，参阅周开庆编：《四川与辛亥革命》。同情四川运动者的一名清朝官员，根据他自己的见闻也作了述评，参阅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
- ⑰ 何况，省谘议局和士绅不满皇族内阁的腐败和保守本质，对庆亲王尤感愤慨，想消除他的“恶劣影响”。参阅英国国会文件（以下略作 BPP）中国卷，编号 1（1912 年），《代领事柏卓安致朱尔典书》，见朱尔典 1911 年 10 月 13 日致格雷的第 22 号文件附件 1。
- ⑱ BPP，中国卷，编号 1（1912 年），《伟晋颂致朱尔典书》，见朱尔典 1911 年 10 月 13 日致格雷的第 22 号文件附件 2。
- ⑲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5 册，《各省光复》第 3 部分，第 9—14 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卷,第107、132、175—176页。
- ⑳ 《民立报》1911年9月18日,第3版;24日,第3版;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72—73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8页。
- ㉑ BPP,中国卷,编号1(1912年),《柏卓安致朱尔典书》,见朱尔典1911年10月13日致格雷的第22号文件附件1。美国驻华使馆代办也报告道,四川部队“被怀疑为同情骚乱者”。参阅USDS893.00/541,《卫理1911年9月7日致国务卿书》。
- ㉒ 中共著作对武昌起义的评论,参阅冯兆基:《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论辛亥革命》,见《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页。
- ㉓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卷,第18页。
- ㉔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307页。
- ㉕ 维杜阿·普拉卡什·达特:《革命的第一周——武昌起义》,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402页。
- ㉖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4卷,第21—22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47—248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75—76页。
- ㉗ 重新评价同盟会中部总会对革命爆发所起的作用,参阅冯兆基:《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见《中国研究会学报》第7卷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 ㉘ FO228/1802,《1911年8、9月份情报》,附在葛福1911年10月5日专件中。
- ㉙ FO228/1802,葛福1911年9月30日致朱尔典的第58号电文;1911年10月2日葛福致朱尔典的第92号文件。
- ㉚ 李廉方断言,起义推迟到10月11日,但这一日期仅仅是某些革命党人的一种说法,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也不是定论。参阅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74页。
- ㉛ 以下叙述的根据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279—282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86—100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记实》,第40—41页。
- ㉜ 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在事业上,他已经显示出并不缺乏成为男子汉的许多素质。在众多的经历中,他以最能干的地方大员之一而赢得声誉。他也不缺乏经验。他深切了解长江流域的局势以及普遍而强烈的反清情绪。作为满人,他无疑早已认识到失去武昌的全部含义,即势必危及清皇朝的统治地位。合理的推测只能是这样:如果他认为抵抗并非徒劳无益,他会作进一步抵抗的。参阅珀西·H·肯特:《满清统治的消亡》,第72页。
- ㉝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册,《武昌首义》,第355—356页。
- ㉞ 《清史稿》,兵3,第9页。
- ㉟ WO106/25,韦乐沛1911年10月16日致作战局局长助理的第210号文件。
- ㊱ 邵百昌:《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见《湖北文献》第10辑(1969年1月),第13—15页。
- ㊲ 文学社阳夏支部在攻取汉口和汉阳中的作用,参阅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4卷,第62—66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卷,第17—48页。
- ㊳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15、103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2卷,第36页。
- ㊴ 万迪休:《万迪休与曾省三论辛亥首义节要书》,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53/3。并参

- 阅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86—87页;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卷,第122—123页。
- ④⑩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卷,第159—160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
- ④⑪ 冯兆基:《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论辛亥革命》,见《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93—196页。
- ④⑫ 《泰晤士报》,1911年10月14日,第7版。在华外国人普遍的感受是,湖北军政府的言行表明,这场革命运动是反对清皇朝的,而不是排外的。参阅BPP,中国卷,编号1(1912年),朱尔典1911年10月23日致格雷的第47号文件。
- ④⑬ 埃德温·J·丁勒曾在1911年10月(或11月)采访过黎元洪,给予高度评价:“黎元洪将军好比是一名缔造国家的能工巧匠,他正在取用粗木料,按预定设想将木料制作成实用的东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其镇静沉着,务实而有洞察力——作为一介武夫,在精神和体力都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仍然具有如此的忍耐力,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正在向全世界表明,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参阅埃德温·J·丁勒:《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与政治经历》,第35页。
- ④⑭ 冯兆基充分展开了这一观点。参阅冯兆基:《黎元洪与辛亥革命》,见《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57页。
- ④⑮ 事例之一是江苏的革命,参阅汪荣祖:《民众骚动与江苏革命》,见《近代中国》第3辑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 ④⑯ USDS893.00/826,嘉乐恒1911年11月21日致国务卿的第362号文件。
- ④⑰ WDGS6790—42,黎富思上尉撰写的《1911—1912年中国革命札记》,31页;《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61卷,第28—29、34页;BPP,中国卷,编号1(1912年),朱尔典1911年10月14日致格雷的第8号文件。
- ④⑱ MP312/193,《1911年10月13日备忘录》。
- ④⑲ 《民立报》,1911年10月14日,第3版;15日,第2—3版。
- ④⑳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61卷,第34—35页;MP312/193,《1911年10月22日札记》;BPP,中国卷,编号1(1912年),奥托·巴里上尉撰写的《关于湖北起义的报告》,见朱尔典1911年11月5日致格雷的第79号文件附件2。
- ⑤① MB312/193,《1911年10月22日札记》。
- ⑤② MP312/61,《莫里循1911年10月26日致新常宣书》。
- ⑤③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15—216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6卷,第174—175页;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14—22页;唐纳德·G·吉林:《山西省军阀阎锡山(1911—1949)》,第14—16页;MP312/193,《1911年10月25日备忘录》;BPP,中国卷,编号1(1912年),朱尔典1911年10月23日致格雷;《民立报》,1911年10月27日,第2版。
- ⑤④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198—199页。该件英译件见WDGS6790—42,《1911—1912年中国革命札记附件F》。我用英译件时作了些文字修改。
- ⑤⑤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195—196页。
- ⑤⑥ 欧内斯特·P·扬:《改革家如同谋叛者》,见阿伯特·费尔惠克等编:《中国近代史探讨》,第253—254页;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25—26页。
- ⑤⑦ WDGS6790—42,黎富思上尉撰写的《1911—1912年中国革命札记》,附件F,第3页。

- ⑤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5 日致格雷的第 79 号文件。
- ⑥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 第 62 卷, 第 49—53 页。
- ⑦ USDS893.00/620, 代办卫理 1911 年 10 月 31 日致国务卿; 《民立报》, 1911 年 11 月 2 日, 第 2—3 版。
- ⑧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 第 63 卷, 第 5—6、10 页。USDS893.00/632, 《1911 年 11 月 3 日致国务卿电报(未具名)》;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6 日致格雷的第 80 号文件。
- ⑨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奥托·巴里上尉撰写的《关于湖北起义的报告》, 见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5 日致格雷的第 79 号文件附件 2。
- ⑩ 吴禄贞遇刺有两种说, 一说清廷下令杀害他, 另一说袁世凯是幕后策划者, 因为袁对吴正在增长的权势有顾忌。第一种说法依据欧内斯特·P·扬的著作, 较为可信。参阅他写的《改革家如同谋叛者》, 见阿伯特·费尔惠克等编: 《中国近代史探讨》, 第 257 页。
- ⑪ 《泰晤士报》, 1911 年 11 月 8 日, 第 5 版; 同⑩, 第 204 页。1911 年 11 月 11 日《民立报》第 2 版报道, 一些汉族军人猛烈攻击驻石家庄的满族军人, 并击败了他们。
- ⑫ FO371/1096, 奥托·巴里上尉撰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10 日致格雷的第 430 号文件中。
- ⑬ 《民立报》, 1911 年 11 月 11 日, 第 2—3 版; 14 日, 第 3 版; 21 日, 第 2—3 版。
- ⑭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26 日致格雷的第 78 号文件。
- ⑮ FO371/1096, 奥托·巴里撰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20 日致格雷的第 453 号文件中。
- ⑯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 第 62 卷, 第 9—10、27 页。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15 日致格雷的第 101 号文件。
- ⑰ 同⑩。
- ⑱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领事伟晋頌致朱尔典书》, 见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5 日致格雷的第 79 号文件附件 1; 《伟晋頌致格雷书》, 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23 日致格雷的第 120 号文件附件 1; 同⑩, 第 232 页。
- ⑲ 同⑩, 第 232 页; 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第 7 卷, 第 77 页;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23 日致格雷的第 120 号文件附件 2、3。据说, 张勋曾索银 80 万两银, 作为将部队撤离南京城的代价, 而代表地方士绅利益的总督只能给他一半银两。
- ⑳ 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第 7 卷, 第 78 页;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4 册, 《各省光复》第 2 部分, 第 26—27 页。
- ㉑ 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第 7 卷, 第 78—79、163—165 页;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4 册, 《各省光复》第 2 部分, 第 28—34、51—69 页; BPP, 中国卷, 编号 1 (1912 年), 《伟晋頌致格雷》, 见朱尔典 1911 年 11 月 23 日致格雷的第 120 号文件附件 4。
- ㉒ 参阅唐纳德·G·吉林: 《山西省军阀阎锡山》, 第 17—18 页。FO405/229, 《1911 年中国年度报告》, 第 59 页。
- ㉓ 《大清光绪实录》(宣统朝) 第 66 卷, 第 1—2 页。
- ㉔ BPP, 中国卷, 编号 3 (1912 年), 朱尔典 1911 年 12 月 20 日致格雷的第 23 号文件。

- ⑳ USDS893.00/1093, 驻南京领事法磊斯1912年1月20日致嘉乐恒的第175号文件。
- ㉑ BPP, 中国卷, 编号3(1912年), 驻长沙领事翟兰恩致朱尔典, 见朱尔典1912年1月29日致格雷的第112号文件附件5。
- ㉒ FO371/1310, 《韦乐沛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11年12月30日致格雷的第521号文件中。
- ㉓ USDS893.00/1093, 领事法磊斯1912年1月20日致嘉乐恒的第175号文件; W DGS6790—42, 《中国革命札记》, 第92页; FO405/229, 《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 第57页; 《泰晤士报》, 1912年2月12日, 第5版。
- ㉔ W DGS6790—42, 《中国革命札记》, 第90页; FO371/1312, 《韦乐沛报告的附录》, 附在朱尔典1912年1月17日致格雷的第33号文件中。蓝天蔚企图在奉天发动革命, 但未成功。参阅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近代东北人民运动史》, 第207—234页; 同⑤, 第253—265页。
- ㉕ BPP, 中国卷, 编号3(1912年), 朱尔典1912年1月2日致格雷的第62号文件。
- ㉖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66卷, 第18页; 第67卷, 第22页; 第68卷, 第1—2页。BPP, 中国卷, 编号3(1912年), 朱尔典1912年1月6日致格雷的第65号文件。还应该提到, 袁世凯企图举借外债, 因西方列强的中立立场而未借成。参阅陈浩贞: 《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中立政策》, 见《东方研究杂志》第7卷第2期(1970年), 第361—370页。
- ㉗ 同⑤, 第257—259页; 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第4卷, 第268—270、349—352页。
- ㉘ MP312/63, T·S·魏1912年1月29日致莫里循; MP312/241, 莫里循1912年1月24日致罗克希尔。据莫里循说, 炸弹从载泽的两幢街角房屋里扔出来, 由此造成报告失实, 把载泽说成这次暗杀行动的幕后指使人。
- ㉙ MP312/63, 莫里循1912年1月24日致T·S·魏; MP213/141, 蔡廷干(袁世凯的顾问)1912年1月18日致莫里循; MP312/194, 1912年1月24日备忘录。《民立报》, 1912年1月23日, 第2版; 25日, 第2—3版; 27日, 第2版。FO371/1312, 《韦乐沛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12年1月27日致格雷的第45号文件中。
- ㉚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卷, 第24页。
- ㉛ MP312/194, 《1912年1月21日备忘录》。莫里循在《1912年1月23日备忘录》中写道, 铁良与伊集院彦吉之间没有任何直接交往, 但又补充道, “无可否认, 青木宣纯(日本驻华陆军参赞)跟良弼有来往”。参阅MP312/141, 《莫里循致蔡廷干》。
- ㉜ WP312/214, 莫里循1911年1月24日致罗克希尔。
- ㉝ 莫里循极力主张袁世凯勿离开北京。他认为, 袁如果觉得自己守不住阵脚, 宁可辞职。莫里循还说, 袁去天津将有失尊严, 因为袁“正控制着军队, 防止军中产生敌意, 并阻止了北方省份宣布拥护共和政体”。参阅MP312/141, 《莫里循1912年1月23日致蔡廷干》。
- ㉞ 《民立报》, 1912年1月28日, 第2版; 2月1日, 第3版。
- ㉟ BPP, 中国卷, 编号3(1912年), 朱尔典1912年1月27日致格雷的第99号文件。莫里循也报告道, “恐怖正在蔓延, 满族权贵们担心遭到杀身之祸”。他预料将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一个更为严重的灾难降临到那位愚笨而狂热的铁良身上”。参阅MP312/263, 《莫里循1912年1月29日致A·W·温盖特上校》。
- ㊱ FO371/1313, 《韦乐沛的报告》, 附在朱尔典1912年2月5日致格雷的第64号文

件中。

- ⑧ 任何携带武器投奔革命的军人,将得到50元赏金,实施细则由湖北军政府解释。参阅FO371/1098,《韦乐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1年12月4日致格雷的第492号文件中。
- ⑨ FO371/1313,《韦乐沛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2年2月5日致格雷的第64号文件中;WDGS6790—42,《中国革命札记》,第90页。
- ⑩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70卷,第1页;WO106/26,韦乐沛1912年1月29日致作战局局长助理的第29号文件。据信,联名电报由段祺瑞的亲信兼智囊徐树铮起草。徐后来对段有很大影响。参阅徐道邻:《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第153页。
- ⑪ BPP,中国卷,编号3(1912年),朱尔典1912年2月10日致格雷的第127号文件。
- ⑫ 《大清历朝实录》(宣统朝)第70卷,第13—15页。
- ⑬ 尤其要参阅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升任总统》,见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433—442页;并参阅刘吉祥:《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第10章。
- ⑭ MP312/65, V·K·廷1912年5月5日致莫里循。

第九章

1912—1913年的陆军状况

清皇朝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政府面临着法治和秩序问题。军队大量过剩，军事首领们的权势不断增长，各派政治力量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财政困难重重，尤其是国内大部分地区没有能力建立起民政管理机构。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民国初年的动荡不宁。辛亥革命中使用暴力，既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也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暴力摧毁了满清当局，把尚武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军人产生自豪感并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但是，辛亥革命使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首当其冲，因而在旧政权覆灭后造成极大的混乱。南方军队的膨胀已经超出了必需的程度，从前线返回的部队给尚未牢固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带来一大堆麻烦。这些部队自以为革命有功，变得骄纵狂妄，难以驾驭，不服从民政当局的管束。情况的确如此，由于封建制度与沿袭千百年之久的古老意识形态的崩坏，把国家与社会维系起来的新制度和新的思想意识又未能迅速而及时地形成，以文治武的传统观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在革命期间，军队中萌发了尚武精神；从职业角度看，军事效率也确实有了提高，这是鼓舞人心的征兆。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新军很快就被革命本身瓦解了，致使清代改革家们取得的大量成果毁于一旦。

帝制的毁坏牵涉到广泛的问题。本章只限于考察1912年至

1913年的军队状况，以及直接影响军队的种种因素。首先要评估的是现役新军的实力，然后分析辛亥革命对新军产生的影响，并简约述评民国政府为改组陆军所作的努力，最后描述政府军队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的表现，以及同年年底这支军队的状况。

一、新军的实战能力

新军从未经受过对外战争的考验。而缺乏对外战争的检验，就很难从军事机制角度来评估新军。或许，辛亥革命为评价这支中国现役军队的纪律和实力提供了唯一的依据。因此，考察一下第一军的作战情况是有启迪意义的。这支远征军曾于1911年11月夺回了

据外国军事专家们亲眼目睹的观感，清朝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他们是“精通军事技能”的。指挥官们有效地控制着各自的部属。士兵们对队官略有不恭敬的表现，但从总体看，他们的军纪良好。军人们看上去结实、健康、精神愉悦而且心满意足，即使遇上最恶劣的天气或参加最艰苦的战斗，他们的形象还是这样。他们时常处在令人沮丧的环境中，但仍然显示出坚毅的意志力、巨大的勇气和忍耐力。更为重要的是，军队中洋溢着良好的团结气氛。每一支部队都有引人注目的职业自豪感，每打完一次胜仗，军人的荣誉感更加显而易见。的确，他们以“毅然自立的神态”给所有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神态预示着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产生。^①

实际战斗既反映出清政府军队的实力，也暴露了它的弱点。他们的马克沁机枪射击术不错，工程兵部队的装备良好，炮兵部队的布置看来也恰到好处，战地工事构筑得符合要求，弹药坑和炮兵的

掩体都建造得“十分适当而且隐蔽性很强”。他们武器装备的状况良好,定时引信和着发引信都不成问题,而且瞎弹极少。但是,他们的炮击技术大有改进的余地。定时榴霰弹的爆炸点常常太高,以致不能产生真正的杀伤效果。他们的战术性运动和战略性调动有些迟缓,在阵地防御战方而尤其差劲。

一直处于低水平的清军军医部门,也遭到了激烈批评。尽管战地医疗队和担架队工作得不错,并有效地把受伤的军人运往后方。但是,战地医院人手短缺,难以应付大量的伤员。要是没有外国教会医生们及时帮助,他们的情况会更加糟糕。^②

外国观察家们一致认为,革命军队显然不如忠于清皇朝的军队。不仅湖北革命军人的实际状况证实了这种看法,其他地方的革命军人也是如此。1912年2月,澳大利亚第六轻骑兵团的一名军官对广州、上海、苏州、武昌和南京驻军的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例外,革命军队一般都是“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如果北洋军队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队将不是它的对手。对其他地区驻军研究的结果也一再证实了这一实际情况。^③因而从军事观点看,促使清皇朝最终覆灭的因素,与其说是南方革命军队的战果,还不如说是北洋军队背弃了清廷。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毕竟展示了中国军人焕然一新的风貌。汉口的交战,使中国士兵没有战斗欲望的传统假设不攻自破。双方战斗人员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勇武精神。革命军队虽然指挥无方,装备拙劣,但他们勇敢而热情的战斗赢得了普遍赞扬。一名外国目击者描述道:

没有任何怯战的卑劣行为。医院里的伤员急于尽早返回战斗前线。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这些士兵被他们完全信仰的事业所激励,显得朝气蓬勃。他们觉得亲身投入这场战争是为了把祖国从令人无法容忍的外来奴役中解救出来。今后我们与

中国人打任何交道，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新的精神风貌。^④

尚武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其他方面也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在宜昌，8岁至14岁的少年儿童以各类武器武装起来，其中部分是木制武器。他们每天接受训练，自称为“敢死队”。英国领事馆外侧的坟场里和附近的一些小山上，孩子们练习各种攻防技术。这种紧张的操练在1912年坚持了整整一年。一名英国外交官评论道：“如果说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别的成果，觉醒的尚武热情就足以使辛亥革命成为一场值得注意的运动”。^⑤这也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比过去更具有军人气质，如果他们认为某项事业对救亡图存来说是合理的、正义的、重要的，他们就能够为此进行顽强艰苦的战斗。

二、新军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南部、西部和中部的的新军分崩离析。各省革命当局处心积虑地打乱或改变现存的军队编制，部分原因是地方革命当局热衷于改革，部分原因是内战时期需要增加战斗部队的兵力。形形色色新建部队层出叠现，而且一直处在变动状态，以致无从获取这些部队详实的兵员数字和编制情况。部队的成份五花八门，性质各异。在大多数情况下，部队的骨干力量由原来的新军以及巡防营等地方部队组成。但是，大部分士兵是新近招募的，其中有为数众多的退役军人、黄包车夫、土匪、无业游民、苦力和犯罪分子，广州和广西的部队里犯罪分子最多。在南京招募的新兵中居然还有女兵队。军事当局对女兵队深感头痛。^⑥

刚建立起来的部队大多不顶用，人们对此不必感到惊奇，因为仓促组建的部队流品复杂，而且不进行任何军事训练。确实，“战

士”这一概念,过去适用于新军,但不完全适用于新近入伍的那些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军装,不进行军事训练,不遵守军纪。还有不少人连最起码的武器也没有。他们是应征入伍或自愿应募入伍来当革命军人的。^⑦

而且,这些部队的军官比北洋各镇的军官差远了。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较为优秀的那部分军官,以前曾担任过新军正式军官或军士。另一些革命军官,尤其是连级军官,或者出身行伍,或者是刚从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中级军官和参谋官是曾经留学外国军事院校或中国陆军中学堂毕业的年轻人。旅级军官尽可能起用从日本回来的军事留学生。但是,师、军级的指挥官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军官,因政治上倾向革命而被任用,他们在革命爆发前就是地方驻军的高级指挥官。革命部队的许多军官,尤其是营、连级军官,是由士兵们推选产生的,大多能力不足或尚未成熟。^⑧例如在上海,身着军装的下级军官在大街上行走时忍不住啃甘蔗,缺乏军人的尊严感。^⑨总而言之,从军事职业角度看,只有一小部分革命部队,特别是原新军小股部队原封不动地改编过来的部队,是素质良好的。

这些新建立的部队有番号,并仿照新军编制组建成师(镇)。但是,这些师只具备大致框架,主要由步兵和官佐组成。它们的番号通常由各省给予,自成系统。南京的情况与众不同。1911年12月,若干省派出几支部队参加攻克南京的战斗,所以驻守南京各师的番号是从第一师到第二十六师,但其间缺略部分番号。^⑩

令人感兴趣的是,华中和华南各省的民军采用了一种新的编制,并使用新的名称来称呼军队的各级单位和军官。表八和表九表示相对应的新旧名称。

但在北方,尽管战争造成的损失及此后的开小差使许多镇的兵员大为减少,新军编制的框架却仍然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了。在

革命时期,东三省、直隶、河南和山东各地的军队构成没有发生多大变动。袁世凯以民国总统的身份重新获取权力后,他在义和团运动以前统辖的武卫右军改头换面地复活了。这支军队现在称为拱卫军,是仿效当年武卫军的模式组建起来的。1912年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山东增添了张勋将军统领的武卫前军。这是一支与拱卫军相仿的武装力量。武卫前军的骨干力量是辛亥革命爆发时驻扎在浦口的毅军。

北洋军队内部还发生一些零零星星的变化。1912年初,袁世凯力图补充在辛亥革命中损失的部队,下令立即组建五路后备部队,称之为备补军。^① 尽管南京革命当局反对总统增加北方兵力的任何尝试,但袁世凯仍然一意孤行,加强北洋军队。驻扎在山东的第五镇招募兵员组建了新的步兵第十八标,以替代1907年调往东北组成奉天第一混成协的部队。在东三省,军队受辛亥革命影

表八 中国民军编制一览表

——军队各级单位新旧名称对照

军队单位	旧名称	新名称
军或军团	军	军
师	镇	师
旅	协	旅
团	标	团
营	营	营
连	队	连
排	排	排
班	棚	班

资料来源:美国首都华盛顿档案馆藏美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简称WDGS) 6562—9,《中国南方陆军编制》,附在鲍莱少校1912年5月24日致陆军部的文件中。

表九 中国民军编制一览表

——各级军衔新旧名称对照

军衔	旧名称	新名称
元帅	大将军	大将军
上将	正都统	大将军
中将或少将	副都统	左将军
准将	协统	右将军
上校	正参领	大都尉
中校	副参领	左都尉
少校	协参领	右都尉
上尉	正军校	大军校
中尉	副军校	左军校
少尉	协军校	右军校
上士	正目	上士
中士	副目	中士
下士	无	下士
一等兵	正兵	上等兵
二等兵	副兵	一等兵
三等兵	无	二等兵

资料来源：同表八(旧名称为作者所加)。

响而解体的情形比其他省份轻微,但1912年局势动荡也使那里的驻军发生了一些变化。巡防营大大扩充了,而且经常东调西征,以防止各地的动乱。至于新军,驻奉天的混成协扩展到一师兵力,将组建为第二十九师,而这年年底开始组建两个新的常备师,即第二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吉林和黑龙江的新军按计划也要扩充。北方其他地区,因革命时期开小差或别的原因造成北洋各镇兵员减少,在1912年已经逐渐得到补充。同年,京旗第一镇调赴察哈尔与蒙古的边界,分为若干小部队驻守在这一辽阔的地区里。拱卫军取代

了第一镇，成为卫戍北京的中坚力量。拱卫军所属的各支部队驻守在总统府周围及城内各处。禁卫军的大部分部队仍然驻扎在颐和园和故宫附近。第三镇一些军人于1912年2月底在北京哗变滋事，后来第三镇部队大多调回北京附近的南苑营房。^⑫

三、裁军与部队骚动

辛亥革命最初几个月内，军队在维持法治与秩序方面起了作用，但清皇朝崩溃后，军队马上成为麻烦的根源了。1912年全年及1913年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军队的哗变、闹事和骚动层出叠现。军人滋事生非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军队过分庞大。1912年3月29日，总理唐绍仪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发表演说时，估计南方民军的兵力已达到80个师。诚如陆军总长段祺瑞所说的那样，唐绍仪所表达的师的概念，其实是指80名独当一面的指挥官或者是80支各式各样的部队，而不是新军所用的镇的概念。重要的是各革命领导人招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左右。^⑬这种估计或许言过其实，但即使保守地估计，南方新增加的兵员也在45万到50万之间。^{*}这些军人的存在，使政府职权无法及时恢复。^⑭在湖北的部队大约有10万人，主要驻扎在武昌。^⑮长沙驻军5万余人，大多是从内战前线返回那里的。^⑯驻扎在南京的部队达2万人，其中有来自广州、浙江、江西和湖南的征战部队，也有当地招募的士兵。^⑰

政府高级官员一般都认为，此类部队大多应该尽快遣散，何况给发军饷日益困难。唐绍仪提议立即裁撤南方陆军20个师。这20个师的兵力从几个连到1.2万名官兵不等。袁世凯赞同唐绍仪的建议。4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发表总统就职演说时宣称，

* 原文称南方新增兵力4.5万至5万，不确，改译为45万至50万。

已命令陆军部和财政部大幅度裁撤军队。^⑧携带武器的军人过多,俸饷又拖欠不发,使国家面临危机,副总统黎元洪对此也表示严重关切。情况确实如此,黎元洪在发给袁世凯的一份电报中,对军队状况深表痛惜:

南北交战,自秋徂冬,仓卒募军,率无纪律;以败为功,以乱为正;以嚣张为平等,以迫挟为自由;名器为植党之资,主将为护符之具。上行下效,此仆彼兴;赏罚不明,号令不饬;省自为城,军自为家。^⑨

财政困难与遣散军队的问题相互影响,使每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官员费尽心思,伤透脑筋。1912年2月底至3月初,袁世凯本人也为他的部队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陆军部下令停发额外的“出征津贴”,以及谣传政府打算大批遣散军队,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触发了这些部队的骚动。^⑩俸饷拖欠几个月是很平常的事,这种情况跟辛亥革命以前的欠饷同样糟糕。因此,要大规模裁撤军队,首先必须给有关军人补足拖欠的俸饷。其次,必须发给他们退伍金,并提供运输条件把他们送回家乡。最后一点也不可忽视,他们必须有其他工作可干。

就军队方面来说,那些领不到军饷的士兵变得极难驾驭。他们哗变闹事,肆意抢劫,敲诈地方绅商的钱财,并骚扰民众,从中得到补偿。等待遣散的士兵则时常感到退伍的条件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他们返回原籍后而面临失业。当他们被遣散或散落到乡村后,许多人成为土匪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

遣散军队也使军官受到影响,其中包藏着另一个祸根。军事当局觉得,要遣散军队,非但难以清偿士兵的欠饷,而且不可能给军官补足拖欠的俸银。在南京,都督被迫抚慰有关的军官,让他们在他的参谋机构里充当暂时性的编外军事副官和参谋幕僚等职。^⑪其他地区被裁汰的军官跟遭到遣散的士兵一样,已给当局

造成了麻烦。

资金短缺使局势雪上加霜。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为国库空虚而苦恼，因此无法向各省提供遣送剩余军人回乡的费用。为了应付财政上的迫切需要，政府被迫举借外债。早在清帝逊位之前，袁世凯已经开始同包括日本和俄国在内的六国银行团进行磋商。1912年4月，唐绍仪试图向一家比利时银行借款，六国银行团对此大为恼火，以致向总统袁世凯表示抗议，并提出若干要求，作为今后借款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在北京成立一个陆军协会，指派外国驻华武官为该协会的监督人，以督察南京、武昌及其他地区的裁军事宜。由于这类条款侵犯了中国处理军务的主权，遭到唐绍仪强烈反对。袁世凯则否认他曾打算向比利时银行筹借款项。但是，南方的排外情绪已经被激发起来，唐绍仪得到了黎元洪和南方其他领袖的支持。银行团拒绝从外国监督的立场上退让，从而借款问题陷入僵局。^②

由于政治上跟袁世凯发生分歧，唐绍仪在6月份辞去总理职务，于是由财政总长熊希龄出面，恢复同银行团的谈判，最终删去了外国监督的条款。结果，银行团预付给中国政府第一笔借款1200万两银。^③

接受外国借款有助于缓解补发军人欠饷的问题，遣散军队渐渐取得了进展。丰收在望的年景也缓和了局势，并有利于将退伍军人遣送回乡。^④各省在7、8两个月共遣散了83583名军人。^⑤

1913年初的局势比前几个月平静。虽然土匪行径仍然遍及全国各地，有关部队骚动的报道也屡见不鲜，但是各地方当局积极平息骚乱，有些地区还组织起乡村民团来维护法纪和秩序。遣散军队看来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正式数字。然而，军队过剩以及大量退役军人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因素。^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造成 1911 年以后局势的动荡不宁。其中一个因素是，曾在推翻清朝统治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长沙的例子具有典型性。从前线撤回来的部队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是“极其横蛮而无法无天”的。他们四出偷盗抢掠，威吓虐待民众。由于一名不受欢迎的军官被任命为宪兵长官，当地宪兵也处在滋事生非的状态，直到那位有争议的军官被撤换，宪兵的骚动才平息下去。^{②7}

动荡的另一个原因是各政治派别和革命团体之间的内部纷争。许多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期望从政治变革中获取实质性的好处，到头来却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分赃中没有拿到一份公平的东西。例如，南昌的马毓宝统一江西以前，全省有 5 个都督分别占据 5 块不同的地盘。在马毓宝的亲信、地区驻防司令朱汉涛遭暗杀之后^{②8}，内部争斗导致李烈钧于 1912 年 3 月取代了马毓宝。^{②9}在长沙，一个军人小集团同情 1911 年 10 月 31 日遇害的湖南第一任都督焦达峰及其副手陈作新，企图谋杀新都督谭延闿。1912 年 8 月，另一起类似的阴谋差一点就成功了。罪魁祸首被处决，但是军队里的混乱持续了一段日子。焦达峰的信徒们成立了会党组织洪江会，要为焦达峰的遇难报仇，后来他们策动了多次暴动。

在武昌，军务部长孙武跟他的一些革命同事发生争执。这些人指责孙武把自己的朋友安插到他们力不胜任的职位上。1911 年 9 月调往四川的第三十一标回到武昌以后，孙武于 1912 年 2 月下旬被解除职务。^{③0}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和湖北都督的双重身份，尽力使勾心斗角的政治派别之间相安无事。尽管黎元洪有良好的个人声誉，但还是无法获取当地革命党人的信任，而且他自己一直处在可能遭暗杀的危险境地。政治对手们企图去除他，但他反应敏捷，很快将其中一些人调离重要职位，并处死了几个怀有敌意的指挥官。^{③1}

军人干政并不限于地方各省，在北京的高级军官也支持一个党派，反对另一个党派，干预政治。1912年6月初，包括天津和京畿地区在内的直隶五地驻军发表强硬声明，反对政府任命亲同盟会分子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打算。这项任命已被直隶谘议局正式通过，并经由总理唐绍仪签署。然而袁世凯认为王芝祥不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理想人物，所以他依仗北洋军队的支持，于6月15日宣布王芝祥出任南方军宣抚使一职。^②按临时约法规定，此类任命必须由总理副署，但这项任命未经唐绍仪同意。

四、整顿军备的尝试

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当重视军事事务，袁世凯本人在这方面的兴趣特别浓烈。他刚刚大权在握就下令设立总统府军事处，让统领禁卫军的冯国璋担任军事处首脑。与此同时陆军部也进行了改组，下设5个司。不过陆军部所做的工作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因为重要的事务都由总统府军事处处理了。军事处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对总统有影响力的顾问机构。^③

1912年5月13日，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作了关于政府军事政策的报告。政府为自己规定了下列各项重要任务：

1. 改组陆军，遣散多余的和低效率的部队。
2. 留用军官的军职将作为其终身固定职业。
3. 改进军事教育。
4. 实施征兵制。
5. 建立制造武器、装备和军装的工厂。
6. 改善马政。^④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武昌发表了类似的政策声明，强调以下各项：

1. 统一全国武装力量。
2. 编制中国军事地图册。
3. 进一步实施军事教育。
4. 留任的军官以军职作为永久性职业。
5. 遣散军队,改善在职军人待遇。^⑤

整顿军备计划的中心环节是统一军事行政管理和统一军令。这项计划处心积虑设想的是,只有完成军政和军令的统一,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各省,因为那些地方军事指挥官们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各省事务。1911年以后军队混乱,军人为所欲为,使政府有正当理由重新作出努力,将国家武装力量置于一个统一的体制下。1912年6月,段祺瑞提议由陆军部复审所有高级军官的任命情况,撤销无能军官的职务,并对全国各地的兵工厂和军械库进行调查和管理,审核各省军工企业的财务帐目,评估辛亥革命对各省军事教育状况产生的影响。^⑥

为了使全国军队达到标准化,北京政府参照晚清军事制度,重新把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北京政府计划设立40个师的常备军;推行征兵制,一视同仁地适用于组成中华民族的5个主要种族。^⑦征兵制对北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可以据此阻止各省像在辛亥革命时期那样随心所欲地招募兵员。但是,实施征兵制的基本前提是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央集中兵权引起了各省文武官员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这意味着重新评估都督的职权。都督是革命党人创设的新的官名,用来称呼在一省或一地区行使民政和军事双重职权的官员。都督掌管他所统辖的省或地区的军队,并凌驾于民政官员之上,粗暴地对待他们。都督擅权非但违背了值得称颂的以文治武的传统,而且还通过军事割据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

为了阻止军事首领们成为割据一方的统治者，北京政府觉得必须把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区分开来。换言之，都督的职权应该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地方最高文职官员民政长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职权，应该提高到与都督的军权相对等的地位。即使做到了这些，仍然不能使都督接受文官控制而处于从属地位，但都督的权力至少会受到削弱，文官统治在表面上得以维持。

权势基础在湖北的黎元洪支持北京的政策。他于1912年4月10日给北京发去电报，列举军人干政的十大弊端，认为如果不再次限定都督的职权，中国将积重难返。一星期后，黎元洪任命樊增祥为湖北民政长，目的在于给湖北恢复文治开路铺道。^④6月，黎元洪主动放弃他对湖北的军事统治权，将省政府移交给湖北省民政当局，以此树立榜样。他保留了民国副总统的职位，作为南方强有力的人物还是具有影响力的。虽然黎元洪本人是军人，但他对军人参政深恶痛绝。看来，他是真心诚意地支持把文武统治分开来的。^⑤

然而，其他省份的反应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省份普遍觉得，就当时全国各地法治与社会秩序的状况看来，如此区划权力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南方，福建、江西和广东诸省反应尤为激烈，这些地方都督都担心他们将失去过多的东西。^⑥他们的顾虑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北京政府无法明确地规定都督以及他们同级的民政长的职权。显而易见，中央政府对整体上解决这个问题极为谨慎，在民国还处于动荡飘摇之际，想方设法尽可能避免跟各省首脑发生任何直接的冲突。中央只能顾应时势，缓慢地采取行动。遵照袁世凯的指令，北京于1912年8月成立了一个讨论民政权与军事权分开的协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到首都讨论文武分权的措施。然而这次努力再告失败。大多数省份还是反对文武分权。除了湖北以外，只有山西和西川表示支持

文武分权。^④因此,到这年年底,只有包括直隶、江苏在内的少数几个省设置了独立的民政机构。^⑤即使如此,那些省份的都督毫无疑问同其他各省的都督一样,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影响力,而且是真正手握实权的人物。

规定都督职权的尝试是在1913年1月作出的。那时发布了一项总统命令,大意是说,为了便于军事管理,要在中国设立若干军区,每一个都督管理2—3个师。这项命令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划分军区,但它补充道,在划分军区之前,各省仍由统辖各该省所有军队的都督管理。在一切军事事务方面,都督受总统、参谋本部和陆军部的直接领导。如果地方发生骚乱,都督应民政长或其他官员要求,可以调派军队协助镇压。但在动用驻省部队过程中,都督必须向总统、参谋本部及陆军部报告。^⑥

显然,北京领导集团渴望将各省军事首脑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两个月以前,袁世凯就在一次政府高级官员的高层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全国各地所有高级指挥官必须经由总统任命。^⑦确实,袁世凯这时已经把都督和陆军将官的任命、调动及解除职务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由于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广东都督胡汉民公然违抗中央政府,袁世凯在1913年7月解除了他们的职务。李烈钧不动声色地离开职位,到上海去发动了一场反对袁世凯的运动。胡汉民镇静地接受了出任西藏宣抚使的调令,然后离开广州去香港,后来又加入了上海的反袁势力。^⑧

民国政府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建立多少军区以及中国陆军兵力保持多大规模才合适。袁世凯的愿望是把全国划为8个军区,每个军区内设置5个常备师,由一名向中央负责的都督统辖。1个师的兵力比清朝1个镇少几千人,包括官兵和非战斗人员在内的平时满员兵力在12368人至12512人之间,由一名中将级军官统率。^⑨每个师下设2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1个炮

兵团,1个工兵营,1个辎重营,1支军乐队及1支医疗卫生队*。按计划规定,1个师的战时编制共有官兵及非战斗人员约2.09万人。^④

1913年初国内一家报纸报道说,估计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和地方部队达100万人,与上一年3月份的陆军总兵力相仿。^⑤这个数字看来是过分夸张了。有人怀疑其中有虚报的空额数,各地方当局以遣散剩余部队为借口,倾向于多报兵员数,以便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金。据英国驻华武官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国陆军人数为52.9万人,这个估计较为合理。^⑥

1913年2月11日,各省代表参加了在陆军部召开的高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国陆军兵力维持在50个师,而不是政府以前提出的40个师。这50个师将分驻各省,每个省的驻军数取决于该省面积、资源及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决议还提到,广东将驻扎8个师,为全国之冠;湖北驻扎4个师,居其次;其他省份驻军2—3个师。会议作出进一步决定,当各省驻军数和军费问题落实后,陆军部应拟订更详细的军备整顿计划,提交国会审议。^⑦

中国陆军在8月份的总兵力为50万人。^⑧由于北方军队人数增加以及在“二次革命”期间又招募了一些部队,中国陆军人数到1913年底略有增加,达到58.8万人。^⑨政府把全国正规陆军维持在50个师的方针得到支持,尽管由于财政困难,这项任务看来在几年内难以贯彻落实。这年12月,政府考虑了把全国划分为9个军区的计划,其中包括废除都督这一职位,以及完成各省行政机构的改组。划分军区的计划如表十所示。

然而上述计划并未付诸实施。计划保持50个师显然胃口太大,不切实际。1915年,陆军部恢复原计划,即维持40个师兵力,分

* 关于1师编制,原文未提到步兵旅,译文作了补正。

表十 1913年划分军区计划

军 区	有关省份	驻军兵力
一	奉天 吉林 龙 黑龙江 热河 绥远	4个师 2个师 2个师 1个师(?) [*] 1个师(?)
二	直隶 河内 山西	6个师 2个师 2个师 2个师
三	湖 北 湖 南	3个师 1个师, 1个旅
四	江 苏 安 徽 江 西	3个师 1个师 1个师
五	浙 江 福 建	1个师, 1个旅 1个师, 1个旅
六	广 东 广 西	3个师, 1个旅 2个师, 1个旅
七	云 南 四 川 贵 州	2个师 2个师 2个师
八	甘 肃 陕 西	2个师 2个师, 1个旅
九	伊 犁 青 海	1个师(?) 1个师(?)

资料来源：《1914年中国年鉴》，第321页。

* “?”系原表所用符号。

别驻扎在 5 个军区,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 1915年划分区军计划

军区	有关省份	驻军兵力
一	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11个师
二	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	8个师
三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	6个师
四	东三省、内蒙古	6个师
五	甘肃、新疆、青海、阿拉善	4个师

资料来源:《1916年中国年鉴》,第220页。

表十一总共仅列出 35 个师,但每一个军区还有 2 个混成旅,这些混成旅总兵力可能被看作相当于 5 个师。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项计划跟以往的那份计划一样,从未实施过。

面对这种状况,人们或许想了解外国专家在这项军备整顿计划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辛亥革命以后,外国教官的人数仍然很少。据一份美国资料记载,到 1913 年底为止,只有 1 名德国军官、1 名法国军官和若干名日本军官在中国的军事学校里担任教官。^⑤ 民国政府不打算辞退他们,也不想聘用更多的外国教官。然而,1913 年秋有谣言说中国已经请求德国帮助中国训练军队。段祺瑞马上予以否认,并要美国驻华武官鲍莱少校确信,这种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时隔不久,段祺瑞私下向鲍莱少校表示,他希望有朝一日美国军官担任中国陆军教官。华盛顿政府对此作出了十分热情的反应。^⑥

段祺瑞的态度与中国当时的政策不相吻合。中国的政策是不聘用外国军官来训练中国军队。很难判断，段祺瑞的表态是他个人一厢情愿呢，还是表达了中国政府想改变政策的一种愿望？不论内幕究竟如何，陆军次长蒋作宾后来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鲍莱少校，中国对美国政府愿意选派军官到中国陆军中服务极为感谢，但是中国的政治现状不允许这样做。蒋作宾接着解释道，美国的每一步行动使日本极其嫉妒。中国只要接受1名美国军官，就将被迫接受好几位日本军官。蒋作宾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不打算聘用日本军官担任中国军队的教官。^⑤

但是，拒绝聘请外国军官担任中国军队的教官是一回事，聘请外国军官担任政府顾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几乎都有外国顾问。在陆军部的外国顾问有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中校、冯·丁克莱曼少校和坂西利八郎大佐。法国步兵军官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中校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他毕业于军事学院，在外国驻华武官中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军官。^⑥冯·丁克莱曼少校以前曾被聘任为一所中国军事学堂的教官。他是德国陆军的退役军官。经德国政府提请，中国政府聘任他为顾问。^⑦坂西利八郎大佐是日本陆军军官。他做过袁世凯的顾问，并在1906年中国军队大会操中担任首席裁判官。^⑧外国顾问来自不同的国家，这反映出中国政府不希望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在中国军事管理事务中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直到1917年，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前武官青木宣纯少将被聘为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指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黎元洪总统组织的新内阁中担任的职务）的特别顾问，日本军官在中国陆军中的影响力才显示出来。^⑨

很难说这些外国顾问为改进中国陆军做过多少工作，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经为改组中国军队发挥过积极作用，至少在1912年至1914年间作用甚微。^⑩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所干

的那么一点事不很重要，而且有些不切实际。我们只要看看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中校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说明这种观点了。他为了在中国创设一支机动的国家宪警部队，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规划设计。根据他的计划，除了现有的普通警察和现役陆军外，还要增设一支拥有500名军官和12.5万名士兵的宪警部队。这支宪警部队的主要任务，一是增强警察力量以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二是平息匪徒作乱。这项计划的目的似乎还在于使全国各地半正规的部队转变为受中央政府控制的更加整齐划一的武装力量。这支宪警部队将以新式的枪炮、炮艇和汽艇武装起来，并聘请精干的挪威军官来培训他们。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中校在计划中争辩道，正规陆军部队一旦从镇压盗匪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就能够集中精力为国防事业而进行训练。^④

这是一项很费钱的计划。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中校希望能通过举借外债为实施计划提供资金。然而，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列强愿意授权银行团为这项号称有助于解决遣散军队问题但华而不实的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何况，中国是否需要如此庞大的警察武装力量也是值得怀疑的。与此相反，人们可以争辩道，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规模较小的宪警部队，在维护法纪和秩序以及平息盗匪胡作非为方面将会效率更高，更令人满意。无论怎样争论，反正建立高效率宪警部队的计划从未实施过。

五、陆军在“二次革命”中

民国羽毛未丰，而临的政治问题之一是南北对抗。自从1913年4月20日宋教仁遭到暗杀后，南北对抗迅速激化，并在这一年夏季发生的所谓“二次革命”中达到顶峰。与辛亥革命不同，“二次革命”纯粹是一场军队的起义。“二次革命”没有得到民众的普遍支

持和同情，因为民众觉得他们不能从一次又一次内战中获取什么东西，他们一般都希望恢复和平和秩序。尤其是商人，他们几乎都担心贸易受到更多的骚扰，从而完全支持代表法纪和秩序的袁世凯。许多有头脑的中国人认为，“二次革命”是谋取官职的两派敌对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③*}

另一方面，一些不满现状的陆军军官是同情“二次革命”的，这些辛亥革命中崛起的年轻将领们曾指望职务迅速升迁，但发觉高级职位并没有多到足以让他们每人占取一席之地。后来，许多青年军官只能接受挂名将军和不怎么令人满意的顾问职位，暂且聊以自慰。1912年期间，南方新组建的部队一度维持着兵员不足的空架子，以便给这些军官中的部分人提供职位。但是，随着南方部队的逐渐缩编，失去职位的军官人数就相应增多了。他们个人的挫折和不满使叛乱领袖们相信，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煽动，制造叛乱。^④

与反叛领袖们的期望相反，来自政府军队的支持微乎其微。袁世凯幸运地获得北洋军队的效忠。或许，只有他才能使大部分北洋军队保持某种传统的敬意。何况，能够借到外债使国家摆脱困境，至少使财政暂时舒缓的人物非他莫属。鉴于这种原因，担心财源枯竭而无法定期发放俸饷的南北双方许多军队指挥官都倾向于袁世凯。^⑤

金钱在中国人的政治中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袁世凯没费多大劲就平息了“二次革命”。由于1913年4月26日签订了新的善后借款合同，袁世凯能够给他的部队发放现金，因而他似乎成为一个“钱包鼓鼓囊囊而又好善乐施的人”。南方的革命党没有资金，只能允许军人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抢的地方进行劫掠。^⑥

* “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作者将这场斗争定性为南北敌对势力争权夺利，似乎过于超脱。

总之，部队效忠于给他们发放足额俸饷的人已是很普通的常识，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况大致如此，在1913年也是这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行政级别较高的地方当局也都坚定地效忠于北京政府。

不过，从军事专业的角度看，政府军队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虽然面对力量比较薄弱的对手，政府军队的表现根本不具备一支武装力量的某些基本要素。他们打破现役部队的编制，任意地组合部队。多少还算得上完整的部队平时编制，却很少照原样使用于战时，而是将原有部队拆散，重新混合改编为几支部队。譬如，不在湖北布置一支完整的部队，而是分别调用了第二师、第三师和第二十师的一部分去那里，至于第二十师的其他部队则被调往上海和南京。江西的情况与此相仿，第二师和第六师原来由两名师长分别统辖，但当局不给这两个师分派独立完成的任务，而是从这两个师抽调官兵编成若干混合部队。^⑥

更有甚者，忠于政府的军队所遵循的惯例是，不给任何一支编制完整的部队以明确的任务，不让任何一名军官接受职责分明的任务，这就使任何一支战斗部队都难以搞好所属各部之间的合作。进攻南京时，冯国璋、张勋和雷震春是三个绝对独立的指挥官，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分派到特殊任务，因此没有最高司令官，也没有协作的观念。^⑦中国人习惯于玩弄权术，在官员之间挑拨离间，这或许就是北洋军队内部制约与平衡机制的原因所在。

军官素质差仍然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弱点，受过教育的军官大多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辛亥革命以来已经公布或见诸报端的将级军官有700多名，其中许多人的年龄在30岁上下。25岁的上校军官是很常见的，他们的学识、训练水平、服役时间或实际经验都难以证明他们是称职的。参谋官的职位几乎全由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尤其是出洋留过学的人充任。遗憾的是，既有实际经验又

有理论知识的参谋官为数很少。他们几乎不接触战斗部队的军官，而且参谋官之间也显示不出团结精神。在“二次革命”中，政府军队看来完全靠显赫的威望、喧闹恫吓或炫耀武力来取得胜利，而没有表现出任何跟敌人拼搏决胜的真正愿望。当武力恫吓的各种方法达不到目的时，就慷慨解囊，贿赂敌人，这往往是有效的取胜之道。^⑧如此种种，与北洋军队在1911年11月收复汉口的战斗中所显示的难能可贵的尚武精神以及多方面的军事专业素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士兵的素质良莠不齐，相差悬殊。辛亥革命以前加入新军的士兵，体格是第一流的，而新招募的士兵在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方面的标准就低得多了。遗憾的是，这两类士兵在遵守军纪方面都不令人满意，而且都不愿主动进攻。旧式部队，例如张勋的士兵，同当年新军一样身强力壮。但是，这类部队的士兵素质也参差不齐，通常是新近招募的士兵远远不如长期在部队服役的老兵。

1913年的战斗中，参与进攻南京的政府军队暴露出另外两个弱点。第一，缺乏组织完善的指挥系统以全面实施铁路军管。北京到汉口及天津到浦口的铁路分别由第一军和第二军使用。但是军事当局没有接管这两条铁路线，几乎不干预或极少干预火车的正常运行，这就大大延误了北军南调的时机。虽然在较大的火车站安排了专门负责调度铁路运输的指挥官，但他们几乎没有一点权威，因为过往部队只服从他们自己的长官。^⑨第二，根本没有安排好后勤供给。小城镇被迫供给过往部队所必需的大米、猪肉、馒头和其他食物。这些部队抵达浦口后，才得到用轮船和火车从上海运来的大米和面粉。^⑩

“二次革命”期间，雷震春将军招募兵员编练成新建第七师，这个师起先开赴长江地区，后来又被调往山东。^⑪原来的第八师在南京被遣散后，又组建了新的第八师，兵员部分从拱卫军抽调，部

分由各补军转正,另有一些是新招募的士兵。“二次革命”以后,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和福建的部队实际上都被裁撤或遣散了。^②新组建的部队招募北方人,往往不给这类部队番号,以免刺激南方人。有些部队被称为某某师的“后备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部队的兵力各不相同,而且差别很大,各支部队的名称和编制仍然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③

这种状况表明,民国政府没能使军队摆脱由辛亥革命造成的分裂混乱状态。尽管经过紧缩编制和裁减兵员,军队规模已缩小到比较容易管理的水平,但还是不见起色。例如,军事教育就没有取得进展。由于革命而中断教学的各省军事学堂,重新开办的寥寥无几。许多军事学堂因缺乏资金已废弃不用。^④1912年7月在北京开设了陆军兵官学堂,以取代保定的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兵官学堂的学员主要是毕业于清末4所陆军中学堂(那时已改称陆军预备学校)的见习军官,其他学员来自因经费支绌而暂时停办的江宁军事学堂。^⑤但是,北京的陆军兵官学堂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停办了。这年10月政府宣布开设新的保定军官学校,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老校舍作为新军校的基础。保定军官学校原计划招收1500名学员,学制2年。但据报道,第一批入学人数达1700人。不幸的是,虽然官方满腔热忱地开办这所军校,但是教官的素质低劣,妨碍了该校头两年的发展。这些教官中不少人毕业于地方军官速成班,他们自己还不够资格担任正式军官。此外,陆军部与保定军校校方之间政治分歧很大,潜伏暗流。政治暗流使灰心丧气的校长蒋方震于1913年6月17日自寻短见,幸而自杀未遂。^⑥

政府在其他一些领域里的所作所为同样平庸,无所建树。政府没有努力推行征兵制。虽然有些地区往往在各省当局的指导下,进行范围非常狭小的人口调查,但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从未组织过。黎元洪试图建立征兵制,但成效甚微,后来放弃了努力。^⑦不

过,那时的士兵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得到给发军饷的许诺,还有抢劫和舒适生活的前景。总的看来,军官们倾向于在部队里呆得越久越好,因为做军官比从事其他许多职业更无忧无虑,更有利可图。

扩建兵工厂和增加武器产量的努力也不很成功,虽然正在着手扩大汉阳兵工厂的规模,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实际上已废置不用,所有备用材料都用船只装运到北方。广州的兵工厂由于管理不善,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结果,中国政府被迫从国外购买大量小型武器、机关枪和野炮。^①

中国政府认识到,为了连结战略要地,必须建造更多的军用铁路。然而,资金不足使任何诸如此类的计划无法实施。1913年下半年政府把铁路建造权进一步出让给不同的外国金融组织,但对铁路建筑期限很少作出具体规定。到今年年底,几乎没有竣工的铁路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陆军在辛亥革命前一度达到高水平状态,革命后每况愈下。清帝逊位后,军人纪律涣散,以至于士气低落,部队成为流品复杂的乌合之众。1911年以前有些部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但此后正规部队的内部凝聚力瓦解了。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人离开了部队,而新招募的士兵素质低劣。最后一点,很多军官干预政治,并与各种政治派别发生联系。这种行为毁坏了中国军队的纪律和凝聚力。

注释:

- ① FO371/1311,怀特豪尔撰写的《评革命时期的中国陆军》,附在海军部1912年1月3日致副国务大臣文件中;FO 371/1347,韦乐沛撰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中军事行动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2年7月3日致格雷的第280号文件中;《1911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2页。
- ② 美国陆军参赞黎富思上尉也觉得第一军的医疗部门“极不完善”。参阅 WDCS: 6790—42,《中国革命札记》,第39页。

- ⑮ WO106/26,《W·F·埃弗雷特中校评清军状况》附在韦乐沛1912年2月2日致作战局局长助理的第37号文件中。
- ⑯ FO228/1841,葛福1912年2月20日致朱尔典的第17号文件。
- ⑰ WO106/26,韦乐沛1912年2月13日致作战局局长助理的第53号文件;FO228/1843,《1911年第四季度和1911年第二、第三季度情报》,附在领事许立德1912年1月18日、7月10日和10月15日的专件中。
- ⑱ FO405/229,《1912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2页;FO371/1347,《1911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页;WO106/26,韦乐沛1912年2月12日致作战局局长助理的第51号文件。
- ⑲ WDG56283—10,黎富思上尉1912年4月18日撰写的《最近军事札记》,第2页。
- ⑳ WDG56233—10,《中国的民军》,见黎富思上尉1912年6月30日致国防部的文件;FO405/229,《1911年中国年度报告》,第56页。
- ㉑ WO106/26,韦乐沛1912年2月12日致作战局局长助理的第51号文件。
- ㉒ FO371/1602,《1912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5页;FO409/229,《1912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1—42页。
- ㉓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67页。
- ㉔ FO371/1602,《1912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4页;FO405/229,《1912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1—42页。
- ㉕ WDG56283—10,黎富思1912年4月18日撰写的《军事现状札记》,第1—2页。
- ㉖ MP312/64,《莫里循1912年3月14日致蒙利纽克斯书》。
- ㉗ 易国干编:《黎副总统政书》第3卷,第15页,《上大总统(1912年3月19日)》。
- ㉘ FO228/1837,《1912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贾尔斯1912年4月25日致朱尔典的第18号文件中。
- ㉙ FO228/1837,伟晋颂1912年3月19日致朱尔典的第19号文件。
- ㉚ 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1913年中国年鉴》,第306、502页;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见《袁世凯史料汇刊》第11辑,第11页。
- ㉛ 同⑮,第15页,《上大总统并致京外省机关(1912年3月22日)》。
- ㉜ FO371/1361,柏来乐撰写的:《关于北京兵变的报告》,附在朱尔典1912年3月21日致格雷的第133号文件中。并参阅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升任总统》,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438—440页。
- ㉝ 《民立报》,1912年5月5日,第7版;伟晋颂1912年8月15日致朱尔典的第48号文件。
- ㉞ 《顺天时报》,1912年5月18日;黄远庸:《远生遗著》第2卷,第1—3页,见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丛书第19辑;WDG56283—12,黎富思撰写的《军事现状札记》,第5、7—8页;6283—13,《军事近况札记》,第5—7页。
- ㉟ 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第12—13页。
- ㊱ 参阅FO371/1347和FO371/1620,若干月份的事件述要。
- ㊲ 《1913年中国年鉴》,第285页。
- ㊳ FO228/1873,《1913年第一季度情报》,附在伟晋颂1913年4月11日的专件里;FO371/1620,《1913年第一季度事件述要》,附在朱尔典1913年5月13日致格雷的第183号文件中。
- ㊴ FO228/1873,贾尔斯1912年2月28日致朱尔典的第9号文件。
- ㊵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卷,第332—333页。
- ㊶ FO228/1837,《1912年第一、第三季度情报》,分别附在贾尔斯1912年4月26日致朱

- 尔典的第18号文件及10月25日致朱尔典的第40号文件中。
- ③⑥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95—197页;FO228/1873,《1912年第四季度情报》,附在伟晋颂1913年1月14日专件中。
- ③⑦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05—207页;沈云龙:《黎元洪评传》,第39—45页;FO228/1841,葛福1913年2月29日致朱尔典的第25号文件。
- ③⑧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56—267页。
- ③⑨ WDGS6283—11,黎富思1912年5月4日撰写的《军事随笔》,第3页。
- ③⑩ 同③⑨,第507页;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1卷,第328页。
- ③⑪ 《民立报》,1912年5月17日,第3版。我在易国干编的《黎副总统政书》里没有找到此件。
- ③⑫ 《民立报》,1912年6月10日,第5版。
- ③⑬ 《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第3版。
- ③⑭ 同③⑬,第9卷,第11—14页,《上大总统并致京外各机关(1912年4月10日)》,第22页;《上大总统并致京外各机关(1912年4月17日)》。
- ③⑮ 《民立报》,1912年7月1日,第12版;WDGS6283—12,黎富思1912年5月3日撰写的《军事近况札记》,第2页。
- ③⑯ 《民立报》,1912年7月1日,第2版;WDGS6283—20,鲍莱1913年4月11日撰写的《最近若干事件》,第2页。
- ③⑰ 《顺天时报》,1912年8月6日、7日、20日;《民立报》,1912年10月9日,第3版。
- ③⑱ 《民立报》,1912年11月24日,第8版。
- ③⑲ 《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1913年2月)中国大事记,第19页。
- ③⑳ 《民立报》,1912年11月18日,第6版。
- ㉑ 《胡汉民自传》,第38页,WDGS6283—22,鲍莱1913年7月3日撰写的《最近若干事件》,第1页。
- ㉒ 《顺天时报》,1912年6月13日;《民立报》,1912年6月24日,第5版。
- ㉓ 《1913年中国年鉴》,第281页。
- ㉔ 《民立报》,1913年1月1日,第11版;4日,第6版。
- ㉕ FO371/1502,《1912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8页。
- ㉖ 《民立报》,1913年2月20日,第8版。
- ㉗ 《1914年中国年鉴》,第327—329页,列表说明中国兵力及分布的大致情况。
- ㉘ FO371/1934,《1913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附录A,第7页,附在朱尔典1914年5月21日致格雷的第202号文件中。
- ㉙ WDGS6562—26,美国驻华陆军参赞1914年1月13日致军校司司长的文件。
- ㉚ 同㉙。并参阅WDGS6552—24,军校司1913年10月21日致陆军部长的文件;6562—25,陆军部长1913年11月25日致陆军部的文件,以及国务院1913年12月4日致陆军部长的文件。
- ㉛ 同㉚。
- ㉜ 北京政府的外国顾问名单,参阅WDGS7829—8,鲍莱1913年9月16日编写的《外国顾问》。
- ㉝ WDGS6283—23,鲍莱1913年4月11日撰写的《最近若干事件》,第2页。
- ㉞ 参阅FO371/41,沃尔特斯准将致陆军大臣,附在朱尔典1906年11月8日致格雷的第462号文件中。

- ⑤⑨ 青木宣纯少将是在1916年9月接受任命的,但直到1917年初他才抵达中国。参阅WDGS7829—30,鲍莱1917年2月26日撰写的《最近消息》,第2—3页。鲍莱在1917年5月5日报告道,当中国军方对日本不友好时,“总理对日本却表现出毋庸置疑的友好姿态”。但他又补充说,青木宣纯将军在中国没有给人们造成他是总统军事顾问的感觉。不过,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将军正在赴华途中,将作一次旅行考察。参阅WDGS7829—36,《最近消息》。
- ⑥⑩ 美国驻华陆军参赞在1914年2月评论道:“尽管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上校……和迪克尔少校花了时间去重组总参谋部,但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参阅WDGS 6562—29,《1913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4页。
- ⑥⑪ FO371/1934,《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上校的计划》,附在朱尔典1914年1月31日致格雷的第40号文件中。朱尔典忍不住评论道:“就像朝鲜在行将灭亡的日子里那样,中国现在正遭受着大批外国顾问的折磨。这些顾问提出各式各样的宏大规划,力图证明他们的存在是合理的。”
- ⑥⑫ FO405/229,《1913年中国年度报告》,第46页。
- ⑥⑬ 同⑥⑩。
- ⑥⑭ 《泰晤士报》,1913年8月1日,第5版。
- ⑥⑮ 《泰晤士报》,1917年8月15日,第5版。
- ⑥⑯ FO371/1934,罗伯逊少校撰写的《关于1913年叛乱时期中国陆军的报告》,附在1914年2月9日朱尔典的第58号文件中。
- ⑥⑰ 同⑥⑯。
- ⑥⑱ 同⑥⑯。
- ⑥⑲ 同⑥⑯。
- ⑦⑰ WDGS7829—9,鲍莱1913年10月3日撰写的《中国的“二次革命”》,第10页。
- ⑦⑱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卷,第6页。
- ⑦⑲ FO 371/1934,《1913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1—11页。
- ⑦⑳ WDGS6562—29,鲍莱1914年2月26日撰写的《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页。
- ⑦㉑ 同⑦⑲,第4页。
- ⑦㉒ 《民立报》,1912年7月2日,第10版;13日,第12版。
- ⑦㉓ 《政府公报》(1912年9月)第147号;王冉之:《蒋百里将军与其军事思想》,第31—33页;射陵外史(笔名):《保定军官学校沧桑史》,见《春秋》第63期(1960年),第63—71页。
- ⑦㉔ WDGS6562—29,《1913年中国陆军动态报告》,第2页。
- ⑦㉕ 同⑦㉔。

第十章

辛亥革命引起的思辨

新军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已被证明是毁灭清皇朝的工具之一，而且还在于它是改革年代的重要产物。作为晚清整体改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军的发展是由若干因素促成的。其中首要的一点是，中央政府从地方大员那里汲取创新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1900年以后的各项改革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官员统辖下的若干省份。相反，这些改革是全国规模的。北京力图将所有新式军队置于统一的体系之中，便是最明显的证据，尽管这种努力有时不很成功。正是由于中央起了作用，才为军事改革创造出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

此外，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时期里，对军事职业根深蒂固的守旧意识已经基本消除。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还会自以为是地争辩道：从军事角度看，旧式军队堪当重任。与此相反，只要军费有着落，他们就普遍支持实施新的军事计划。例如，培训新式军官几乎没有遭到保守的士大夫和职位可能受威胁的旧式高级军官的抵制。其实，旧式军队也经历了整顿和进行新式训练的类似过程，而且部分旧式军官被吸收到新军中任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旧式军人都赞同变革。譬如张勋，他仍然依恋陈旧习俗，缺乏任何新的思想观念。他的“辫子军”被公认为这个国家里最令人震惊的事物。革新派和守旧派之间还存在着敌意。但从总体看，倾向于军事改革的进步姿

态，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义和团运动以后的10年改革不是“同治中兴”的重现，并没有努力强化封建帝制赖以存在的儒家机制。与此相反，已经作出的大量努力使儒家机制更有变通性，以便为保卫中国和清皇朝实施各项必需的合理改革。进入20世纪，尤其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以后，儒家学说受到打击，使士绅和受过近代教育的阶层有可能为军事职业作出有用的贡献。

由于外来威胁加剧以及清政府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挑战，与19世纪自强运动相比，满清统治的最后10年里中国学生的爱国主义有了明显增长。爱国主义表现在自强求富、救亡图存等口号中。许多有文化的人把从事军事职业看作光荣高尚的事，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安危，部分原因是军队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升迁的金光大道。同时，不少跟民族主义有关的新的价值观念正开始得到自我表现，使青年学生逐渐改变心理定势。这种状况又作用于陆军改革，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社会以当兵为耻辱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要发现才华杰出的中国指挥官可能还不那么容易，但在清皇朝垮台以前，许多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他们愿意接受某种军事培训，而且一旦受过军事培训往往愿意留在军队中，谋取有职权的位置。没有证据表明新式军事学堂退学率高，也不曾发现受过近代教育的军官对从事军职感到失望而辞职的例子。

尽管遭到有文化阶层中不少派别的长期攻击，清政府还是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作出过自己贡献的。清政府对外来威胁日益警觉。晚清官员们与以往不同，不再屈从于外国人的要求。中国重申了对边疆地区的主权，爱国主义在新军某些部队中得到鼓励。总而言之，清政府对外来挑战已作出了更积极的反应。

不幸的是，新军的发展受到了一大堆问题的阻碍。首先，1909

年以后北京领导集团软弱无力，影响了各项决策，并挫伤了士气。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杰出改革大员张之洞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实施一场广泛深远改革所需要的坚强领导。不久清廷贬黜袁世凯，但无助于改善局势。事实上，1910年至1911年期间新军进展甚微，尽管镇和混成协的数量略有增加。

问题之二，诚如约翰·罗林森所言，“中国军事力量的地方割据状态业已形成”。^①无视中央指令，各省所作的大量改革从内部损坏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妨碍了中央统一指挥。出于种种原因，各省当局往往觉得有必要在政治、财经和战略部署等方面背离北京的规章和政策，对它们各自经管并提供军费的部队保持相当大的控制权。这就妨碍了北京组建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家军队的计划。

还有财政上的问题。中国固然贫穷，但或许还没有穷到供养不起一支中等规模新式陆军的地步。令人头痛的是，大量银钱被腐败无能的官员中饱私囊或不适当地花费掉，而且拨给军费的方式杂乱无章。由于1910年底之前没有国家预算，军费来源更加乌七八糟。但是，新出笼的国家预算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的财务制度还是像过去那样混乱而陈腐。在财务制度得到彻底改革以前，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充分资金，来满足发展陆军之类计划的巨额开销。

另一个问题也必须提及，中国没有或不能为建立近代陆军创设相应的工业基础，而近代陆军的规模几乎取决于工业基础。中国的经济结构尚不精密完善，以致无法生产大批高质量的新式武器，而且也无能力构筑起交通运输的基本框架。对中国这么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部队平时调动和战时增援必须依靠交通运输网络。

尽管如此，新军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

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新军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在19世纪零打碎敲的军事改革与国民党陆军在南京按德国方式进行10年军备整顿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②新军虽然有所不足，但比起中华帝国的旧式军队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新军中出现了全新的有文化军官阶层，他们的主要弱点是经验不够。招募来的士兵，社会层次比以往要高，他们具备多方面的军人素质引人注目。如果领导得当，组织有方，新军士兵是能够形成一支相当优秀的战斗力量的。

跟晚清其他许多改革差不多，新军也花费了政府大量银钱，到头来反而使清政府自食其果。省谘议局的设立使立宪派人士离心离德，发展新军则培养出大批不满现状的军人。新军最终怎么会^③对清皇朝反戈一击的呢？有些中国共产党的学者争辩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性矛盾冲突的结果，即清廷用一支“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来维护“封建政权”本身。^④是否可以把清皇朝称为“封建政权”，不必在这里辩论。然而，论定新军是一支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就不可能被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论断的事实根据是，受过教育的人大批涌入新军任职，由此改变了新军的社会构成。^⑤但是必须指出，有文化的人进入军界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军人仍然出身农民的事实。何况，进入军界的书生士子根本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资产阶级”特性，也没有形成明确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田中义一倾向于把新军看成一支农民军队，他把自己的说法看成定论。如果不试图给新军贴上一张标签，或不为新军杜撰一个社会学的新名词，人们就会争辩道，新军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农民阶级”。事实上，新军是农民、城市贫民、青年学生以及下层士绅的混合体，农民在士兵中占绝大多数。

另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提出，1911年新军起义时，它的编制、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未能发挥多少作用，革命的真正原因是全国革

命总形势造成的影响，以及革命党人在军队里活动的结果。^⑤ 诚然，革命影响是起了作用的，尤其在湖北，那里的激进军人很成功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秘密团体。其他地区的非军界革命党人或新军官兵也作出了革命努力，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破坏了部队对清皇朝的忠诚。

然而，革命策反活动只是造成新军动摇的因素之一。从军事改革性质看，它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性经历。包括编制、技术、教育和训练在内的全面军事改革，有助于军人形成近代化世界观，使他们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不足之处，以及国家面临的问题。这就促使新军滋长起国家民族意识，清政府自己也在大力扶植这种观念。不过，民族主义是双刃利剑，当它被用来反击外来侵略时，也砍向了满清统治者。

变革的过程不是平坦和顺的。尽管清政府竭力提高军事职业吸引力，新军还是纠缠在层层叠叠的问题中，尤其辛亥革命前的两三年里更是问题成堆，其中包括腐败、贪污、欠发俸饷、晋升机会减少以及官兵之间的冲突等。军人的怨愤看来具有传统性质，再加上自然灾害，稻米和其他食品涨价，军队的离心离德就与民众普遍不满交织在一起，对清皇朝的怨愤情绪正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这种形势正中革命党人心怀。到1911年10月，湖北新军士兵已经为发动起义作了充分的准备，并指望能得到其他省份的支持。外部支持对任何一个首举义旗的省份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支持将取决于发动起义地区的军事形势及其他离心离德省份的处境。当省政府能够平息当地的起义，那么起义就成为一次孤立的事件。当湖北革命军人表明他们有能力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时，武昌起义就成为革命成功的信号。武昌起义与以往任何起义不同之处在于，省政府无法扑灭起义烈火。从北方迅速南下增援的保皇部队也未能恢复帝国的地方政府。武昌的军事胜利是令人敬畏的，

把其他不满现状的省份逼到了绝境，使它们不得不迅速作出决断，是否要投入共和事业。南方的新军宣布追随共和事业，北方的部队一般拥护君主立宪制。但是保皇的武装力量并非没有不满情绪，他们也不愿意为旧政权卖命。当北洋军意识到只有经过令人厌恶的持久战才能维持清皇朝时，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高级将领们就开始与南方商谈清帝逊位问题了。

辛亥革命中，新军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关键作用。直接的作用是新军在武装斗争中首当其冲，间接的作用表现在新军给已经不满现状的各省谘议局和地方士绅施加了压力。革命一旦发生，军事指挥官就同省谘议局合作，担任各省的领袖。这种合作是辛亥革命很快成功的原因。省谘议局议员迅即投身于革命，部分原因是清皇朝的宪政改革延宕过久，使他们与政府离心离德，部分原因是他们企图影响革命发展进程，并希望因此增加他们在新政权中的政治力量。总而言之，导致清皇朝最终垮台的，不单单是新军的作用，也不仅仅是立宪派的背离。如果没有新军支持，或许立宪派就不会决然采取行动。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清皇朝无法使新军和非军界精英保持忠诚，它的毁灭已成定局。

新军主要是被辛亥革命瓦解的。一旦清皇朝覆灭，新军就成为麻烦的根源。新军在内战时期大大扩充，以致对尚未充分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尤其在南方，军队变成良莠不分的大杂烩，不少新兵在一两年以前是不可能被招收入伍的。新招募的兵员没有经过身体条件、社会和家庭背景等方面的认真审核考选。新兵的素质是如此低劣，以致他们大量应募入伍成为对军事改革的一种否定，因为军事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征募良家子弟入伍。总统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几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国陆军中还存在着大批来自社会下层的不良分子。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所谓“军阀混战”时期。那时地方军事首领的私家军队大多由不良分子组成。詹姆斯·谢里登曾评论道：“大批城乡无业饥民想加入军队，为了求得温饱和获取或许会有的军饷。至少，他们期望有时有机会进行抢劫……”。^⑥（原文加重点号）这种状况实在太可悲了。1911年以后的中国陆军竟然会迅速堕落到如此境地，那里的地方军事首领实际上将可以收罗到的一切人都拉进他们的私家军队。在冯玉祥、阎锡山等一些“军阀”部队里，军人接受严格的常规训练，但别的部队大多“纪律松懈，训练马虎或者干脆不训练，军队生活混乱不堪，极不正规”。^⑦农民受到无情压榨，市民遭到骚扰和凌辱，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晚清改革家们曾竭尽全力去改善的军人社会形象，至此已经黯然失色。

辛亥革命非但毁坏了以前改革家们的大量成果，而且使传统的文武关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军队在中华帝国虽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政治进程中并未构成长期的、半合法（或至少被接受）的因素”。^⑧中国人一直偏爱受儒学道德约束的文官统治。约瑟夫·尼达姆曾指出，统治中华帝国“主要用经典文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而不是依仗赤裸裸的专制和武力”。^⑨虽然新旧皇朝兴衰交替之际，往往有长时期的军事统治，但每个新皇朝的统治秩序一经确立，通常要削弱军人职权，使之低于相应级别的文官职权。^⑩辛亥革命几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军队与国家官僚政治的传统关系，结果军方占了优势，就像“军阀割据”时期表明的情況一样。1928年国民革命名义上重新统一了这个国家后，稍微倾向于行政官员的天平很快就失灵了。国民党政府动用军队来维持统治，后来中国共产党也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废除帝制与“天子”之后，军方的优势造成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新建的民国政府行使最高权力时缺乏传统的权威。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地方当局都无法依靠尚未建立起来的西方式民主制

度，他们无例外地依赖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至少也得同后者建立友好关系。^⑩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的传统模式，把中国社会瓦解到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政治方向和心理定势的地步，在民国初年政治不稳定的年代里，军方自然倾向于攫取政治权力，而且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军方比文官集团准备得更充分。毫无疑问，令人满意的新思想体系尚未产生时，天子的任何后继者都注定会在统治中遇到重重困难。袁世凯摆脱不了这个规律，1916年以后的北京统治者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军方获取统治职权并在政治进程中扩大了参与权。由此可见，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显然不同于中国历代显朝覆灭过程中将军们的叛变造反。1911年以后的各类政府都在设法维护以文治武的统治秩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人物。他坚信党指挥枪，而枪决不能指挥党。但是，毛泽东不得不发布这种指示，并且再三强调其重要性。这样事实恰恰表明军方影响力在增长。即使在当代中国，文武关系似乎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然而，我们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到，军方作用在1911年以后的年代里愈益重要了。在温文尔雅的人物经常占取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一种新的尚武传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我们已作过讨论，晚清改革家们在促进中国尚武主义方面是取得成功的。中国人民对一支近代化军队的作用和职能给予更高的评价，在遭受外来侵略时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在1911年以后变得比过去更富有战斗精神了。军国民教育得到倡导，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倡生活军事化。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军队为人民服务，人民学习解放军。当然，重要问题一直是：维持武装力量以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如何使军队处于文职官员控制之下。

注释:

- ① 约翰·L·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而奋斗(1839—1895)》,第201页。
- ② 关于国民党陆军的整顿,参阅刘馥:《中国近代军事史(1924—1949)》。
- ③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卷,第158页。
- ④ 约瑟夫·法斯:《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见《东方文库》第30期(1962年),第185—186页。
- ⑤ 同③,第2卷,第456—463页。
- ⑥ 詹姆斯·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情况》,第17—18页。
- ⑦ 詹姆斯·谢里登:《中国在崩溃——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82页。
- ⑧ S·N·爱因斯坦特:《帝国的政治体制》,第172页。
- ⑨ 约瑟夫·尼达姆:《当代中国的历史影子》,见《百年评论》第4期(1964年),第154页。
- ⑩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50—51页。
- ⑪ 费正清、赫肖尔、克雷格合著:《东亚近代化》,第542页;并参阅陈志让:《中国军阀的概念及其派系》,见《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期刊》第31期(1968年),第567页;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军事割据与中央政权(1911—1938)》,第1页。

**附录一 1906年清政府筹建36镇新军及
摊派给各省额数**

省 区	镇 数	省 区	镇 数
京 畿	4*	山 东	1
江 苏	2	江 北**	1
安 徽	1	江 西	1
河 南	1	湖 南	1
湖 北	2	浙 江	1
福 建	1	广 东	2
广 西	1	云 南	2
贵 州	1	四 川	3
山 西	1	陕 西	1
甘 肃	2	新 疆	1
热 河	1	奉 天	1
吉 林	1	黑 龙 江	1
直 隶	2		

* 不包括禁卫军。

** 江北(江苏北部)新军将驻扎在清江浦,受江北提督统辖。

附录二 辛亥革命爆发时新军分布状况

部队番号	军事机关驻地	最高长官
禁卫军	北京南苑	良弼
第一镇	北京北苑	何宗莲
第二镇	直隶保定	马龙标
第三镇	吉林长春	曹 錕
第四镇	直隶马厂	吴凤岭
第五镇	山东济南	张永成
第六镇	直隶保定	吴禄贞
第七镇	江北清江浦	段祺瑞
第八镇	湖北武昌	张 彪
第九镇	江苏南京	徐绍楨
第十镇	福建福州	孙道仁
第十九镇	云南昆明	钟麟同
第二十镇	奉天沈阳	张绍曾
第二十三镇	吉林长春	孟恩远
第二十四镇	黑龙江哈尔滨	不 详

合计：14镇（不包括禁卫军）。

部队番号	军事机关驻地	最高长官
第十七镇	四川成都	朱庆澜
第二十一镇	浙江杭州	萧星垣
第二十五镇	广东广州	龙济光

注：上列3镇建制不全，但在1911年设置了镇指挥机关。

部队番号	军事机关驻地	最高长官
混成协*	直隶廊坊	不 详
第一混成协	奉天沈阳	蓝天蔚
第二十一混成协	湖北武昌	黎元洪
第二十三混成协	江苏苏州	艾忠琦
第二十五混成协	湖南长沙	萧良臣
第二十七混成协	江西南昌	吴介璋
第二十九混成协	河南开封	应龙翔
第三十一混成协	安徽安庆	赵理泰
第三十三混成协	四川成都	施承先
第三十五混成协	新疆乌鲁木齐	马盛富
第四十一混成协	浙江杭州	萧星垣
第四十三混成协	山西太原	姚鸿法
第四十九混成协	广东广州	龙济光
混成协*	陕西西安	王毓江
混成协*	甘肃兰州	赵 倜
混成协*	贵州贵阳	袁保义
混成协*	西 藏	钟 颖
混成协*	广 西	胡景伊

合计：18个混成协（包括实际兵力不足一标的驻贵州混成协，以及兵力或许与此相仿的驻西藏混成协）。

* 表示有关部队的番号不详。

注意：驻新民府的第一混成协已与奉天其他部队合并为第二十镇，因此不列入上表。

部队番号	军事机关驻地	最高长官
第三十九协	不 详	伍祥楨
第四十协	不 详	潘築楹

合计：2协。

注释中的缩写*

- BPP**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Blue Books).
英国国会文件(蓝皮书)。
- FO**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伦敦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
- MP** The Papers of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50—1932, Mitchell Library, New South Wales Library, Sydney.
悉尼市新南威尔士图书馆、米切尔图书馆藏《莫里循文集(1852—1932)》。
- USD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10—29,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美国首都华盛顿档案馆藏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 十进制卷宗, 中国国内事务类(1910—1929)。
- WDGS**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General staf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美国首都华盛顿档案馆藏美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
- WO**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伦敦档案馆藏英国陆军部档案。

* 原著另有8种中文资料用英文缩写表示, 中译本直接用中文表述, 此处不一一列出。

参 考 书 目

Andreski, Stanislav,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Berkeley, 2nd ed., 1968.

斯坦尼斯莱夫·安德雷斯克,《军事组织与社会》。

Anon, ① 'Education of the Soldier', *Translations by Overseas Students*, 7 (August 1903), *Military Affairs*, PP. 38—40.

② 'Famous Countries in History that Exalted Militarism', *The Chinese National Magazine* (1904), PP. 196—8.

安诺: ①《军人之教育》, 载《游学译篇》第7期, 军事类, 第38—40页。

②《历史上有名之尚武国》, 载《国民报汇编》(1904年), 第196—198页。

Baili, 'Military National Education', *The New People's Journal*, 22 (December 1962), PP. 33—52.

蒋百里(方震):《军国民之教育》, 载《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 第35—52页。

Bays, Daniel H.,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Ann Arbor, 1978.

丹尼尔·H·贝斯:《中国进入20世纪——张之洞与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

Bergere, Marie-Chai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PP. 229—95.

白吉尔:《资产阶级的作用》, 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第229—295页。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4 vols, New York, 1967—71.

包德华编:《民国人名辞典》(4卷)。

Brissaud-Desmaillet, 'Situation de l' armee chinoise au 1er Mars

1910', vol. 75 (May 1910), PP. 412—33, trans. into English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s, 53 (September 1910), PP. 1181—95. Reproduced in United States 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attached to No. A—4—a, Reg. no. 159.

布里索特·德斯曼莱特:《1910年3月1日前中国军队的概况》,英译后载《皇家三军杂志》第53期(1910年12月),第1181—1195页,美国海军情报处翻录存档,登记号159。

Brunnert, H. S. and V. V. 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A. Beltchenko and E. Moran, Trans., N. P., 1911, Reprinted in Taipei, n. d.

H. S. 布鲁尼特和V. V. 哈格尔斯特姆:《中国当代政治机制》。

Buck, David D., 'The Provincial Elite in Shantu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Modern China*, 1, 4 (October 1975), PP. 417—46

戴维·D·巴克:《民国时期山东精英的成功与失败》,载《近代中国》第1卷第4期(1975年10月),第417—446页。

Cai Jiou, *The Bloody History of Hubei*, Shanghai, 1958.

蔡寄鸥:《鄂州血史》。

Cameron, Maribeth E.,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1936.

马利贝斯·E·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

Cao Yabo,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Wuchang Revolution*, 2 vols, Shanghai, 193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2卷)。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i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1955.

张仲礼:《中国士绅——他们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Chang Hao, *Liang Ch' i-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1971.

张颢:《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1890—1907)》。

Chan-Lau Kit-Ching, ① *Anglo-Chinese Diplomacy 1906—1920 in*

the Careers of Sir John Jordan and Yuan Shih-Kai, Hong Kong, 1978.

② 'British Policy of Neutrality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II, 2 (1970), PP. 357—79.

陈刘洁贞：①《约翰·朱尔典爵士与袁世凯经历的中英外交(1906—1920)》。

②《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中立政策》，载《东方研究杂志》第7卷第2期(1970年)，第357—379页。

Cheng, Shelley H., 'The T'ung meng-lui, Its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and Finances, 1905—1912',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2.

郑谢利：《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及财务(1905—1912)》，未刊博士论文。

Ch'en Jerome, ① *Yuan Shih-Kai*, Stanford, 2nd ed., 1972.

② '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Their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1 (1968), PP. 563—600.

③ 'A Footnote on the Chinese Army in 1911—12', *T'oung Pao*, XLVIII (1960), PP. 425—46.

陈志让：①《袁世凯》。

②《中国军阀的概念及其派系》，载《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期刊》第31期(1968年)，第563—600页。

③《关于1911—1912年中国陆军的一个注释》，载《通报》第48期(1960年)，第425—446页。

Chen Kuilong, *The Memorials of Chen Kuilong*, n. p., 1913

陈夔龙：《庸盦尚书奏议》。

Chen Qitian,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Taipei, 1969.

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

Chen Xizhang, *The History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Beiyang Army*, 2 vols., Tainan, 1967.

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2卷)。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ai De-
ng et al. (comps), 8vols, Shanghai, 1957.

中国史学会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8卷）。

Chorley, Katherine C.,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London,
1943.

凯瑟琳·C·乔莱：《军队和革命艺术》。

Chu, Samuel C.,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
1926*, New York, 1965.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张謇（1853—1926）》。

Cohen, Paul H., 'Ch'ing Chin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1850—1900', in James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70, PP. 29—61.

保罗·H·科恩：《清国与西方的对抗（1850—1900）》，载詹姆斯·B·
克劳莱编：《近代东亚译丛》，第29—61页。

Committee on Writte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National Com-
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
ce (ed.), *Recollection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6vols, Peking,
196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6卷）。

Da Qing Guangxu xinfaling, Compiled by Shangwu Yinshuguan,
20ce, Shanghai, 1910.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大清光绪新法令》（20册）。

Deng Muhan, *Ten Regulations for the Subversion of the New
Army in Canton*, Guo mindang Archives 352/8.

邓慕韩：《广州新军运动军事章程十条》，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52/8。

Deng Wenhui, 'The Origins of the Society for Common Advance-
ment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system', *Materials on Modern
History*, 3 (August 1956), PP. 7—25.

邓文晖：《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载《近代史资料》第3期（1956
年8月），第7—25页。

Des Forges, R. V., *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

tion, New Haven, 1973.

R·V·德斯·福格斯:《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

Dingle, Edwin J., ①*China's Revolution: A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cord of the Civil War*, Shanghai, 1912.

②*Across China on Foot*, New York, 1911.

埃德温·J·丁勒: ①《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与政治经历》。

②《步行穿越中国》。

Ding Zhongjiang, *History of the Beiyang Warlords*, 4 vols, Taipei, 197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4卷)。

Dong fang Zazhi, Taipei, Reprint, 1967.

《东方杂志》,台北重印。

Dreyer, Edward L. 'Military Continuities: The PLA and Imperial China', in William W. Whitson (e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in the 1970s*, New York, 1972, PP. 3—24.

爱德华·L·德莱尔:《军事的延续性——人民解放军和中华帝国》,载威廉·W·惠特逊编:《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第3—24页。

Dutt, Vidya Prakash, 'The First Week of the Revolution: The Wuchang Uprising', in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PP. 383—416.

维杜阿·普拉卡什·达特:《革命的第一周——武昌起义》,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6—1913)》,第383—416页。

Editorial Committee on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Comp.), *Document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2 Series, Taipei, 1964.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2编)。

Eisenstadt, S. 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London, 1963.

S·N·爱因斯坦特：《帝国的政治体制》。

Elvin, Mark,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 1905—14', in Jack Gray (ed.),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London, 1969, PP. 41—65.

伊懋可：《上海华界的绅士民主政治(1905—1914)》，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41—65页。

Esherick, Joseph W., ①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1976.

② '1911: A review', *Modern China*, 2, 2 (April, 1976), a Special issue entitled 'A Symposium on the 1911 Revolution', PP. 141—84.

周锡瑞：①《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②《回顾1911年》，载《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辛亥革命论文特辑》，第141—184页。

Fairbank, John K.,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8.

②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G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费正清：①《美国与中国》。

②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合著：《东亚近代化》。

Fang Dongying, 'The Japanese-educated Officers' Cliqu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Republic', *Art and Literature*, 54 (1959), PP. 14—18.

方东瀛《留日士官系与民初政坛》，载《艺文志》第54期(1959年)，第14—18页。

Fang Zhaoying, *A Draft List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Taipei, 1962.

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目录初辑》。

Far Eastern Review, ① 'The Chinese Army', October 1909, PP. 171, 175—88.

② 'China's Army and Navy' August 1910, PP. 85—6, 90—7.

- 《远东评论》，① 1909年10月登载《中国陆军》，见第171、175—188页。
② 1910年8月登载《中国的陆海军》，见第85—86、9、—97页。
- Fass, Josef, ① 'The Role of the New Style Army i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Archiv Orientalni*, 30 (1962), PP. 183—91.
② 'Revolutionary Activity in the Province Hu-pei and the Wu-ch'ang Uprising of 1911', *Archiv Orientalni*, 28 (1960), PP. 127—49.
- 约瑟夫·法斯：①《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载《东方文库》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
②《湖北省革命运动与辛亥武昌起义》，载《东方文库》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
- Feisheng (Pseud), 'The True Solider', *The Tide of Zhejiang*, 3 (April 1903), PP. 65—72.
飞生(笔名)：《真军人》，载《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第65—72页。
- Fen Gesheng (Cai E), 'On Militant Citizenry', *Xinmin Congbao*, 1 (February 1902), PP. 79—88; 3 (march 1902), PP. 65—72; 11 (July 1902), PP. 45—52.
奋翻生(蔡锷)：《军国民篇》，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第79—88页；1902年3月第3期，第65—72页；1902年7月第11期，第45—52页。
- Feng Yuxiang, *My Life*, Shanghai, 1947.
冯玉祥：《我的生活》。
- Feng Ziyou, ①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olution*, 4 vols, Chongqing and Shanghai, 1939—47.
② *A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2 vols, Chongqing, 1944, Taipei Reprint, 1954.
冯自由：①《革命逸史》（4卷）。
②《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2卷）。
- Fincher, John, ① '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PP. 185—226.
② 'Elitemilitarism, Populist Tax Protest and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 (march 1979),

PP. 223—36.

傅因秋：①《政治割据与民族革命》，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185—226页。

②《尚武精英、民众抗税和中国的民族革命》，载《远东史学论丛》第19期（1979年3月），第223—236页。

Fung, Edmund S.K., ①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Army, 1911—1913',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 (March 1979), PP. 13—54.

② 'Post—1949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4, 2 (April 1978), PP. 181—214.

③ 'Military Subvers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Modern Asian Studies*, 9, 1 (1975), PP. 193—23.

④ 'Li Yün-hung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Monumenta Serica*, XXXI (1974—1975), PP. 151—71.

⑤ 'The T'ung-men-hui Central China Bureau and the Wuchang Uprising',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7, 2 (1974), PP. 477—96.

⑥ 'The Kung-Chin-hui,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Society',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1, 2 (July 1973), PP. 193—206.

⑦ 'The T'ang Ts'ai-Ch'ang Revolt',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 (March 1970), PP. 70—114.

冯兆基：①《革命与中国陆军（1911—1913）》，载《远东史学论丛》第19期（1979年3月），第13—54页。

②《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论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页。

③《辛亥革命中的军心动摇》，载《近代亚洲研究》第9卷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

④《黎元洪与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

⑤《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载《中国研究会学报》，第7卷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 ⑥《晚清革命团体共进会》，载《东方研究杂志》第11卷第2期（1973年7月），第193—206页。
- ⑦《唐才常起义》，载《远东史学论丛》第1期（1970年3月），第70—114页。
- Gascoyne-Cecil, William, Lord,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1910.
威廉·加斯考尼·塞西尔勋爵：《变革中的中国》。
- Gillin, Donald G.,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1967.
唐纳德·G·吉林：《山西省军阀阎锡山（1911—1949）》。
- Gittings, John, 'The Chinese Army', in Jack Gray (ed.),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London, 1969, PP. 187—224.
约翰·吉廷斯：《中国陆军》，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187—224页。
- Great Britain, ① *Foreign Office Archiv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 1) FO17,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 China.
 - 2) FO228,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hina Correspondence Series 1.
 - 3) FO371, General Correspondence after 1906 Political.
 - 4) FO405, Confidential Print, China.
- ② *Parliamentary Papers (Blue Books)*.
- 1) *China, No. 1 (1912)*,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cd. 6148).
 - 2) *China, No. 3 (1912)*,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cd. 6447).
 - 3) *China, No. 3 (1913)*,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cd. 7054).
- ③ *War Office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 1) WO33, Reports 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1853—1948.
 - 2) WO136, Directorat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1837—1948.

大不列颠, ①伦敦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

- 1) FO17, 1906年以前关于中国的一般函件。
- 2) FO228, 中国函件系列1: 大使馆和领事馆档案。
- 3) FO371, 1906年以后的一般政治函件。
- 4) FO415, 中国密件复印件。

②英国国会文件(蓝皮书)。

- 1) 中国类, 编号1(1912年), 关于中国事务函件(机密文件号6148)。
- 2) 中国类, 编号3(1912年), 关于中国事务函件续编(机密文件号6447)。
- 3) 中国类, 编号3(1913年), 关于中国事务函件续编(机密文件号7054)。

③伦敦档案馆藏英国陆军部档案。

- 1) WO33, 1853—1948年的报告和各类文件。
- 2) WO106, 1837—1948年作战处和情报处文件。

Guo Tingyi, *A Daily Chronology of Event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 vols, Taipei, 196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2卷)。

Hackett, Roger 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1900—1910', *Papers on China*, III (May 1949), PP. 134—69.

罗杰·F·哈可特:《旅日中国学生(1900—1910)》, 载《中国论丛》第3期(1945年5月), 第134—169页。

Hatano Yoshihiro, 'The New Armies', in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PP. 365—82.

田中义一:《新军》, 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第365—382页。

Hedtke, Charles H., 'Reluctant Revolutionaries: Szechwan and the Ch'ing Collapse, 1898—1911',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68.

伊谢力克:《勉为其难的革命党人——四川与清政权的崩溃(1898—1911)》, 未刊博士论文。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Chronology Editorial Committee

(ed.), *A Chronology of Events in the Chinese Republic 1911*, Taipei, 197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1)》。

Hobsbawn, E.J.,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the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1959.

E·J·霍布斯鲍：《仿古的反叛——19、20世纪社会运动陈旧方式的研究》。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1964.

何炳棣：《中华帝国胜利的阶梯》。

Hsiao Kung-chü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1960.

萧公权：《19世纪清廷对农业中国的控制》。

Hsieh Pao-cha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 Baltimore, 1925.

谢宝潮：《中国的政府(1644—1911)》。

Hsüeh Chün-tu,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1961.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

Huang, Philip C., *Liang Ch' i-ch' 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1972.

黄宗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人的自由主义》。

Huang Yuanyong, 'Posthumous Collection of the Writings of Huang Yuanyong', 2 vols, no. 19 in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Yuan Shikai*, edited by Shen Yunlong, Taipei, 1966.

黄远庸：《远生遗著》(2卷)，载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丛书第19辑。

Hubei Xueshengjie, Tokyo, 1933.

《湖北学生界》(1933)。

Hubei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ed.), *Recollections of the First Uprising in 1911*, 3vols, Wuhan, 1957.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3卷)。

Hubei wenxian, Taipei, 1966.

《湖北文献》。

Hu Egong, *A True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Shanghai, 1948.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Hu Hanmin, *The Autobiography of Hu Hanmin*, Reprinted in Taipei, 1969.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1943—4; Taipei Reprint, 1964.

恒慕义：《清朝名人传(1644—1912)》。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York, 1968.

塞缪尔·P·亨廷顿：《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秩序》。

Hu Poyu,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Taipei, 1974.

胡璞玉：《开国战史》。

Ichiko chūzō, ①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PP. 297—317.

② 'The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in Szechwan in 1911',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4 (1955), PP47—69.

市古忠造：①《一个前提——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297—317页。

②《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载《东洋文库研究部回忆录》第14期，(1955年)，第47—69页。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ed.),

① *Materials 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Yunnan and Guizhou*, Pe-

king, 1959.

② *A Posthumous Draft of Xiliang's Memorials*, Peking, 1959.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①《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②《锡良遗稿奏稿》。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Jilin Bran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ed.),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Mass Movement in the North-east*, Changchun, 1960.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近代东北人民运动史》。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68.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Janowitz, Morris,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cago, 1964.

莫里斯·佳维茨：《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军事因素》。

Jiang Zuobin, *The Memoris of Jiang Zuobin*, Taipei, 1967.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

Jia Shiyi, *The Vairous Ministers of Fina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Taipei, 1967.

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

Johnson, William R., 'China's 1911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of Yunnan and Kweichow',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2.

威廉·R·约翰逊：《辛亥革命在云南和贵州》，未刊博士论文。

Joint Hube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ed.), *An Anthology 'n Celebration of the Jubile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2 vols, Hankow, 1962.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卷)。

Ju Zheng, *The Collected Work of Ju Zheng*, Taipei, 1954.

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

Kapp, Robert A.,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1973.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军事割据与中央政权（1911—1938）》。

Kenk, Percy H., *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 London, 1912.

珀西·H·肯特：《满清统治的消亡》。

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1970.

孔斐力：《叛乱与镇压——晚清帝国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96—1864）》。

Kupper, Samuel Yale, 'Revolution in China, Kiangsi Province, 1905—1913',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塞缪尔·耶尔·库伯：《江西的变革（1903—1913）》，未刊博士论文。

Lan Tianwei, ① 'The Meaning of Soldier', *Hubei Xueshengjie*, 1 (February 1903), pp. 57—62.

② 'The Popularisation of the Idea of militant Citizenry', *Hubei Xueshengjie*, 3 (April 1903), pp. 41—6.

③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military Affairs', *Hubei Xueshengjie*, 4 (May 1903), pp. 49—62.

蓝天蔚，①《军解》，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2月），第57—62页。

②《军国民思想普及论》，载《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第41—46页。

③《军事与国家之关系》，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5月），第49—62页。

Lary, Diana,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1974.

黛安娜·拉里：《地方势力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集团》。

Leonard, Captain Henry., 'The Chinese Army', in United States General Records, Central Files, 1906—29, Numerical file, 1906—10,

vol. 217, encl. to no. 2106/2-5.

亨利·伦纳德上尉：《中国的陆军》，见美国综合档案中央案卷（1906—1929）中的1906—1910年部分，第217卷，案卷号2106/2—5。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1958.

约瑟夫·R·利文森：《中国从尊孔到近代化的命运三部曲》。

Lewis, Charlton M., ①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Cambridge, Mass., 1976.

② ‘The Hunanese Elit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5—189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X, 1 (November 1969), PP. 35—42.

查尔顿·M·刘易斯：①《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观念和制度的转变（1891—1907）》。

②《湖南精英与改革运动（1895—1898）》，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1期（1969年11月），第35—42页。

Liang Qicha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Ice Drinking Studio*, Shanghai, n. d.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Li, Dun J. (ed.), *The Road to Communism, China Since 1912*, New York, 1969.

李敦仁编：《通往共产主义之路——1912年以来的中国》。

Liew Kit Sio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Canberra and Berkeley, 1971.

刘吉祥：《为民主政治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

Li Jianno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aipei, Reprint, 1974.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Li Lianfang, *A Record of the 1911 Wuchang Uprising*, n. p. 1947, Reprinted in Taipei, n. d.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

- Li Liejun, *The Autobiography of General Li Liejun*, Chongqing, 1944.
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
- Li Liuru, *Changes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2 vols, Peking, 1962.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2卷）。
- Li Shiyue,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Hunan-Hubei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eking, 1957.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
- Li Shoukong, 'Tang Caichang and the Independence Army', in Wu Xiangxiang (ed.), *Selected Writing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 6, PP. 41—160.
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载吴湘相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卷，第41—160页。
- Liu Fenghan, *The Newfounded Army*, Taipei, 1967.
刘凤翰：《新建陆军》。
- Liu, 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1956.
刘馥：《中国近代军事史(1924—1949)》。
- Liu Housheng, *The Biography of Zhang Jian*, Shanghai, 1958.
刘厚生：《张謇传记》。
- Liu Yusheng, *Miscellaneous Recollections of Shizaitang*, Shanghai, n.d.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
- Li Yuanhong, *The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f Vice-President Li*, edited by Yi Guogan, Taipei, Reprint, 1962.
易国干编：《黎副总统政书》。
- Lu Chu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resident Yuan*, no. 11, in the Series *Yuan Shikai shiliao huikan*, Taipei, 1966.
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见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第11辑。
- Luo Jialun (comp.), *Documents on the Revolution*, vols 1—4, Taipei, 1953.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4卷)。

Mckenzie, F. A., ① *The Unceiled East*, London, 1907.

② 'Four Hundred million Chinamen Awaken, (an interview with Morrison)', *London Magazine*, 25, 150 (February 1911), PP. 695—707.

F·A·麦金尼：①《揭去面纱的东方》。

②《四亿中国人的觉醒——莫里循访问记》，载《伦敦杂志》第25卷第150期(1911年2月)，第695—707页。

Mackinnon, Stephen R., ① 'The Peiyang Army, Yuan Shih-K' ai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I, 3 (May 1973), PP. 405—23.

② 'Yüan Shih-Kai in Tientsin and Peking, *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His Power*',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71.

斯蒂芬·R·麦金诺：①《北洋军、袁世凯及近代中国军阀主义起源》，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3年5月第3期)，第405—423页。

②《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权力结构及源起》，未刊博士论文。

Minlibao, Shanghai, 1910—11, Reprinted in Taipei, 1970.

《民立报》(1910—1911年)。

Minyoushe (ed.), 'Military Education', *Youxueyibian*, 1 (November 1902), junshi, PP. 1—7; 2 (December 1902), jun shi PP. 13—16; 4 (February 1903), jun shi, PP. 17—20.

民友社编：《武备教育》，载《游学译篇》第1期(1902年11月)，军事类，第1—7页；第2期(1902年12月)，军事类，第13—16页；第4期(1903年2月)，军事类，第17—20页。

Morrison, George Ernest, *The Papers of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50—1932*, Mitchell Library, New South Wales Library, Sydney.

乔治·欧内斯特·莫利循：《莫利循(1850—1932)文集》，悉尼市新南威尔士图书馆、米切尔图书馆藏。

Munholland, J. Kim.,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I, 1 (November 1972), PP. 77—95.

金姆·J·芒豪莱特：《法国人失败的交往》，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2年11月第1期），第77—95页。

Nagai Michio, Hara Yoshio, and Tanaka Hiroshi, *Asian Overseas Students and Japan*, Tokyo, 1973.

永井道雄、原芳男和田中宏合著：《亚洲留学生和日本》。

Needham, Joseph, 'The Past in China's Present', *The Centennial Review*, 4 (1964), PP. 145—78.

约瑟夫·尼达姆：《当代中国的历史影子》，载《百年评论》第4期（1964年），第145—178页。

Non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Shanghai, weekly, 1895—1911.

《北华捷报》（1895—1911年）。

Peake, Cyrus,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32.

西鲁斯·皮克：《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民族主义》。

Pekin Shina Kenkyūkai (ed.), *Saishin Shina Ranshin Roku*, Tokyo, 1918.

北京支那研究会编：《最近支那官绅录》。

Powell, Ralph 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1955.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

Pye, Lucian W., 'Armi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sation', in John J. Johnson (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1962, PP. 69—91.

卢西恩·W·派伊：《政治近代化进程中的陆军》，载约翰·J·约翰逊编：《不发达国家中军方的作用》，第69—90页。

Qingchao Xuwenxian tongkao, 300 juan, Reprinted in Taipei, 1958.

《清朝续文献通考》（300卷）。

Qingshigao, Comps. Zhao Ersun et al, 536 juan, Peking, 1927.

赵尔巽等编著：《清史稿》（536卷）。

Qingshi liezhuan, 80 ce, Shanghai, 1928, Reprinted in Taipei, 1964.

《清史列传》(80册)。

Quan Hansheng, 'The Question of Railway Nationalisatio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Zhongguo Xiandai Shi congkan*, 1 (1960), PP. 209—71.

全汉昇:《铁路国有问题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1辑(1960年),第209—271页。

Qu Lihe, *Overseas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aipei, 1973.

瞿立鹤:《清末留学教育》。

Rankin, Mary Backus,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Mass., 1971.

玛丽·巴库斯·兰金:《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上海浙江的急进知识分子(1902—1911)》。

Rawlinson, John L.,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Cambridge, Mass., 1967.

约翰·L·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而奋斗(1839—1895)》。

Reid, J. G., *The 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 1908—1912*, Berkeley, 1935.

J·G·里德:《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

Rhoads, Edward J. M., ①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1975.

②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95—1911',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1974, PP. 97—117.

爱德华特·J·M·罗兹:①《中国共和革命在广东(1895—1913)》。

②《广州的商会(1895—1911)》,载伊懋可和G·威廉·斯金纳合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97—117页。

Rosenbaum, Arthur L., 'Gentry Power and the Changsha Rice Riot of 191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V, 3 (May 1965), PP. 689—715.

阿瑟·L·罗森鲍:《绅权与1910年长沙米骚动》,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34期(1975年5月第3期),第689—715页。

Ross, Edward A., *The Changing Chinese*, New York, 1911.

爱德华特·A·罗斯:《变革中的中国人》。

Schiffirin, Harold Z.,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1968.

哈罗德·Z·斯钦夫林:《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源起》。

Shao Baichang, 'The Causes of the Wuchang Uprising of 1911 and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Hubei wenxian*, 10 (January 1969), PP. 8—22.

邵百昌:《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载《湖北文献》第10辑(1969年1月),第8—22页。

Sharman, Lyo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Stanford, Reprint, 1968.

莱昂·夏曼:《孙逸仙评传——他的一生及其意义》。

Sheling Waishi (Pseud.), 'A Turbulent History of the Boading Military School', *Spring and Autumn*, 63(1960), PP. 63—71.

射陵外史(笔名):《保定军官学校沧桑史》,载《春秋》第63期(1960年),第63—71页。

Shen Jian, 'The Army of Our Country and Its Finance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social science*, II, 2 (January 1937), PP. 343—408.

沈鉴:《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载《社会科学》第2辑第2期(1937年1月),第343—408页。

Shen Yunlong,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i Yuanhong*, Taipei, 1968.

沈云龙:《黎元洪评传》。

Shen Zuxian and Wu Kaisheng, *Records Kept by the Disciple of Ronyan*, n. p., 1913.

沈祖宪和吴闿生:《容庵弟子记》。

Sheridan, James E., ①*Chinese Warlord: The Case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1966.

②*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

- tory, 1912—1949, New York, 1975.*
- 詹姆斯·E·谿里登：①《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情况》。
- ②《中国在崩溃——中华民国史(1912—1949)》。
- Shi J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aipei, 1967.*
- 石锦，《中国现代化运动与清末留日学生》。
- S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1971.*
- 约翰·E·斯雷克尔，《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德国人在山东》。
- Shuntain Shibao, Peking, 1912—1913.*
- 《顺天时报》(1912—1913年)。
- Smedley, Agnes,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 New York, 1956.*
- 阿格尼丝·斯梅德利，《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 Smythe, E. Joan, 'The Tzu-li Hui, Som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Papers on China*, XII (December 1958), PP. 51—68.
- E·琼·斯密特，《自立会——一些中国人及他们的反叛》，载《中国论丛》第12期(1958年12月)，第51—68页。
- Su An and Shi Sheng, 'The Condition of the Yunnan Officers' School',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ed.), *Yunnan Guizhou Xinhai geming ziliao*, PP. 14—19.
- 素庵和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4—19页。
- Subao, Shanghai, 1903.*
- 《苏报》(1903年)。
- Sutton, Donald Sinclai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Yunnan Army, 1909—192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0.
- 唐纳德·辛克莱·苏顿：《云南陆军的兴衰(1909—1925)》，未刊博士论文。
- Swift, Major Eben, 'The Chinese Army, Its Development and Pre-

sent Strength', in George H. B. Blakeslee(ed.), *China and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17, PP. 177—86.

埃比·斯威夫特少校：《中国陆军的发展与目前兵力》，载乔治·H·B·布拉克斯利编：《中国与远东》，第177—186页。

Tao Juyin, *A History of the Beiyang Warlords*, 6 vols, Peking, 195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62—1874*, Stanford, 1957.

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汇览(1862—1874)》。

The China Year Book, edited by Montague H. T. Bell and H. G. W. Woodhead, London, 1912—16.

蒙塔古·H·T·贝尔和H·G·W·伍德海合编：《中国年鉴》(1912—1916年)。

The Times, London.

《泰晤士报》。

Thomson, John Stuart, *China Revolutionised*, Indianapolis, 1913.

约翰·斯图尔特·汤姆森：《革命化的中国》。

Tsang Chiu-san, *Nationalism i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2nd ed., 1967.

曾昭三：《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

United States, ①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10—29,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②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③War Department, General Staf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美国首都华盛顿档案馆藏：①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十进制卷宗，中国国内事务类(1910—1929)。

②美国海军部情报处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

③美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

Wan Dixiu, *A Letter from Wan Dixiu to Zeng Shengsan Discussing the 1911 Uprising*, Guomindang Archives, 353/3.

万迪休,《万迪休与曾省三论辛亥首义节要书》,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53/3。

Wang Jingyu,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Industry*, vol. 2, 1895—1914, Peking, 1957.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895—1914)。

Wang Ranzhi, *General Jiang Baili and His Military Thought*, Taipei, 1975.

王冉之:《蒋百里将军与其军事思想》。

Welch, Claude E. Jr(e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 Read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Change*, Belmont, 2nd ed., 1971.

小克劳德·E·韦尔奇编:《政治近代化——政治变革比较读物》。

Wen Gongzhi,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2vols, Taipei, 1962.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

Wong Young-tsu, 'Popular Unrest and the Revolution in Jiangsu', *Modern China*, vol. 3, no. 3 (July 1977), PP. 321—44.

汪荣祖:《民众骚动与江苏革命》,载《近代中国》第3辑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Wright, Mary Clabaugh(ed.), ①*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②*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1957.

芮玛丽编:①《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②《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足点——同治中兴(1862—1874)》。

Wu Tiecheng, *The Memoirs of Wu Tiecheng*, Taipei, 2nd ed., 1971.

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

Wu Xiangxiang, *Political Figures of the Republic*, 2vols, Taipei, 1969.

- 吴湘相:《民国政治人物》(2卷)。
Xinmin Congbao, Yokohama, 1932—7.
《新民丛报》(1902—1907)。
- Xu Daolin, *Collected Writings and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Xu Shuzheng*, Published in one Volume, Taipei, 1962.
徐道邻:《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 Xu Tongxin,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Zhang Zhidong*, 2 vols, Shanghai, 1947.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2卷)。
- Yan Xishan, *The Memoirs of Yan Xishan in His Early Years*, Taipei, 1968.
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 Yang Duo, 'A Reappraisal of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Wuchang Uprising', *The Jiangsu Museum Monthly*, Vol. 2, no. 1, PP. 1—6 (date unknown).
杨铎:《武昌革命真史之商榷》,载《江苏博物馆月刊》第2辑第1期,第1—6页。
- Yang Shiji, *A History of Hunan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Changsha, 1958.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
- Yang Yuru, *A First Account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eking, 1957.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 Young, Ernest P., ①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1977.
② 'Nationalism, Reform 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James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70, PP. 151—79.
③ 'Yuan Shih-K'ai's Rise to the Presidency', in Wright(ed.), *China in Revolution*, PP. 419—42.

- ④ 'The Reformer as a Conspirator',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 al.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
- 歇内斯特·P·扬: ①《袁世凯总统——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与专制统治》。
- ②《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改革及共和革命》，载詹姆斯·B·克劳莱编:《近代东亚译丛》，第151—179页。
- ③《袁世凯升任总统》，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419—442页。
- ④《改革家如同谋叛者》，载阿伯特·费尔惠克等编:《中国近代史探讨》。
- Zeng Shengsan, *The Origins of the Wuchang Uprising*, Guomindang Archives 335/7.
- 曾省三:《武昌首义之源起》，国民党档案馆藏，编号335/7。
- Zhang Guogan,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1911 Revolution*, Shanghai, 1958.
-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
- Zhang Nanxian, *The Known Record of the Revolution in Hubei*, Shanghai, 1945.
-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 Zhang Pengyuan, ① *The Constitutionalist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Taipei, 1963.
- ② 'The Constitutionalist', in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PP. 143—83.
- 张朋园:①《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 ②《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143—183页。
- Zhang Shoubo, *An Outline of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Recent Hankow*, Hankow, 1911.
- 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
- Zhang Yukun, *A Factual Account of the Literary Society's Uprising in Wuchang*, Peking, 1952.
-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 Zhang Zhido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Zhidong*, comp. Wang Jinqing et al., Reprinted in Taipei, 1963.
王晋卿等编：《张文襄公全集》。
Zhejiangchao, Tokyo, 1903.
《浙江潮》(1903年)。
- Zhengfu gongbao*, Peking, 1912—28, Reprinted 1912—16, Taipei, n.d.
《政府公报》(1912—1928年)。
- Zhou Kaiqing (ed.), *Sichua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Taipei, 1964.
周开庆编：《四川与辛亥革命》。
- Zhou Shanpei,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Railway Dispute in Sichuan*, Chongqing, 1957.
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
- Zhu Wu, 'The Army of Our Country', *The National Spirit*, 1, 21 (1910), PP. 47—74.
竹坞：《我国之陆军》，载《国风报》第1辑第21期(1910年)，第47—74页。
- Zhu Yanjia, 'Wu Luzh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Zhongguo Xiandai Shi Congkan*, no. 6, PP. 161—232.
朱炎佳：《吴禄贞与中国革命》，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辑，第161—232页。
- Zou Lu, *A 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Taipei, Reprint, 1965.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译 后 记

1990年,我在澳大利亚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研究重点是中国近代军事史。通过学术交流活动,美澳学者傅因秋、安娜、石林等向我推荐英文版《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直译《中国革命的军事因素》)。我注意到西方学术刊物对这部著作给予广泛好评,并获悉作者冯兆基博士有意将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学术著作的翻译以准确为第一要义。在翻译过程中,冯博士始终与我保持书信往来,反复切磋商讨,努力使译文忠于原著。为了避免译文欧化,我三易其稿,拆解长句,以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冯兆基博士出生于广东,早年去港,获香港大学硕士学位后,旋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深造,28岁即取得博士学位,迄今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余年,成为国际知名学者。

他成名不忘根本,来信说,身为炎黄子孙,很希望中译本早日在中国出版,使大陆和港台读者都能读到这部著作。他还特地关照,中译本一定要写上他的中文姓名,切勿音译,因为中译本是献给自己同胞的。他对故土和同胞的深厚感情萦萦于怀,流露在书信的字里行间,也隐隐包含在著作的行文之中。他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促成中译本的出版。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的老师沈渭滨教授也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学者,悉心指导众多的学生。我研究军事史,得到他长期指导。经他鼓励和大力支持,我才下决心搁下手中的工作,尽心竭力地翻译这部著作。沈渭滨教授撰写的序言,必将为中译本增辉。

张云教授鼎力相助，使中译本在出版以前就引起军史研究者的关注。作为责任编辑，他在《军事历史研究》上连载了部分译稿，还全文刊出长篇书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刊登了一章译稿。我的好友徐有威熟悉史料，待人诚挚。他专程来我家校阅部分注释中的作者译名，还借给我工具书，便于我进一步勘误。我要说明的是，在注释部分，外籍华裔历史学家都用他们的中文姓名；非中国血统的史学家，凡中文称谓为中国学者熟知者，尽可能沿用；其他学者姓名音译，适当顾及已有译法。

我还要感谢郭太素、方春满、孙孝煌、郭昭如，她们主动分担了部分工作，对译稿提出修改意见。她们虽然不是人文科学专家，但不乏真见灼识，真可谓“旁观者清”。尤其是我80余岁高龄的老母，放下她每天必读的书刊，为我抄写部分稿件，以其深厚的中英文功底，指出了译稿中若干错误。我感动之余，生发出与冯兆基博士同样的感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所不在，亲友师长的关怀帮助令人感到温暖。

学术译著的出版是不容易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格外困难。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受译稿，经过精心校审，使中译本终于出版。我对编辑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郭太风

1993年2月27日